·党史党建·

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王新娣，刘　刚
（安徽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摘要：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源，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非凡的意义和价值。高校作为大学生意识形态塑造的主流阵地，应引导学生深刻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探寻伟大建党精神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从文化、平台、学术、实践等多方面探寻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用伟大建党精神培育当代大学生坚定信念理想、践行使命担当。

关键词：伟大建党精神；科学内涵；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1；D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01-05

1　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

伟大建党精神是在特定历史下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人民性和发展性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彰显，是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赓续。

1.1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守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一直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要求自己，坚持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探索中不断成长，直至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饱受磨难，但一路走来仍能经久不衰，不断壮大，创造了很多奇迹，取得了很多成就，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坚守理想，始终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真理建成信念，将理想筑成信仰，铸就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以坚持真理为标准，用科学的理论方法指导推进党的伟大事业，坚持在具体实践和时代变化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系统、完备、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建党精神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1.2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践行的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担当的是为伟大复兴中国梦，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使命。“践行”二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根本不同，实践性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征，我们党不仅仅对人民作出承诺，更重要的是用行动证明它、实现它；马克思主义不仅仅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用科学的理论改变世界。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忠诚的实践者，自建党之初便一直用实际行动诠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庄严承诺，伟大建党精神也为党的奋斗指明了具体的实践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实践的“精神支柱”。担当使命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方方面面，党的担当精神促使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立足新民主主义时期基本国情，推陈出新，成功开辟了适合当时中国发展的革命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结合实际国情进行社会

收稿日期：2023-05-18
基金项目：安徽省 2020 年高校思政工作能力提升计划“高校思政工作领军人才队伍建设项目”（编号：sztsjh2020-6-9）、安徽农业大学 2021 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研究课题：新时代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实效性研究（编号：ZX2021yb07）、安徽省 2021 年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习近平关于群众观点的重要论述研究”（编号：YJS20210252）和安徽省 2022 年新时代育人质量工程项目“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研究”（编号：2022xscx04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新娣（1999—），女，安徽亳州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 2021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刘刚（1997—），男，安徽合肥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2020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主义建设与改革，满足了基本物质需求，中国人民从此“富起来”了；开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守正创新、自立自强，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稳步前行，在党的坚强带领下，我们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越来越近，逐步实现“强起来”。

1.3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无畏生死、艰苦奋斗、不懈斗争、勇往直前等鲜明意志品格，既包括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牺牲个人生命的“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畏精神，也包括敢于和违背国家意愿等“歪门邪道”行为作斗争的精神。回顾历史征程，在多少民族危亡时刻无数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斗争，将国家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新时代新征程也时刻不忘斗争的重要性，并提出要进行“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国共产党不但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出现、美国的贸易战、台湾的紧张局势等都需要我们灵活把控、善于斗争。同时，我们党在面对现存的一些不良行为、风气时，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伤，纵观世界上的其他红极一时的大党，大多衰败于没有直面自身问题的勇气，中国共产党不避讳向自我内部问题作斗争，这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也源于我们的一切斗争都以初心使命为出发点，始于此也终于此。我们要弘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精神力量。

1.4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立场，九千多万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就是对人民忠诚，对人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才能不负人民。每一位共产党员在入党前都会对着党旗宣誓，“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是每一位共产党员入党时许下的庄严承诺，他们也在用实际行动践行这一誓言，无论是解放战争时期用自己的身躯托举炸药包炸毁敌人碉堡的董存瑞，还是疫情防控期间敢于发声、敢于同新冠病毒作斗争将生命献给抗疫事业的李文亮，都是对“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信仰者、实践者。人民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决心，所以人民群众信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中国共产党从曾经的一个风雨飘零的小船，到如今成为一个行稳致远的巍峨巨轮，创造许多辉煌奇迹，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始终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党和人民一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正是因为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忠诚的信仰和不负人民的坚守，才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伟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2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

伟大建党精神呈现了一幅党百年奋斗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是一个庞大、精彩、鲜活的历史教科书，高校应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时代新人。

2.1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彰显了党的先进性，有利于夯实大学生的信仰之基

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先进，是因为他所总结的人类发展规律、社会发展经验可以和世界各国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马克思主义先进，中国共产党必然先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举马克思主义鲜明旗帜，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决抵制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习近平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这就是党的先进性所在。深刻理解党的先进性是坚定大学生信仰的基石，让他们知道党、了解党，知党才能信党，信党才能爱党，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坚定无论是对自身发展还是国家的发展都影响深远。习近平指出：“心有所信，方能行远。”[3]一个人没有了信念与信仰，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不知来时的初心，更不知“飞”向何方，要利用伟大建党精神的教育，让无数青年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积极投身到祖国伟大事业的建设中去。

2.2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展现了党的宗旨性，有利于培育大学生的家国情怀

党的宗旨性是对一个政党成立的根本目的和意图的阐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不变的宗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仅仅阐述了党的初心，也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使命担当，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体现在一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不怕牺牲、不畏艰苦、舍小家为大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新时代的发展贡献努力与牺牲。[4]大学生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中坚力量，必须站稳人民立场，筑起担当脊梁，向先辈楷模学习，树立大局意识、民族意识与责任意识，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磅礴力量。对大学生进行伟大建党精神教育，让大学生明确党的宗旨，并在将来的实践、学习、工作中身体力行，学习先辈精神，增强对时代、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做一些对社会、对国家、对自己人生有意义的事情。

2.3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突出了党的进步性，有利于塑造大学生的精神风貌

有前进就会有阻碍，有阻碍就会有斗争，有斗争就会有胜利，有胜利就会有牺牲。“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追求进步、追求前进的政治决心和政治勇气。翻开历史画卷，这一精神的展现比比皆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有“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的林觉民，和平年代有“拯救别人，燃烧自己”的火场救人英雄王峰等，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更值得珍藏并弘扬的是他们的精神财富，有利于塑造大学生不怕挑战、不畏风险、勇敢斗争、破除万难的风貌。当代大学生生在和平年代，但不能忘记舍生忘死为我们奋斗出如今幸福生活的先烈们，要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在困难面前敢于斗争、敢于进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所面临的新挑战，不能停止前进的步伐，要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教育学生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用全新的精神风貌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

2.4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体现了党的纯洁性，有利于锤炼大学生的忠贞品格

党的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政党，本质要求就是对党忠诚，对党所代表的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忠诚。[5]“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八个字准确体现了党的纯洁性。过去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一穷二白到满足人民基本的物质需求再到现在的致力于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无不体现着为民情怀。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又致力于党风廉政建设，真真正正做到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走进老百姓的心窝里，这对大学生的教育作用不仅体现在让他们站稳人民立场，知道国家社会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还体现在对他们未来的警省作用，当大学生走向工作岗位时，深刻认识到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事业才是体现自身价值的意义，而不是追求拜金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对防范错误思潮的侵入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切入点，教育大学生要紧跟时代脚步，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美丽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3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为大学生提供了内容丰富、价值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大学生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主体，要注重把握认知能力、思维方式、个性特征，不断探索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新途径，培育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好青年。

3.1　品文化——以文化涵养精神

学生是校园文化形成的重要主体，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建党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可以培养学生知史爱党的情怀，提升党史学习的时效性、长效性，充分发挥精神文化的隐性教育作用。

第一，加强校园物质文化建设。首先，充分利用校史馆、人物雕塑等标志性建筑，将建党精神融入校史发展。每个高校的建设发展都有着曲折的过程，学校可以组织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参观校史馆，了解学校发展的艰辛奋斗历程，培养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将建党精神融入学生自身、贯彻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其次，发挥图书馆的育人作用。学校图书馆要设立“建党精神学习专栏”，购买时事政治材料、党史故事资料、党史教育读本等供师生阅读、学习和研究。再次，充分利用学校宣传栏和校园广播的作用。将建党精神的内涵、特征等用宣传海报的形式放置在宣传栏中。校园广播作为校园资讯的重要传播途径，以开设“宣扬建党精神”特色栏目，每天通过广播播放一则建党精神小故事，使学生能在校园的整体氛围中，受到文化的隐性促进作用。

第二，充分发挥校园精神文化的作用。一方面，发挥思政课堂环境育人的功能。思政课堂作为高校思政教育的主要阵地，要充分发挥思政课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作用。首先，思政课教师要

加强理论学习，加深对建党精神的理解与感悟，以自身经历与体验感染大学生，在情感上同大学生产生共鸣。其次，要创新教学方式，使理论阐释与实践运用相结合，让学生感兴趣才能使其认真学、主动学。再次，还要改变纯粹的理论灌输思路，要以身边的人、事、物为切入点，提升课堂的时效性。要变换考核方式，调动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让学生成为讲述建党精神的主体，教师在政治性上、理论性上进行把控，切实发挥老师和学生“双主体”的作用及辩证关系，增强思政课堂的交互性，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另一方面，邀请抗战老兵、优秀党员等进校园讲述红色故事。抗战老兵作为保家卫国的亲历者、国家建设发展的见证者，有着特定的历史情结和独特的历史经历，能够以不同的视角解读建党精神、阐释其价值意蕴，以期增强学生对红色文化、历史、精神的高度认同，加深对建党精神的感悟与理解。优秀共产党员是每个领域的佼佼者，具有不同的、独特的职业认识，可以从不同的职业、领域视角解读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达到以情化人。

3.2　搭平台——以网络促进融合

互联网的便利性、多样性、复杂性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互联网＋”的背景下，高校思政课堂不再局限于实体教室，课堂资源多元化、形式多样化，为建党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新动力、新方法。

第一，加强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化作用。2022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6]而青年大学生更是使用网络的主体。如今自媒体时代，网上的新闻各式各样，思想政治教育也要紧跟时代潮流，将伟大建党精神转化成深入浅出，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结合大学生流行的话题，撰写大学生容易接受的公众号文章或视频进行推送传播，让大学生更好地了解、接受并弘扬它。[7]善于让学生产生共情，用细节打动学生、感化学生。

第二，加强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作用。习近平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8]积极运用网络开展网络红色课堂，利用网络建设网上党支部、网上团支部，开设“伟大建党精神”专栏，开展以“建党精神”为主题的网络知识竞赛、网络征文比赛、颂党史微视频比赛，激发学生对党史学习的热情，加深对“建党精神”的深刻理解，领悟其精神内涵。

3.3　研学术——以学术深挖理论

自伟大建党精神提出以来，学界学者们纷纷展开研究。2022年10月10日以“建党精神”作为主题在CNKI上搜索，论文数量有2782篇，可见对建党精神的理论研究热度高涨。随着时代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日益变化，仍需不断挖掘“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动能。

第一，高校要组建“建党精神”的研究团队。高校作为科研的重要场所，要立足学校特色优势，不断挖掘建党精神的教育价值，为高校育人工作赋能。在理论研究中不断拓宽建党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路径，将理论运用于教学实践中，通过调整教学方法、更新教学内容等，发挥伟大建党精神的育人功能。要加强高校研究团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交流了解各个高校的教学优势，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在研讨过程中，不断激起思想碰撞，可以在研讨中丰富完善“建党精神”的理论教学体系。

第二，指导和鼓励学生进行“建党精神”研究。学生在查阅文献资料、经典著作的研究过程中，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建党精神的学理性，了解其中的多重逻辑和科学内涵。在研究过程中也可以了解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在关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原因所在，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激发广大学生对建党精神的研究兴趣，让伟大建党精神真正可以进课堂、进课本、进学生头脑。

3.4　重实践——以实践追求真知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为实践对象的活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只能是实践。[9]因此，在理论研究的同时，要把建党精神提升到实践层面。

第一，积极组织以“宣传建党精神”为主题的团队，开展理论宣讲活动，将理论转化为实践行动，促进建党精神在整个大学生群体中入脑入心。[10]鼓励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关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主题的社会调查、公益活动和社团活动，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让他们主动接触有关伟大建党精神的活动，引领学生向革命先辈、英雄人物学习，主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愿意为国家的伟大事业奋斗，学习先辈们那种“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精神，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所能及的力量。

第二，定期开展学习“建党精神”的红色党建、团建活动。以班级、专业等为单位，依托红色教育

基地开展活动，充分发挥党支部、团总支的引领作用，提升大学生的情感体验。红色教育基地走访体验式教育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共鸣，所以，高校可以沟通有关部门，创建相关实践教育的党建、团建活动基地，让学生走出课堂，到先辈们流血的地方，走访革命老兵，近距离地感受英雄人物，听他们那一代人的故事，产生情感共鸣，这样的实践方式更鲜活，更能激励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从而达到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4　结束语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兴党、强党的思想之基，是照亮中国共产党未来奋斗之路的光明火炬，是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百折不挠、砥砺前行的重要精神引领。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以及世纪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相互叠加，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培养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责任担当具有重要意义。扎实推进建党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培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努力奋斗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1] 辛向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1(4)：12-18.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76.

[3] 习近平给复旦大学青年师生党员回信勉励广大党员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N].人民日报，2020-07-01(01).

[4] 辛向阳.当代中国伟大社会变革的性质[J].理论探讨，2019(1)：11-15.

[5] 唐皇凤，梁新芳.中国共产党百年自我革命的基本经验[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9(1)：16-26.

[6] 王思北.“数字”点亮美好生活：透视第五十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N].新华每日电讯，2022-09-01(3).

[7] 陈国锋，段慧云，魏超，等.以微信为载体创新有机化学“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探析[J].广东化工，2021，48(6)：167-168.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78.

[9] 郑永廷.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及其发展[J].教学与研究，2001(3)：49-52.

[10] 李倩.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青年思政教育的价值、困境和路径[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1(5)：6-10.

责任编辑：仲耀黎

Integrating the Great Spirit of Party Building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ANG Xindi，LIU Gang

Abstract：As the source of the spiritual lineage of Communists，the great spirit of Party build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mainstream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shaping of college student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guide students to deeply grasp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great Party building spirit，explore 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the great Party building spirit in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nd explore practical paths of integrating the great Party building spirit into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culture，platform，academia and practice. With the great spirit of Party building，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be cultivated to have firm beliefs and ideals ，fulfill the mission and take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the great Party building spirit；scientific connotation；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practice path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内涵·问题·路径

魏世梅,江亚琦
(河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摘要: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乡村治理实践中仍面临着主体作用弱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不足、“三治”未能实现完全统一,以及乡村治理“信息化”滞后的现实困境,要在强化“党建引领”的基础上构建多元主体共治格局,运用各种措施提升多元主体的共治能力,实现自治、德治、法治的融合统一,提升“智治”水平,以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06-05

乡村治,百姓安,乡村作为党在农村的重要基层组织,其治理能力直接关系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乡村治理不仅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国家综合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1]78-86因此,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规定了乡村治理也必然要以现代化为根本取向。[1]78-86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我国乡村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各个乡村的差异性和工作的复杂性,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学界较少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角度研究乡村治理的现状和未来。在乡村治理推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探析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困境可以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全新的路径选择。

1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是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2]这一话语体系既有宽广的世界历史眼光,也旗帜鲜明地凸显了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深刻的阐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是指导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武器,而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潜力所在。具体而言,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1　乡村治理的制度化[3]

现代化乡村治理的基本特征就是用规范的制度来约束乡村治理的过程。对于乡村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而言,必须遵守相应的制度与规范。因此,乡村治理活动的开展需要在一定的制度与规范中进行。唯有如此,才能够确保乡村社会治理不偏离正确的轨道。乡村治理制度化就是把民主集中制落实到乡村社会,并将其贯穿于村务管理、决策、治理、监督的各个环节与流程中。而村级治理的制度化建设能够再造制度运行的环境与基础,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2　乡村治理的民主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2]列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并提出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在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必须彰显人民中心地位,解决好乡村治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能够惠及所有乡村居民。[4]首先,要充分落实基层群众的自治权,保障村民能够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规避基层政府对村里各种事务的一揽包收现象,解决村民委员会自治性缺失、村民自治参与度不高、参与态度消极、基层民主落实不够等诸多治理问题。其次,除了基层政府外,其他各类

收稿日期:2023-05-20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全球正义问题研究”(编号:21YJA720004)和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研究”(编号:2023-ZDJH-47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魏世梅(1965—),女,河南温县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发展;江亚琦(1995—),女,河南洛阳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2021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

民间组织也应该在现代民主法治规则下行使其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权利，构建基层民主协商的多层次治理格局。

1.3　乡村治理的德教化

乡村治理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人的道德水平的现代化。道德文化作为内心的法律，它主要通过改变人的内心进而对个体的思想观念进行教化，导引社会价值秩序。法律则是以看得见的惩罚对人们的外在行为进行规范，以此约束人们的不良举止，两者都是社会调整的重要方式。实现乡村治理的德教化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的乡村文化认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公序良俗，用“软约束”的德治聚合力量，治理乡村。

1.4　乡村治理的法治化

法治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坚实后盾。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在乡村场域的治理规范作用。一方面，要健全农村的法律法规体系，营造有法可依、寻法有道的乡村法治环境，同时，也要做好对农村困难群众的安抚和法律援助工作；[5]另一方面，要运用多种载体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充分调动村组干部和党员志愿者的积极性，组织开展政策法规宣讲，服务乡村基层治理，使干部和民众的法律素养得以提升，切实提高乡村法治文明程度。

1.5　乡村治理的科学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乡差距存在着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如何把未来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富裕、美丽的乡村社区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实现乡村治理的科学化尤为关键，这样既能够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也能满足国家治理的现实要求。[6]随着社会的加速转型，面对差异化、复杂化、多元化的社会现状，行政化、碎片化、单一化的乡村治理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应将数字治理引入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加快推进实施“互联网＋农村”战略，真正将现代科技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深度融合起来，切实提升乡村治理实效。

1.6　乡村治理的公平化

在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引领，强调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并使其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要求和实践方针。实现乡村治理公平化，首先，必须处理好城与乡的关系，必须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二者的地位平等与功能互补，也要注重对乡村内在价值的尊重与保护。其次，顺应乡村自然发展规律，加强对传统村落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就乡村治理主体而言，公平化就意味着要处理好政府、集体和农民的关系，核心就是实现对农民自治权的尊重和保障，全面落实村民自治，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性、积极性、自主性，切实保障和实现农民当家作主。

2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依照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和决策部署，全国各地各村镇围绕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极具地方特色的经验模式，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乡村治理主体作用弱化

乡村治理主体是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机构、主体和个人。现代化乡村治理主体包括：国家权力主体、村庄自治主体和市场等利益相关主体。首先，基层政府作为国家权力主体，是乡村治理的首要核心主体，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因为自身认识不足、政治站位不高等原因未能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思想懈怠等问题，认为乡村没有价值、不好管理，致使农民群体成了“一盘散沙”。其次，农民是乡村的主体，也是乡村治理的核心。但很多村庄人口大量外流，村子逐渐“空心化”，遴选出合格的村委班子成员都十分困难，更遑论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究其原因：一方面，农村本土的资源禀赋和现实条件限制了本村村民的发展，多数村民选择离开农村，涌入各方面较为发达的城市务工经商，造成乡村治理中坚力量的流失；另一方面，居住在乡村的多为“三留守”村民，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的限制，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态度消极，对于乡村如何治理处于被动状态，对于怎样实现现代化的治理更是有心无力，导致基层乡村的治理工作缺乏创新性，加之急剧的城镇化进程也在不断地冲击乡村传统文化，使得农民主体的治理意识也相对弱化，部分村民认为乡村治理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与自己并无太多联系，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在“最后一公里”也并未发挥根本作用。再次，农村社会组织的缺乏也成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阻碍。大多数乡村缺乏兼具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志愿性等多重作用的农村社会组织，即使部分农村拥有了基金会、互助会、理事会、乡村精英组织等社会组织，但他们的组织能力有限，没有从村民个体的实际需要出发，不能找准自己的

角色定位,难以对乡村治理作出有效回应。具体有几点问题:一是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分布不合理,多数社会组织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中西部乡村社会组织力量严重不足;二是社会组织的层级结构与乡村治理的需要不匹配,县以下的乡村社会组织数量严重不足;三是社会组织的类型结构不匹配现实需要,乡村最需要的服务型社会组织非常欠缺。作为农村新型社会经营组织,乡贤能够利用个人威望和乡规民约有效化解乡村基层的各类矛盾,改善乡村治理,对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良好秩序的运行发挥重要作用。但在某些乡村中乡贤却总以旁观者身份自居,没有尽其所能地投入乡村社会的治理中。

2.2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不足

能否做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衡量现代化治理效能的重要标准,同时,它也是推动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向。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矛盾依然存在,乡村治理问题愈加复杂化,乡村社会的流动性也在不断加大,“单个”利益主体转变为“多元”利益主体,“单位人”变为“社会人”,这些情况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但是,传统的乡村治理方式还未转型成功,基层干部在乡村治理的具体工作落实中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困难。首先,基层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尚未厘清。在乡村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由于各个主体间存在能力差异,其社会参与也就呈现出一种非均衡态势,主要体现在人员配置、组织机构、资源支持等方面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也就导致了多元主体在乡村治理中不能完全发挥其作用。村民理事会、村妇女代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各种自治组织代表了不同的乡村利益群体,能够直接了解农民群体的现实诉求和利益需要,在乡村社会中能够发挥其独特作用。但基层政府在治理实践过程中却对乡村各种事务进行直接“接管”与“替代”,这就削弱了乡村社会自治组织的功能发挥,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多元化、健康化、可持续化发展。[6]因此,在党建引领下,实现多元主体在乡村治理事务中各尽其能、各显其才,也是乡村治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3 自治、法治、德治未实现有机结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7]但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从理念到实践、从悬浮到深入,还存在着自治水平低下、法治意识薄弱、德治力量微小等问题。第一,基层群众自治需要文化基础,乡村在这一方面显然处于薄弱地位,村民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限制,对农村的自治制度在认知上存在着偏差或误解,简单地认为自治就是自己想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缺乏对村民自治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的认识,致使乡村自治形势严峻,自治水平也相对低下。第二,乡村的封建传统思想还存在,村民的法制观念和法治意识薄弱,村民个体间的矛盾纠纷日趋复杂突出,他们反映问题、解决矛盾、维护权益不遵循正规的法制渠道,不懂法律也不相信法律,存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思想。乡村的种种不良行为与我国法治国家的要求是相悖的,也与乡村治理现代化背道而驰。[8]第三,乡村地区突出表现为德治力量较小。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主要依靠道德伦理来维持乡村的秩序,保障其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行。德治不仅对村民自治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而且对依法治村也发挥着保障性的作用。由于受西方“利己主义”思想以及“金钱至上”观念的冲击,农村地区也出现偎慵堕懒、奢靡攀比、媚富欺贫的不良现象,致使德治在农村的作用被削弱。

2.4 乡村治理“信息化”滞后

近年来,全国上下以数字治理为切入点发动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开启了“数字治理”的新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距离“智治”目标还有差距,乡村治理“信息化”水平仍显滞后。数字治理只是一个工具,能否真正发挥其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治理主体的水平高低。从治理主体来看,基层政府作为乡村治理的首要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但由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数字技术认识不足,自身数字化素养不高,导致本应反映群众诉求的政务公众平台沦为了“僵尸平台”,群众有求却无应;APP、工作群等数字平台本来是用来提高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办事效率的,但现实中却出现了工作过于注重“留痕”“晒照”,忽略实效,助长了弄虚作假的歪风邪气。基层政府缺乏对数字化治理的战略认识,没有利用数字技术优化政务工作的能力。同时,治理主体间为了自身利益拒绝资源共享,在治理过程中存在着“数据壁垒”,信息不能进行正常的交互流通,难以发挥多元主体协同乡村数字治理的优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乡村数字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从治理对象来看,主要是乡村的居民数字化思想落后。当前,乡村居住的留守居民主要是老人、妇女及

留守儿童，他们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较低，对数字化治理的接受程度也很弱，甚至对数字化治理产生了抵触心理，认为数字技术影响了自己的正常生活，反对利用数字技术对乡村进行治理，种种原因都致使乡村治理的信息化落后。

3　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实现中国式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针对以上乡村治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探寻破解这些现实难题的路径显得极其重要，它不仅需要政府的引领，还需要村民和社会组织通力合作，实现协同共治和“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同时，也要将科学技术融入乡村治理工作中，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快速发展，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3.1　强化党建引领，构建多元主体治理格局

乡村治理是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良性互动的治理，是共治共享。面对乡村治理主体的缺位弱化问题，需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加强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以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主线，强化宗旨意识，充分发挥其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确保基层党组织始终坚强有力。第二，激发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发挥他们作为乡村治理工作中最直接利益相关者的主观能动性和覆盖面优势，在降低政府监管成本的同时调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投入乡村现代化治理中，提高治理水平，确保党的乡村振兴战略方针落地实施，开花结果，使其真正始于乡村，立于乡村，造福于乡村。第三，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特殊作用不容小觑，必须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培育和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尤其是能够发挥各类协商自治功能的乡贤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组织，建立自治、法治、德治深度融合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加快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第四，人才是第一资源，新乡贤作为乡村的能人群体，他们有知识、有能力、有社会资源，对实现乡村场域的“治理有效”发挥着垂范作用。广大乡村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引导乡贤资源回流，投身于乡村治理现代化。

3.2　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

党的二十大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9]这表明了新形势下乡村治理依靠单一主体无法有序推进，必须搭建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平台。只有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协同运作，才能充分发挥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效能。因此，必须提升乡村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能力，从而更大限度地调动各主体的创造性，坚持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原则，形成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乡村居民协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要求各个主体认清自己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优势。在发挥各主体优势的同时，也要着重提升各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能力，形成多元主体互商互助、共同解决乡村问题、处理乡村矛盾的治理共力，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共识引领下通力合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使治理成效惠及广大人民。

3.3　实现自治、法治、德治融合

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有效途径。“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是单一的自治，单一的法治，单一的德治，而是三者深度融合与整体推进，只有把握好自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德治是支撑的基本原则，才能达到实质治理效果。为此，必须将“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在乡村治理的各项事务、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中，实现三者有机结合和相互贯通。此外，由于各地的经济条件及自身状况不同，要因村施策，建立符合本村实际、实用且可操作的“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模式。

3.4　加强乡村数字化治理建设，提升乡村“智治”水平

加强乡村信息化治理建设，转变治理主、客体的治理思维，实现治理思想的创新，加快提高基层治理的智能化和智慧水平。为此，必须提升作为首要治理主体的政府人员的数字治理意识，组织相关人员学习有关政务的数字化知识并进行相关的技能培训与实践演练，以期更好地应用到乡村治理之中。其他治理主体同样需要强化大数据思维，提升自身的数字化素养，多元主体各尽所能，共同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从乡村治理的客体来看，治理现代化主要是“人的现代化”。必须矫正村民对数字化的固有认知或错误思想，使他们对数字化产生认同感，政府部门应大力推广普及基层数字治理的典型经验，广大领导干部不仅要“身到基层”，更要“心到基层”，采用多种形式加大对数字化的宣传，充分培育乡村数字化治理思想，与人民群众心意相通，切实提高我国落后地区的信息化治理水平。同时，在数字化基层治理中也要强化“智慧”的内涵，为其注入文化因子和人文精神，避免走向技术至上，产生伦理缺失及数据安全问题，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总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烙印，可谓道阻且长、任重道远，行则将至、做之必成，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这意味着在新时代必须把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升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高度，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解决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难题，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指导，以党建增强乡村的治理动力，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善治目标，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

参考文献：

[1] 陆益龙，李光达.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J]. 江苏社会科学，2023(2).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3.

[3] 李三辉. 乡村治理现代化：基本内涵、发展困境与推进路径[J]. 中州学刊，2021(3)：75-81.

[4] 蔡文成. 基层党组织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分析[J]. 理论与改革，2018(3)：62-71.

[5] 苏畅，任凤琴.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困境与实践进路[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1)：69-74+94+162.

[6] 耿卫新. 构建科学有效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9-09(A06).

[7] 王治玮.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机制的路径创新研究[J].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21，35(2)：56-61.

[8] 李娟娟.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和对策[J]. 现代商贸工业，2021，42(7)：19-20.

[9] 本刊编辑部. 新疆社会科学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理论研讨会摘编[J]. 新疆社科论坛，2022(6)：5-18.

[10] 张成林.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张占斌教授[N]. 海南日报，2023-04-26(A06).

责任编辑：仲耀黎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Rural Governance: Connotation, Problem and Path

WEI Shimei, JIANG Yaqi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rur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governance, there are still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weakening of the role of the main body, insuffici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bility of multiple subjects, incomplete unity of the "three governance", and lagging behind in the "informat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multi-subject co-governance pattern on the basis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building guidance", and use various means to improve the co-governance ability of multiple subjects.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and unity of autonomy, rule of virtue and rule of law,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intelligent governance", so a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rural governance.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mplementation path

高校“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内涵、要素与建设

张伟娟
（盐城师范学院 离退休工作处，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高校离退休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化是推动高校党建工作创新发展、提升高校党建水平的有效途径。准确理解高校“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的内涵及特点，从品牌理念建设、机制建设、阵地建设、宣传推介四个方面，把握品牌建设的基本要素。通过创新学习模式和组织设置形式，健全工作机制，丰富活动载体和方法，积极发挥离退休教职工的引导作用，推进信息化建设，丰富党建品牌内涵，扩大品牌辐射效应。

关键词：高校党建；品牌建设；内涵；要素；建设策略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11-05

习近平强调：“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1]高校离退休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是创新高校党建工作模式、提升高校党建工作质量的有效途径。[2]加强和改进高校离退休基层党建工作，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离退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有利于进一步提升高校离退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战斗力，有利于进一步发挥离退休老同志“银发先锋”作用。高校“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究竟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如何实现离退休基层党建品牌化，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实现对特色党建品牌的推广与宣传，充分发挥特色党建品牌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对提升离退休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高校“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的内涵

根据美国市场营销学会（简称为“AMA”）1960年的定义：品牌是一个名称、专有名词、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上述元素的组合，用于识别一个销售商或者销售商群体的商品与服务，并且使他们与其竞争者的商品与服务区分开来。[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品牌”一词也承载着越来越丰富的涵义。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品牌是一种识别标志、一种精神象征、一种价值理念，是品质优异的核心体现。源于经济领域的品牌概念，对很多其他领域也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在高校基层党工作中，品牌意识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1.1　品牌理念引入高校基层党建工作

高校党建引入经济领域中品牌理念的做法，其实质就是借用市场经济中管理和经营品牌的手段，结合党建工作特点，探索符合时代特点的党建工作新机制。[4]在品牌建设方面，企业党建和高校党建都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2000 年 5 月，海尔集团党委书记张瑞敏提到：“海尔的标志是蓝色的，海尔工业园区也是蓝色的，而鲜红的党旗深深飘扬在海尔人心中。”[5]从此开始，经过几年的精心打造和培育，建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尔蓝中党旗红”党建品牌。[6]24 自 2003 年起，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在全院开展“党员旗帜工程”，树立“发展一名党员，就是树立一面旗帜”的理念，强化了党员的责任意识和群众监督力度，增强了党员先进形象的辐射力。[7]党建是重要的政绩，是中国共产党抓好各项工作的根本，随着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号召以坚定自信的姿态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理论界越来越关注党建工作研究，高校党建品牌创建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呈现规模化发展。党建品牌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做法都开始逐步深入。

1.2　“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的涵义

高校离退休教职工是学校的宝贵财富，他们具有高学历、高素质、高职称等特点，受党培养教育多年，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政治素质。根据他

收稿日期：2023-04-20
基金项目：盐城市社科联基金项目“高校‘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个案研究与实践”（编号：22skB2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伟娟（1981—），女，河南杞县人，研究实习员，硕士，研究方向为离退休管理和党建。

们的专业优势和特长，组建“银发先锋”工作团队，借助学校搭建工作平台，充分发挥他们的自身优势。打造高校“银发先锋”党建品牌，积极发挥离退休基层党组织及特色品牌的示范引领作用和服务功能，进一步推进离退休基层党建工作提质增效。

党建品牌的界定既要反映党建工作特色，又要体现党建社会功能、工作性质、职能特色和服务宗旨。因此，高校“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可以界定为：以高校离退休教职工为主体，以服务师生为重点，围绕学校中心工作、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具有较强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影响力，能够起到示范、导向和辐射带动作用，高校党员、师生普遍认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党建工作理念、标识或载体。[8]

1.3 “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的特点

“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的高站位。基层党建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高校四大功能为中心做好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工作，具有较高的工作站位。“银发先锋”基层党组织作为高校党组织的一部分，要结合离退休教职工实际，在培育时代新人、助力学科建设、参与社区治理、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增添正能量。

“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的服务性。与追求经济效益的商业品牌不同，“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主要强调实现社会效益。品牌建设工作一般都具有明确的工作对象，高校离退休基层党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高校的教职员工和青年学生群体，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培育时代新人、学术研讨与创新、理论宣传与研究、参与社区基层治理等实践活动；参与学校教育教学督导，帮助青年教师提升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引领青年学生成长成才；参与学校学科建设，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参与社区治理、乡村振兴，为社会服务提供技术支持和智力支持。

“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的育人性。一是党员的自我教育。基层党组织通过组织政治理论学习、召开座谈会、研讨会、组织实地观学等，不断提高离退休党员自身的思想政治觉悟；二是对其他党组织、高校师生、社会公众的导向、教育功能。通过对高校“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的创建、实施、总结、推广，扩大高校“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的辐射效应。通过做好基层党建、关心关爱、培育新人、服务社会等活动，不断提高“银发先锋”党建品牌的凝聚力、影响力、战斗力，升华党建文化，进一步强化教育效果，扩大教育范围。

“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的创新性。创新是品牌的特质和持久价值所在，是基层党建品牌创建的关键点。高校“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要永葆其先进性，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创新。通过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探索合理的工作机制和途径，不断激发党建工作活力，把党组织真正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践行党的先进性的战斗堡垒。

“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的独特性。一是群体的特殊性，“银发先锋”团队成员由离退休教职工组成，他们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是银发群体的先进代表；二是要具有独特的视觉标识，在名称、符号、图案等标识设计上要能区别于其他品牌，并展示出银发群体发挥作用的功能；三是要有独特的品牌理念和价值定位，通过充分发挥品牌理念的导向功能、激励功能、凝聚功能、稳定功能，使之成为推动党建工作的强大内力；四是要有独特的党建品牌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9]

2 高校“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的要素

高校“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的创建必须要明确党建品牌的工作理念，建立品牌运行机制，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建好用好活动阵地，并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推广党建工作品牌。

2.1 品牌理念建设

一要秉持政治方向正确理念。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党建工作的灵魂和统帅，也是党建工作的基本遵循和根本保证。只有政治方向正确，才能保证党建工作的方向正确，才能保证党建工作的思路和模式是符合政治规律和党建规律的。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做到真学真信真用，学懂弄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和党建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前进方向，奋力推进离退休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要秉持品牌建设规律理念。根据党建品牌建设规律，打造“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首先要总结提炼离退休基层党建工作的成功经验，将反映规律性的成果进行升华。党建品牌建设规律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特征。在党建品牌建设初期，结合党建工作的经验做法，提炼党建品牌主题，策划党建品牌名称，设计党建品牌标识，让党建品牌具体化、可视化；在党建品牌成长期，多层次多维度全方位打造和培育党建品牌，扩

大党建品牌的辐射面，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党建品牌完善期，要始终坚定方向、持续创新，不断赋予党建品牌内涵，使品牌始终焕发生机活力。只有把握和遵循党建品牌的建设规律，才能确保党建品牌持续健康成长，才能更好地发挥党建品牌的政治功能。[6]28

三要秉持党建工作特色理念。特色党建是品牌价值的内在要求，也是区别于其他品牌的根本标志。党建工作一方面强调大局统一性，在政治方向、政治要求、政治原则等方面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也要突出灵活有效性，在理念确定、思路创新、激励机制等方面体现特色，突出优势，注重实效。因此，高校离退休基层党建工作在组织开展活动时，一定要结合实际，突出亮点，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开展“自选动作”，充分发挥“银发先锋”成员的自身优势，开展富有成效、具有特色的党建项目，以提高项目的吸引力、参与感，增强党建品牌的形象价值和宣传优势。

2.2　品牌机制建设

增强离退休基层党建品牌建设意识，有助于充分发挥品牌建设在离退休党建工作中的作用，推动离退休工作持续发展和进步。以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创建单位盐城师范学院离退休教职工第七党支部为例：自开展“一支部一特色一品牌”工作以来，离退休基层党支部每月固定活动日，定期组织政治理论学习、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每学期初支部书记、支委、党员骨干一起专题研讨谋划支部工作；借助学校工作平台，充分发挥离退休教职工的政治优势、威望优势、经验优势，在培养人才、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社会等方面成效显著，深受广大师生、社会群众的一致好评。

盐城师范学院离退休基层党支部不断健全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增强离退休基层党组织吸引力、凝聚力，提升离退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一是实行“头雁效应”工作机制。支部书记、支委委员作为“关键少数”，充分发挥“头雁精神”，形成“头雁效应”，组织发动、团结群众、攻坚克难，在社会服务、学校发展、师生成长等方面发挥积极示范作用，为其他党员和群众树立榜样，有助于营造积极主动的工作氛围；二是建立“志愿服务，银发先锋”工作机制。借助学校工作平台，以“志愿服务”为切入点，以评选“老有所为”先进典型为抓手，引领支部党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投身学校改革发展，为维护学校和谐稳定贡献力量。老同志志愿服务工作，既有利于个人发挥余热，满足个人内心需要，也有助于学校相关工作的顺利推进，具有很好的“个人—组织”共赢特点；三是建立“关怀帮扶”工作机制。通过建立谈心谈话制度、走访慰问制度、联系党员群众制度、结对帮扶制度等，积极倾听党员群众呼声，切实解决其实际困难。根据帮扶对象特殊需求，从学校的“党员信息库”中进行供需匹配，较好地提高了帮扶工作的针对性和服务的有效性。

2.3　活动阵地建设

以“确保每个离退休基层党组织都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每名离退休党员都能过上规范化组织生活”为目标，着力构建全覆盖的离退休基层党组织活动阵地网络体系。一方面，依托线下有形阵地建设，配备集学习、娱乐、活动、保健等多功能为一体的老年活动中心，满足离退休党员日常学习活动所需，每年订购党报党刊等资料，定期组织离退休党员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积极开展相关主题教育培训工作。另一方面，依托“学习强国”学习教育平台，关注“江苏先锋”“江苏老干部”公众号，建立微信学习交流群，打造线上阵地建设，既保证了理论的及时更新，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信息内容，又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互动性，进一步增进离退休党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了党建品牌的影响力。

2.4　品牌宣传推介

积极开展“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宣传推介活动。在高校“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建设中，通过政治理论学习、主题讲座、知识竞赛、书记项目申报、样板支部打造等多种途径向离退休各党支部和党员灌输品牌理念，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广大离退休党员对党建工作内容的认识和理解，提升基层党建工作品牌的知名度。同时，充分利用报纸 、电视、广播和网络等媒体资源，引导长期异地、行动不便的离退休党员在网络平台上开展党课学习、交流互动等，扩大党建工作覆盖面和影响力。建立离退休基层党建工作品牌的网上宣传机制，加强对特色党建工作的宣传和推广力度，营造良好的党建工作品牌氛围。

3　高校“银发先锋”基层党建品牌的建设

3.1　创新学习模式

高校离退休党员同其他领域的党员同志比较，其最突出特点就是学习能力强。离退休党员理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是彰显高校离退休基层党组织先进性的一项重要内容。高校离退休基层党组织要结合离退休党员实际，不断创新学习模式，通过集中学习、个人自学、专题研讨培训等形式

不断提升党员党性修养和政治素养。借助“银发讲坛”平台，以理论宣讲为抓手，围绕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及学校中心工作，针对当前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切实解答离退休老同志及学校师生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既是服务师生、助力学校发展的需要，又是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

3.2 创新组织设置形式

组织形式对于实现党建工作目标具有基础性作用。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离退休老同志养老方式也在发生着很大变化。居家养老、异地养老、旅居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国外养老等新兴养老方式不断涌现，离退休老同志的社会活动空间也因此更加多样。[10]创新高校离退休党组织设置形式，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已成为实践中的迫切问题。

高校离退休基层党组织要全面准确把握离退休党员的基本情况，逐人建档立卡，建立动态信息管理平台。按照“有利于扩大党组织覆盖面，有利于组织活动，有利于服务群众，有利于发挥作用”的原则，采取多种方式设置党组织，做到离退休党员在哪里党的组织和工作就覆盖到哪里。对组织关系在高校但长期异地定居、旅居的老党员，在尊重个人意愿的前提下，到当地社区党组织进行备案，纳入当地社区党组织管理服务范围，就近参加学习、参与活动。选配党性强、威信高、身体好、经验丰富、乐于奉献的老同志担任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和委员，给予高龄、行动不便的党员更多关心和指导，根据情况配备 1 名及以上在职党员担任联络员，协助支部开展工作。

3.3 健全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党内教育、管理、服务、评价的长效机制，是新时代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进一步探索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11]针对高校离退休基层党建领导体制不够健全、职责边界不够清晰、运行机制不够顺畅的问题，要明确基层党组织职责定位，切实履行党建工作主体责任，党委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上级部门加强对离退休基层党建工作的宏观指导、督促落实，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探索完善离退休基层党建品牌工作机制。

3.4 丰富活动载体与方法

高校离退休基层党建工作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载体与方法的选择运用是否科学。鉴于离退休基层党建工作服务管理对象的特殊性，在开展活动的时候，要结合年龄、身体状况、专业、工作岗位、居住地等情况，选择适宜的载体和方法。多元性、科学化载体与方法的运用，有助于促进党建工作由单向走向互动，由传统的封闭式走向现代化的开放式。[12]例如：盐城师范学院离退休教职工第七党支部充分发挥退休党员自身优势，定期组织志愿服务，为社区居民维修小家电；春节前夕组织书法爱好者为社区居民写春联；高考期间与考生家长一起指导考生填报志愿；服务年长、行动不便人员参加体检；重大节日组织文体活动、茶话会等为大家沟通交流提供平台；积极参与学生社团指导、心理疏导等工作，充分利用专业优势、阅历优势、经验优势为青年学子成长成才保驾护航。在支部班子的正确领导下，在先进典型的带领下，第七党支部在社会服务、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帮困助贫、关心下一代等工作中成绩显著，多次被学校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特色党支部”，被省委教育工委表彰为“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入选第三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建设单位，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持续增添正能量。该支部的工作模式、工作方法不断被推广、学习、借鉴，带动辐射更多党支部、老党员参与到“老有所为”活动中来，产生了较大的品牌效应。

3.5 积极发挥引导作用

组织退休党员开展“亮身份、树形象奉献在社区”主题实践活动，按照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适宜适度地组织离退休党员参与社区治理，宣讲党的最新理论和方针政策。通过讲中国故事、讲中国共产党故事、讲新时代故事、讲身边人故事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感染更多的人向善向上，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紧跟时代步伐，共享时代发展成果。根据高校离退休党员行业特点，可以紧密。结合社区居民需求，在高考志愿填报指导、设点免费家电维修、困难帮扶、调解纠纷、组织健康文娱活动、关心教育下一代等方面，广泛组织离退休党员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社区建设增添正能量。

3.6 推进信息化建设

网络已经深度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5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4.4%，[13]15 其中：60 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 1.19 亿，占网民整体的比例达 11.3%。[13]21 随着网络技术在老年群体的不断深入应用，利用新媒体技术开展离退休基层党建品牌建设是推进高校基层党组织信息化建设的必然趋势，也是提升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必然要求。盐城师范学院离退休教职工党委进行了

积极有益的探索，如：组建党支部微信群、QQ群，进一步畅通离退休基层党组织工作交流渠道，为广大离退休党员群众提供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创建“党建工作”网站，发布离退休各党支部工作动态、作用发挥、组织建设、服务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创建离退休教职工党员动态信息库，及时准确把握他们的居住地、学习情况、身体状况、服务需求、作用发挥等信息；引导离退休教职工党员关注“江苏老干部”“盐城老干部”微信公众号，下载“学习强国”APP，一年两次开展“学习强国”积分评比活动，增强离退休教职工党员学习的自觉性。线上、线下活动阵地相结合，进一步拓宽高校离退休基层党建工作的深度与广度，增强党建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凝聚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高校党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立德树人思想引领 加强改进高校党建工作[N].人民日报，2014-12-30(01).

[2] 岳爱鹏，柳国强，魏伟，等.高校党建品牌创建的理路探究[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4)：61-64.

[3] 于江波，王君，吴鹏宇.高等学校特色基层党建品牌建设研究[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79-182.

[4] 覃浩.党建品牌建设的认识与思考[J].广西电业，2009(1)：66-69.

[5] 张瑞敏.海尔“蓝”中党旗红[J].求是，2000(5)：38-39.

[6] 季冬晓.用品牌效应提升基层党的建设水平：青岛市创建党建品牌的做法与启示[J].理论学刊，2010(3).

[7] 楼锡锦，江美芬，陈小兰.实施六项举措 提升六大作用：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开展大学生党员旗帜工程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高教研究，2006(6)：44-45.

[8] 王东朋.校园文化视角下高校党建品牌化构建策略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15)：255-256.

[9] 刘定禹，饶志华.高校教师党建品牌的意义、内涵及特征[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3(3)：39-41.

[10] 李晓丽.对老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路径的思考[J].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2)：57-64.

[11] 凌海金.建立健全教育、管理、服务党员长效机制[J].创新，2011(6)：35-39.

[12] 施小明，袁媛，尚娅.基层党建品牌建设科学化研究[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6)：36-38.

[1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2-08-31)[2023-03-18]. https://www.cnnic.net.cn/n4/2022/0914/c88-10226.html.

责任编辑：仲耀黎

The Connotation, Elements,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ilver Pioneer"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Brand in Universities

ZHANG Weijuan

Abstract: The branding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work for university retiree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arty building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Party build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brand of "silver pioneers" in universities. Grasp the basic elements of brand building from four aspects: brand concept construc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on, position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on. By innovating learning models and organizational settings, improving working mechanisms, enriching activity carriers and methods, actively guiding retired faculty members to actively play their roles, promo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struction, and constantly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arty building brand and expand the brand radiation effect.

Key words: Party building in universities; brand building; connotation; elements; construction strategy

构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话语体系

白　雪，刘　华
（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构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要坚持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特征的原则，通过强化话语解释、传播、转化机制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的实施。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的构建，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

关键词：从严治党；话语体系；语境；路径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16-04

话语体系是一种表达方式，是依据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外在的表现形式，是一定时代条件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政治话语作为政治实践是政治思想的直接现实。[1]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话语体系是指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口头表达或外在表现形式，[2]中国共产党用全面从严治党的话语体系表述党领导理念中所探讨的发展价值，构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一方面，为面对新时代严峻挑战提供落实治党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党建部分的战略方针。面对全面从严治党在新时代遇到的新形势新考验，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提升辩证思维能力，遵循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的构建原则，探寻话语体系建设路径，从而正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

1　构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的语境

全面从严治党是管党治党的逻辑主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3]是新时代党的建设鲜明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自我革命的一个伟大壮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把“建设什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4]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命题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5]64。关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话语时代语境的研究，就是要论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构建所处国际国内的时代环境，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构建的时代语境，要深刻认识话语构建所处时代环境的严峻性，以及实现话语建设的迫切性。

1.1　国际语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面从严治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正在发生着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变化。从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论述世情变化：

在政治方面，资本主义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固有的矛盾所造成的社会灾难不断暴露，贫富差距拉大，资本主义所维系的政治经济世界体系发展趋向于不平衡，社会动荡加剧。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时代化结合紧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21 世纪的中国发展更加完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促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处模式进行重新解构。

收稿日期：2023-05-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领导能力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编号：21&ZD04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白雪（1999—），女，河南南阳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2022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刘华（1971—），男，江苏宝应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在经济方面，经济全球化向更深层面发展，带来全球人才、商品、资金迅速流通。同时，也出现各种各样不可预见的问题，逆全球化浪潮加剧，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新兴经济体发展迅速，世界格局演进变化迅速，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严峻挑战，对我国风险应对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重视在经济中出现的问题，维护经济基础的运行，也就加强了上层建筑的根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与中国的发展有关，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都要我们与世界各国共同面对。

在科技方面，科学技术在变局中有实质性进展，从蒸汽化、电气化、信息化到当今智能化。新的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不断革新，新型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促进生产力的进步，生产效率得到很大提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各种差距显现，资本主义的弊端与社会主义的优势形成鲜明对比，资本主义极力保障自己的国际地位，不惜做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威胁的行为。例如：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挑衅等，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逐渐变得紧张。

1.2　国内语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推进

二十大报告提到我国当前“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5]27-28。经过艰苦的努力，我国在新时代已经完成全部贫困人口脱贫摘帽，实现全面小康，完成了中华民族千年梦想，[5]7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一切向好发展。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的奋斗历程，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5]28，对我国发展中的薄弱环节进行加强，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

当前，我国着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发展面临着新的风险，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我们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改革进入攻坚期，要警惕各种矛盾的产生，警惕“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产生。对于新风险和新挑战必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5]13。党找出了勇于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方法，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不是断断续续的，而是持续进行的，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中华民族的复兴梦要从梦想变为现实，中国梦的实现要注意有内部阻力的制约，保持警惕，保持党自身的先进性建设，用自我革命刷新从严治党新境界。

1.3　党内语境：全面从严治党是净化党内环境的现实之需

十八大以来，党内一直致力于同腐败行为作斗争，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用卓有成效的方法取得了成果。全面从严治党对执政党建设尤为重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党员面临的诱惑不断增加。要警惕党内出现的问题，警惕一些党员钻制度的空子，破除法律的枷锁，为自身谋取利益，抛弃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抛弃党的初心使命。一些党员缺少理想信念，也缺乏精神之“钙”，缺“钙”就容易得软骨病，动摇自己的信仰。部分党员依旧存在侥幸心理，贪污腐败，使命感不足。基层党员干部持有消极工作态度，软弱涣散，解决群众问题效率低。这些都威胁党的执政能力，败坏党内风气，因此，要注重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净化党内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从严治党内容提出新的理论成果“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5]14为解决党的干部思想动摇、领导弱化等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大政党，在这样庞大的组织中保持政党先进性、纯洁性，实现全面从严管理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2　构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的原则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话语体系构建，是对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的具体内容进行外化的话语表达。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5]16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政治话语部分的创新，因此，研究全面从严治党要与“马克思主义行”相联系。探究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遵循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政治话语构建原则，立足我国实际情况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内容，从理论与现实中的具体联系来构建。

2.1　遵循中国化原则，坚持中国特色

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的建立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部分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话语表达方式结合起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中国化的创新。

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理论，凝聚着深厚的语言智慧，沉淀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文化基因。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与历史传承，孕育产生了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秀文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部分中遵循了具有中国化的创新原则。例如：论述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践行初心使命，“初心”一词最早追溯到我国古书文献中，“本意”特指一个人做事情本来的意识。在古人所著《搜神记》中也提到“既不契于初心”，意为做事情最初的初衷或原因。“初心”一词来源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关于共产党人崇高信仰的阐述，在全面治党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初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初心”相结合，创造出全面从严治党践行的初心，构建出从严治党的特色话语体系。

习近平多次提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爱民为民思想，“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的选贤用能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等，这些都引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话语，创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语言，为构建中国化的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提供条件，坚持了中国特色。

2.2　遵循时代化原则，展现时代亮色

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中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党建方面的理论实践，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具体内容。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的构建是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话语的构建，在实践运用时要进行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守正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与我国全面从严治党内容相结合，构成具有时代特色中国风格的全面从严治党的话语体系，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的建立一定要在时代不断变化发展中守正创新。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有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我们有我们时代的语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新时代总有新语言。”[6]因此，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也要进行话语创新，适应时代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是其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全面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在全面从严治党、反腐倡廉、提高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方面丝毫不能松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话语创建，构建与新历史方位相适应的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可以更好解决面对的时代语境问题，作出时代回应。

2.3　遵循大众化原则，彰显人民本色

全面从严治党的话语体系构建要遵循大众化的方向，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起就践行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实行全面从严治党的政策接受者和实践者都以广大人民大众为主体的，更加坚定了要遵循大众化话语构建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5]68作出从严的政策指引。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建立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服务于人民，受众于人民。全面从严治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政治话语体系，是服务于大众政策理解领域的。因此，坚持大众化就是要将政治话语转化成大众话语，转化成人民听得懂、理解透彻的语言，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彰显人民性本色。

3　构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的机制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要从解释机制、传播渠道和话语转化机制构建，从传播源头控制话语传播机制，丰富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

3.1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话语解释机制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话语解释机制，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现各个阶级对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的认同。如何将高度政治化的语言转化成容易理解的话语，需要全面准确对从严治党的话语作出解释。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中，习近平多次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容进行通俗化解释，例如：提出理想信念是指引共产党人向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奋勇向前的精神之“钙”，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总开关”，用缺“钙”形容缺乏理想信念的党员。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管理干部，习近平提出“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说法，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治党”和“治国”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提拔干部方面，习近平指出要防止“带病提拔”，“带病提拔”形象地解释了干部任用中的不正之风。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去疴治乱，‘打虎’‘拍蝇’‘猎狐’

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5]13-14习近平用“打虎”“拍蝇”“猎狐”生动形象的比喻反腐败力度的推进，这些话语很容易使得各级干部、党员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政策方针，更好地进行从严落实。

3.2　完善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传播机制

在话语传播中必须注重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要对话语体系进行完整准确的传播并不容易，需要各方面进行联动才能达到效果。话语体系的传播要借助具象化载体展现共享价值。[7]1-10对于全面从严治党话语的传播路径要借助具象化的载体来进行，将国家的政治语言通过图片、视频、文字、歌曲等形式表现出来，借助新型传媒技术进行传播。例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通过影视传媒生动向大众传达中国共产党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和成果。积极利用新时代智能化媒体传播迅速、有效、便捷的特征，为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传播提供可靠保障。注重干部话语、政策话语、群众话语准确的衔接转变，让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传播得更快、更广、更好。

3.3　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话语转化机制

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话语体系，其目的就是将顶层设计直观传达到基层，使人民群众有效地理解制度内容，用简洁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目前，在全面解读从严治党的话语方面存在着话题的多样性、内容的碎片化、结构的复杂性等问题，迫切需要全面严格解读从严治党的话语体系并进行转化。话语转化要遵循两个原则：首先，对从严治党的内容要保持原有意思的准确性，转化是为了加强对全面从严治党话语的理解，但要注意措辞话语的准确性，避免基层群众和干部对于话语的错误理解进而出现相反的效果。其次，要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导向。[7]1-10在进行话语体系转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循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转化。这种从严治党进行外化的表达方式要满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需要。例如：在探寻破解历史治乱兴衰规律的过程中，将勇于自我革命看作是破解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守正了毛泽东对于破解历史周期律的第一个答案，又创新表达了自我革命对于从严治党的重要性。

4　结束语

全面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通过历史与现实相统一和系统与整体相统一的思维能力，守正创新。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现状客观分析的产物。新时代坚定党领导一切，更加突出全面从严治党，因此，构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是时代所趋。[8]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的构建，既是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需要，不但坚定了党的人民立场，而且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施提供了现实依据。将顶层政策设计准确地贯彻到基层执行，话语体系的构建、转化、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尤为重要。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体系的构建从语境、原则、路径方面出发，利用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守正创新，探索话语语境构建的道路，使得各级干部和群众更好理解和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4-35.

[2]　赵绪生，孙进宝.论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24(5)：38-46.

[3]　王世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基本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50.

[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90.

[7]　艾四林，陈钿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三重维度[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

[8]　欧健.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J].社会主义研究，2015(6)：14-20.

责任编辑：仲耀黎

·思政论坛·

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课

洪　菊，张　晔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高校思想政治课重要的理论资源与精神资源，将其融入高校思政课，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同源性、在价值逻辑上具有同向性、在内容逻辑上具有互补性。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应注重提升教师素养、丰富教学内容、利用实践教学、借助网络教育等，加强学理阐释，确保融入质量，增强教学效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20-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1]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2]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资源，用其引领学生成为时代新人，既是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时代需求，也是创新发展高校思政课的现实需求。

1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价值内涵

传承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对保持党的生机活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学习党的精神谱系，有助于增强青年学生的文化自信，提高政治认同。对大学生来说，要发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价值引领作用，必须深刻领悟精神谱系的价值内涵。

1.1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百年历程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发展史是党领导人民自立自强、独立自主的奋斗史，是团结各民族人民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实践历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由不同革命建设时期连缀构成，展现不同时代的革命任务与人民诉求。[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忍侵略，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剥削奴役，中国共产党明确自身的革命任务，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的胜利。在艰难险阻中积极探索，积极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例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展现出独立自主的英雄气概。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捍卫祖国河山，不屈不挠为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而奋斗。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巩固新生政权。坚持中国人的事情由自己说了算，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大力发展生产力，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例如：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等，不惧国内国外的困难压力，从一穷二白的困苦国情出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作出重要决策，同时，科学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鼓舞共产党人发奋拼搏，自力更生。努力践行人民观，将人民利益与国家建设相结合。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家建设重心向经济转移，党和国家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共产党人对执政规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实行改革开放，大踏步进行经济建设，积极解放社会生产力，努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仁人志士秉承要让祖国富起来的心愿，大胆在经济领域进行实践探索，努力创新，不怕困难。经济体制不断改革完善，经济总量得到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

收稿日期：2023-04-20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中共开国一代革命家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研究”（编号：11120047102001）和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现代化语境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研究”（编号：2022ZD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洪菊（1993—），女，山东济南人，党的建设专业 2021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张晔（1999—），女，山东德州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2021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同时，无论从科技发展还是到竞技体育。例如：载人航天精神、女排精神等，中华儿女在各个领域为国争光，拼搏向上，以祖国繁荣为坚定信念，喊出中华民族崛起的时代强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面对困难，英勇无畏，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努力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新的飞跃。以充分的实力、充分的准备，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一致领导中华儿女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例如：新时代北斗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等。面对突然爆发的全球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党和国家以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根据疫情危害程度科学调整防疫政策。打赢脱贫攻坚战役，积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勇于胜利，勇于超越，实现高科技领域领跑。

1.2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科学内涵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根本内涵。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人民立场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领导人民在各项事业中取得胜利的动力根本。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以人民为自身的出发点，以人民利益为言语行动的根本立场，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初心始终不动摇。从伟大建党精神到抗疫精神，人民立场贯穿于整个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深刻践行于中国革命实践。例如：建党精神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长征精神的“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属性，一切发展为了人民。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持续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4]加强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严禁空谈，为老百姓实事求是解决问题。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指向，一个具有长期执政能力的政党关键在于理想信念的树立。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将理想信念转化为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自建党开始，党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斗争拼搏。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5]理想信念使革命先辈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例如：井冈山精神的“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抗疫精神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才能在党的自我革命中永葆精神力量。

实践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机理。社会在矛盾运动的斗争中发展，共产党人以斗争精神在各个时期承担起自身革命任务，在不同革命阶段注入时代力量。中国共产党强调以实践行动，真抓实干地进行社会文明形态的革新，创新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道路。以实现每个主体的福利保障和自由发展为奋斗方向，以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推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将为人民服务落实于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勇于实践斗争的精神气概使中国共产党展现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例如：“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建党精神，“精准务实、开拓创新”的脱贫攻坚精神等。在改革与建设的历程中，以担当精神化为具体行动。

2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课的逻辑契合性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众志成城，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了拼搏进取的强大现实力量。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6]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教育，需要准确把握二者结合的逻辑契合性。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高校思政课结合的现实可行性，在于二者理论逻辑的同源性、价值逻辑的同向性与内容逻辑的互补性。

2.1　理论逻辑的同源性

首先，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属于中共党史教育的研究范畴，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研究，解答了历史和人民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的基本规律与经验。[7]精神谱系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一个紧密的整体，以红色故事和红色精神对中国革命道路中的伟大精神进行高度凝练。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有力保障，担当大国责任，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不畏困难，锐意进取，持续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其次，高校思政课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核心课程，是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承担引导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教育任务。切实明确为谁培养人才，防止西方别有用心的分裂思想腐蚀，让青年学生明确为什么历史和人民会选择马克思主义，树立理想信念，培养优良作风传统，激励青年学生为国奉献。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思政课提供了优质的文化资源、历史资源与理论资源；另一方面，思政课为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奠定了基础。精神谱系中每一个

伟大精神的生成都是从历史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件中概括出来的，含有每个时代的特质，能够让青年学生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体会革命先辈的付出，激励新时代大学生为国奋斗。

再次，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和高校思政课的落脚点都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中国共产党人赓续精神谱系取得巨大成就，必将鼓舞青年人奋发图强，主动担当新时代历史使命。高校思政课帮助学生把握马克思主义立场思想方法，引导学生抵制不良社会思潮。学生在思政课堂上深化对共产党的了解，发奋继承伟大精神，爱党爱国，情系人民，深刻认识革命前辈的艰辛不易，自觉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

2.2　价值逻辑的同向性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和高校思政课价值逻辑的同向性是二者融入的关键。爱国爱党，忠诚为民，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特质，形成了独特的精神谱系。精神谱系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在政治、道德、精神的品行修养，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功能和情感激励功能。引领青年学生固守初心使命，牢固树立人民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一步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涤荡学生心灵，调动青年人为国担当、无私奉献的主观能动性。高校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共同致力于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致力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其次，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融入思政课，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作用。“办好思政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8]青年学生全面把握党的百年奋斗历程，透彻理解党的性质，体现出国家教育“为谁培养人”的价值指向，培养出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是重要的文化宝库与资源，可以对青年学生形成穿越时空的价值引领，以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英勇事迹形成对大学生的精神领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是强调对大学生的政治引导与价值引领，二者的价值同向性促进了功能引领的结构升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精神谱系包含着珍贵的红色基因和丰富的历史底蕴。思政课是培育青年人传承党的伟大精神的摇篮，运用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论证与阐释思政课教学内容，能使思政课教学内容更有人文情怀、更有温度，激发青年学生的学习热情。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关的旧址、博物馆、实物可以活化思政课的理论内容，使学校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增进教学的生动性，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年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担负起自身使命。

2.3　内容逻辑的互补性

习近平强调：“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9]以精神为指引，才能在革命道路上坚定信念，百折不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理论来源，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时代背景，其具体内容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为实践基础，与高校思政课有高度互补性。

一是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内容契合互补。精神谱系是仁人志士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马克思哲学的杰出成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同样能够为理解精神谱系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利用唯物史观、劳动解放等理论更深层次地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二是精神谱系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内容契合互补。精神谱系是青年学生宝贵的精神财富，有利于大学生精神风貌的建设，有利于培养其积极的革命意志。“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能够为精神谱系的弘扬提供道德土壤，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认知观念。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可以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亲和力。二者在育人上可以优势互补，提升整体效果质量。三是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与“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内容非常契合互补。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重要实践经验的总结凝练，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追求。“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能够为研究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提供历史载体，有利于青年学生在大历史观对精神谱系进行系统科学地把握。四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内容契合互补。精神谱系展现了共产党人理论思想体系的完备，以及强大的政治优势。“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能够为大学生提供完整的思想脉络来研究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从理论发展的角度认识其内涵与价值。

3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

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融入，使高校思政课充分发挥育人作用，不仅要提升教师素质，也要善于丰富教学内容，加强学理阐释，同时，利用实践教学、借助网络教育，从而多角度、多层次、多方

位促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课。

3.1　提升教师素质，确保融入质量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课，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思政课教师的理论功底与才华学识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实际教育成效，决定着青年学生在精神谱系中所汲取的精神滋养。[10]高校思政课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融入教学中，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引导学生正确地把握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进而明确前进方向。首先，思政课教师应该全面系统地掌握党的精神谱系，领悟其中的精髓，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不断深化理论研究，形成一定的学术研究成果，才能将其准确、完整地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学懂悟透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核心要义。学校可以邀请一些权威的理论专家开设讲座，思政课教师可以通过参加讲座、培训班、研讨会等渠道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将其吸收理解之后传授给学生。其次，在全面提升理论素养的同时，思政课教师还要提升现代化教学能力，运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历史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将情感、信念、价值等有机融入教学中，[11]使精神谱系能够呈现当代社会中的现实反映，引导学生立足当下，感悟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再次，在思政课中，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融入其中的优秀课程，发挥优秀示范课程的带动作用，使教师能够从示范课程中学习经验。此外，定期与同校教师及不同学校教师举办分享交流会，相互交流分享自身的教学经验，确保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课程的质量与效果。

3.2　丰富教学内容，加强学理阐释

课堂教学是高校思政课融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主渠道。精神谱系能够拓展课堂内容，使得高校思政课更加具有厚度和温度。具体结合思政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选取适当的切入点，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与教材内容进行有机结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可以将精神谱系中的某个伟大精神融入其中，生动诠释革命先辈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诞生过程。同时，以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内容作为典型案例贯穿课堂教学，使其浑然天成地融入教学内容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能够使精神谱系中的哲学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相结合。精神谱系的许多方面都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可以用精神谱系中生动、具体的故事帮助学生理解较为抽象的理论知识，为新时代大学生成长为时代新人提供精神滋养。在“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突出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与社会矛盾，使青年学生全面系统地理解精神谱系的内涵实质。

3.3　利用实践教学，增强融入效果

丰富的课外实践活动是知识课堂的重要补充，是提升高校思政课实效性的重要一环，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将知与行相结合。利用形式多样的课外实践教学活动，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更好地融入高校思政课，使高校思政课更加生动、活泼。一是参观红色纪念馆。红色纪念馆是传承精神谱系的重要载体与关键场域。像井冈山、沂蒙等典型地区的红色纪念馆，教师可以根据课堂学习内容，组织学生参观相关革命遗址或者革命纪念馆，通过现场实物、照片及影像资料，使学生身临其境感受历史场景，切身体会其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参观后学生就自己所体悟的精神进行讨论交流，老师现场点评，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伟大精神。二是举办相关主题活动。进行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例如：举办征文比赛、演讲比赛、主题朗诵，以及知识竞赛、微视频大赛等活动，激发大学生自主学习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热情。根据伟大精神排练情景剧，扮演自己喜爱的历史人物。在主题团日、党日时可以不限形式地分享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感悟。依托社团，以宣讲团的形式深入社区和中小学展开一系列宣讲活动，促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承与弘扬。三是思政课教师联系学校的党委宣传部、校团委等部门，充分利用板报、宣传栏、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将大学生所关注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一些精神及其背后的故事进行宣传教育，使学生融入良好的氛围中，从而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3.4　借助网络教育，提升学生兴趣

当今时代网络和生活已经密不可分，青年学生成为主体网民。运用网络媒体等先进手段向大学生传达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内涵精髓，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高效启动，[12]让学生领略其内涵与实质。例如：教师借助一些新型媒体教学平台，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多角度地展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并布置一些相关知识点的主题讨论、随堂演练等任务，与学生进行积极的互动。教师根据学生讨论过程中的关注点了解学生的想法，

从反馈结果中不断地探寻更为合适的教学方法，进一步提高教学实效性。还可以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等大学生喜爱使用的社交媒体，用大学生熟知的网络用语，创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播形式，吸引大学生主动阅读，通过建立相关的微信公众号，推送一些真实感人的故事，让大学生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接受熏陶、坚定信念、砥砺传承的自觉。可以应用VR技术、人工智能等方式让学生通过虚拟场景切身参与过去的一些历史事件当中，进行全方位、立体式体验。利用VR眼镜观看延安红色基地、井冈山根据地等不同景区，领略这些红色文化景区所承载的伟大精神。在虚拟场景中体会科学家们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通过虚拟场景再现无法重复的历史，将历史与现实相连接，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回到过去的年代，立足学习、分析历史，感受革命先烈的不易，体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精髓，强化大学生的情感认同。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8.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4.

[3] 项久雨，聂莹莹.中国共产党奋斗精神的科学内涵、发展脉络及价值意蕴[J].思想教育研究，2021(8)：3-8.

[4] 赵岩.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人民立场[J].思想教育研究，2021(6)：91-94.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88.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14.

[7] 王晓霞.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融入“纲要”课教学刍议[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1(2)：112-120.

[8]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2019年3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9.

[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690.

[10] 韦俊峰，张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三重逻辑及其实践机制[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5)：34-44.

[11] 毛天虹.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三重意蕴和实践路径研究[J].现代教育科学，2022(4)：73-78.

[12] 王惠英.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J].南方论刊，2022(4)：89-91.

责任编辑：仲耀黎

Integrating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Chinese Communists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NG Ju，ZHANG Ye

Abstract：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Chinese Communists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spiritual resour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Chinese Communists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homology in theory logic，homology in value logic，and complementarity in content logic.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piritual lineage of Chinese Communists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mproving teachers' quality，enriching the teaching content，using practical teaching and network education to strength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cademic theory，ensure the integration quality and enhance the teaching effect.

Key words：spiritual pedigree of Chinese Communist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path

改革创新应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

李昌昊[1]，李星雨[2]
（1. 江苏师范大学 法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2. 南京审计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改革创新贯穿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全过程，青年一代有动力想干事、有体力能干事、有创造力会干事，参与改革创新具有显著优势。立足新时代新征程，青年要在改革创新中大显身手、实现青春远航，根本要求是政治合格，前提条件是加强学习，核心要素是提升能力，用力方向是担当作为。

关键词：改革创新；新时代；青年
中图分类号：D43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25-04

1　深刻理解改革创新的时代价值

1.1　改革创新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

《新华字典》对动词“改革”的定义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1]232；对动词“创新”的定义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1]112总结两个关键词的定义，可以对“改革创新”的内涵简单定义为：废旧出新。从我国发展实践意义上看，邓小平、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改革创新都有不少论述，概括起来就是通过调整完善体制机制破旧立新，推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回顾我国近 40 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一直贯穿于全过程，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基本要求。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改革”从此成为指导中国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迈开步子敢试敢闯。[2]此后，历次党代会都把改革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概念，从此我国进入了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习近平先后在 2010 年深圳经济特区 40 周年和浦东开发 30 周年、2018 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2021 年建党 100 周年和十九届六中全会、2022 年党的二十大等重要时间节点发表的重要讲话都反复强调要大力推进改革和创新，事实上，改革创新也始终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关键位置，成为贯穿新时代的一个重要而鲜明的主题路径。

1.2　改革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的时代呼唤

1.2.1　改革创新是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关键手段

新时代，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创新的竞争、制度机制的竞争。因此，改革创新事关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0—2022 年我国 GDP 连续突破 100 万亿、110 万亿和 120 万亿大关，2022 年达到 1 210 207 亿元，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接近 1/5，稳居世界第二。[3]我国之所以能够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关键举措就是持续改革创新，不断破除制度障碍、发展瓶颈和现实难题。多年来，尽管西方国家对我国技术人才层层封锁，我们依然成功开发“两弹一星”、北斗导航、神舟飞船、奋斗者号、天眼、高铁、核电、大飞机等一系列大国重器，这是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结果。正所谓“创新决定未来，改革关乎国运”[4]。可以想见，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征程的开启，也必将为我国大幅提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不断积蓄力量、汇聚能量、增加新的动能后劲。

1.2.2　改革创新是促进社会建设和人民幸福的有效路径

近 30 多年来，人们坐上了高铁、住上了新房、开上了小车，生活水平全方位提升，靠的就是党领导下的改革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改革创新、接续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千

收稿日期：2023-02-10
作者简介：李昌昊（1974—），男，江苏铜山人，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宪法和行政法学、法理学、管理学；李星雨（2003—），女，江苏徐州人，法学（法务会计）专业学生，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诉讼法学、法理学。

年小康梦想，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脱贫攻坚战，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6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78.2岁，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互联网上网人数达10.3亿人。[5]7-11因此，改革创新不仅解决了人们生产、生活、生态中的突出问题，还大幅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生活内涵，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有保障、可持续。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改革创新的持续推进必将民生福祉不断加持新的元素和新的内涵、新的制度和新的技术，必将以更具品质的民生条件惠及更多群众的幸福生活。因此，改革创新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的重要路径，是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有力举措，是诠释坚持人民至上的最好实践。

1.2.3 改革创新是实现个体价值和贡献中国梦力量的强大引擎

改革创新不仅仅是国家战略，也是个人战略，是实现个人梦想、个人价值并带动实现中国梦和民族追求的一个强大引擎，不仅需要人人参与，而且人人需要参与。因此，改革创新实践的价值是集体与个体、国家民族与公民个人、国家战略与个人战略的统一，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与新时代青年发展不容回避、必须直面的共同任务，也是新时代个人梦想与国家民族梦想实现深度融合的绝佳路径和强大动力源泉。

2 全面认识青年人的特征与优势

2.1 青年人富有激情想干事

青年人刚步入社会，一方面，有动力。青年人正处于激情澎湃的年龄阶段，普遍对人生有理想、有方向，对发展有规划、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期待、信心满满。另一方面，有激情。青年人具有闯劲，对于干事创业，活力四射，可塑性强。这一鲜明特征，为其参与新时代改革创新提供了显著的内在动力优势，成为广大青年人敢闯敢干、敢于开拓的重要内在动力机制。

2.2 青年人年富力强能干事

青年人有着强壮的身体机能、充沛的体力精力，工作时间、强度和效率都处于极富韧性的状态。在心理上，对社会有着好奇心和新鲜感，承压和抗压能力相对较强；在群体规模上，我国虽然开始步入老龄社会，但20～35岁人口约为3亿多，[6]相当于美国全国人口。青年人的这一鲜明特征，为其参与新时代改革创新提供了显著的先天体力精力优势，使广大青年人在实践中拥有客观的竞争优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主力军作用。

2.3 青年人头脑灵活会干事

青年人具有头脑灵活、接受新事物快、富有创新和创造力的鲜明特征，特别是在极具挑战的专项攻坚领域、需要智慧的科技研究领域、亟待创造的源头创新领域，青年人的作用与贡献无可替代。研究表明：科学创造最佳年龄在25～45岁之间，峰值年龄为37岁。[7]可见，创新能力与青年人高度关联。青年人的这一鲜明特征，为新时代改革创新提供了显著的创新和创造力优势，成为广大青年人创新的关键性要素和支撑性条件。

3 新时代改革创新与青春远航的三维逻辑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开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的新征程。新征程呼唤改革创新浪潮持续向前，改革创新需要新时代青年的深度参与。可以说，改革创新与新时代青年放飞梦想、青春远航之间高度契合、紧密相连，有机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新实践。

3.1 时间维度：新时代改革创新为青春远航创造了历史机遇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的使命任务："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21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了分两步走的总体战略安排："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5]24不断向着实现新时代使命任务扎实迈进，离不开改革创新的强力支撑。新时代呼唤改革创新，改革创新是这个时代的鲜明标志。青年人所具有的参与改革创新的优势，高度契合了时代要求，为广大青年实现青春远航，提供了历史机遇。

3.2 空间维度：新时代改革创新为青春远航提供了广阔空间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5]71国家发展、人民幸福、民族复兴都需要改革创新，改革创新体现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体现在生产、生活各个方面；体现在城市、乡村各个角落；体现在生产、物流、销售、消费等经济链条各个环节。广大青年分布于全社会各专业领域、覆盖各行各业、遍布各个角落，参与经济社会建

设发展各个环节，全方位改革创新为青年一代实现青春远航提供了无比广阔的舞台空间。

3.3　方向维度：新时代改革创新为青春远航指明了前进方向

时代呼唤青年，时代催促青年人奋进。一方面，新时代改革创新需要破解的难题纷繁复杂。青年人应当以时代的前进方向和时代的新要求为指引，以各个领域改革创新为具体阵地，冲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前沿。展现活力智慧，实现国家目标和个人价值的同频共振。另一方面，现实的就业压力和竞争压力，也要求广大青年必须拿出十足的劲头、付出十分的努力，迎难而上直面实践的淬炼和时代的考验，在勇毅前行中锻炼自己、提升自己、放飞自己，实现青春远航与人生价值的互动并进。

4　新时代改革创新与青春远航的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5]71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新时代青年如何在改革创新中大显身手、实现青春远航，这既是新时代改革创新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需要新时代青年认真提交的一份答卷。

4.1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保证改革创新的守正方向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正是因为坚持了党的领导，广大青年才成为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重要力量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做到政治合格是对青年的第一要求，是青年实现青春远航最为重要的素养硬件。广大青年应当注重"强化两个自觉"：一方面，注重强化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广大青年应当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积极主动向党靠拢，自觉做到用党的光辉旗帜指引青春方向，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内心，用党的良好作风保驾远航，真正从内心深处对党的信赖，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注重强化正确向上的价值引领自觉。青年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阶段，广大青年应当扎实做好思想理论武装，树立科学正确的世界观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切实做到新时代的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味、更有内涵、更显青春活力的人生。

4.2　把握时代脉搏抓学习，夯实改革创新的知识基础

改革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闪烁跳跃着时代的音符。青年人参与改革创新伟大实践，应当破解"认知盲区"，通过"三个知识"全面持续打牢知识储备基础：一是扎扎实实学好专业知识，这是青年人融入改革创新时代浪潮最为根本的前提。改革创新既需要各个方面的普通人才，更需要高精尖的高层次创新人才，有一定深度和走在前沿的专业知识。青年一代只有强化专业立身意识，用力用心在专业知识上打牢基础、做好积累，才能在实践中厚积薄发、发挥智慧。二是与时俱进坚持更新知识，青年人只有自觉养成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才能适应时代需要，适应改革创新需要，才能在改革创新实践中游刃有余。否则，很容易发生知识老化、思维僵化，甚至被时代淘汰。三是注重培养综合知识素养，时代发展对知识的需要不是单一方面、单向维度的，特别是改革创新的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特征，决定了与之相匹配的复合型知识人才，新时代青年既要有主攻的专业技能，又要具有多专业知识融会贯通，这样才能真正有效适应改革创新的实践需要。

4.3　紧跟时代步伐提能力，积蓄改革创新的强大动能

新时代改革创新不仅需要综合知识素养，更需要紧跟时代、满足改革创新需要的综合能力素养。新时代青年人需要"六种能力"：一是联系实际、综合分析的能力，这是一种系统思维能力。实践中，综合分析能力应当是第一要素，理论实际之间、前后环节之间、各类信息之间联系好才能贯通好，贯通好才能分析好，分析好才可能真正解决好。二是问题导向、精准施策的能力，这是一种破题能力。改革创新本质上就是解决问题。创新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坚持问题导向，从问题入手破题，注重发现问题、聚焦问题、分析解决问题。三是统筹兼顾、聚焦重点的能力，这是一种统筹能力。面对多种矛盾、多重压力、多个难题，应当统筹兼顾，抓主要矛盾，否则就会顾此失彼、手忙脚乱、无从下手，解决问题也就无从谈起。四是沟通协调、组织协同的能力，这是一种情商能力。一方面，沟通是正确获取信息的前提，协调是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沟通协调意识和能力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改革创新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种力量协同作战、系统化推进。强化协同意识、构建协同化机制尤为关键。五是控

制情绪、遇事沉稳的能力，这是一种应急能力。控制情绪也是一种能力，好情绪提升信心，坏情绪则可能引发更坏的结果。遇到不顺心不满意的问题，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要控制情绪，才能理性分析问题、正确处置问题和有效解决问题。六是自信不自负、失败不气馁的能力，这是一种意志能力。不断强化斗争精神，在斗争中磨砺成长，得意不自负不忘形，失败不灰心不气馁，磨炼屡败屡战的斗争意志，才能实现人生目标，堪当时代大任。

4.4 永葆时代活力勇担当，发挥改革创新的主力军作用

青年人知识、能力要运用到改革创新实践中去，要始终坚持“两个实践”。一方面，担当作为，勇敢投身改革创新伟大实践。青年一代是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唯有大胆投身改革创新实践，才会有作为，才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实现人生价值。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有希望国家民族才有希望。另一方面，永葆活力，持之以恒展现改革创新实践韧劲。青年一代的激情活力是创新的源泉，是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有力支撑。因此，改革创新实践中青年人应当发挥优势释放活力，力求情绪上胜不骄、败不馁，思维上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利用好改革创新的广阔舞台，展现风采，实现价值。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小词典[M]. 5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 邓小平.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EB/OL]. (2022-12-29)[2023-02-10]. http://news.cctv.com/news/special/zt1/shenzhen/1455.html.

[3] 熊丽. 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121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EB/OL]. (2023-01-18)[2023-02-10]. https://k.sina.com.cn/article_1663612603_6328b6bb02001chyd.html.

[4] 《思想道德与法治》编写组. 思想道德与法治[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92.

[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6] 月黄昏. 目前20～35岁的人占中国人口的比重有多大[EB/OL]. (2020-08-27)[2023-02-10].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7133370.

[7] 于光. 论“科学创造最佳年龄规律”的局限性[EB/OL]. (2018-01-31)[2023-02-10].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0130/151233097.shtm.

责任编辑：仲耀黎

Reform and Innovation should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Voyage of Youth

LI Changhao[1], LI Xingyu[2]

Abstract: Reform and innovation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The young generation have the motivation to do work, have the physical energy to do work, and have the creativity to do work, and have the significant advantage in participating in reform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young people should demonstrate their skills in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achieve their youthful journey.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is political qualification, the prerequisite is to strengthen learning, the core element is to enhance abilities, and the direction of effort is to take on responsibilities.

Key words: reform and innovation; the new era; youth

王稼祥知识分子观的历史性贡献

张　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6）

摘要：王稼祥青年时期开始探索分析知识分子，在中央苏区时抵制过“左”政策，保护红军急需的知识分子；延安时期推行针对知识分子“容、化、用”的政策，在根据地、军队、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中吸收和使用知识分子；解放战争时期，在哈尔滨探索城市工作政策，提出教育和培养服务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通过与毛泽东等知识分子观的历史演进比较，王稼祥对知识分子观的贡献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分子观的形成。

关键词：王稼祥；知识分子观；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3；D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29-04

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不仅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而且在中国共产党人知识分子观的形成过程中贡献大量原创性思想。王稼祥从小学习优秀，在芜湖求学期间，因领导爱国学生运动被圣雅各中学高中部开除，后转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并经党组织推荐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投身革命后，王稼祥作为知识分子类型的领导干部，也是较早思考知识分子政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制定适应不同时期要求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分子观。

1　青年时期对知识分子的初步认识

王稼祥在芜湖、上海和莫斯科三段求学时期留下 17 封和亲友的通信，其中：有 5 封收录至《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从中可以一窥其青年时期的革命思想。1925 年，19 岁的王稼祥在给堂弟王柳华的信中尝试分析知识阶级（包括自己所在的学生群体）的社会地位和革命方向，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峙的社会”，而知识阶级介于两个阶级之间，只有两条道路：一是帮助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买办阶级为主）去压迫劳动者；二是帮助工人和资本家斗争，解放无产阶级（包括工人和农民）的同时解放自己。但随着资本集中，中产阶级没落至无产阶级，知识阶级也会成为无产者。所以，知识阶级唯一的出路是帮助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解放劳动者和自己。他认为青年学生作为知识阶级和国民中的优秀者，应该加入政党负起救国责任，而且这和读书并行不悖。[1]

王稼祥在上海大学附中部加入共青团后，1926 年经党组织推荐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在 1927 年申请入党。因为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经莫斯科中山大学党支部推荐，王稼祥、张闻天等被培养无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的红色教授学院录取。在系统研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阶段，他在 1926 年的一封信中对世界和中国革命趋势进行全面分析，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分为：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知识阶级和农民等部分。其中知识阶级又分为上层和下层阶级，下层阶级（包括：学生、中小学教师等）倾向革命。[2]5-6 王稼祥在青年求学阶段已经开始思考知识分子观，虽然将知识分子看成单独阶级的提法并不严谨，但是，他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极具前瞻性。

将王稼祥的分析和毛泽东同时期的阶级分析比较，可以发现很多类似的认识。毛泽东在 1925 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将小知识阶层，包括：学生、中小学教员等共同归为小资产阶级。根据具体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差异，进一步划分为三类：有“余钱剩米”的，对革命取疑甚至害怕革命的少数右翼；经济上大体自足，但维持生活困难，对革命保持中立态度，至少不反对革命的近半数的中间派；负债渐多、欢迎革命的部分左翼。[3] 总体上，王稼祥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一样，将知识分子归入小资产阶级并持正面知识分子观。

2　中央苏区时期保护和团结知识分子

在大革命失败的背景下，党内一度弥漫着浓厚的排斥知识分子思想。1927 年 11 月的中共临时中央扩大会议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认为知识分子成分的领导干部是“机会主义遗毒犹存的主要

收稿日期：2023-05-21
作者简介：张伟（1983—），男，安徽泾县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2021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原因之一”[4]。在王明主导的第三次“左”倾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过“左”观点也达到新的顶峰。王稼祥在1931年4月来到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位，逐步成为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在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他较早地从教条主义的阵营中摆脱出来，并从宁都会议开始就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面对知识分子被排斥甚至被迫害时，他设法保护我军最早的一批医疗、通信技术和文化艺术知识分子，并将其培养成为党的专业人才和干部。

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先驱之一曾三同志记得，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中，王稼祥保护一位俘虏来的电台报务员，并使他成为我军无线电通讯的技术骨干。经王稼祥设法保护下来兵器专家王诤和医务工作者王斌等在建国后分别担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和卫生部副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5]16-17王斌后来也追忆王稼祥特别注重团结知识分子，在他的正确领导下，知识分子在当时红军四根“顶梁柱”，即：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中都能积极地发挥作用。[5]63

王稼祥不仅保护知识分子，还较早在苏区的干部和士兵中推动文化知识学习。针对当时战士文化程度低的情况，王稼祥领导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李翔梧同志召集部队的指导员研究怎样对战士进行识字和文化教育。[5]34在他的带动和领导下，当时在红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萧华和冯文彬等都在部队中推广文化教育，并成为青年工作的一个特色：通过文化教育巩固思想建设，同时，教育青年战士和团员学习共产主义。

苏区时期，毛泽东同样坚持保护知识分子的做法（王诤等6名被俘的国民党通讯技术人员就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等亲自欢迎下加入红军的），并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超越先前的阶级成分分析。1929年，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发布《告商人及知识分子》，公开告示革命接纳包括学生和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并号召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政府和军队。[6]1933年，针对苏区一些地方排斥知识分子的做法，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维埃政府指出：不能将知识分子单独看作阶级成分，而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即使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在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条件下充分利用。[7]当年，苏区还发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现金聘请白区的医疗、通讯、军事等技术人才来苏区发挥专长。[8]在苏区，毛泽东、王稼祥等领导人都对抵制和纠正过“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延安时期吸收和使用知识分子

1938年至1943年延安期间，王稼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辅助毛泽东处理党、军队和根据地的大量工作，这也是他担负最多领导职责的一段时期。[9]这是王稼祥对马克思中国化做出更多原创理论贡献的时期，他多次系统地论述知识分子政策，在根据地、军队、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中坚定地吸收知识分子。[10]

在根据地建设中，王稼祥信任和尊重知识分子群体，并给予很高的政治地位评价。在当时对知识分子普遍不信任的氛围下，王稼祥作为政治工作领导的态度非常重要。王稼祥要求八路军卫生部政治委员刘惠农等对待知识分子首先要信任，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为革命服务。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审查干部运动发展为“抢救运动”，许多知识分子蒙受怀疑和审查。钱益民（延安时期曾任联防军保卫部部长，杰出的情报保卫工作者）回忆，王稼祥同样要求在保卫工作中信任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们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不顾生活条件来到延安，所以要贯彻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5]37王稼祥在1939年纪念“一二·九”四周年大会上高度肯定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的先锋队。[2]266他赞赏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认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新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新的精华”[2]125。这个时期最能代表王稼祥知识分子观的是1939年公布的《总政治部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的训令》和1942年《总政治部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等，前者将吸收新的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为干部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大批吸收的同时考察思想和引导教育，经常考察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特长，同时，提高组织观念、纪律性和坚定性等。[11]403-404在后文中，王稼祥提炼出对待知识分子的“容、化、用”政策，所谓“容”就是否定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做法，争取和容纳知识分子加入军队。即使不一定拥护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只要赞成共产党民主纲领，就不应排斥他们，而要将其视为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化”就是通过教育引导、转变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使他们革命化、无产阶级化。但教育工作既不能漠视思想问题，也不能操之过急，过分地以小资产阶级意识扣帽子。“用”就是正确运用知识分子，分配工作，在实践锻炼中培养为优秀干部。[11]456-460曾任王稼祥机要秘书的史坚同志回忆说，王稼祥非常重视这个原则，反复在会上和个别谈话时强调。[5]103

为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和作用，王稼祥在为知识分子分配工作前一一征求意见，同时，要

求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关怀知识分子，给予待遇要高于一般干部。如：当时边区政府给高士其同志（美国医学博士回国，给延安带来一台高倍显微镜）每月二十元，和白求恩大夫享受同等待遇。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女士曾经回忆，当时一般同志才只有一两块钱，同样是医生的自己每个月是五元。[12]正是在毛泽东、王稼祥等领导的支持下，1940年在“八路军卫生学校”等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了八路军第一所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13]担任校长的正是反围剿时期来到苏区，在王稼祥的保护下留下工作的王斌。同时，任教的还有治疗肺结核病的专家何穆，他带来延安的第一部X光机帮助根据地诊断并治愈众多肺结核病患者。在王斌、何穆等老师的教学指导下，很多毕业生成长为我国医疗战线的技术骨干和领导干部。

当时，延安基于对人才的渴求，主动向沦陷区和其他根据地招募知识分子，甚至按照陈云的说法是“抢知识分子”[14]。1941年7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向各兵团首长发出指示，不惜津贴尽可能地吸收医务人才，并在政治上当作非党干部。[15]302当年10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提议从苏北、安徽各根据地内招收“知识青年六百至一千人来延安”[15]309。在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吸引下，全国各地大批进步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穿越封锁线奔赴延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源源不断地提供智力支持。

在根据地之外，王稼祥在军队干部培养中反对“关门主义”，积极吸收知识分子。[2]301-302他认为“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劳苦群众的军队，工人、农民及劳动知识分子的军队”[2]281。毛泽东和王稼祥等建议在华中成立抗大分校或新四军干部学校等吸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15]248王稼祥甚至提出必须吸收大批知识青年担任军事政治及各方面的领导工作，其中参谋机关更应吸收有军事政治文化知识的学生出身的人员。[2]300

在党的组织建设中，王稼祥批评有些地方害怕知识分子入党，提出欢迎知识分子，特别是贫苦知识分子入党。[15]214他在1939年5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提出：发展党员中没有注意发展知识分子，并且候补期不应比商人更长。[15]219王稼祥在1939年8月《关于巩固党的几个问题》中再次明确中国共产党需要一批好的知识分子，“他们比农民还好，要培养他们成为党的骨干。”[2]215一方面，明确知识分子入党的要求，不仅要承认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积极纲领和主张，而且承认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整个纲领。另一方面，要正视知识分子缺乏组织性、纪律性等弱点，要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入党后加强思想建设：第一，教育知识分子掌握马列主义的人生观，改变其阶级立场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第二，教育知识分子提高组织性与纪律性，反对和纠正散漫性、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思想；第三，教育青年学生党员重视民众中的实际工作，坚持理论实践的统一，纠正轻视下层工作的倾向；第四，教育他们尊重、接近工农，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反对轻视工农的倾向。[2]258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广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标志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转变。[16]王稼祥在1937年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给中央的信中指出：中国的民主斗争最终是要依靠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而且必须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2]118王稼祥在1939年关于知识分子的众多论述都在1939年12月中央制定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得到充分体现。毛泽东肯定“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7]618-620，明确要求党、军队、政府都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分配工作，进行教育。同时，针对广大的党外知识分子，应该建立联系并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17]618-620在中共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总结提出：“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18]

总之，抗战时期，在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指导下，在全民族抗日和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大批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学者、文化艺术工作者，甚至众多国际专家云集革命圣地延安。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知识分子观形成的关键阶段，王稼祥具有特殊贡献。

4　解放战争时期教育和培养知识分子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有些地区对土改政策操之过急，加上客观上复杂的斗争环境，导致“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不够，错过不少吸收知识分子的机会”[19]。毛泽东在1945年《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指出，吸取抗战初期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注意不够的教训，要在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等特别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这一部分力量，并尽可能吸引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20]1947年，王稼祥从苏联病愈回国，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等，并分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大城市哈尔滨市的工作。当时，党内缺乏城市工作的先例，王稼祥充分考虑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新要求，纠正一些“左”的做法，为之后的城市工作积累经验。

经过实际调研，王稼祥于1948年完成在党的城市工作历史上具有探索性的《城市工作大纲》，其中包含大量对知识分子的新思考。在欢迎、团结、吸收和教育知识分子的基础上，他提出在未来的新城市“建立以工人劳动人民为骨干、团结知识阶层、联合中小民族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的民主统治”[2]379。他认为城市越大知识分子就越多，所以，更有必要团结、改造和组织知识分子。为了把知识分子组织起来，他前瞻性地提出吸收知识分子参加职工会，以及按职业组织工程师协会、医师协会、教师联合会等协会团体，在政府的帮助下推动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2]376他还罕见地提出为了促进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要保障知识分子的人权、财权和较高的物质待遇。

在具体的教育事业中，王稼祥较早地开始思考建立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打破旧中国只有富人才能接受教育的旧制度，通过免费、公费生、半工半读等政策保证贫苦劳动者子弟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实现真正的教育平等。他还开创性地建议改变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发展职业教育等满足新民主主义建设要求。最终通过青年组织和政治思想的教育改造等，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新知识阶层。[2]376总体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行将胜利之际，王稼祥不仅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保障知识分子的权利，而且率先提出教育和培养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新知识分子，也契合毛泽东建国后对知识分子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观点。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8-10.

[2] 《王稼祥选集》编辑部.王稼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

[4]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49.

[5] 《王稼祥选集》编辑组.回忆王稼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5.

[7]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5.

[8]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苏维埃中国[M].1957：135.

[9] 徐则浩.王稼祥研究论集[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20.

[10]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王稼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335.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九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2] 朱仲丽.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自传三步曲[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5：288.

[13]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8-29.

[14] 朱文显.知识分子问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255-273.

[15]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一九〇六—一九七四)[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6] 骆方金.毛泽东知识分子思想的发展历程[J].广西社会科学，2003(1)：18-20.

[1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2-1083.

[19] 潘建华.从“隔阂”到“融合”：解放战争时期中原新区对知识分子的吸纳[J].民国档案，2022(3)：68-79.

[2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82.

责任编辑：仲耀黎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Wang Jiaxiang's Thoughts on Intellectuals

ZHANG Wei

Abstract: In his youth, Wang Jiaxiang began to explore and analyze intellectuals, resisted the "Left" policy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and protected the intellectuals urgently needed by the Red Army;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the policy of "accommodating, transforming, and utilizing" intellectuals was implemented, and intellectuals were absorbed and utilized in the base areas, military forces, united front, and Party building;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he explored urban work policies in Harbin and proposed to educate and train intellectuals who would serve New Democratic Society. Compared with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intellectuals, Wang Jiaxiang's contribution to intellectuals has forme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oughts on intellectuals.

Key words: Wang Jiaxiang; the thoughts on intellectuals; Mao Zedong Thought;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诚信”三问:本质·边界·实践

章文军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政与交通工程学院,安徽 合肥 231603)

摘要:诚信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诚信的基本含义是诚实守信,它是在修身基础上通过个人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来养成和维系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内容的诚信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诚信应用范围要有边界,不能盲目诚信,不辨是非,不管善恶。践行诚信要认知并认同诚信价值观,践行诚信既要修身苦练内功,也要积极践履落实到行动中。

关键词: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边界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33-04

“诚信”可以说妇孺皆知,毫不陌生,似乎人人都能说出一二,无需赘言,但熟知并不等于真知,“一般来说,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1] 目前,对“诚信”认识仍有偏差,模糊不清,这不利于正确认识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诚信”。因此,亟须分析“诚信”的三个关键问题:何谓诚信?诚信有无界限?如何践行诚信?

1 本质之问:“诚信”内涵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诚信”与“爱国、敬业、友善”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于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更加明确了“诚信”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建设和个人发展中处于一个基础地位。加强诚信教育,树立诚信为本、诚信为重的观念,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诚信是人安身立命之本,更是社会长期稳定发展之基,诚信由来已久。“诚”最早出现于《尚书》“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2]145,这里的“诚”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意思是对鬼神要发自内心虔诚。“信”最早记载于《尚书》,“尔无不信,朕不食言”[2]125,此处的“信”已有信用之意。“诚”和“信”连在一起作为一个词使用最早出现于《管子·枢言》:“好恶形于心,百姓化于下;罚未行而民畏恐,赏未加而民劝勉,诚信之所期。”[3] 此处的“诚信”已含有诚实守信的意思。

诚信属于道德范畴,一般多用于指为人处世真诚老实,信守承诺,坚持实事求是。诚信是调整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道德规范,数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极为重视诚信道德建设。《论语·卫灵公》道:“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4]240 意指诚实守信素养极其重要。在先秦思想家看来,诚信是个人修身的目标指向和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诚信维系着人际关系和谐和社会秩序有序,没有诚信,必然人人自危,必定怀疑一切人行为目的的正当性和友善性,国家信誉和社会公正性荡然无存,社会必将大乱,甚至走向灭亡。在儒家看来,诚信是一个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品格,它是人际交往和社会有序运行的奠基石。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4]10 意思是人如果不讲诚信,都不知道会怎么样,实际是指如果没有“诚信”这一精神内核,将有多糟糕的现象可能远远超出我们想象,可见诚信的极端重要性。《孟子·离娄上》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5] 诚信被视为世间万物本体道德基础很早有之,从自然法则和道德原则看,自然界的本原在诚信,人的本原也在诚信,诚信是维系和推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良性发展的本原。所以,良好的社会一定是真、善、美,真善美产生的前提是诚信,诚信是真、善、美的基础。如果没有诚信何来真?没有真又何来善?没有善何谈美?正基于此,王夫之把真、善、美统一于“诚”。自然是人化

收稿日期:2023-05-28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质量工程项目“高职扩招背景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研究”(编号:2021jyxm054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章文军(1976—),男,安徽芜湖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

的自然,人改造自然满足人的需求,不能脱离自然的规律,这里的自然规律就有诚信寓意天道的意思。同样,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需要发挥诚信道德规范功能和约束功能,倡导每个人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营造守信光荣和失信可耻的良好社会风气。尔虞我诈和言行不一将受到诚信道德谴责和严厉失信处罚。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诚信教育,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作出很多关于诚信的重要讲话,极大丰富和发展了诚信内涵。毛泽东非常重视诚信道德建设,他很早就强调,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忠诚积极。他要求把诚信作为共产党员的基本道德规范,对党对人民绝对忠诚,并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6]邓小平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坚持把对人民的忠诚放在第一位。他多次强调党和政府要服务于取信于人民,只有这样,党和政府才会有群众的支持,才会有诚信的基础,并痛心疾首地说道:“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7]在邓小平看来,党和政府要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对老百姓承诺的事一定要办到,决不能失信于民。江泽民对多领域提出了诚信要求,他指出把诚实守信作为职业道德基本要求之一,后来又把明礼诚信作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要求。胡锦涛把“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作为八荣八耻内容之一。显而易见,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传统诚信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诚信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要求,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诚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将诚信价值观提到历史最高地位。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诚信,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和社会制度大相径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的诚信思想和中国传统诚信思想并非完全相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在社会主义长期发展和实践中产生,指导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道德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是诚信价值观的基色,它和传统诚信思想首先在经济基础上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诚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命脉,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诚实劳动,坚持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的拥护和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目标,因此,诚信价值观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2 边界之问:“诚信”界限

诚信是人的道德底线,是维护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美德,也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稳定器,社会有序发展要求每个人诚信。习近平强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社会无信,则人人自危;政府无信,则威信不立。”[8]诚信要针对所有人和所有事。

诚信的应用范围要有边界,不能盲目诚信,不辨是非,不管善恶。当前,社会充斥着多种价值观,西方物质至上,精致利己主义价值观被某些人信奉,他们为达到个人目的和追求个人财富不择手段。尔虞我诈,各种欺诈,失信现象层出不穷,造成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社会陷入信任危机。要提倡诚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倡导人与人之间诚信,但这种诚信并非不分敌我、不分善恶,不分场景,把是非、敌我、原则排除在外的诚信是一种愚诚信而非真诚信,践行诚信和分清敌我并不矛盾,而是一体两面。诚信必须符合社会的正义原则,不能突破正义的底线,只有这样,倡导诚信,才能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

诚信也不能不分你我,在特殊时期和特殊情境之下,“不诚信”也是一种善,善是诚信的底色,也是诚信行为的伦理基点。若实行诚信给他人或社会带来的不是善果而是恶果,此时,行为人理应有人际边界和人与社会边界。要以善意的诚信为出发点,客观评判诚信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和人民,不能坚持教条的诚信。不利于社会发展、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诚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伪诚信。伪诚信之人以教条的诚信标榜自己,不论何人不管何事都讲诚信,以道德模范和救世主自居,过分放大自我,追求个人心理慰藉,而将行为强加于他人,坚持自己的诚信行为是合理的和正义的,在施行诚信行为的名义下,不自觉地满足心理需要。诚信是建立在主体平等基础之上的,以牺牲主体平等幸福来换取自己的获得感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们倡导的诚信。现实生活中,存在各式各样诚信无边界现象,譬如:对敌人诚信,把国家机密透露给间谍,使国家遭受危险和损失;对恶人诚信,助纣为虐,危害社会稳定和损害人民利益;对特定人透露不该透露的实情,犹如晴天霹雳,给特定人员造成巨大痛苦。这些错误行为是要坚决摒弃的。

从主体视角来看,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是不越界,就是说要有边界意识,要区分

清楚自我和他人。诚信作为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不仅要以诚信为出发点，更要在语言和行为上把握分寸，做到谨言慎行，不要自认为只要是诚信的，就可以信口开河，就能随意作为。诚信也要明晰自我与他人的边界，人际边界清晰的人能找准自己在人际交往中的位置，能把握分寸，做到不越界。诚信要求实话实说，但不是所有的实话都说，实话说不说是有边界的，一些实话说比不说好，一些实话在不合适的时间点说出会造成社会不安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破坏社会稳定。诚信边界不清的人把属于个人隐私，不适合于与他人吐露之事，出于完全信任或一吐为快而告之他人，使私人空间受到侵犯，个人利益和名誉遭受损失。虽然做人诚信没有错，但出于友善，出于正义，出于维护人民和国家利益，出于自我保护，要会拒绝，他人有要求你诚信的权利，你同样有拒绝的权利，因为诚信并不排斥社会成员维护人民的利益和正当个人利益的权利。

诚信具有三个鲜明特征，即：友善性、正义性、阶级性，这三个特征也是诚信的边界。诚信的动机和行为应是友善的，非“爱人”的诚信是虚假诚信，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每个人心存善意，善待家人、朋友、他人，对社会、国家和自然都抱有善意。诚信代表着正义而非邪恶，诚信一定为正义所用，施行诚信行为要思考行为的对象是否是正义的，行为目标指向是否是正义的。诚信蕴含着特定的阶级立场，社会主义的诚信观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反对一切破坏国家稳定损害人民利益的敌人，对这些人民民主专政对象不能讲诚信，不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3　实践之问：“诚信”践行

追问“诚信”的本质，划清“诚信”的边界，其目的是如何真正践行诚信。诚信的价值不仅仅存于内心或只是常挂于口，辨别一个人是否真正诚信，要听其言，观其行，见其心。诚信最终要落到行为，若只听一个人常说诚信之言，却始终不见诚信之行为，这是伪诚信。青少年时期一般是个人真正开始深入系统思考、辨别、选择价值理念关键时期，是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此时进行正确价值观教育和引导尤为重要。青少年是社会中最活跃的群体，他们持续影响和改变着社会风气，他们的诚信价值取向不仅关系着个人道德健康发展，也影响并决定着整个社会诚信价值理念的形成和传播。在全社会弘扬和践行诚信价值观，需要大学生坚定不移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成为整个社会诚信价值观最积极、最坚定的倡导者、践行者、维护者。当然，诚信价值观的养成并非易事，青少年要勇于起步，起好步，带好头，心存善意、心怀国之大者，不为一己私利而尔虞我诈，不为袒护一人而颠倒黑白。心中有诚信的坚定信念，由小到大，由易到难，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用自己的言行影响身边人，做到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努力营造良好诚信社会氛围，共同为实现中国梦贡献个人力量，久久为功，必定能牢固树立诚信价值观。

坚定不移践行诚信价值观。首先，要认知并认同诚信价值观，诚信价值观不可能自然形成，它的形成需要深学细悟和深思明辨。要研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诚信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思想的发源地，学懂弄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把握其核心要义尤为重要。除研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著作外，还要汲取外国优秀文明成果中蕴含的诚信思想，特别要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搞清弄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内容的“诚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他内容的逻辑关系。深思明辨要善于思考问题，善于辨别是非，要不断修正自己价值观，增强个人价值判断力，坚守价值底线，积极主动做良好社会风尚的推动者。

践行诚信既要修身苦练内功，也要积极落实在行动上。内在诚信坚定信念和外在诚信言行是诚信一体两面，缺一不可。内在诚信信念是基础和根本，它是诚信价值选择和价值行为的源头，从外在的诚信教育、诚信环境、诚信规范等他律转化成内在的诚信自律是一个长期的修身过程。“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9]诚信成为个人自主自律理性精神，个人必然主动、自觉接受并实行道德诚信，同一切不诚信行为做坚决斗争，自觉担负起捍卫诚信尊严的光荣职责，诚信不是有口无心的说说而已，而是真心诚意地去践履。《中庸》云：“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10]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诚信并非容易，需要坚持不懈，一以贯之，要信念坚定，不畏艰难，多学多问，深思明辨，知行合一。因此，诚信的广泛宣传和积极引导，让诚信蔚然成风是培育诚信意识的应有之举。诚信的养成有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牢固树立诚信意识是第一步，诚信意识内化为诚信信念是第二步，诚信信念外化为诚信行为是第三步，当然，这其中有纠偏修正的胶着状态。

“诚信”作为优良传统美德,无论社会健康发展和个人安身立命都离不开它,它是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和价值需要。外在的诚信道德规范约束转变成内在诚信道德自律非一日之功,需久久为之,这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修养过程,这种自律不是靠心与心感应可以产生,也不是靠遗传可以产生,只能通过环境熏陶、自我学习和教育塑造获得。诚信成为内心不可撼动的信念,不管何时何地都处处讲诚信,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并非易事,正所谓“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践行诚信可以由易到难,立即行动,从现在做起,坚持不懈,坚持学思结合,践悟并重,唯有如此方能内外兼修,行稳致远。“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11]诚信应该体现在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在社会实践中生根发芽,使诚信成为一言一行的基本价值遵循。践行诚信,要常修诚信之德,常怀诚信之心,常做诚信之举。目前,社会存在各种不诚信行为,我们要敢于揭露不诚信行为,同各种不诚信行为斗争,旗帜鲜明地弘扬诚信美德,自觉做诚信模范。

总而言之,诚信作为个人为人处世的基本价值理念,是个人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之一,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诚信也是基本道德规范,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基础性意义。在任何时候,诚信都不能无边界,否则,诚信非但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反而不利于人民和社会。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0.

[2]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3] 耿振东.管子译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207.

[4]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153.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2.

[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00.

[8]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8.

[9] 王文锦.大学中庸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146.

[10] 李世忠,王毅强,杨德齐.《大学·中庸》新论[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78.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编辑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65.

责任编辑:仲耀黎

Three Questions of "Honesty": Essence, Boundary and Practice

ZHANG Wenjun

Abstract: Honest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 basic meaning of honesty is honesty and trustworthiness, which is developed and maintained on the basis of self-cultivation through personal self-renewal and self-cultivation. As the main content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honesty has distinct people.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integrity should have boundaries, not blindly honest, do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regardless of good and evil. To practice integrity, we must recognize and agree with the values of integrity. To practice integrity, we must not only cultivate ourselves, but also actively implement it into action.

Key words: honesty;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tension; boundary

·教育探索·

高职院校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教材改革现状及其新形态教材开发

刘　婷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商贸与融媒体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8）

摘要：当前，诸多高职院校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教材改革较为滞后，教学理念不转变使教材改革无方向、课程改革不彻底致使教材改革不匹配、产教融合不深入导致教材改革无特色。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适应课程模块化改革要求，积极探索新形态教材开发路径，调整新形态教材框架结构，重构新形态教材内容板块，突出新形态教材学习任务设计，打造新形态教材网上共享教学资源。

关键词：高职院校；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新形态教材；开发路径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37-05

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是当前诸多高职院校财务金融学院开设的一个重要专业。该专业虽然开设了很多新兴课程，但更多的还是“基础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等传统课程。这些课程的教材改革现状怎样，如何深入理解新形态教材的内涵、特征和分类，怎样科学开发高职院校大数据与会计专业的新形态教材，下面拟就这些问题作以简要探讨。

1　高职院校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教材改革现状

2021 年教育部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原高职会计专业名称也更新成为大数据与会计专业，体现了国家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1]专业更名意味着会计从最初只关注事后核算和报告的“账房先生”逐渐转变成提供决策分析服务的“战略分析师”，人才培养的重心也开始对接智能财税背景下的会计相关岗位，以突出技能培养。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大数据与会计专业的人才培养仍停留在本科学科体系上，职业教育特点不突出，教材改革较为滞后，存在较多问题。

1.1　教学理念不转变导致教材改革无方向

会计专业是高职院校的老牌专业，其发展经历了手工会计、电算化会计、会计信息化、智能财税等阶段。当前，新技术的出现对会计岗位提出了新的要求，职业教育要体现职业性，也必须适应新技术和新岗位的要求。目前，高职院校大数据与会计专业诸多教师由于教学理念较为保守，课程改革没有目标，这使的教材大多数还是重学科体系的传统教材，这使教材改革缺乏明确方向，难以深入推进。

1.2　课程改革不彻底导致教材改革不匹配

教材是课程内容的外显形式，教材的内容和组织形式决定着教学质量和成效。课程改革不到位，教材改革也不可能彻底。课程改革是教材改革的前提，一旦课程按照新职业教育模式进行革新，传统教材必然不能满足改革后的需要。比如：一门课程按照模块化、工作流程等形式进行教学内容改革，但如果教材改革与课程不匹配，仍旧使用重视学科体系的传统教材，势必会导致课程和教材“两张皮”现象，其后果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知所措，从而降低教学质量，无法有效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1.3　产教融合不深入导致教材改革无特色

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教材改革要紧贴企业一线，做到校企互助、产教融合。首先，教师要到企业进行深度调研，了解大数据与会计专业学生就业对应的核心岗位要求，并根据岗位工作内容确定毕业生必备的岗位基本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素质；其次，同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基于产教融合的新教材和新课程。这样的改革能缩短学生毕业后的岗位适应期，突出学生的岗位技能培养，使毕业生较快适应工作要求。由于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很多

收稿日期：2023-05-10

基金项目：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2022 年度课题“民办高职院校赛证融合课程建设研究”(编号：CANFZG22472)和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2022 年课题“新商科类专业群‘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机制研究”(编号：sccvcyb20220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婷(1982—)，女，江苏徐州人，教授，注册资产管理师，会计师，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教学管理、企业财务管理。

教师缺乏创新，与行业企业的合作不够紧密，产教融合度不够，导致教材改革缺乏特色，课程改革缺乏创新。

2　高职院校大数据与会计专业

教育部2019年底颁布了《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其中：第四章《教材编写》第十二条提到，教材编写依据职业院校教材规划，以及国家教学标准和职业标准（规范）等，服务学生成长成才和就业创业，倡导开发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新形态教材。[2] 2020年9月，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要系统推进职业教育“三教”改革，加强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其不仅要求高职院校积极联合企业合作开发教材，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方法运用到教材的开发内容中，对接行业企业先进经验和技术，保证学生学习内容的前沿性，而且还提出要根据职业学校学生特点创新教材形态，推行科学严谨、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形式多样的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3] 学者们随之纷纷对新形态教材展开了研究，如：丁喜纲在《职业教育新形态教材的比较与建设探析》一文中将新形态教材总结和归纳为三种形态：活页式教材、工作手册式教材、融媒体数字教材。[4]

2.1　新形态教材的内涵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传统的纸质教材与数字资源充分融合，经一体化设计、建设并通过多终端应用的新型教材，成为新职教改革的一个新态势。与传统教材相比，新形态教材不仅在形态上出现了创新，如：活页式、插页式等，可抽取便于携带，而且在内容上也体现了课程改革的模块化、流程化、标准化；同时，其融入了行业企业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规范，融入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政、双创等元素，大大提高了新形态教材的育才功能。

2.2　新形态教材的分类和特征

新形态教材是职业教育改革下的产物，是深化教学改革的体现。无论是活页式、工作手册式还是融媒体数字式，它们都一改传统教材的学科体例，凸显职教注重技能的特点，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见表1）。

表1　新形态教材的分类和特征

新形态教材	特征	适用范围
活页式教材	内页的灵活装订形式 内容的模块化组合	专业课程
工作手册式教材	工作过程的体验学习工作清单、工作流程实施、实施反馈	专业课程（偏实践类）
融媒体数字教材	互联网、数字技术、一体化平台动画、微课视频、3D图片等信息资源	专业课程（混合式教学）

活页式教材的特点是两个“活”字。第一个“活”，指的是“活页”，内页是一种可灵活调整的装订形式。这种装订方法便于学生按照单元或者模块学习，并根据需要进行携带。第二个“活”，指的是“灵活”，教材内容不再是传统教材的章节式构架，也不再强调学科式的体系，体现了内容选取、组合模式上的灵活。

工作手册式教材的特点是将企业工作手册的编写方式引入教材建设中，其实质在于突出职业教育教材的类型教育特征，适应产教融合、工学结合的教学改革要求，实现学习任务与工作任务、学习标准与工作标准、学习过程与工作过程的统一。[5] 工作手册式教材主要体现工作过程的体验学习，适用于偏实践类的专业课程。

融媒体数字教材的特点就是在传统教学基础之上运用图片、视频、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不同媒体技术，使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得到个性化、有效性、信息化的学习服务，增加了学生学习的体验感和互动感，突出了混合式教学的优势和特色。

3　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新形态教材开发的实践探索

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新形态教材的开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经过PDCA循环管理环节，即计划、执行、检查、处理等诸多环节。

3.1　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新形态教材开发的总体设计

《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强调专业课的教材要充分体现产业的最新发展，紧密对接科技发展和市场需求，及时融入成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以下简称“三新”）。因此，学校需要深入企业调研，及时了解大数据与会计专业在“三新”方面的变化，在新形态教材中加以体现，这是新形态教材开发的总体原则（如图1）。

学校首先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引入和孵化真实生产项目，分析会计工作的典型工作任务，然后将其作为课程改革后的课程内容，设计和组织新形态教材的教学单元。新形态教材的开发主体一定是校企双方：校方深入企业调研，企业方提供岗位分析、工作内容、工作流程；校方将内容转换成符合职业教育认知和发展规律的方式，重组课程内容、教材单元，最终呈现在新形态教材之中。新形态教材的开发过程是产教深度融合的过程，也是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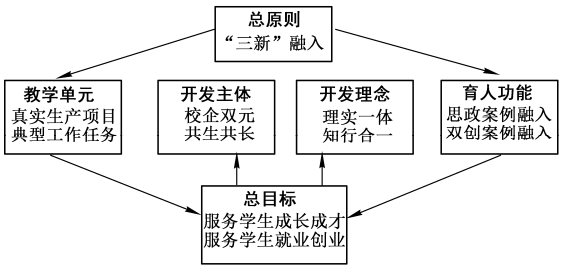


图1　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新形态教材开发总体设计

企双方共同促进、共生共长的过程。

教材是教师教学实施的依据，更是学生学习的材料。教材除了能够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外，还应该具有育人功能，解决“我们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同时还需要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新形态教材的开发设计中还应将思政案例和创新创业等案例融入到教材中，在教材相应的位置开辟“立德诚信”“双创贴士”等专栏，提供财务工作中遇到真实案例，引导学生积极讨论，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观。通过分享国家发布的创业优惠政策和财税行业前沿的咨询信息，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激情，培育创新创业意识。

3.2　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新形态教材开发的具体方法

3.2.1　开发模块化课程体系

新形态教材开发离不开新形态课程开发。高职院校要通过对企业的深度调研梳理出智能出纳、云财务会计、智能成本会计、智慧税务会计、战略会计主管等五个核心岗位，并将这五个核心岗位的工作内容确定为五个职业应用领域，即资金核算、会计核算与账务处理、成本核算与决策分析、涉税事项处理、财务管理与报表分析，以此开发和构建大数据与会计专业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在此基础上教师对每个模块化课程（职业能力应用领域）的典型工作任务进行梳理，并设计学习单元，培养学生完成每个典型工作任务需要具备的对应能力（见表2）。这是新形态教材开发的前提与基础。

表2　模块化课程体系开发对应关系

核心岗位	职业能力应用领域（模块化课程）	学习单元	对应能力
智能出纳	资金核算	现金收支业务 银行结算业务	现金收款业务处理能力 ……

续表

核心岗位	职业能力应用领域（模块化课程）	学习单元	对应能力
云财务会计	会计核算与账务处理	原始凭证处理 记账凭证处理 会计账簿登记 会计表报编制	原始凭证识别能力 会计要素和科目认知能力 财务软件基础设置能力 ……
智能成本会计	成本核算与决策分析	生产费用的归集和分配 产品成本计算 成本报表的编制与分析	要素费用的归集与分配能力 品种法计算能力 ……
智慧税务会计	涉税事项处理	工商税务登记 增值税发票填开 纳税申报 企业年度报告公示	工商登记 税务登记 增值税发票申领 ……
战略会计主管	财务管理与报表分析	筹资管理 资金运营管理 ……	最佳资本结构计算能力 项目投资决策评价指标计算能力 ……

3.2.2　构建新形态教材框架结构

高职院校在模块化课程体系改革的基础上构建新形态教材的框架结构（如图2）。依据模块化课程确定学习单元，分解学习任务，进行单元总结、考核与反馈，形成理论与实践融于一体的学习闭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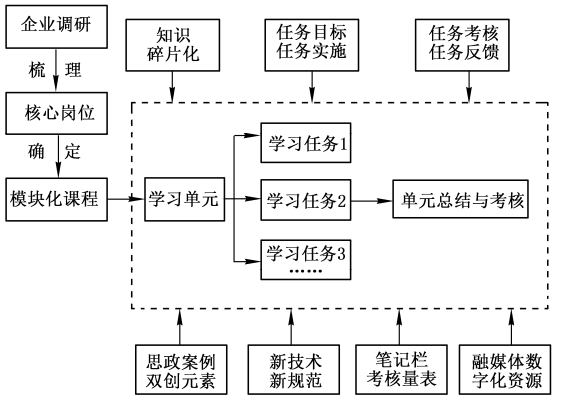


图2　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新形态教材框架结构

3.2.3　突出新形态教材学习任务设计

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诸多课程理论知识较多，学生学习比较抽象单调、枯燥无味。新形态教

材突出学习任务设计，弱化理论知识，强调实践教学，将知识点实操化。学生以任务为导向开展工作项目式学习，他们在完成任务过程中需要理论知识支撑时，以打开教材“知识点链接”的形式获得及时补给。新形态教材每个单元都设有任务导读、任务实施和任务检测三个环节（如图3）。任务导读的用途是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任务的主要目标、完成内容、步骤解析、基本成效等。任务实施过程中有详细步骤，以及相关环节对应的知识点链接、学习讨论、笔记栏、双创小贴士、思政案例等环节。学生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跳转到超星学习通上观看教学视频、教学图片、教学案例，也可以完成相应环节的随堂练习。每项任务完成后有任务总结，其通过绘制思维导图、流程图等方式总结本项工作任务。学生通过自我检测审视本任务的完成情况和掌握情况，为单元总结中的考核量表提供考核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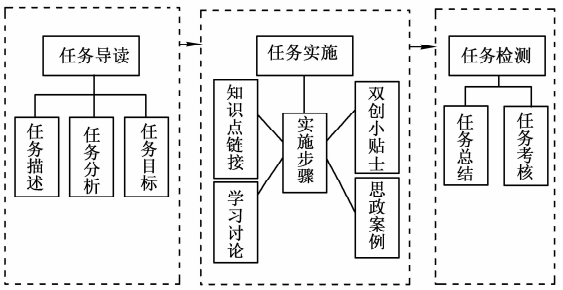


图3　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新形态教材学习任务设计

3.2.4　重构新形态教材内容板块——以《涉税事项处理》新形态教材为例

为适应模块化课程改革需要，新形态教材要进行相应的内容板块重构。以《涉税事项处理》新形态教材为例：紧密对接税务会计岗位，引入“金税财务应用1＋X”等级证书（初级）标准，按照智慧税务会计岗位工作内容，以及工作流程重构教材内容，分为4个单元和9项工作任务（如表3）。

表3　《涉税事项处理》新形态教材框架结构

	单元名称	任务名称
涉税事项处理	工商税务登记	工商注册
		税务信息采集
		税控盘发行
	增值税发票填开	增值税发票申领
		增值税发票填开
	纳税申报	增值税申报
		企业所得税申报
		个人所得税申报
	年度公示	年度报告公示

该教材每个单元都下设相应的工作任务，每项工作任务都设置对应的能力素质和技能训练要求，以保证工作任务的完成，真正实现职业教育按照岗位需求进行人才培养的科学目标。

3.2.5　打造新形态教材网上共享资源

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新形态教材为学生提供网上教学资源共享服务。学生在学习时可以通过扫描教材上的二维码跳转到相应知识点或者技能点的微课视频，随时随地地进行碎片化学习和反复学习。学生通过在线观看相关实践环节的操作视频，可以进一步激发学习兴趣，了解工作流程，把握实践要领，提高实践技能。

4　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新形态教材开发的实践要求

4.1　“三教”改革要形成联动

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新形态教材开发不能单兵突进，单独进行，必须同教师、教法改革协调一致，同时进行。教师、教材、教法的改革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职业教育的类型化、适应性等特点需要教师在思想上、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中进行全方位革新，教学内容的变革必定会带来教材形式、教材体例的改革，最终带来“课堂革命”，也就是教学方法的创新和改进。因此，在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新形态教材开发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变化相结合，形成联动，以取得更好效果。

4.2　要处理好技能点和知识点的密切关系

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新形态教材开发根据岗位对应的工作过程、工作内容重构了教材内容，注重学生技能的培养，凸显了职业教育的特色，同时，需要注意和考虑教材知识点的呈现形式。知识点是技能点的理论支撑和保障，学生在学习时如果一味强调“会操作”而忽视“为什么要这样操作”的原理性问题，就会成为没有思考、没有思想的“机器人”，我们需要培养的是既懂技术又懂原理，并具有崇高职业道德思想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因此，在开发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新形态教材时需要考虑知识点的呈现形式、内在逻辑、系统性，以及拓展性等方面内容，以保证学生学习内容的完整性。

4.3　教材开发团队应当形成合力

高职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新形态教材的开发应由职业院校专业（群）牵头成立教材开发团队，团队

（下转第77页）

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助力乡村公共卫生管理探析

葛稳罡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图书馆，江苏 淮安　223005）

摘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元素，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立足专业特色，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在乡村公共卫生服务与宣传、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作用，既是全面提升自身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也是履行社会服务功能、助力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乡村公共卫生；路径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41-04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不断丰富和拓展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使城乡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1]乡村作为公共卫生的重要阵地，也是公共卫生的薄弱环节，提高乡村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加快补齐相应短板，对于提高突发重大传染病应对能力，构筑基层基础医疗卫生防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可见，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与乡村公共卫生管理有着天然的联系，理应充分发挥其在医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助力乡村公共卫生管理，为健康中国战略的顺利实施贡献力量。

1　乡村公共卫生管理现状分析

乡村公共卫生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最后一公里”，对推进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战略，尤其是确保乡村百姓身体健康，增强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乡村公共卫生在基础设施、人才队伍及防护意识等方面还存着诸多问题。具体如下：

1.1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薄弱，服务功能低下

2020 年初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将乡村公共卫生管理的问题暴露无疑，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落后。例如：部分县区公共卫生业务用房严重不足，且多数用房陈旧，部分房屋甚至建于改革开放之前，使用面积受限且部分医疗设施配置陈旧单一，紧要物资短缺，卫生服务功能配套不全，导致乡村公共卫生服务功能低下，很难有效满足乡村公共医疗卫生需求。有的乡镇很早就建成并投入使用了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有的发展较为落后，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现在还未投入使用，有的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室只有十几平方米，“一桌多苗”现象普遍存在，给预防接种服务带来了诸多不便。

1.2　公共卫生管理人才匮乏，人员结构不合理

乡村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都是最基本的，量大而面广，但由于乡村医生收入水平低且缺乏保障条件，加上职业吸引力小，导致乡村医生队伍不稳定，人才流失严重。据了解，招聘到的本科学历毕业生，工作一两年左右就考取了研究生，毕业后就不再回来；研究生学历的医学毕业生则根本招聘不到。乡村医生队伍的职称学历年龄结构也不平衡，如：淮安市某县卫健委 2021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共有在岗乡村医生 957 人，其中：男性 708 人，45 岁以上 434 人，占 61.3%；女性 249 人，40 岁以上 135 人，占比 54.2%。中专及以上学历 499 人，占 50.2%，高中 224 人，占 23.43%；初中及以下 234 人，占 24.47%。取得执业医师 9 人，职业助理医师 37 人，护师（士）6 人，乡镇执业助理医师 230 人。[3]可见，一是乡村医生的年龄性别结构问题严重，出现较大断层，岁数大者居多，中青年医生数量严重不足；男性医生居多，女性医生明显不足。二是队伍建设出现断层，目前，乡村年轻医生短缺，人员招聘较为困难，医学生不愿去乡村，去了也留不住。加之离退休人员逐渐增多，也给乡村卫生队伍

收稿日期：2023-05-06
基金项目：淮安市 2022 年度社科研究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课题“医药卫生职业院校服务乡村公共卫生路径研究”（编号：2022WSA0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葛稳罡（1974— ），男，江苏盱眙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带来更大挑战。三是乡村医疗工作人员的职称学历存在结构性矛盾，高学历、高职称人员少，低学历、低职称人员占比较大，较大影响了基层卫生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

1.3 公共卫生专业知识缺乏，主动防护意识不强

长期以来，乡村特有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使乡村居民环境一直存在一些卫生死角和环境盲区。一是生活垃圾随意扔弃、堆放，人畜粪便露天存放等现象依然存在，导致部分乡村公共卫生环境依旧有着“脏、乱、差”痕迹。二是乡村婚丧嫁娶等事宜依然存在大办特办的现象，尤其是大摆露天式的流水酒席，卫生状况令人堪忧。三是个人卫生防护方面，大都囿于“不干不净，吃了不病”的传统旧思维，自我防护意识淡薄，勤洗手，戴口罩、常消毒等良好习惯尚未养成。

2 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助力乡村公共卫生管理的内在逻辑

健康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基础。《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2—2022年)》指出：“职业院校中的学生70%来自农村。”[4]因此，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在乡村公共卫生乡村振兴，尤其是服务乡村医疗健康事业上有着天然的内在逻辑。

2.1 全面推进健康乡村战略需要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助力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不断丰富和拓展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使城乡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建成体系完整、分工明确、功能互补、密切协作、运行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机制，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提高重大疫情早发现能力，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遏制重大传染性疾病传播。深入开展健康中国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5]。江苏省《关于做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实施乡村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提升行动，持续深入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乡村卫生院达到推荐标准比例提高至40%，新建200个甲级村卫生室”[6]。上述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有效保障了健康乡村战略的推进，同时，也为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助力乡村健康提供了广阔天地。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通过专业知识传授、实践技能培养，将那些乡村走出来的学生培养，成为乡村的合格的“健康守门人”，这对健康乡村战略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2.2 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助力乡村公共卫生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也明确指出：职业教育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广大乡村培养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实用人才”[7]；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提出：要“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和“组织开展农业技能培训、返乡创业就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培养高素质乡村振兴人才”[8]。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的要“切实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9]总体要求相一致。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应积极增强适应性，适应时代要求，充分发挥医药卫生人才培养、医药卫生科学研究和医药卫生社会服务的三大功能，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强化社会服务功能。

3 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助力乡村公共卫生管理的路径

3.1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作用，涵养医学生家国情怀

新时代的医学生要志存高远，把个人价值和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作用，涵养医学生家国情怀，引导大学生在服务乡村健康事业发展的大势中绽放绚丽之花。

3.1.1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与就业观

新时代医学生应当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顺应当下乡村振兴和健康乡村战略的大背景，调整就业观念，摒弃以往那种只有留在大城市进入三甲医院工作才是好工作的思想，结合自身专业优势而为，瞄准急需医学人才的乡村市场，主动远离大城市、三甲医院激烈的竞争环境，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洒在广袤的乡村大地，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与技能奉献给广大乡村百姓的健康上，帮助乡村百姓增强健康获得感，实现人生价值。

高校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作用，把思想政治理论课、职业生涯规划课、相关社团活动、宣传教育等活动与乡村管理相结合，讲好乡村故事，培养医学生积极投身健康乡村建设，为国家乡村振兴提供强劲动力。通过第一、二、三课堂多渠道就业指导教育，增强医学生为投身乡村、奉献乡村的意愿和积极性，为全面建设乡村培养新时代“农医人才”。

3.1.2　增强医学生家国情怀与医学使命

理想信念教育是大学生提升家国情怀和医学使命的有效途径。学校充分用好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主渠道，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将乡村、乡村卫生、乡村振兴引入思政课堂，以此引导学生认识乡村、了解乡村医疗卫生现状，使学生积极关注乡村建设。同时，还要充分利用课程思政的全方位渗透，让学生提前了解乡村，认识乡村，提升投身乡村的热情和积极性，增强他们为乡村发展奉献青春的家国情怀，使其在完成学业离开学校时，能够走入乡村，投身乡村，扎根乡村，在服务乡村振兴的事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医学使命。

3.1.3　用典型案例感染医学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学生毕业后对职场生活较为向往，尤其是大城市优越的商业条件、交通条件、教育条件等优势对医学生比较具有吸引力。再加上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的医学生对当下职场竞争与自身知识技能素养的认识不够清晰，简单地认为留在大城市等同于拥有更多机会，很少有学生愿意回到乡村。因此，学校应该积极挖掘本校的优秀校友、本行业的优秀人才，尤其是他们的师兄学姐的成长经历和优秀事迹，唤醒学生，并用典型案例感染学生，[10]让他们感受到即使是远离大城市的广阔乡村，只要勇于奉献，担当作为，也一样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3.2　主动对接乡村，培养适合乡村公共卫生发展的医学人才

3.2.1　确立以服务“健康乡村”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

以“服务健康农村”为导向，培养适应健康乡村发展需要的医学人才。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可以调整、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在课程设置、实践实训等方面，积极适应健康乡村发展需求，围绕基层公共卫生需求，培养适应乡村需要的医学生，全面提升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适应性。

3.2.2　探索乡村“免费医学生”的定向培养机制

积极探索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可与地方共同培养免费公共卫生人才机制，加大农村基层医疗卫生队伍人才供给。在免费医学生的专业设置上，通过认真调研和分析，紧贴乡村卫生现状实际，除了全科医生外，还可积极扩充预防医学、中药学、护理学等定向培养专业，重点向农村基层紧缺人才倾斜，为农村基层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实用型医药卫生人才。

3.3　强化实习实训，为乡村公共卫生提供丰富的健康服务

3.3.1　将乡村公共卫生纳入实践实训环节

实践实训是医学生毕业前必须进行的实践锻炼，也是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学校可以在实践实训内容加入乡村公共卫生元素，让学生在实践实训过程中切身感受乡村的魅力；另一方面，学校在选择实践实训地点时，可以选在基层或乡村，让学生通过乡村的“工作和生活”，对乡村有一个更为直观的认识，这对他们毕业后留在乡村、奉献乡村有着重要意义。

3.3.2　积极组织开展暑期“三下乡”等公益类志愿服务

通过基层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有针对性、适应乡村公共卫生的系列志愿活动，让医学生认识乡村、了解乡村，增强服务乡村的意识和责任。志愿活动要围绕主题，充分考虑农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形成志愿服务机制，推动志愿活动的可操作性、适应性和可持续性。

3.4　合作开展公共卫生研究，全面提升乡村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应充分发挥自身科研优势，通过“走出去”“请进来”方式，与地方医疗卫生机构合作开展公共卫生研究，全面提升乡村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3.4.1　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科学研究要“走出去”

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拥有较为丰富的科学研究资源，应积极发挥自身科研优势有效服务乡村公共卫生。一方面，与乡村合作，围绕乡村公共卫生问题组建科研团队，例如：通过横向课题的方式，将研究的主题瞄准乡村，共同组建研究团队并开展适应乡村公共卫生发展的科研课题研究；另一方面，依托学校资源优势，结合乡村公共卫生现状与需求，对基层和偏远乡村采用“送教”的方式，选派优秀教师和专家到当地开展公共卫生教育培训工作，传授前沿医学知识和技术。

3.4.2　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科学研究要“请进来”

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有较高水平的科研型实验实训室、图书馆等优质科研资源，将乡村公共卫生人员“请进来”，帮助他们提高专业技术技能和科研能力。学校图书馆可以打破仅为本校人员提供教学、科研服务的模式，敞开门为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乡村居民提供医学文献查询、专利查新、科技报刊等纸质和电子资源查阅等专业服务，从提高他们的公共卫生素养。

3.4.3 破除观念性障碍，制定社会服务考核激励办法

医药卫生类学校应该积极结合区域公共卫生发展实际情况，不断加大学校开展社会服务的宣传力度，树立积极的社会服务意识，让更多的科研人员投身乡村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把论文写在乡村大地上。将社会服务要求纳入教师考核评价指标，对教师的社会服务工作量化考核，制定社会服务考核激励办法，根据社会服务考核结果在职称评聘、评优评先、工资绩效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引导教师不断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

大学理念是学校的思想和灵魂，它决定着一所大学的办学价值取向及办学定位。[11]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应积极转变办学理念，高度重视学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俯下身”走进社会，走入乡村，在遵循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基础上，积极主动开展面向区域、基层和乡村的社会服务，在服务社会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乡村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6-10-26(10).

[2] 孙宇鑫.“后疫情时代”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思考[J].黑龙江粮食，2021(8)：82-83.

[3] 胡茂新.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的路径思考：以江苏省盱眙县为例[J].人口与健康，2021(1)：44-47.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2—2022年)[J].职业技术教育，2022(24)：69-77.

[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农村工作通讯，2022(21)：4-22.

[6]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EB/OL].[2023-02-13].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13/content_5741370.htm?dzb=true.

[7]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号[EB/OL].(2019-01-24)[2019-02-13].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

[8] 曾天山.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何以重要[N].中国青年报，2022-03-21(6).

[9]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2021-10-12].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12/content_5642120.htm.

[10] 张海燕，陈显久，毕研新.乡村振兴背景下医学生参与健康乡村建设的困境与出路研究：以山西某医学院校为例[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2，34(5)：69-75.

[11] 艾述华.新建地方本科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路径研究：基于威斯康星思想的启示[J]教育与考试，2016(3)：74-79.

责任编辑：仲耀黎

Analysis of Medical and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s Assisting Rural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GE Wengang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care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Medical and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s，based on their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play a role in rural public health services and publicity，as well as public health talent cultivation through the methods of "going out" and "inviting in". This is not only a requirement for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ir own educational level and talent cultivation quality，but also a necessary obligation to fulfill social service functions，assist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Key words：medicine and health；vocational colleges；rural public health；path

“三螺旋”理论在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应用

谢 晖
（湖北文理学院 政法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摘要：基于“三螺旋”理论及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中政企校关系的三螺旋模型，分析政府、企业、学校的职能定位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优化三螺旋合作关系策略：即政府促进合作的凝聚力，企业激发合作的生命力，学校增强合作的吸引力。

关键词：“三螺旋”理论；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政企校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45-05

1 “三螺旋”理论概述

1995 年，美国社会学家 Etzkowitz 与荷兰科学家 Leydesdorff 引入了生物学中的三螺旋概念，并对该概念进行了拓展，提出了“政府—企业—大学”三螺旋创新范式，利用生物学中的三螺旋模式化知识经济时代政府、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新模式。借助“三螺旋”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作为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系统的三大核心单元——政府、企业和大学之间的交迭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政府、企业和大学三方的合作为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理论，为大学的知识创新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它克服了以往双螺旋关系模式中没有考虑到国家层面的缺陷。“三螺旋”理论强调政府、企业和大学三者之间各有边界又相互融合，彼此间的界限被消除，三者之间的作用和功能可以结合起来，每个行为主体通过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优势及其与其他主体的协作关系对创新体系发挥作用，三者之间的互动合作能够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已成为当代科技创新的重要模式，“三螺旋”理论将政府（行政链）、企业（生产链）和大学（科学链）三种不同的力量结合在一起，通过互动协作实现共同发展。[1]

2 法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内涵式发展中政企校关系的三螺旋模型

在法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领域（以下简称“双创”教育），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各司其职，超越界限，通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组合，形成了一个三螺旋的协同发展框架。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是创新的三大核心单元，三方力量在互动过程中，形成协同交织的螺旋，并在螺旋上升过程中，形成相互作用、相互提升的合作共赢关系。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合作互动的三螺旋模型如图 1 所示，其中阴影部分代表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在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中形成推动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阴影部分的面积越大，合力越大，越有利于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内涵式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动态积累和创新过程。[2]

法学专业“双创”教育的特点是内容的开放性、目标的实践性和行为的社会性。仅仅依靠法学院校的单方力量，很难实现法学专业“双创”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为此，三个主要角色——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必须共同作用，协同推进法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三螺旋”理论强调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的合作关系，为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合作的可行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三螺旋”理论认为，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创新的三股力量，三者形成了交叉影响的三螺旋关系。“三螺旋”理论为政企校协同推进法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内涵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三螺旋”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下政府（行政链）、企业（生产链）和法学院校（科学链）三链融合互动发展的理论。政府是法学专业“双创”教育的

收稿日期：2023-05-03
基金项目：湖北文理学院 2022 年度“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研究专项立项项目“三螺旋理论视域下法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研究”（编号：CX202201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谢晖（1978—），女，湖北武汉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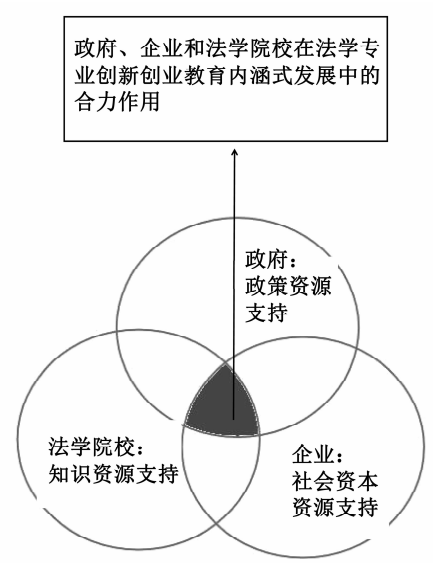


图1　政企校关系的三螺旋模型图

指导者和推动者，在战略实施、服务民生中形成行政链；企业是法学专业“双创”教育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在科技开发、成果转化与产品研发中形成生产链；法学院校是法学专业“双创”教育的主导者和实施者，在知识传承、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中形成科学链，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三方联动、角色交替、资源整合，实现彼此的持续发展。[3]根据“三螺旋”理论，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的职能定位如下：(1)政府的职能定位是制定支持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政策法规，为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创造有利的大环境；搭建法学院校与企业的直接沟通平台，携手校企双方，共同推进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优惠政策，给予企业税费减免或财政补贴等，对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进行有效的激励和成本补偿，从而调动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兴趣，确保法学专业“双创”教育的内涵式发展。[4](2)企业的职能定位是参与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切实发挥企业在法学专业“双创”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找准人才培养和企业需求的结合点，打破法学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壁垒，致力于打造以法学院校为核心、企业深度参与法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全过程的人才培养共同体，培养更多高质量的企业法务人才。[5](3)法学院校的职能定位是充分发挥法学院校的科研、人才优势，充分发挥法学院校的智库作用，提供知识技术创新成果，落实政府对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相关指导意见，与企业共同打造创新创业实践基地，依托校企合作项目，弥补法学院校自身在创新创业教育条件方面的不足。正如：教育部2012年印发的《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中规定的创业教育教学目标的基本要求。[6]创新创业精神、理念、意识与能力已经成为新时代引领、驱动国家、民族、社会与人的新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引擎。[7]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是三大创新主体，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局面，实现资源共用、人才共育和成果共享，形成三种力量交叉影响、螺旋上升。在纵向上，三条螺线互动交叉，非线性增长，螺旋式上升；在横向上，法学院校发挥着科学链的作用，企业发挥着生产链的作用，政府发挥着行政链的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实现三螺旋的良性发展。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三方处于动态互动中，每一方都通过与其他两个螺旋主体的互动来保持自己的持续发展，三方良性互动，形成螺旋支持的“双创”教育共同体。

3　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三螺旋”理论的基本思想，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应该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以实现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目标。然而，实践中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三大主体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责。

3.1　政府层面的主要问题

目前，政府虽然已制定了支持法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相关政策，但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制度性的保障，关于校企合作中双方的义务、责任和权利的法律法规非常少，权责利划分不明确，参与主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没有法律依据。立法的规定不能满足法学专业“双创”教育校企合作的现实需求。目前，创新创业教育已被纳入教育体系之中。[8]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扶持校企合作的优惠政策，但一些优惠政策因缺乏必要的细化执行方案等问题无法真正落地，存在“空转”现象，造成校企合作动力不足、合作流于形式。政府没有充分利用组织优势，建立系统合理的政策体系，统筹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发挥好“红娘”作用，导致大多数情况下校企合作都是校企之间的私下合作，都是通过法学院校和企业之间的私人关系来维持。由于校企合作双方缺乏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相关规定，导致学校希望合作却没有法律的保护和企业没有参与合作的热情局面。

3.2　企业层面的主要问题

企业是新常态下创新的主体和载体，要树立战略眼光，要从企业长远发展考虑，舍得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真正支持、参与、服务法学专业

“双创”教育。但实践中，企业考虑参与校企合作短时间内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和风险，甚至有可能扰乱企业的正常运营，往往缺乏参与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企业是趋利的，对自己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对比分析，如果“入不敷出”，就没有合作的动力。此外，法学院校和企业在合作中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这导致校企合作缺乏协同效应，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两张皮”现象。还有的企业缺乏参与人才培养的责任感，没有从人才战略的高度去认识校企合作的重要性，参与校企合作的目的不纯，只是为了解决企业招工难、上任难等问题，不关心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没有发挥企业的主体性作用，校企合作不深不实，影响了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目标的实现。现在的校企合作，大多是学校主动找企业，企业主动找学校的少，“校热企冷”的现象普遍存在。龚向田认为，虽然搭建了实践平台，但有些常常被闲置。[9]目前，我国法学专业“双创”教育中的校企合作还处于民间状态，无法制保障，对校企合作中法律关系、法律风险等具体问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校企合作难以有效持久、深度开展。

3.3　法学院校层面的主要问题

当前，法学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缺乏与法学专业教育的有效融合，导致法科学生参加工作后，不能很快的适应法律实务部门的岗位要求。法学专业学生需要具备创新创业能力，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变化，能够深入剖析法律背后的法理，善于解决法律新问题。法学专业学生的就业岗位主要是：公安、检察院、法院、行政执法部门、法律服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法律事务部门。法学专业学生只有在创新创业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才能更好地胜任工作岗位，只会生搬硬套相关的法律条文，缺乏创新的法律思维和分析能力，很难在工作岗位上开拓创新。创新创业教育与法学专业教育的融合一直是我国法学专业院校的短板。[10]提高法学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实效的关键是要做到创新创业教育与法学专业教育的融合，培养创新创业型法律人才。此外，法学院校缺乏在创新与创业方面拥有专业的法学理论、丰富的法律技能、兼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复合型教师。创新创业课程教学不系统、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不完善、创新创业配套机制不完整等，这些都制约着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

4　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中政企校的优化策略

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企业与法学院校要充分实现资源共享，推进行政链、生产链和科学链的深度融合，优化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三方的关系，促进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

4.1　政府指导，增强合作的凝聚力

由于政府在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作用远远大于其他机构，因此，政府的职能定位应以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为宗旨，将重点放在宏观管理、部门协调和统筹规划上，做好规划、立法、咨询和监督等。

首先，政府要做好校企合作的顶层设计，充分发挥政府角色作用，实现校企合作的常态化。完善现有的法规制度，明确校企合作主体的法律权利与义务，规范法学院校和企业的行为，保障合作双方的合法权益，并明确他们应承担的相关职责，保护参与创新创业师生的合法权益。例如：大学生创新创业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创业团队的创新技术成果应当如何归属仍然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要统筹指导，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加强舆论宣传，促进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形成积极的螺旋体。[11]因此，政府应加快校企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明确企业参与法学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配套优惠政策，营造校企合作的良好环境，发挥法学院校和企业双方优势的同时，实现教育为企业服务的功能。通过制度规范法学院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行为，强化各主体的责任意识。

其次，政府不仅要进行宏观指导，还要出台具体可行的激励措施。对参与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企业和法学院校出台税收优惠和专项财政扶持措施，例如：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教育部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校企合作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技术改造等方面进行资金扶持及奖补，加大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财税扶持和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金融、财政、税收等激励措施来保障创新创业教育。法学院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应定期接受政府监督，确保校企合作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消除基于私人关系的低端的不可持续的合作模式。同时，政府应聚焦创新创业法律人才培养目标，推进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使企业与法学院校的合作符合企业岗位的需求，贴近企业岗位，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安排课程内容等，实现优势互补、师资共享，共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推进高素质创新创业型法律人才的培养。

再次，政府应搭建政企校合作信息互通平台，促进产教融合，助力法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内涵式

发展。全面运用“大学—政府—企业”生态网模式解决创新创业教育问题的思路。[12]政府应广泛征集创业项目，建立统一的创业项目资源库。选择一批优秀项目向社会推介，实现创业者与创业项目的有效对接，促进项目成功转化。建立人才技术需求信息库，促进“产业链”和“人才链”有机融合，通过校企合作，发挥法学院校法学专业理论研究的优势，共同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政府应利用现有的创新创业网络平台，大力宣传创业成功的典型案例，建立创业者交流平台，举办创业创新大赛、展示推介优秀创业项目等活动，营造崇尚创业、竞相创业、褒奖成功、宽容失败的创业环境，增强各方的信任和凝聚力。

4.2　企业参与，激发合作的生命力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力是企业创新创业的需求。创新创业是企业的生命力，企业只有创新创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生存。企业创新创业需要的法律人才来自地方法学院校，企业创新创业可以充分利用地方法学院校的教师资源、学生资源、法治科技园资源。在当前信息时代，人力资源是企业拥有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它增强了企业的综合实力。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自身在创新创业方面的需求。在创新创业“三螺旋”中，知识资源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原动力，成为企业创新的灵魂和源泉，企业要充分地整合法学院校的知识资源和企业的社会资本资源，以促进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实现关键资源的优势互补。企业要充分认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校企合作显得越来越重要，校企合作的意义就在于可以资源共享，实现共赢。从理论上讲，企业的参与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表现为企业通过行业发展现状与市场需求情况分析，为政府制定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政策提供重要参考；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和法学院校能够共同探讨、统筹规划和实施具有互利互赢的校企合作项目，形成一条无缝衔接的“产学研”链，为企业培养能够提供包括风险防控、建立规章制度等高层次法律服务的人才，促进企业长远发展。企业在创新创业教育校内支持体系中充当重要驱动力的角色。[13]随着创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企业竞争的加剧，企业以项目研发的方式与法学院校开展合作，可以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在校企项目合作中，企业可以积极向学生传授创新创业技能，激发学生的创业欲望和创业热情，使学生认清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以及法律人才在企业的发展空间，使学生了解法学专业目前的就业趋势和职业必备素质和技能，尤其是了解独立创业必须具备的法律素质和能力，为今后的创新创业做好铺垫，企业的积极参与激发了合作的生命力。

4.3　法学院校主导，增强合作的吸引力

为了吸引企业来校合作，法学院校要强化自身内涵建设，提升育人质量、教师素养、服务能力，增强合作的吸引力，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培养法学学生自主创业的就业观。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狭隘就业观，束缚了法科学生的就业选择，导致法科学生将进入司法系统，成为公务员或者律师，视为唯一的就业出路，这些传统的理念影响了法学院校法科学生创新创业思维的训练和创新创业能力的提高，阻碍了法学专业“双创”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法学院校应引导学生树立自主创业的新型就业观，基于法律服务的就业观念，培养适应社会不同层次、不同领域法律服务的创新创业能力，并能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创新法律服务模式，以创新增技能，以创业促就业，用“双创”来有力支撑就业。(2)引导法学学生树立创新法律服务的理念。在法学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中，要引导学生创新法律服务理念，紧紧围绕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法学专业知识，突出法学专业特色，突破现有的法律服务模式，大胆创新，积极探索新的法律服务模式，以增强合作的吸引力，为创业企业提供更加符合其需求的优质的法律服务，更好地助力企业尤其是创业期企业的发展，以更好地适应创新型社会的需求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3)促进创新创业教育与法学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法学教育应该培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应用型、创新型”法律人才，但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结合不多，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因此，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创新创业教育的内容，使创新创业课程的内容与经济发展相融合、人才培养与实际使用相融合，将法律服务技术引进课程，明确将“创新创业”的法律服务技术融入到法学专业课程的内容中，使法学专业课程各章节的知识点与“创新创业”的法律服务技术需求相结合，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法律技术人才。(4)加强“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将法学院校教师和企业法务专家结合起来，通过融合师资力量将教育资源最大化，一方面，鼓励法学教师与企业开展项目合作，了解企业对法律服务工作的实际需要，提升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更好地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另一方面，邀请企业知名法务专家组成教学团队，针对企业需求，对创新创业的法科学生

进行企业法务实务的教学与训练，提高法科学生的创新创业素质，以适应企业法务岗位需要。[14]总之，教师的创业实战经验和创新法律服务经验越丰富，就越能保证创新创业教育的质量，减少法科学生创新创业的风险和盲目性。

5　结束语

“三螺旋”理论强调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中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三方的协作，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之间的三螺旋协作是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真正动力，也是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关键因素。法学专业“双创”教育内涵式发展，不仅需要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积极参与，还需要政府的政策资源、企业的社会资本资源和法学院校的知识资源要素的三螺旋组合，因此，树立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协同的法学专业“双创”教育理念，在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之间建立良好的协同机制，通过交流与合作将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要素结合起来，统领导、开放合作、共同推进，实现资源的互补和整合，打造政府、企业和法学院校协同共享的法学专业“双创”教育系统。

参考文献：

[1] 石芬芳，谢苏.三螺旋理论框架下高职院校政产学合作人才培养实践研究：以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专业人才合作培养实践为案例[J].职教通讯，2011(7)：15-20.

[2] 刘洁.以竞赛为导向的法学创新创业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高教学刊，2021(10)：42-45.

[3] 高照军.新时代高校“创业法学”教育现状及课程开发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21(28)：153-156.

[4] 于定勇.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之观察、分析及应对策略：以广东省普通高校法学专业本科教育为例[J].科教导刊，2021(23)：1-6+12.

[5] 胡剑锋，李一飞，魏宏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法学专业教育研究[J].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8(2)：6-10.

[6] 张英.高校法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的现实意义及教学组织模式探究：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法学专业《创新创业实践》课程开设经验为参考[J].高教探索，2018(8)：61-66.

[7] 李海娟.卓越法治人才导向下法学专业创新创业课程体系的理性安排[J].高教学刊，2020(32)：49-52.

[8] 江超，徐志仓，周海魁，等.基于CSSCI的2010—2019年我国创新创业教育文献计量研究[J].安康学院学报，2020，32(5)：118-128.

[9] 龚向田.地方本科院校法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之实现路径探析[J].高教论坛，2019(3)：70-74.

[10] 包国为.论创新创业教育与法学专业教育的融合[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9，34(5)：28-34.

[11] 吴惠.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共生的路径研究：以江苏省C大学为例[D].常州：常州大学，2021：14.

[12] 林宣汝.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主题演化及政策相关性研究[D].北京：北京邮电大学，2021：9.

[13] 熊静.教育生态系统视角下创新创业教育校内支持体系优化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21：19.

[14] 王鹂，宋洪庆，邵丽华.协同理论视域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7(6)：638-644.

责任编辑：仲耀黎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ree Helixes" Theory in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Double Innovation" Education in Law Majors

XIE Hui

Abstract：Based on the "triple helix" theory and the triple helix model of government-enterprise-school relationship in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 of "double innovation" education for law major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main problems of government，enterprises and schools，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optimizing the triple helix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that is，the government promotes the cohesion of cooperation，enterprises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cooperation，and schools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cooperation.

Key words：the "three helixes" theory；law major；"double innovation" education；connotative development；relationship among government，enterprises and schools

“趋同化”视域下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管理的困境与对策

袁 茜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江苏 南京 211188）

摘要：留学生管理的趋同化是留学生培养质量提升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走向国际化教育强国的必经之路。当前，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存在办学理念定位偏差、工作制度设计缺位、文化“融合共享”思维缺失等现实困境，需从留学生管理的思维理念、顶层设计、文化精神、校企合作等方面有效、有序推动来华留学生管理。

关键词：一带一路；趋同化管理；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50-05

2013 年秋，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不仅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同时，引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发展。[1] 2022 年 5 月，教育部“教育这十年”“1＋1”新闻发布会上，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我国职业教育在近十年一直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目前，400 余所高职院校与国外办学机构开展合作办学，全日制来华留学生规模达 1.7 万人。[2] 中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来华留学生人数虽受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影响略有下降，但在全球留学生人数普遍降低的情况下，中国作为沿线国家学生留学目的国，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吸引力。这对中国高校留学生人才培养工作带来机遇和挑战，既要坚持教育改革对外开放不动摇的决心，更要加快中国教育事业与国际先进教育接轨的速度，提升中国教育文化对外传播的影响力。如何适应新时代来华留学生人才培养需要，积极推动留学生教育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破解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困境，提升留学生教育质量，已成为广大高职院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来华留学生教育趋同化管理的内涵与必要性

1.1 “趋同化”管理内涵

留学生“趋同化”管理，是指高校将来华留学生教育纳入全校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实现统一管理与考核，提供平等资源与服务，保障中外学生平等的文化交流与共同的合法权益。[3] 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留学生教育起步早，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留学生趋同化管理体系，比如：在入学申请、教学安排、管理体制、毕业等方面与本国学生都毫无差别。[4] 在我国，部分高校存在对留学生提供额外优待现象，给留学生教育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趋同化管理”提出来华留学生教育应本着“公平、合理、审慎”的原则，这意味着高校在权利、责任、资源分配等方面对留学生须一视同仁；对管理和服务工作中出现的不合理现象须进行全面整改；对留学生违反校纪校规的惩处与执行须重新审视。

1.2 高职留学生“趋同化”管理必要性

首先，“趋同化”管理是国家对留学生教育的客观要求。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不仅是留学大国，更是留学生管理大国。伴随留学生人数激增，教育教学及日常管理的难度日益增大。部分高校在留学生教育与管理上还存在特殊化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高校教育的平等氛围，影响了留学生人才培养质量。为了推动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参照欧美国家较为成熟的国际留学生教育培养模式，开展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显得十分必要。其次，“趋同化”管理是高职院校提高办学质量的内在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带一路”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高校应自觉承担培养“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的重要使命，抓好来华留学生的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关于《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

收稿日期：2023-05-16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趋同化管理视域下高职院校留学生奖惩制度研究”（编号：2021SJB0270）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袁茜（1980—），女，江苏宿迁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和国际教育。

范(试行)》(简称《规范》)指出:“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推进中外学生管理和服务的趋同化。”[5]15此外,《规范》明确提出来华留学发展要严格规范管理,坚持内涵式发展,通过提高留学生人才培养质量,促进中外学生跨文化交流融合和中国学生国际化视野提升。这为高校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提供了指导方针,高职院校不仅要承担“一带一路”政策下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更要注重培养的目标与方向,严格抓好来华留学生培养质量。

2　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的现实困境

目前,国内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管理模式主要有三种:归口管理,趋同化管理,以及从归口管理到趋同化管理的过渡模式。[6]归口管理模式是指将留学生包括:招生、学籍、教育教学、日常生活服务等在内的凡是涉及到留学生的事务,都归口于校内某个教学单位或部门(比如:海外教育学院、国际合作交流处等)统一管理。“趋同化”管理模式是指将海外教育学院的一些管理功能归属到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由职能部门进行统一管理(比如:教学职能由学校的教务处来参照中国学生进行管理),并将留学生的管理直接纳入中国学生的教育管理体系中,不强调来华留学生的差异性。目前,国内高职院校大多没有实现完全的“趋同化”管理,尚处于归口管理向“趋同化”管理过渡模式。在“趋同化”管理具体推进的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

2.1　办学理念定位偏差

多数高职院校坚持国际化办学理念,将留学生数量与质量作为国际化办学的重要指标之一,但高职院校办学指标性导向所驱,以及留学生教育培养政策理解不透彻等影响,认为“留学生无小事”片面理解,采取“小心翼翼”特殊化管理方式,把留学生定位为“请来的客人”,为留学生采取“定制化”管理与服务。这种权宜之计是划地为圈,“圈”住留学生,在教育教学、校园管理、生活服务等诸多方面自成一座“孤岛”,服务至上,管理与教育滞后。在以往高职院校留学生培养初期,确实对留学生工作的有序开展起到一定保障作用,但面对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高要求,这种管理模式已不适用于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方向。

2.2　工作制度设计和队伍建设不足

来华留学生教育与培养仍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学校制度顶层设计方面仍然存在空白和漏洞,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复杂问题缺少制度规范。一是在教学管理体系、留学生惩戒制度、留管人员激励政策等方面仍需有待完善。比如:面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缺少工作预案和相关制度。特别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仍沿用之前相对滞后的管理模式。二是在学校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较紧张情况下,留管队伍建设不够健全。大部分高职院校留学生的工作机构(国际合作交流处、海外教育学院等)一般作为临时增设部门,或者是调整原有部门承担留管业务。专业留管人员的配备总体偏少,部分院校甚至没有留学生辅导员。三是留管队伍涉外政策掌握不足,缺乏外事工作经验,业务能力不精,跨文化交际和管理能力较弱,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差异、生活习俗、宗教和种族问题上缺乏深入了解,无法和留学生在思想上达成共识。

2.3　文化“融合共享”思维欠缺

来华留学生在课堂学习、教学组织、日常生活、宿舍安排和学生管理中都与中国学生孤立开来、隔而不融,究其原因,缺乏“融合共享”管理思维。中国本土学生不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的思维习惯和文化传统,不知道如何与他们有效沟通和和谐相处,在他们眼中,留学生只是校园里“美丽的风景”,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瞻。来华留学生也似乎更愿意活在自己的“安全圈”,喜欢用本国的语言和本国学生相处。这种隔离的做法与学校开放办学理念相悖,也不利于留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导致文化认同感缺失,进而产生思想迷茫和焦虑,难以适应中国的学习和生活。这样的情况虽有留学生的主观感情色彩,也和职能部门和留管人员文化共享思维欠缺有关。

2.4　校企合作国际化水平不高

高职院校高度重视校企合作,能够主动根据产业结构升级和国际产能需要,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并作了有益探索与实践,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校企人才培养定位不一致,符合企业需求的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就业竞争力不强,特别是“会语言、精技能、通文化、懂规则”的技术技能型留学生人数较少;二是校企合作双方对于国际化人才培养需求不平衡,“走出去”中资企业积极性不高,存在学校“一头热”的情况,很难实现校企“双赢”局面;三是留学生人才供给与企业快速发展需求不匹配,高职院校留学生培养周期为2.5～3年,海外中资企业在所在国技能人才需求紧缺情况下,更倾向于在当地招聘员工进行短期实操性技能培训,从而可以更快上岗工作。企业方

长期指导学生专业学习与技能实践难以实现，校企双方在国际化人才培养上协同育人、资源共享、平台共建等方面的作用难以发挥。

3　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实施对策

“趋同化”管理之所以仍处于探索推进阶段，其主要原因在于管理思维模式、制度设计、管理体系等与目前国际化办学需求不一致。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指出：“要做强‘留学中国’品牌，打造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版。”[7]随着留学生培养提质增效的要求，留学生“趋同化”管理须从思想、制度、文化、实践等多维度开展科学验证和探索。

3.1　思想转变：重塑留管思维——矫正管理态度偏差[8]

3.1.1　遵循发展规律，避免盲目追寻市场竞争力

20世纪80年代，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招收自费外国来华留学生的有关规定》，明确了自费来华留学的相关政策，一些高校开始有资格招收留学生，20世纪90年代政府简政放权，培养留学生的高校，留学生数量均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从1980年的1381人到1991年突破1万人。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至今逐渐由量的增加向质的提升转变。职业教育作为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国家政策，以及学校国际化办学指标导向的激励下，部分高校为吸引更多外部资源，增强竞争力，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惜降低留学生招生门槛，为留学生设置低于中国学生招生条件，并提高其奖学金及住宿等相关标准。这样“宽进又宽出”的态度貌似“力求上进”，实则为教育教学的良性发展埋下隐患，与我国高校办学以质量提升为核心，服务高等教育强国战略不符。

3.1.2　坚守办学精神，秉持长远的战略眼光

高职院校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现代职业教育，聚焦人才培养和内涵质量提升，结合学校办学目标，科学规划国际化人才中长期培养规划，切实以留学生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专业标准输出为抓手，以校企国际化深度合作为载体，以知华友华助华留学生培养为目标，推动高质量国际人才“引进来”和“走出去”。要逐渐摒弃留学生“特殊化”“集中化”的思想观念，改变“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管理模式，尽快将留学生的管理分散到整个教育管理系统中，实现“趋同化”管理，真正推动留学生人才高质量培养，为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走出去”中资企业人才需求，助力国家进一步发挥外交影响力。

3.2　顶层设计：趋同化管理——完善管理体制

3.2.1　提升留管师资队伍国际化建设水平

积极利用合作办学提升学校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充分利用国际交流平台，加强国际间合作，开展国际师资培训等，提升现有中青年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能力素质和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提速青年教师的国际化成长。此外，还需引进具国际化教育理念、通晓涉外事务管理，语言能力较强的优秀教师等，逐步打造一支业务精湛、素质高尚、能力过硬、思想先进的兼具国际国内特色的留学生管理队伍。

3.2.2　建立中外学生“一视同仁”长效管理机制

“发展留学生教育不能只顾经济利益，过度依赖经济利益驱动、缺乏管控的留学生教育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和教育问题。”[9]2019年7月，教育部国际合作和交流司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鲜明地表达了我国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的态度：平等一致。[10]因此，高职院校应树立“平等一致”的理念，设置“一视同仁”长效管理机制，坚守相同的制度、相同的原则、相同的规则，避免“双标”现象。无差别化提供留学生教育环境，让留学生充分同样学习专业学习、技术技能培训等，融入无差别教育管理系统中，加快留学生归口管理向趋同化管理过渡的进程。

3.2.3　提升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来华留学生人数增多，但留学生生源质量良莠不齐。早在2009年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生建学曾指出，来华留学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层次和质量问题，高层次的学历生不多，由于没有统一的毕业考试，毕业生的水平也参差不齐。《规范》作为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构的重要的政策指导，已专门针对留学教育在招生录取、培养目标、教育教学等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为开展来华留学内部和外部教育活动提供明确方向和制度保障，高职院校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见表1）。

表1　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提升举措

质量提升举措	
生源质量	拓展生源渠道，加强校企合作，凸显品牌专业，提升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实施“严进”招生考核机制
语言质量	完善汉语预科教育，把好语言关，更好服务专业课程

续表

质量提升举措	
过程质量	确立合理的培育目标：既符合办学目标、学科专业现状；也贴合多数来华留学生的具体情况，操作性强，抓好教学过程：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合理利用网络教育平台，建立汉语线上教学资源库，完善教学质量评价和反馈机制，建立符合高职留学生特色的教学评价与反馈机制，完善留学生奖惩制度。教育部已经对留学生的奖励与惩罚措施有明确的指示："对来华留学生中违法违纪现象将严肃处理。"[5]19
输出质量	坚持中外学生一致，严格执行中外学生无差异学位授予标准，坚持"严出"不放松，严格执行清退机制，确保人才输出质量，提高办学知名度
	对毕业生保持持续跟踪反馈，利用反馈结果改进办学质量

3.3　精神引领：推进文化融合——提速趋同化管理进程

跨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不同文化群体彼此之间在精神、价值、思想、语言、行为等方面相互碰撞、同化、发展和改变原有文化结构的过程。如果一种文化所传承的价值观能够被接受和认同，那么，这种文化的影响力将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文化受众者的思想与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11]要积极培育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代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来华留学生作为中国文化最直接的受众者，自然而然担负了文化传播者的使命，因此，深度推进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是加快"趋同化"管理的有效策略。

3.3.1　正视中外文化差异，建构兼容并蓄相互融合的理念

首先，是双向"求同"，理性看待不同文化背景下行为特征引发的管理困难，在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加强法律法规教育，以"入乡随俗"的道理帮助他们融入公平、开放的文化生活环境。其次，是"求异"，正视沿线不同国家的人文习惯、宗教信仰、文化差异，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加强人文关怀，解决合理需求。在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的前提下共同促进文化融合。

3.3.2　推进多元文化双向交流，让来华留学生充分体验文化融合魅力

开展感知中国文化类课程与活动，举办以国画、服饰、京剧、茶道等为主题的多样化校园活动，加强中外学生间的联谊互助，以跨文化交际为目的，以沿线国家文化及中国历史文化为载体，开展文化学术交流讲座，挖掘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促进来华留学生自发融入精神文化领域，渐渐消除"趋同化"管理过程中的"圈层隔离"现象。

3.3.3　搭建中外学生合作学习与交流网络平台，提升中国文化传播的精准度

网络现已成为留学生重要的交流渠道，作为跨越国界交流的空间，校园网络平台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传播的格局，尤其在疫情期间，课堂从校内扩展到全球云端资源。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积极利用新媒体技术开发国际汉语在线课程资源，能更好地跨越时空的篱笆，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培养更多认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友华"学生。

3.4　创新实践：校企合作——"趋同化"管理的新途径

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主要体现在职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技术的创新，但以往这些合作更多侧重于本土学生的培养。由于受相关政策限制，以及基于留学生安全等情况考虑，学校很少组织来华留学生参与企业实践。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越来越多企业在加大力度拓展海外市场时，亟需通语言、精业务、懂规则的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而高职院校在校企合作联合培养国际技术人才方面颇具优势。

3.4.1　修订留学生人才培养方案，嵌入企业实践课程

以企业需求为出发点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并着力打造"企业讲师＋学校教师"的专兼职教学团队，将企业文化、岗位能力和职业素养等要求融入到培养过程中。

3.4.2　深化产教融合，搭建留学生企业实践平台

高职教育的本质特色要以产教融合为方向，以应用性人才培养为目的，所以，在政策上应该完善来华留学生就业管理规定，[12]组织留学生参与企业实践活动，培养国际化团队合作精神。

3.4.3　激发留学生内驱力，主动参与企业社会实践

高职留学生普遍来自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他们更加珍惜学习和就业机会，更加渴望学习先进的

职业技能。通过参与中资企业实习锻炼，激发他们主动到基层岗位加强锻炼的动力，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获得工作岗位，也能为中资企业储备海外技术人才，对提高企业和高校的知名度均有助益。

简而言之，校企合作共育留学生，一方面，有利于学校提升留学生培养质量；另一方面，有利于培养高质量的海外本土员工，彼此间形成良性互动，潜移默化中促进留学生在思想和精神层面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理解，从而有利于降低校内“趋同化”管理的难度。

当前，国内高职院校留学生教育培养处于不同阶段，应找准制约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将来华留学生教育作为国际化办学的重要抓手，同时，提高学校内部留管人员与专业教师的国际交流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增强我国对留学生的吸引力，实现“趋同化”管理，更好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参考文献：

[1] 郭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发展[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3)：86-92.

[2] 程婷.我国四百余所高职与国外合作办学，全日制来华留学生1.7万[EB/OL].[2022-05-24].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239997.

[3] 教育部.推进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N].北京晚报，2019-07-20(6).

[4] 黄展，刘晶.高校国际学生趋同化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探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6)：68-71.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的通知：教外〔2018〕50号[A].2018-10-09.

[6] 李桂园.“唐、今”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比较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5(18)：126-129.

[7] 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意见.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N].人民日报，2020-06-23(01).

[8] 张凤娟，胡彬玮.高校来华留学生管理行为偏差探源[J].复旦教育论坛，2021，19(5)：58-64.

[9] 薛新龙，李立国.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模式及管理经验[J].现代教育管理，2018(1)：122-128.

[10] 教育部国际司负责人就来华留学相关问题答记者问[EB/OL].[2019-07-20].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1907/t20190719_391532.html.

[1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14.

[12] 王朝晖，张春胜.“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走出去”人才本土化研究：来华留学生为例[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8，25(5)：63-73.

责任编辑：仲耀黎

The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Management of Foreign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vergence"

YUAN Qian

Abstract: The convergence of the management of foreign students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oreign students' training, and also the important way for China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power. At present, there exists practical dilemma just like theory orientation deviation, absence of work system design, lack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thinking and so 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management of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effectively and orderly from the thinking concept, top-level design, cultural spirit,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management.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convergent management; dilemma; countermeasure

高职院校大学生兴趣调查研究

姚愔怡
（徽商职业学院 商贸系，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对 4 所高职院校不同年级学生的学科兴趣、课外阅读兴趣、课外体育运动兴趣及网络兴趣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高职学生对课程感兴趣的原因与个人喜好及课程实用性有关，对课程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课程的难度；对文学类课外读物兴趣较高，对时事政治类课外读物兴趣较低；课外体育运动兴趣有集中性、相似性的特点；由于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的不同，高职学生在网络兴趣活动选择方面存在性别差异。高职大学生的兴趣具有多样化特征及娱乐消遣倾向，网络兴趣具有目的差异性。高职院校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学生自身应学会积极调整，双方同步推进，形成合力。

关键词：高职院校；大学生；兴趣
中图分类号：G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55-04

0　引言

兴趣是个体积极探究、认识从而掌握某种事物并且经常性地从事某种活动的个性心理倾向，对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具有重要影响，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兴趣源于需要，发自内心的好奇与热爱，总是伴随着良好的情感体验，是人们认识和参与活动的强大动力。兴趣是推动高职院校大学生积极学习的直接动力，是促进其个性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因为，“专业兴趣与学习成效之间是正向相关的，也就是说专业兴趣越大，学习成效越好，反之亦然。”[1]

21 世纪科技日新月异、经济飞速发展，当代高职大学生的兴趣爱好随着社会发展及生活环境的变化而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鉴于兴趣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对高职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加以高度重视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尤为必要。此类相关研究有助于准确把握学生的兴趣状况，促进学习质量和效果进一步提升，使学生全面发展，有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本研究聚焦与高职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主要兴趣，全面把握兴趣现状，深入探索兴趣成因，合理总结兴趣特征，积极提供建议与对策。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 4 所高职院校的 252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一年级学生 195 人，占总人数的 77.4%，高年级（一年级以上）学生 57 人，占总人数的 22.6%；男生 166 人，占总人数的 65.9%，女生 86 人，占总人数的 34.1 %。

1.2　研究材料

本研究立足研究目标和任务，设计并编写了“高职大学生兴趣调查问卷”，问卷调查的内容聚焦调查对象的学科兴趣、阅读兴趣、体育运动兴趣及网络兴趣等，采用单选题和多选题结合的方式作答。

2　结果与分析

2.1　学科兴趣

2.1.1　高职院校大学生学科兴趣现状

按顺序排列，高职院校大学生最喜欢的课程分别为：计算机类（占比 32.9%）、专业课类（占比 24.6%）、英语类（占比 13.1%）、体育类（占比 13.1%）、其他类（占比 9.5%）及政治德育类（占比 6.8%）。

其中：选择其他类的高职大学生大多填写的是艺术类、美术类及舞蹈类课程。高职大学生最不喜欢的课程依次是：英语类（占比 40.1%）、政治德育类（占比 21.8%）、专业课类（占比 11.9%）、体育类（占比 9.5%）、计算机类（占比 8.4%）及其他类（占比 8.3%）。选择其他类的高职院校大学生大多填写的是数学类及哲学类课程。

收稿日期：2023-07-18
基金项目：教育部 2020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心理机制研究”（编号：20YJC710127）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姚愔怡（1992—），女，安徽合肥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

2.1.2 高职院校大学生学科兴趣差异

从年级来看，一年级学生与高年级学生在感兴趣与不感兴趣的课程上皆无显著差异。在性别方面，37.1%的男生对计算机类课程感兴趣，占比明显高于女生的11.6%；20.9%的女生对英语类课程感兴趣，占比明显高于男生的9%。在最不感兴趣的课程选择上，有48.8%的男生选择了英语，远高于女生的23.3%；26.7%的女生选择了政治德育类课程，明显高于男生的19.3%。下面从性别与课程兴趣的卡方分析（见表1）。

表1 性别与课程兴趣的卡方分析

卡方检验指标	最感兴趣的课程		最不感兴趣的课程	
	值	*P*	值	*P*
Fisher	21.245	0.001	16.757	0.004

由上可知，女生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课程更感兴趣，男生则对计算机类、理工类等自然科学领域的课程兴趣更高。

2.1.3 高职院校大学生学科兴趣分析

调查得知，高职院校大学生对课程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与个人喜好及课程实用性有关，对课程不感兴趣的原因和课程本身难度有关。57.5%的高职院校大学生选择计算机课和专业课作为自己最感兴趣的课程，其中：71.8%的大学生做此选择的原因为课程实用性、操作性强及个人喜爱。究其原因，大多数高职院校大学生基于自身兴趣选择报考学校，因而专业课成为其最感兴趣的课程之一。此外，课程本身的价值和学生的需要也是兴趣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当前社会对大学生计算机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学生普遍较为重视计算机相关知识学习和技能操作，因此，计算机课也跻身为高职院校大学生最感兴趣的课程。61.9%的大学生选择英语和政治德育类课程作为自己最不感兴趣的课程。选择的原因主要是感觉其内容枯燥、知识晦涩（占比78.2%）。比较这两种情况可知，影响高职院校大学生学科兴趣的主要因素是学生个人喜好和课程本身的难度。男女大学生在学科兴趣上的差异，是“由于男女两性在认知风格和人格特质等方面的心理特性差异及长期以来的传统文化等社会因素所造成的”[2]。

2.2 课外阅读兴趣

2.2.1 高职院校大学生课外阅读兴趣现状

对于高职院校大学生最感兴趣和最不感兴趣的课外书籍调查采用了多选题的形式。他们最感兴趣的课外书籍分别为：文学类（占比42.5%）、生活类（占比39.3%）、科技类（占比35.7%）、历史人物类（占比33.7%）、艺术类（占比30.2%）、军事类（占比28.6%）、言情类（占比22.6%）、武侠类（占比22.2%）、经济类（占比14.3%）、社会政治法制类（占比13.9%）、专业辅导类（占比13.5%）及其他（占比3.6%）。高职大学生最不感兴趣的课外书籍按顺序排列分别为：言情类（占比33.7%）、社会政治法制类（占比33.3%）、武侠类（占比31.3%）、经济类（占比20.2%）、专业辅导类（占比19.4%）、文学类（占比14.7%）、历史人物类（占比14.3%）、军事类（占比12.7%）、艺术类（占比11.1%）、科技类（占比9.1%）、生活类（占比6.3%）及其他（占比2.0%）。

对于高职院校大学生最感兴趣和最不感兴趣的杂志调查采用了多选题的形式。他们最感兴趣的杂志按顺序排列分别为：青年类（占比65.5%）、文摘类（占比50.4%）、影视类（占比48.4%）、生活类（占比40.1%）、专业类（占比20.6%）、社会法制类（占比16.3%）、体育类（占比15.9%）、家庭类（占比12.7%）、婚姻类（占比6.7%）及其他（占比2.0%）。高职院校大学生最不感兴趣的杂志按顺序排列分别为：婚姻类（占比47.2%）、社会法制类（占比28.2%）、体育类（占比22.6%）、家庭类（占比21.8%）、专业类（占比17.1%）、文摘类（占比13.1%）、影视类（占比10.3%）、生活类（占比7.9%）、青年类（占比6.3%）及其他（占比4.8%）。

对于高职院校大学生最感兴趣和最不感兴趣的调查采用了多选题的形式。他们最感兴趣的报纸按顺序排列分别为：社会性综合报纸（占比52.8%）、社会服务性报纸（占比33.7%）、专业性报纸（占比25.4%）、对像性报纸（占比19.8%）、其他报纸（占比19.4%）及党报（占比16.7%）。高职院校大学生最不感兴趣的报纸按顺序排列分别为：其他报纸（占比36.5%）、党报（占比27.4%）、对像性报纸（占比24.6%）、专业性报纸（占比23%）、社会服务性报纸（占比15.9%）及社会性综合报纸（占比8.3%）。

2.2.2 高职院校大学生课外阅读兴趣差异

从年级来看，在感兴趣的课外书籍的选择上，一年级学生选择经济类和其他类的人数明显多于高年级学生，在不感兴趣的课外书籍的选择上，高年级学生与一年级学生无明显差异；在感兴趣的杂志的选择上，一年级学生选择专业类的人数明显多于高年级学生，在不感兴趣的杂志的选择上，一年

级学生与高年级学生并无明显差异;在感兴趣与不感兴趣的报纸的选择上,一年级学生与高年级学生并无明显差异。

从性别来看,在感兴趣的课外书籍的选择上,男女生在经济类、生活类、科技类、军事类、艺术类和言情类书籍的选择上皆有显著差异,在不感兴趣的课外书籍的选择上,男女生在历史人物类、经济类、生活类、科技类、军事类、艺术类和言情类书籍的选择上皆有显著差异;在感兴趣的杂志的选择上,男女生在专业类、生活类和影视类杂志的选择上有明显差异,在不感兴趣的杂志的选择上,男女生在体育类和生活类杂志的选择上皆有明显差异;在感兴趣的报纸的选择上,男生选择党报的人数明显多于女生,女生选择社会服务性报纸的比率明显高于男生;在不感兴趣的杂志的选择上,女生选择专业性报纸的人数明显多于男生,男生选择社会服务性报纸的人数明显多于女生。

2.2.3　大学生课外阅读兴趣分析

调查发现,文学类书籍是高职大学生课外阅读中较感兴趣的读物,这与文学自身的特色与优势有关。言情类和社会政治法制类书籍并列为高职大学生较为不喜爱阅读的书籍,反映了他们对时事政治与法制不感兴趣,同时,也表明随年龄和社会阅历的增长,高职大学生变得更加成熟,已经不需要言情类书籍来满足其对爱情的幻想。高职大学生喜欢阅读的杂志是青年类和文摘类,这两类杂志所刊登的文章多为文学作品,符合阅读需要。他们不喜欢的杂志是婚姻类,因为高职大学生结婚成家为时尚早,对婚姻类杂志没有兴趣。高职大学生喜欢阅读的报纸为社会综合报纸,不喜欢其他报纸,可见他们对时事政治关注度不高。在阅读兴趣上,低年级学生与高年级学生并无较大差异。从性别方面来看,高职院校大学生的阅读兴趣则存在明显差异。女生弃选较为严肃的、逻辑性强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法律及科技等方面的读物,而对活泼、轻松、娱乐性的文学类、生活类及言情类读物感兴趣,这"主要和女高职大学生的重形象思维,情感丰富细腻,社会亲和性强等特有的性别心理有关"[3]。

2.3　课外体育运动兴趣

2.3.1　高职院校大学生课外体育运动兴趣现状

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课外体育运动兴趣主要集中在球类、棋牌类和田径类三个领域。在参与调查的高职院校大学生中有31%的学生选择了篮球,19.8%的选择了羽毛球,17.5%的选择了乒乓球,选择棋牌的学生占16.3%,选择田径的占9.1%,选择足球的占6.3%。从每周锻炼时长来看,约66.7%的学生每周锻炼时长在3小时以下,更有35.7%的学生每周锻炼时长不足1小时。

2.3.2　高职院校大学生课外体育运动兴趣差异现状

从年级来看,一年级学生的运动时长和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与高年级学生没有显著差异。从性别来看,男生每周平均运动时长高于女生。男生运动时长在每周3小时以上的有36.2%,明显高于女生的27.9%。从总体趋势来看,男生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体育锻炼。此外,男生(占比36.1%)选择篮球的人数明显多于女生(占比20.9%),女生(占比33.7%)在选择其他项目(大多选择羽毛球)的人数明显多于男生(占比12.7%),女生(占比19.8%)选择棋牌类的人数略高于男生(占比14.5%)。[4]

2.3.3　高职院校大学生课外体育运动兴趣分析

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课外体育运动兴趣丰富多样,但也具有集中性,主要领域是球类、棋牌类和田径类,球类中的羽毛球、篮球等尤其受欢迎。主要原因可能跟这些项目容易学习掌握、投资费用较少、对场地等设施要求条件不高,以及容易开展等原因有关。就男女大学生性别差异来看,男生每周平均运动时长明显高于女生,可能是因为男生的精力更为旺盛,更喜欢参加体育运动。此外,男生可以通过体育运动来达到社交的目的,女生则倾向于将更多时间用于逛街等,这些原因都可能导致男生的每周平均运动时长高于女生。在不同运动项目的选择上,男生更喜欢篮球、足球等团队对抗型体育运动,女生则喜欢羽毛球等个人运动项目。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是生理差异因素,男女大学生在棋牌类项目上的差异则和传统文化有关。此外,缺少锻炼伙伴(48.8%)及自身懒惰(61.5%)也是让高职大学生运动兴趣不高、锻炼时间减少的主要原因。

2.4　网络兴趣

2.4.1　高职大学生网络兴趣现状

对于高职学生上网所做事项的调查采用了多选题的形式,他们上网所做事项按顺序排列分别为:看动漫、电影、下载音乐等(占比70.6%),聊天或交友(占比69.4%),查阅资料、浏览信息(占比62.3%),玩网络游戏(占比60.7%),网上交易、购物(占比53.6%),通讯或联络(占比44.4%),学习或写作(占比44%),下载软件(占比27.8%),维护个人博客等(占比21.4%)。此外,在对高职院校

学生每天课外上网(包括玩手机)时长的调查中发现,75%的学生每天上网时长超过3小时。在对上网原因的调查中发现,46.8%的学生上网仅为打发时间,61.1%的大学生认为上网是没有意义的,更有25.8%的学生认为上网十分有害,是在浪费时间。

2.4.2 高职大学生网络兴趣差异

从性别来看,男女学生在上网时长上并没有明显差异,女生(占比64%)选择网上交易、购物的比例明显高于男生(占比48.2%),男生更愿意花时间上网玩游戏。从年级来看,一年级学生和高年级学生在上网时长上没有明显差异。前者(占比66.2%)上网查阅资料、浏览信息的人数明显多于后者(占比49.1%)。

2.4.3 高职院校大学生网络兴趣分析

从性别上看,高职院校大学生上网时长没有明显差异,但在上网活动的选择则存在明显差异。除去男女生共同喜好的上网活动事项,男生更多地将上网时间花费在玩游戏上,这可能是因为男生更愿意通过网络寻找刺激,因而选择游戏作为上网的主要活动;女生更愿意将时间花在网上交易、购物方面,可能是因为其方便快捷、可选择性更高,以此取代传统的逛街购物。从年级来看,高低年级学生在上网时长上没有明显差异,但一年级学生上网查阅资料、浏览信息的人数明显多于高年级,可能是因为一年级学生刚入学,对学校不了解,对专业知识较生疏,因此,借助网络获得有效信息进行学习。此外,调查发现,75%的高职学生每天上网时长超过3小时,46.8%的学生上网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没有明确的目的。这说明部分学生没有形成具体的上网目标,不懂得如何正确利用网络、如何合理规划校园生活,只能用网络消磨剩余时间。

3 结论

3.1 高职院校大学生具有广泛多样的兴趣

当前,世界经济极速发展,各种新兴事物如雨后春笋,可供大学生选择的各种资源及其获取途径也日益增多。高职院校大学生无论是在学科学习兴趣上,还是在阅读兴趣、课外体育运动兴趣及网络兴趣等方面,都呈现出个性化和多样化特征,所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种类也较为繁多。

3.2 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兴趣活动具有娱乐消遣倾向

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兴趣活动具有娱乐消遣倾向,如:在课外阅读方面对文学类课外书籍、青年类及文摘类杂志和社会性综合报纸等课外读物的选择,在网络活动方面对影视、音乐及游戏等的选择。娱乐、消遣性兴趣既满足了他们认识世界、获取信息的需要,同时,也满足了他们放松心情、丰富生活的需要。这些娱乐消遣活动反映了高职学生的生活方式、精神需求及美好意愿,不应否定和贬低其存在意义和价值。[5]

3.3 高职院校大学生的网络兴趣活动目的不同

当今世界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网络内容包罗万象,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具有较为浓厚的网络兴趣,网络成为他们获取信息、沟通交流、休闲娱乐的有效工具。调查表明,多数高职院校学生上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休闲消遣;少部分学生是为了获取资料、开展学习而上网;另有一部分学生则没有明确的上网目的,仅仅为了消磨时光、打发时间。这种现象反映出高职院校学生缺乏正确的网络观,没有形成积极健康的网络使用习惯。

参考文献:

[1] 张进明,孔锦,陈同扬,等.大学生专业兴趣调查研究:以南京工业大学低年级大学生为例[J].高校教育管理,2014(4):109-114.

[2] 何军.大学生课外阅读兴趣调查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01(11):87-88.

[3] 林云.高职学生专业兴趣对学习成效影响的调查分析[J].教育与职业,2011(8):183-184.

[4] 贺奇,董延华,宋嘉怡,等.基于大数据的大学生兴趣爱好特征聚类研究[J].智能计算机与应用,2020(10):44-46+53.

[5] 何旭明.学习兴趣的唤醒:教师的教育教学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影响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79.

责任编辑:刘雪琪

·教学改革·

“热点述评”教学法融入高校思政课探析

范华伟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1）

摘要：学生对待社会热点的看法和态度直接反映其思想动态，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和契机。“热点述评”教学法利用实践教学活动，观察和回应现实焦点问题，有利于发挥大学生主体作用，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热点述评”教学法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有利于思政课教师业务素养和思政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关键词：热点述评；思政课；价值诉求；组织实施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59-04

十八大以来，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得到根本扭转，思政理论课的地位和环境得到了历史性转变，但思政课不是一个孤岛，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多元文化相互交织和激荡碰撞更加深刻复杂，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仍面临巨大的考验。“要加强社会思潮动态分析，强化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正面引导，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1]高校思政课要高举旗帜，敢于亮剑，利用热点述评教学法，围绕社会热点挖掘思政元素，理直气壮地帮助学生过滤净化各种错误思潮，落实铸魂育人的根本任务。

1　“热点述评”教学法内涵

热点：即社会热点，是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广泛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或事件；述评：即叙述和评论。所谓“热点述评”教学法，就是在具体的思政课堂教学中，由事先确定的学生当主讲人，利用多媒体技术，向全班师生讲述并评论自己事先准备的与思政内容相关的社会热点，然后，全班同学对主讲人的述评活动进行点评、质疑、追问、补充，再由教师结合教学内容进行概括性点评和总结的一种实践教学方法。

高校思政课倡导“新闻播报”法，也称作“时政播报”“读报时间”“要闻回顾”。笔者以为，热点与新闻是一种交集关系，学生对新闻不一定感兴趣，但对社会热点一般都感兴趣。新闻重在“新”、重在“重大”，与学生的生活实际有一定距离，而热点重在“热”、重在“聚焦”，大都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社会热点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具有典型性，社会热点是社会痛点、难点、堵点的集中表征，是社会问题的放大镜，容易引发普遍的围观和热议；二是民众参与度高，社会热点联结了社会各类人群，聚焦在同一对象上进行信息传递和交流，是道德、法律、价值等思想观念“发酵”的重点场域；三是形成舆论压力，民众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度，往往影响热点事件的进展，甚至推动该领域相关公共政策的调整。新闻的内容纷纭杂沓，没有热点更能直击社会发展的矛盾和症结，不如热点更能引发学生的关注和热议。学生对待社会热点的看法和态度，能直接反映学生本人的思想动态，为思政教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直接提供了宝贵的载体和契机。热点述评教学法可融入课前导入，激发学生兴趣，引发学习动机；可融入课堂教学，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让课堂充满生机活力；也可融入学生作业和课外实践，丰富教学成果，助力大思政教育格局的形成。

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主要是国内外重大事件，如：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台海危机、反腐等；民生问题类，如：教育、住房、环保等；社会道德与法治类，如：唐山打人事件、人教版毒教材事件、胡鑫宇事件等；直接事关切身利益类，如：资助、学业、就业、实习等。在现代互联网技术和工具的加持下，一旦有社会热点事件发生，会迅速充溢网络空间，形成巨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2]大学生对社会热点具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和代入感，思政课有必要对学生普

收稿日期：2023-05-30
基金项目：阜阳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质量工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项目（重点）“新时代赶考精神对大学生的思想引领教育研究”（编号：2021SZJYXM0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范华伟（1987—），男，安徽临泉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遍关注的社会热点进行积极回应，善用“热点述评”教学法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

2 “热点述评”教学法的价值诉求

2.1 契合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需要

2.1.1 有利于践行思政课教改要求

传统思政课的主要问题是教师往往重在关注是否按计划完成教学目标而忽视学生的素质发展，以“满堂灌”的理论讲授为主，虽然也有教师提问、学生回答，但学生对教师预设的问题不一定感兴趣，不能深度参与思考，问题互动大多成为摆设。这种教学方式没有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理论与现实脱节，容易导致思政课“曲高和寡”。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学问，只有与生活实践中的具体事物联系起来，才能真正为学生理解和掌握，才能真正实现时代化大众化。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借助热点案例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回应现实和实践的焦点问题，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的重要抓手。

2.1.2 有利于提高思政课教学生产力

理论灌输固然必要，但不能满堂生硬地灌输，否则，学生的学习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很难真正将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利用热点述评，实施启发性教育有助于将硬灌输转变为软灌输，将灌输变得可爱、生动起来。热点问题贴近生活实际，时代特色鲜明，能够活跃课堂气氛，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引导学生从热点中延伸出做人的道理，从热点中感悟思政课教材中相关知识点，等于训练了学生的思维，锻炼了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学生准备的热点往往会成为最新的教学案例素材，稍加引导就会成为突破思政教学重难点内容的重要手段，为高效完成教学任务提供了重要引擎，增强理论教学的生动性和吸引力，弥补传统说教的不足，使思政课真正成为学生真心喜欢的、终身受益的课程。

2.1.3 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社会化

新时代大学生自我意识强，思维活跃、视野开阔，敢于怀疑现实，但身处象牙塔的他们“对社会的认知、适应还处于感性、片面阶段，甚至错误的层面”[3]，有时会出现偏执、狂妄、情绪化的一面，会拿西方的一套所谓“理论”来否定、质疑我国的相关制度。如果思政课漠视社会热点，特别是对一些负面的社会热点缺乏理性解读，学生会产生心理落差，思政教育的可信度会大打折扣。热点问题是社会问题的窗口，是社会变化的“晴雨表”，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学生打开了体察社会、洞悉人生的窗口。借助热点事件可以引导学生理性思考我国的制度特点和政党优势，在激烈的思想文化交锋中，善用国际比较，纠正学生的错误观念，深入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4]关注时政热点也是公民政治素养和爱国情感的表现，引导大学生关心时政热点，有利于促使其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使大学生紧跟时代步伐，为将来走向社会、适应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2.2 契合思政课立德树人的需要

2.2.1 有利于引领学生思想成长、价值观塑造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时代，变动不安的时局和鱼龙混杂的互联网信息深度影响着大学生的“三观”，部分大学生出现思想迷茫、无所适从、意识形态淡化的现象，容易被假象迷惑而信谣传谣。热点述评将学生关注的热点引入思政课堂上来，与思政教学内容相结合，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学生分析讨论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各种思想观念的碰撞磨合。真理越述越明白，越评越透彻，学生们的相互分析和点评，加上老师的适切引导，注重审视学生对热点问题的价值观评判，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学生思想困惑，提高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理性思维能力，这既是对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塑造的过程，也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过程。热点述评经常会涉及生活中的责任担当问题，思政课教师要注重对大学生的正能量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使大学生明白自己身上的社会责任，自觉感恩社会、热爱生活，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主流意识形态。

2.2.2 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富有时代特色、贴近生活实际的热点述评能很好迎合学生猎奇的心理特点，激发学习兴趣，调动学生思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明确自己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同学们有充分的自由和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评论他人观点，学习他人优点，自觉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增强了学习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团队合作制作课件，相互交流讨论、通力协作，锻炼了组织协调能力；上台展示、述评锻炼了他们的胆量和勇气，获得了成就感，增强了自信心；课前课后谈感想、晒收获，增进了友谊，加强了沟通。热点述评是一种实践教学活动，在自主选题、素材整理、课件制作、阐述点评、讨论质疑等方面都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2.2.3 有利于全方位锻炼学生、提高综合素质

热点述评活动能全方位锻炼学生能力，从选

题、搜集筛选资料、制作PPT，到课堂上展示、讲述、点评，再到分析、质疑、补充、辩论等，在问题导向和任务驱动下发挥主观能动性，既锻炼了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锻炼了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人际交往沟通能力。

2.3　契合教师提升自身业务素养的需要

2.3.1　变压力为动力，提高自身素质

教师是热点述评的“导演”，决不能袖手旁观当个看客，学生自主选择的热点话题合不合适、会不会引发政治问题、学生录屏上传到网上会不会引发舆情问题等，教师一定要亲自把关。对于学生选择的热点话题，教师本人是否熟知、能否揭示其背后的深层逻辑、能否对学生的热点述评以科学的指导，这些都需要教师利用互联网等手段，下足功夫去研究。思政教师只有与时俱进学习新知识，更新教育理念，研究教学对象，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深厚的学识功底赢得学生，将教材文本转化为教学话语，才能做好热点述评的指导和点评工作。久而久之，教师自身看问题的角度与深度，知识的广度与厚度，教学的组织和实施等业务能力都会与日俱增，实现教学相长。

2.3.2　加强师生对话交流，增进师生感情

在热点述评的全过程中，“导演”与“演员”需要反复沟通交流，以便确定热点述评的主题、内容和组织形式，师生共同参与活动，对话交流的机会也多了，师生情感也进一步拉近了，思政课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塑造也更易于走进学生心坎上。师生关系密切了，教师得到学生的尊重与理解，教师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都得到实现，幸福感也会上升，有助于克服职业倦怠，享受成为“人师”的快乐。

2.3.3　把握大学生思想动态的有效途径

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是可以预测和掌握的，常见的方式是谈心谈话、师生评价、心理量表、学生干部反馈等，虽然能发挥作用，但学生有时为了面子、维护自尊，反馈的信息可能失真、滞后。而热点述评活动则提供了新思路、新渠道。学生深度参与热点述评活动，他的态度和观点一定会映射到热点上来，全班师生都可以管中窥豹见一斑，及时感受到他的思想情绪波动变化，为下一步有的放矢地进行干预引导、纠偏匡正打下基础。

3　“热点述评”教学法的组织实施

3.1　热点述评教学法应遵循的原则

3.1.1　坚持主导与主体相结合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学生的学习是主动建构知识意义的过程，学生是具有独立思维的能动性的个体。学生是自己学习的主体，是内因，教师作为“教”的主体，是推动内因发展变化的外因。[5]热点述评教学法将内外因统一起来，既注重激发学生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又注重教师的引领示范作用。思政教师在热点述评活动过程中要把舵定向，防止出现重大政治问题和过度流量化、娱乐化的倾向，处理好突发事件，控制好课堂秩序，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守牢意识形态主阵地。

3.1.2　坚持述评内容与教学相结合

热点述评教学法操作简单，方便灵活，无需费用，学生也乐于参与，热点述评的各个环节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独立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可以随意发挥，那些“小道消息”“娱乐八卦”及与教学内容无关的热点是不适合在课堂述评的。教师要把控好内容和方向，将述评的热点变成鲜活的思政案例，引导学生的热点述评朝着教学目标有效达成的方向努力，切不可为了热闹而述评，致使述评的内容与教学“两张皮”，陷入“摆拍”形式主义泥淖。

3.1.3　坚持问题意识和学生需求相统一

我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享受生活、拜金主义、幻想一夜暴富、快速成名、价值观扭曲、遇到困难躺平等不良思想仍存在。思政课要通过热点述评活动，注重研判学生思想倾向，以学生实际思想问题为导向，正面答疑解惑，对症下药，解决学生实际问题和现实需求，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涵养进取品格，以奋斗姿态激扬青春”[6]。

3.2　热点述评教学法的实施环节

3.2.1　总体设计，分工合作

每班设立思政委员一名（也可由团支书兼任），负责热点述评的组织联络工作，及时向思政教师反馈问题，协助教师开展热点述评工作。思政教师建思政委员群，所有思政委员入群，以便及时沟通。思政委员根据本班情况，按3～8人划分一个小组，选出小组长。热点述评活动一般每周每班进行一次，一学期结束基本实现全员参与。小组长负责组内分工协商，分配搜集资料、制作课件、上台主讲等任务，小组推举出主讲人（可以多人合作述评），按照小组顺序每周进行一次5～10分钟热点述评活动（一般安排在课前进行）。思政委员担任主持人，及时与小组（主讲人）联系，每周日之前将热点述评的主题发到思政委员群里。教师对每次热点述评情况都作出相应记载，根据分工表现赋分，作为平时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学生一开始信心不

足、不愿参与，可以先由思政委员或其他学生干部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率先示范，带动更多同学踊跃参与进来。

3.2.2 素材的选择，课件的制作

大学生能熟练使用手机和电脑下载应用软件，如：学习通、人民网、新华网等APP，这里有大量的新闻热点资讯，当然，朋友圈、视频号里也有大量热点事件，学生可以多渠道获取自己感兴趣的热点话题，选取自己所需要的热点素材。热点事件的选择要与思政课内容相关，学生思考问题时能联系教材内容，从理论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习惯。鼓励大学生自己动手制作多媒体课件，课件中插入图文、音视频等，以增强展示效果，精心打磨、不断调试课件。

3.2.3 课堂的述评展示

主讲人在热点述评中要适当展示自己对热点的见解，阐述热点事件的启示，并进一步引申到实际生活中来。主讲人述评结束后，由台下的同学点评、质疑、补充。点评主要从述评的热点是否具有代表性、表述是否清晰、语言组织是否合理、分析是否到位、还有什么可作补充完善的地方、自己有什么收获等方面着手。热点述评可以创新展示形式，采用自己喜欢的风格和方式，如：采用对话、访谈、微视频等形式进行。事实证明，“00后”大学生有着很强的表现欲，展示形式丰富多样，课堂气氛十分热烈。

3.2.4 教师点评提升

学生述评结束，教师可以引导大家继续围绕热点话题进行讨论，根据自身经验适当进行点拨和纠正，引导学生增强“四个自信”，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小组之间存在个体差异，有的小组大放光彩，有的小组可能黯然收场，教师要多鼓励学生，放大学生身上的闪光点，让学生体验到成就感。每次开始和结束都引导学生致以热烈的掌声以示鼓励和支持，同时，委婉地指出不足和努力的方向。学期末要对“热点述评”进行评比，评选出热点述评达人，在学业成绩上再适当赋分，进一步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EB/OL].[2013-12-23].http://www.gov.cn/jrzg/2013-12/23/content_2553019.htm.

[2] 何慧玥，李晓云.大学生对热点舆情事件的免疫力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19)：22-23.

[3] 刘玲，刘颖.高职院校思政理论课教学方法探析：新闻播报法[J].现代职业教育，2017(10)：60-62.

[4]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7)：4-17.

[5] 李小芬.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意蕴与路径探索[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6(3)：70-74+79.

[6] 习近平.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N].人民日报，2023-01-01(01).

责任编辑：仲耀黎

Exploration of Integrating the Teaching Method of "Hotspot Review"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FAN Huawei

Abstract：Students' views and attitudes towards social hot spots directly reflect their own ideological dynamics，providing an important carrier and opportunity for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 The teaching method of "hotspot review" utilizes practical teaching activities to observe and respond to real-life focal issues，which is conducive to exerting the role of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and mobilizing their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in learning. The integration of "hotspot review" teaching method int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teaching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ers.

Key words：hotspot review；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value appeal；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基于 OBE 理念的高职院校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以“网页设计与制作”课程为例

李若瑜[1,3]，陈 蔚[2]，朱元彩[1,3]，郭崇嵩[1]

（1.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信电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2.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系，安徽 淮北 235000；
3. 徐州市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安全应用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针对“网页设计与制作”的课程目标和内容、教学实施、考核机制及质量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将 OBE 理念引入课程，对该课程进行教学改革探索，从建立以行企需求为导向的课程目标和内容，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六环节”课程教学实施过程，建立“理实结合”的考核评价体系，完善课程质量保障措施、推进课程持续改进。实践表明，教学改革在提高学生课程通过率，毕业设计水平及实习就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课程教学效果得到了明显提升。

关键词：OBE 理念；高职院校；“网页设计与制作”；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63-04

0 引言

OBE 教育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1] OBE 的教育成果重点不在于学生的分数，而在于学习结束后学生真正拥有的能力。[2] OBE 在应用层面上有 3 种类型：以重视专业技能及其结构性表现的传统型 OBE；强调非结构性表现与高层次能力的过渡型 OBE；聚焦生活角色能力及由复杂角色绩效决定的转变型 OBE。[3] OBE 理念，有利于培养学生具备未来步入社会后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素质，符合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需求。[4] OBE 理念强调学习目标，实现方法及衡量目标达成度。近年来，高职院校广泛应用该理念开展课程改革，增强课堂教学吸引力和学生学习获得感。

“网页设计与制作”是一门理论和实践性较强的课程，课程教学目标是使学生熟练掌握有关网页设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进行网页前端设计。针对“网页设计与制作”课程存在的问题，以 OBE 理念为理论指导，从课程目标和内容、教学实施过程、考核评价体系及质量保障措施方面开展课程改革研究。

1 “网页设计与制作”课程存在问题

第一，成果导向不明确。由于对该课程的理解不到位，产出不明，从而引发教学目标不清，导致学生学习的知识和技能较为零碎，缺乏整体性、系统化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训练。偏离了岗位要求与人才需求，造成学生实习就业困难，“供”与“需”之间不匹配。

第二，教学模式不适配学生特点。该课程在授课过程中主要采用传统教学模式，教师按照知识点、技能点照本宣科完成教学任务，学生配合教师完成课堂教学内容。课程教学实施策略、方法与学生特点存在差距，未从学生的能力、兴趣、课堂形式偏好等角度出发，且缺乏足够的互动和实践环节。因此，导致学生的学习效果与教师的教学期望存在一定差距。

第三，考核机制单一。该课程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考试或考察的考核机制只是单一检验学生理

收稿日期：2023-04-06

基金项目：江苏省 2021 年度电子信息职业教育研究重点课题“教师创新创业教育能力提升策略研究”（编号：JSDX2021-I09）和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度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基于 OBE 理念的课程质量提升策略研究：以‘网页设计与制作’课程为例”（编号：JGYB22-1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若瑜（1986—），男，江苏徐州人，助教，软件设计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网络技术、Linux 操作系统、移动互联网及高等职业教育；陈蔚（1981—），男，安徽淮北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应用技术、现代教育技术；朱元彩（1972—），男，江苏徐州人，正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物联网技术应用、电子信息工程应用及大数据分析；郭崇嵩（1988—），男，江苏徐州人，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政教育、机械工程。

论知识或实践能力，没有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综合性考核。

第四，质量保障措施欠缺。由于缺少周期性行企调研，导致课程目标不能紧跟现实需求；教材教辅等配套资源不丰富，引发延伸学习的不足；任课教师缺少一线工作经验，无法结合岗位实情和现实需要，将知识点通过实际应用的方式较好地融入教学过程中等。这些课程质量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课程的持续改进。

2　基于OBE理念的教学改革策略

OBE教育模式采用“自顶向下”的“反向设计”方式，通过预先设定的培养目标，反向设计支撑该目标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式，并针对培养目标整合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过程。[5]“网页设计与制作”课程，其改革整体策略为：以行业/企业（以下简称“行企”）要求为成果导向设定课程目标，以“知识技能—项目载体”为主要形式制定课程内容；以学生为中心开展“六环节”教学实施，建立理论与实践并举的综合性课程考核；完善课程质量保障措施，推进课程持续改进。

2.1　以行企要求为成果导向，制定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是指特定阶段，课程根据教育目标制定的任务指标，也是特定课程所要达成的预期结果，具有时限性、具体性、预测性及可操作性等基本特征。[6]就具体学科课程而言，课程目标不仅是构成整个课程的第一要素，也是指导整个课程编制过程的关键与准则。[7]

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目标是面向行业企业及岗位需求，培养“即插即用”的技能型人才。相关职能部门或人员通过企业调研、座谈交流、毕业生信息反馈、招聘网站信息分析等方式，梳理了高职应届毕业生从事网页设计与开发工作的基本要求。岗位素养方面，要求对工作认真负责，尽职尽责，能够承受压力；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意识，学习能力强，有创新精神。岗位能力方面，要求能够根据产品项目内容开展PC及移动端前端设计研发工作；根据产品需求分析并给出合理的页面前端结构解决方案；通过开发工具改进流程，保证前端业务开发的高效性。岗位知识储备方面，要求熟悉HTML5、CSS3等基本知识；熟练使用JavaScript实现界面交互；精通网页布局；熟悉移动终端的适配；能够使用Vue.js等框架。对照上述岗位要求，以OBE理念中“以成果为导向”作为制定课程目标的理论依据，制定“网页设计与制作”课程的素质目标、能力目标及知识目标。

素质目标。学生需具有较强的专业学习素养、执行和创新素养；具有自觉的规范意识、团队协作意识。

能力目标。能运用各种交流手段进行良好的表达和交流；具有使用基础英语进行阅读和交流的能力；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人际交往和组织管理能力；具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需能够运用系统性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能进行自主学习和自我评价；具有良好的变通能力、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够独立进行网页架构规划并实施。

知识目标。学生需掌握HTML5与CSS3基础知识及最新技术，并熟练使用JavaScript制作网页动态效果；理解Vue.js框架的基本用法；掌握HTML5移动终端的开发及适配。

2.2　以“知识技能—项目载体”为主要形式，制定课程内容

在课程目标的框架下，采用“知识技能—项目载体”的形式制定课程内容，满足课程目标的知识技能及素质要求。其中：知识技能明确该课程的内容范围，主要包括H5基础知识、H5页面脚本两个重点内容。其中：H5基础知识由“简单的图文混排”“盒子模型及网页布局”“使用CSS3样式表设计网页样式”“超链接和列表的使用”“音视频多媒体元素在网页中的应用”“表格和表单控件”6个单元构成；H5页面脚本由“JavaScript数据类型”“JavaScript流程控制”“JavaScript函数”“JavaScript对象和事件的用法”“BOM和DOM的使用”5个单元构成，并根据课程目标增加网页框架基础应用、多终端适配等内容。项目载体是指将各个单元组织成项目的形式，学生通过完成项目掌握知识技能，培养岗位素质。

此外，可采用专业选修或技能提升课的方式增设JavaScript进阶、Web程序设计等专项拓展课程，建立连贯的课程知识体系，使学生具备开发网络应用系统前后端的能力。增加企业项目实训课程及课时，邀请企业教师开展实践教学的授课并带领学生完成真实的工作项目，从实际岗位要求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实践技能并灵活运用。通过上述方式，使内容匹配面向岗位的课程目标。

2.3　以学生为中心，开展“六环节”教学实施过程

课题组对本校253名2020级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学生开展调研，通过分析调研数据，得出如下结论：学习兴趣方面，大多数学生对“网页设计与制

作”课程兴趣较为浓厚，愿意学习；学习形式偏好方面，大多数学生认为纯理论知识的学习模式接受度不高，但对以身边的实例为载体开展知识技能学习的方式，接受理解度较高，并且追求学以致用。因此，该课程采用项目化教学方式，通过“导入—解析—立项—练习—评价—晋升”六个环节开展教学工作，整体过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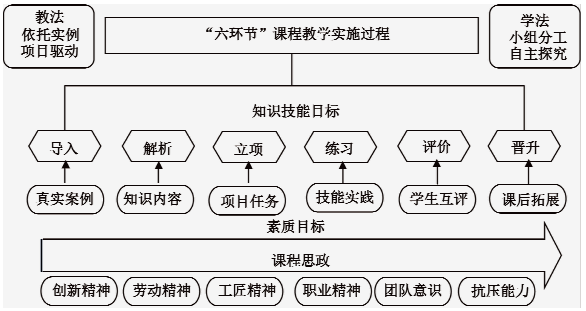


图1　课程教学实施过程

导入时以学生身边的实例为载体，通过实例快速抓住学生的眼球，引起兴趣。例如：在讲解CSS3样式表的使用时，可通过游戏中的“人物皮肤”过渡到网页的“皮肤”，以实例引出CSS3样式表；教师分析讲解实例中涉及的知识和技能的重难点，并通过立项的形式发布项目任务；学生自主学习知识技能点，以小组协作或工单制模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开展成果互评，分享学习心得，共同提升；教师布置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的课后拓展练习，进一步巩固提升学生对知识技能的理解和掌握。

通过六个环节落实课程目标中的知识和技能目标，满足学生学以致用的期待。课程思政贯穿于课堂教学，依托课堂培养提升学生的岗位素养，落实课程目标中的素质目标。此外，在课堂实施过程中可以适当引入竞赛的形式，让学生在竞赛“赶学比帮超”氛围中强化知识提升技能、提高素质。

2.4　建立“过程＋成果＋答辩”的课程考核机制

改革传统的考核模式，采用“过程考核＋期末成果＋考核现场答辩考核”结合的形式，三者的分值分别为10分、50分、40分，课程考核满分100分。其中：过程考核主要依据授课过程中学生课堂表现、同学互评、课后作业完成情况及教师评价；成果考核是指在期末设置3～5个项目，让学生任选其一进行制作，在最后一次课时展示成果；答辩考核是指学生在展示成果考核作品时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教师根据学生回答情况进行评价，必要时可提出新需求让学生现场制作。

这种考核机制既实现了全过程的学习情况跟踪和反馈，又考察了理论知识和技能掌握情况及代码规范度、沟通交流能力等岗位素质，有效避免抄袭等问题，并为后续毕业设计及岗位实习应聘作相应准备。教师也可进一步掌握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及学生的学习成果满足成果导向的程度。

2.5　完善课程质量保障措施，建立课程持续改进机制

课程质量保障措施是指运用先进理念，把提升课程质量有关的各方面组织起来，采用相应的方法和措施，促进课程的发展，提升职业院校学生的知识素质技能水平。课程质量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形成的，要求目标定位、课程内容、师资队伍、评价与反馈体系之间相互协调、和谐发展。[8]课程质量是高等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提高课程质量已成为高等教育的核心主题。[9]

对该课程来讲，一是建立科学的组织体系，由“学院—专业—教研室—任课教师群”构成，依托该组织改进课程目标、内容及教学实施过程等具体工作，从组织层面确保质量保障落实到位。二是借鉴企业内部或培训机构的课程安排及教材资源优化课程内容，并采用信息化手段建设在线课程，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学生的学习渠道和学习资源。三是提升优化师资力量，在假期安排任课教师赴企业进行实践，了解行业一线需求，从而更好地结合实际开展教学工作，并鼓励教师积极考取相应证书及参加各类技能大赛，从而促进任课教师的知识技能水平不断提升。四是积极拓展校外实训基地，与企业联合办学，实现校企无缝对接。五是建立相应的考评机制，对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学生学习情况等进行考核评估，找到不足之处并改进。通过开展务实有效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切实保障教学质量，从而打造高品质课堂教学。[10]六是拓展信息反馈渠道，通过学生评教、毕业生调研等方式，分析学生的建议，针对学生的学习感受进行课程改进。通过完善上述质量保障措施，建立持续的课程改进机制，确保该课程不断适应行企要求，课程质量不断提升。

3　实施效果

通过近几年的教学改革实践，“网页设计与制作”课程通过率达到97%，不及格率显著下降；学生评教好评率在98%以上；被访2020级应届毕业生中48%选择Web应用系统作为毕业设计；52%的实习学生从事网页设计与制作或网站运维作为实习岗位。从实施效果来看，改革后的课程目标更

加明确，导向清晰；教学内容系统化，在课程中学到的知识技能与实习工作内容适配度较高，贴近现实；课堂教学环节可操作性强，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课堂互动明显增强。通过以教研室为单位陆续开展的访企拓岗、企业实践、校友经验分享、1＋X证书培训调研，以及组织学生和教师参加各级别网页设计类技能竞赛等，持续推进课程的改进和完善。以OBE理念为指导开展本课程的教学改革，可有效提升学生的知识技能水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工作素养和精神，提升课程的教学质量及学习获得感，满足高职院校面向岗位培养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目标需求。

4　结束语

课程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出发，立足行企需求；另一方面，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教学，完善质量保障措施，不断推进课程的持续改革。OBE教育理念涵盖了成果、学生为中心、持续改进三要素，以其作为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的理论指导并应用到课程中，可有效提升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 王国强，卢秀泉，金祥雷，等.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新工科通识教育体系构建研究[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4)：29-34.

[2] 韩开绯，向阳，罗春娜，等. 基于成果导向的高职通识课程模式与机制研究：以黑龙江职业学院为例[J]. 黑龙江畜牧兽医，2019(20)：155-159.

[3] 申天恩，斯蒂文·洛克. 论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J]. 高校教育管理，2016(5)：47-51.

[4] 于基成，刘秋，陈超，等. 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发酵工程实验”课程内容设计及实践[J]. 微生物学通报，2020(4)：1234-1242.

[5] 王波，王美玲，刘伟，等. 基于OBE理念的电子技术实践教学改革[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9(10)：228-231.

[6] 施良方. 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5-16.

[7] 钟启泉. 课程与教学概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8.

[8] 赵翠荣. 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的举措[J]. 普洱学院学报，2022(5)：117-119.

[9] 林青松，郭国业. OBE理念视角下高等学校在线教育质量提升策略研究[J]. 理论研究，2022(4)：4-7.

[10] 窦雪萍，李同飞，邵长桥. “金课”导向下工科课程质量提升策略：以“道路通行能力分析”课程为例[J]. 教育教学论坛，2022(7)：45-48.

责任编辑：净　草

Exploration of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in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OBE Concept

——Taking the course "Web Design and Production" as an example

LI Ruoyu[1], CHEN Wei[2], ZHU Yuancai[1,3], GUO Chongsong[1]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urse objectives and content,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ssessment mechanism and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web design and production", the OBE concept is introduced into the course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course. By establishing curriculum objectives and content oriented towards the needs of enterprises, implementing a student-centered "six link" curriculum teaching process, establishing an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that combines"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improving curriculum quality assurance measures to promot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curriculum.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eaching reform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students' course passing rate, graduation design level and internship employment, and the course teaching effect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Key words: OBE concep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eb design and production"; teaching reform

基于中职数学核心素养的课程思政实践

张少华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人文艺术系，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中职数学作为公共基础课程，其蕴涵着丰硕的思政内容，承载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同时，还肩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提高学生的数学运算能力等数学核心素养的任务；是全面落实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立德树人的渠道和载体；在中职数学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是培育综合素质过硬的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主要途径。在中职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及时优化并合理创新课堂教学，做好课程设计，抓住课程思政的着眼点，不断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塑造学生的健全人格，提高思想道德品质，培养学生综合素养，发掘数学思政基因，培养学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的职业素养。

关键词：中职数学；核心素养；课程思政；综合素养
中图分类号：G6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67-04

0　引言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中提出：“以立德树人铸就教育之魂。”[1]数学是中职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结合数学学科的特点融入思政教育，以知识为载体，充分挖掘数学学科所具有的德育功能。同时，紧密联系专业课程渗透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中职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使他们不仅能够提高数学核心素养，而且能够获得良好的道德品质与职业素养，增强社会责任感，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基础。本文将从落实课程思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课程思政在中职数学教学中的现实意义、中职学校数学课程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的路径和实践等方面进行中职数学教学中思政教育的实践探索。

1　核心素养下落实课程思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课程思政是德育工作的基本内容。教师要深入挖掘课程教学中的思政元素，对教学资源进行整合、对教学方式进行创新、对教学章节进行设计，以提升课程思政育人的能力。公共基础课要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形成协同效应，同向前行。中职数学是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因此，必须在其核心素养教学中贯彻实施课程思政。

在中职学校的数学教学中，落实课程思政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第一，数学学习直接或间接地涉及现实世界中的“数”与“数”之间的联系与空间形态，是对“数”与“形”的探究式学习。第二，数学的结论、定理、公式等都是严格而明确的，因此，通过数学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养成科学态度，拥有一种合理的数学思考能力。第三，数学本身就是一门充满知识的学科，可以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学生不但可以锻炼数学逻辑思维，而且还可以提高自己的求知欲、创造力和进取心。第四，数学教育是一种文化性的基础教育，也就是说，在数学课程中引入思政要素来开展道德教育，不仅是一种必然，而且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对学生的思想认识和人格品格的培养，让他们能够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在课堂中，要注重讲解理论知识、师生互动、动手练习解决问题等，为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平台。

2　课程思政在中职数学教学中的现实意义

中职数学教学内容不仅是学生学习专业课的理论依据，而且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即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很少使用数学理论，但他们在数学知识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学科推理和思维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更好的工作效果。随着中考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创新，中等职业学校生源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在中职学校的数学教育中，很多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没有养成很好的学习观念，也没有形成很好的思维方式。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为社会提供更多

收稿日期：2023-04-30
作者简介：张少华（1979—），女，安徽淮北人，讲师，研究方向为中职数学课程思政教学。

的高技术、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中职数学的课堂教学应充分发挥学科的人文教育作用，以公共基础课与专业课相结合的形式，对学生进行全面的素质与能力的提高，为其将来的学业与技术的熟练掌握奠定基础。最终实现对课程实施方式与内容的优化，并与完善的教材内容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一种科学的教学活动。将课程思政引入中职学校的数学课堂，可以充分发挥思政教育的功能，并采取与学科教学相结合的方法，使思政课与专业课的教学高度融合。

在中职数学核心素养下实施“课程思政”，不仅能充实中职学校的数学教育，还能进一步凸显“融合”的特点。通过构建课程思政一体化格局，便于将人文拓展融入中等职业学校的“人文主义”和“学科化”建设体系，是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有效方式。在中职学校的数学课堂上，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各个环节，使学生在良好的课堂氛围中转变生活、学习态度，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他们对中职学校的思政教育的认识。通过思政教育和学科基础知识的融合，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从而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所需的技能人才。

3 中职学校数学课程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的优势与劣势

中职数学作为一门基本学科，对提高学生的运算能力和解题能力、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等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中职的数学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自身特色，在构建课程思政方面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与局限性。

3.1 优势

首先，中职学生越来越多，他们对这门课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因此，在中职的数学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做好这门课的思政，是有必要的。其次，中职很多专业都有要求，而且涉及面很大，每个中职学生都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就是“数学”，在教学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对整个中职学校都有很大帮助。另外，中职的学生还不成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很好，思维能力很强，因此，中职老师们要把握好这样的机遇，加强对学生进行课程思政教育。

3.2 劣势

第一，因为中职学校生源参差不齐，中职生入学的文化基础知识薄弱，尤其数学基础更弱，由于对数学不能有足够系统的认识，对学习缺乏积极性，所以，他们学习数学就比较吃力，从而缺乏学习数学的信心，厌学现象严重，课堂上学生的参与度很低。而课程思政是以学科知识为载体展开的思政教育，所以，思政就难以有效开展。第二，数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其逻辑性、应用性和抽象性突出，与历史、语文等其他社会学科相比，较难融合思政要素。第三，中职学校的数学课程对思政要素的发掘还不够，教师的教学观念落后，教学方法单一，很多教师依然选择传统教学方式，不愿意与时俱进、改善教育教学方法，思政的内涵也很浅，这就影响了数学学科的育人功能。第四，一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对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影响了思政教学的效果。

4 中职数学教师缺乏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表现

4.1 不能认识课程思政的重要性

课程思政要求各学科都要担负起教育的责任，从而达到教育的作用和目的。中职学校的数学课程思政具有重要性：一是“立德树人”的本质要求，中职学生处于价值观和人生观塑造的关键阶段，极易被社会上的一些不良思潮所左右，因此，必须加强对他们的正面教育，让他们能够作出正确的价值观抉择，树立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观。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学教师要在教学的同时努力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正确的运用，将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地将学生变成社会主义建设所要求的具有过硬政治素质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但是，长久以来，中职数学老师没有充分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忽视了对课程思政的学习和实践，影响了学校“三全育人”的根本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学数学课程思政的发展。

4.2 对中职数学课程思政内容应用能力不足

中职学校的数学课思政要充分关注学生的年龄特征、学科特征，并将其贯穿于整个教育活动的每一个环节，所以，教师必须对数学教学和思政教育的内容都有相当的了解，这样才能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课程思政的目的。但是，中职数学教师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对每一章节知识重难点的理解和应用没有充分的把握，对教学内容的思政元素不清楚怎样设计，对思政目标不知如何体现，对思政教学方法运用不够恰当，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不顾学生实际，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缺乏数学课程与实际生活的相互衔接，导致课程思政教学的有效性不佳，这就需要教师努力钻研，不断提高课程思政教学的内容设计能力。

5　课程思政在中职数学教学中的具体路径

5.1　课程设计是数学课程思政的基础条件

首先，在课程设计上，要与数学学科的教育规律相适应，找出学科知识与思政元素之间的切入点，使思政元素得到合理的体现。其次，要从整体上进行规划，以确定中等职业学校的数学人才培养的目的，通过整合学科教学目标与思政教学目标，对课程标准进行优化，不断发掘数学学科思政的内涵与知识，充分发挥课程与教学目标的设计在实施课程思政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在中职学校的数学教学中，可以引进一些有导向意义的问题，将中职学校的数学知识导入学生的脑海中，根据思政课程的内容，增加教学的灵活性。这样，就可以使中职学校的思政课程更加灵活地进行，同时，也可以使学生们更好地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拓宽他们的学习思路。

5.2　课程思政在中职数学教学中的着眼点

教师要从自身的角度提高对课程思政的认识，寻找课程思政在中职数学教学中的着眼点，防止思想误区。当前，很多老师在几年的教学过程中，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对数学教学的习惯，然后，在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时，很难有更高层次的认识。同时，他们还觉得，思政课与数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因此，忽视了对课程思政的贯彻，也忽视了与数学相结合的工作。因此，教师们要在提高自己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前提下，找到中职数学教学中的课程思政教学的着眼点，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建设者。在进行数学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将其与课程思政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实思政教育的内涵，强化学生的思维意识和人文素质的培养。中职学校的数学教学，也有许多与思政相关的课本内容，可以通过开展中职学校的数学教学活动，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3]

6　中职数学核心素养下的课程思政实践

6.1　确立价值塑造目标，培养学生综合素养

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下，尽管有关学生品质和能力的目标已被确定，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目标的规划比较混乱、目标不明确等。在中等职业学校的数学教学中进行课程思政的实践，要以更加明确的教学目标、具体的多个角度为主要内容，将数学教育与思政相结合的高度可能性提高。为了适应新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构建新的价值观，老师还可以利用对学生的真实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对学生运用哲学眼光和思维对事物进行判断的能力进行培养，从而提高他们在数学课堂上的自我学习能力和价值观念。当前，很多学生仍存在着心理不平衡、数学学习信心不足的问题，要提高学生的哲学思维、自主能力和交流能力，就必须充分发挥思政教学的潜力。根据数学学科特点确定教学目标，注重哲学思维、心理健康和情感等方面的指导，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和意志品质。[4]

6.2　发掘数学思政基因，创新数学教育内容

教师要重视挖掘数学学科思政教育职能，以对学生进行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为前提，确立人文教育的目标，发掘数学思政的基因，进行数学教学的创新。教师可以将数学教学中的真实案例或事件与数学教学中的知识联系起来，使学生能够积极乐观地完成学习。例如：解析几何“圆锥曲线”内容难度较大，又枯燥无味，但在机电数控专业课中该知识非常重要，要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认真研究教材，从数学知识的应用、数学理论的由来等方面丰富学科资源，拓展数学学科教学内容的内涵和外延，挖掘数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激发中职生数学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数学学科素养。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教师适时引入“圆锥曲线”的由来及其在生活中的用途，圆锥曲线是古希腊数学家梅内赫莫斯（公元前380—公元前320）首次提出的；古希腊数学家阿波罗尼奥斯（约公元前262—公元前190）对前人的成果进行归纳提炼并加以系统化，编成巨著《圆锥曲线论》，他用一个不经过圆锥顶点的平面截圆锥面，得到了圆、椭圆、双曲线及抛物线，它们都是圆锥曲线。圆锥曲线广泛应用于建筑、轨道卫星等领域。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运行轨道就是椭圆，火力发电厂冷却塔的轴截面曲线是双曲线，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 m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轴截面曲线是抛物线。通过介绍圆锥曲线的历史，不仅点燃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而且使学生了解数学知识产生的背景和研究方法，进而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的应用价值。通过发掘数学思政元素，也提高了学生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实现全方位的教育目标。[5]

6.3　引入数学史，培养学生人文精神

中职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型阶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注重课程思政的融合，培养学生的三观。老师可以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使用生动、幽默的语言，或者借助多媒体，将一些数学发展史或数学家的感人故事介绍出来，这样可以促进学生的道德素养的提高，从而让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变得更高，育人作用

就不言而喻。比如:教师在讲完第一章的“集合”和“充要条件”后,可以让同学们自己去读《康托尔与集合论》,再用多媒体向同学们播放康托尔与集合论的一些趣闻,让同学们明白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对集合论的看法和遇到的困难,并以此来激励同学们改变自己的学习态度,学习数学家们坚持不懈、克服困难、永不言弃的高尚品格。在“弧度制”的教学中,可以用短视频或者 PPT 等形式,适时介绍我国的数学家祖冲之和华罗庚等人的成功事迹,更好地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加强学生对数学思维的认识。教师通过讲述数学家的励志故事、严谨的科学态度、勇于探究、敢于追求真理的精神,既能活跃课堂的气氛,又能使同学们感受到数学工作者的勤奋和努力,从而提高同学们的国家荣誉感。但同时也要注意,在数学史的讲解中要尽量避免数据的繁琐和枯燥无味的问题,通过知识点、数学文化内容的强调等,增强学生的数学思维意识,以更好地展现数学的教育优势,为学生数学思维意识的形成及思想能力的强化提供支持。也就是说,在中职数学课堂上,通过数学史的融入,可以将学生作为主体,增强学生的课程思政能力,实现数学课程的教育创新目的。[6]

6.4 依托专业特色,培养科学的职业素养

数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基础学科,是解决现实生活中问题的重要工具。而中职生学习数学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专业课学习,所以在数学教学中以学生所学专业为出发点,合理设计运用数学知识解决专业课中遇到的问题,自然地融入思政元素,不但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通过与专业课程的紧密衔接及思政教育的渗透,培养了中职生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促进课程思政目标的达成。比如:会计电算化专业的学生,在“指数函数的应用”学习中,可以设计如下的应用型问题:李丽同学通过校园贷平台借款 10 000 元,扣除手续等各种费用后,实际到手 8 000 元,分 24 个月还清,每月除了要还本金 417 元外,还要支付 200 元的利息,校园贷平台宣传说月息只有 2%。请同学们帮助李丽算下账,这种贷款实际平均月利率是多少?如果按银行贷款年息 5%计算,李丽向校园贷借款比向银行借款,需要多还多少钱?

将会计专业中贷款利率计算问题与指数函数知识相结合,引导学生在专业实践中,用科学的观点,理性地分析问题,培养财会专业学生不弄虚造假、服务社会的职业道德。通过校园贷案例分析计算,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到了校园贷的危害性、欺骗性,培养学生养成理性消费观,远离校园贷,学会保护自己。通过这种思政教育的融入,也培养了学生科学、理性的职业素养,体现了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

7 结束语

在中职数学课堂教学中将课程思政渗透到数学核心素养教育中,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还能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达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效果,实现中职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国家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这就需要教师用心发掘,积极琢磨,不断思考,将数学的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品德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实践,将数学课堂中所包含的数学思维和思政要素充分地发掘出来,如盐溶于水一般自然地渗透思想政治元素,使中职数学课程的“德育”和“智育”双效功能更加丰满立体,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作为中职数学教师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推动我们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研究和探索,最终达到课程思政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评论员:以立德树人铸就教育之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EB/OL].[2018-09-11]. http://edu.people.com.cn/n1/2018/0911/c1052-30286767.html.

[2] 曹萍.中职数学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提升策略研究[J].河南农业,2022(15):23-25.

[3] 杨万柱,黄晓惠.数学文化之于中职数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价值与实践路径[J].职业教育(中旬刊),2021(12):41-44+55.

[4] 陈玉清.“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在数学课程中的路径探索与实践[J].试题与研究,2022(35):46-48.

[5] 连佳.思政元素融入中职数学课程的探究与实践[J].数理化解题研究,2022(33):35-37.

[6] 陈卫红.浅谈基于课程思政教育大背景下的高职数学教学改革[J].科技风,2019(29):54.

责任编辑:赵 冬

“新文科”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实践研究

高鸿雁
（淮北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新文科”背景下，强调传统文化的地位，将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育符合新时代全课程育人的要求，有利于落实教育的根本任务。高校英语教育工作者应该针对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教师是课堂主导力量，师资队伍的能力与水平至关重要，对其进行有效建设将积极促进学生传统文化素养和跨文化能力的提升；坚定文化自信、解决教材内容偏单向输入的问题，及时调整改进课程设置，增加拓展视野类课程的板块；调整教学的测评方式及测评内容；充分开发第二课堂，丰富学习环境，让传统文化随着外语学习能更有效地得以传播。以此推动“大学英语”教学高质量发展，促使其成为培养提高国家传播影响力的国际化人才的阵地，成为增强学习者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心的堡垒。

关键词：新文科；“大学英语”；传统文化；渗透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71-03

2019 年 4 月，教育部牵头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在天津正式启动，要求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全面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2020 年 11 月 3 日，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召开并正式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新学科建设已经成为今后我国高等教育着力推进的核心工作。高等教育要建设新文科，做强大外语，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1] 满足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需求。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向纵深发展，“共享”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跨文化交流的步伐愈加势不可挡，外语类课程的普及与发展意义不言而喻。“大学英语”是高校必修课程，开课范围广，授课时间长，具有强大的工具性，同时又兼具语言课程内在的人文性，因而在培养与强化学生传统文化意识方面，具备成为主力课程的可行性；同时，将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课堂也给大学英语教学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点；再者，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因此，高校应当重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利用交融渗透的手段将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内容，助力本学科的课程思政教育，将大学英语课堂打造成为增强学生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的重要阵地。

1　“大学英语”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指出：“通用英语课程的目的是……增加学生在社会、文化、科学等领域的知识储备，拓宽国际视野，提升综合文化素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2]19，并提出：“课程设置应该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2]23 随着新文科建设的启动，在英语教学改革进程中，兼顾英语语言的工具性及人文性，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与跨文化意识将成为“大学英语”新一轮教学改革的重点。新形势提出了“大外语”的新要求，如何发挥大学英语教育在全人教育中的突出功效，如何在我们师范院校帮助传统的理、工科类和文科类学生学好先进技术与专业，并激发他们的批判思维与家国情怀，如何引导他们认识西方文化和输出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如何提高他们的英语综合素养都将是大学英语课程认真思考与对待的重要内容。然而，从当前国内高校“大学英语”教学现状来看，教学过程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1　过度强调目的语

长期以来，大学英语老师过度强调目的语文化，忽视了母语文化在教学中的输入与融合，造成学生们在国际交流中的文化失语现象。[3] 纵观多年的外语教育教学，“文化教学”被默认为是对

收稿日期：2023-05-19
基金项目：淮北师范大学 2020 年校级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重点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大学英语课堂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策略研究”(编号：2020xjxyj040)和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 2022 年攻关项目“皖籍文人朱光潜翻译研究”(编号：2022CX13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高鸿雁(1981—)，女，安徽桐城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教育、英语语言文学。

目的语文化的拓展与普及，或者是强调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强调母语在目的语学习过程中的负迁移作用，在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时，致力于英语学习者能顺利获取和理解目的语承载的文化信息与文化内涵，减少国际交流中的失误。语文类课程在大学阶段并不普及，学生正处于学习能力较强的阶段，英语语言文化的高频率渗透可能会让学生潜移默化接纳并内化目的语的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对母语文化的认同，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与坚持。

1.2 教材内容大多偏单向输入

目前，大多数《大学英语》教材听、说、阅读内容选自英美主流媒体或刊物，以英美文化输入为主。教材出版部门在这两年也相应设计推出相关的思政类教学素材，但相对比较碎片化，缺乏对传统文化输入设计的系统性，不利于学生整体知识体系的构建，导致学生们到了大学阶段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强化出现一定断层。

1.3 教师传统文化素养和能力待提高

大学英语老师群体在传统文化及文学方面的素养有待进一步增强，在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元素的能力有待提高。这一点与前两点有密切关联，当前的英语教师群体正是在过度强调目的语文化、强调语言之工具性的外语学习环境中成长与培养起来的，处理文化问题的能力普遍不强。大部分老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比较扎实，但自身的人文素养还有待提高，本国传统文化知识也有待积累，这也正是长期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渗透所造成的短板。进入互联时代以来，大学英语教师群体在跨文化意识方面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但因为教学任务的设定与教学内容的选择紧密关联，也因为西方文化中心论长期的影响，大多数英语老师会根据偏目的语文化的情境，更多拓展目的语文化相关的内容或是对两种文化的相异点做更多阐释和比较，将母语文化在教学中的位置放在了他者的角度，学生也经常以审视的态度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强调母语在目的语学习过程中的负迁移作用。这种环境和理念下，以西方文化尤其是英美文化为主、中国传统文化输入为辅的教学模式慢慢形成，从一开始两种文化就没有被放在平等融合的位置上，长此以往会削弱学习者对母语文化的接受与认同，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与发展。针对这些问题，近年来大学英语教育界在时代潮流的引领下，陆续作出了相关的教学改革与修正，但对长久以来“大学英语”课堂中华文化缺失现状的缓解还是杯水车薪。

2 大学英语课堂中国传统文化渗透策略

新学科背景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围绕“识变、应变、求变，新使命、大格局，新文科、大外语”[4]，提出新时代高等外语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目标、要求、思路与举措，为新文科有机组成的大学外语教育指引了新的路径与方向。向明友就新文科背景下公共外语需要进行的从教育理念到教育内容和模式的相关改革进行了思考，认为人文外语教育在新学科建设中尤为重要。[5]新学科建设启动后，业界对英语教学中如何融入传统文化的探讨越来越热烈。针对大学英语课堂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课程思政的问题，研究者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出了大量的分析与探索。其中：彭晓燕在论文“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中提出了“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缺失造成的文化逆差现象。[6]陈红以具体的“茶文化”为例讲解如何在英语教学中渗透文化意识，指出了融入本土文化对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积极作用。[7]李影、李丹阳分别就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及翻译教学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与路径。[8]由此可见，在新文科背景下，强调中国文化的地位，将其融入大学英语教育，既体现了传统文化意识的增强，也将推动具体教学方法与策略的改进。

2.1 加强师资建设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导者，提升课堂主导群体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力非常重要。当前的大学英语教师群体成长于单向强调目的语文化与语言工具性的外语学习环境，而自身对中国古典文化知识的理解掌握有所缺失，在学识上是否能够胜任母语文化的教育教学成为一个问题；另外，受长期思维定式的影响，语言工具论深入教学理念，英语教师们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语言的人文性，或者忽略了母语正迁移的作用。这些都会成为影响大学英语老师能多大程度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因素。不可否认，语言教师需要接受文化方面的培训。语言教师应了解目的语文化和本土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9]全球社会经济高度融合的背景下，时代对大学生英语实践应用能力的要求日益增长，英语教师群体所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大。作为英语知识的传递者和文化的传播者，英语教师群体对母语文化的理解与掌握，以及在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上的不同选择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们文化自觉的培养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2.2 调整“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

英语课程设置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至关重要，目前绝大部分高校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相对比较单一，只有基础类的读写和听说课程，增加拓展视野类的课程和强化 ESP（专门用途英语）

课程非常必要。《大学英语》教材建设要“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坚守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39。《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指南（2020版）》发布以来，结合新文科背景及国家对于课程思政建设的推进，教材内容正在被及时调整和试用。在新教材全面普及之前，笔者在课堂上有意识地融入本土传统文化的内容，完成教材内容的同时补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素材。以《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3》Unit3为例，原教材选取了奥黛丽·赫本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生平故事来体现西方社会中的进取精神与人道主义精神，笔者选取整理了梅兰芳先生生平故事的英文素材作为阅读补充，来表现中国人的民族气节与艺术追求。学生们真实地接触到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化，并在两种文化的分析比较过程中加深对思维方式及语言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刺激文化意识，利用母语文化的正迁移作用提高对英语语言文化的学习效果。以此为鉴，大学英语教学在不同的学校和学生群体展开时，任课教师可以集体备课，因为教材的课程内容本身也是积极主流社会精神的传递，所以，英语老师可以依据本学校或所教授专业的学情特点，有效规划各单元学习话题并拓展本土传统文化相关内容，在增强学生运用英语在两种文化的讲述中自由切换的能力的同时促进本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

2.3　调整课程测评方式及测评内容

2013年以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增加了文化翻译的新题型，其考查内容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如：传统节日与风俗，中国的传统建筑元素等等；但就整个考试而言，涉及传统文化内容的比例相对较小。外语能力测评应坚持以考促学的原则，将跨文化传播能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考察纳入测评内容，更大程度上增强师生的传统文化意识，这意味着各种题型都可以融入传统文化的因素而不拘泥于翻译练习；同时，教师可以兼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两种评价手段，促使传统文化与英语学习相融合成为教学日常。如此，师生在日常教学与学习中会自觉注重对本土文化词汇与语料的拓展与积累，以此促进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发挥其能动性和积极性，自主提高分析问题、查找资料等方面的能力，有利于学生们形成积极的批判性思维方式。

2.4　积极拓展开发第二课堂

改善单一的学习环境，开发第二课堂，开展多彩的实践活动，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是有益的补充。传统文化不仅要进入课堂，也要拓展到课堂之外，学校可以组织多样化的活动来创造文化气息，丰富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参与英语教学活动的热情。比如：举办人文素质讲座；利用师范类院校的文科优势资源，设置校内跨学科课程，联合拓展人文素质类选修课的范围和内容；利用中国传统节日等契机开展多样化的双语学生活动，浓厚校园传统文化氛围，提高学生们的人文修养。

3　结束语

在“大学英语”课程中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渗透，从国家战略需求层面是必须，从学生成长需要层面是必要。“外语能力已成为国家参与全球事务的战略资源”[10]，“大学英语”教学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将中国文化融入“大学英语”课程符合新时代全课程育人的要求，有利于落实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既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多样化的优秀文明与文化、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思辨能力、提高学生整体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更有助于培养和储备具有国际视角、善于用英语传播中华文化的优质人才，对建设文化强国及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将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高〔2018〕2号[S].北京：教育部，2018.

[2]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大学英语教学指南[M].2020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3] 从丛.中国文化失语症：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19(1).

[4] 吴岩.新使命 大格局 新文科 大外语[J].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19(2)：3-7+90.

[5] 向明友.新学科背景下大学外语教育改革刍议[J].中国外语，2020(1)：19-24.

[6] 彭晓燕.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11)：111-113.

[7] 陈红.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管理中的渗透：以茶文化渗透为例[J].福建茶叶，2020(7)：165-166.

[8] 李影，李丹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课中实现传承与发展的路径探讨[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35-38+48.

[9] Byram M. Cultural studie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M]. 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1989：8-24.

[10] 李宇明.提升国家外语能力任重而道远[N].人民日报，2017-02-06(07).

责任编辑：刘雪琪

《说文解字》在当今识字教学中的应用

梁　迪，王　伟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说文解字》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完备的字典，对于字形、字义、字音等方面的理论有着形象又科学的解释。在识字教学中，运用《说文解字》的相关理论对字进行详尽讲解，使学习者对汉字的了解更加深入，既能知其然又能知其所以然。结合学生认知发展的特点，探讨《说文解字》应用于当今识字教学的可行性，并对《说文解字》在识字教学中的具体教学应用进行分析，以期完善当今识字教学方式，提高识字效率。

关键词：《说文解字》；语文；识字教学
中图分类号：G40-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74-04

识字教学在当今语文教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识字教学的方式方法仍有待完善。《说文解字》作为我国第一部文字学专著，对汉字清晰且深刻解读的同时，又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说文解字》是识字教学的辅助工具，把在汉字解读方面的相关理论运用于当今识字教学之中，既能够弥补传统识字教学的缺陷，又能够激发学生的识字兴趣。

1　《说文解字》在当今识字教学中的价值

1.1　识字教学

识字教学，主要指在义务教育阶段，对小学一、二年级学生所进行的识字教育教学。研究表明，这个年龄阶段是学生智力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是他们智力发展的初步萌芽阶段，以直观形象思维为主。除此之外，他们刚刚步入校园，开始接触新的知识内容，但缺乏基础的知识储备，倘若没有正确的方法引导，对他们今后的学习将造成极大的阻碍。所谓识字教学，就是汉字教学。汉字既是人与人交流情感的重要方式，又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识字教学就是教导学生了解汉字形体、认识汉字结构，最终掌握汉字。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教学来说，识字教学是语文学习的基础。再结合学生的年龄、智力发展水平和认知特征，识字教学应以情境教学和直观教学为主。教学过程中，将一些比较枯燥、难理解的生字，以图画、故事等直观形象的方式展现出来，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积极性，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教师在教学生识字时，常常会把教学目标设定为要求学生会认、会写汉字，却忽略了教授学生如何去理解、辨析汉字。这样浅显的识字教学目标的设置，不仅造成了课堂教学的单调乏味，而且教学效果也大打折扣。倘若教师把《说文解字》中汉字的相关释义与现代教学相结合，让学生深入了解汉字的文化内涵，识字效率将大大提高。

1.2　《说文解字》的当代教学价值

《说文解字》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也是一部汉字教学的著作。从我国识字教学的历史看，《说文解字》是“字形派”的代表。《说文解字》把近万个汉字组编成一个既丰富无比，又井然有序的字表，并且创造性地以六书理论作为纲领，字形派也由此逐渐成熟。正因如此，《说文解字》作为汉字学的鼻祖，在识字教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也显现了《说文解字》编撰的价值所在。

首先，《说文解字》对字的形体结构有着明确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既说明形体，又指出形体表示的含义，一般用于结构复杂的字体，多以会意字为主；二是只说明形体，不指明形体的意义，通常情况下用于简单明了的字体，常见于象

收稿日期：2023-04-21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推广普通话，助力乡村振兴”（编号：2022AH040069）和淮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基于《说文解字》的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研究”（编号：CX202301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梁迪（1994—），女，安徽淮北人，学科教学（语文）专业 2022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王伟（1977—），女，安徽宿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形、指事、形声三类。在当今识字教学中，对于字形的分析尤为重要。而《说文解字》作为文字学的鼻祖，更是当代识字教学的基础。同时，它是形书、字形派的代表，其立说的首要因素是字形，识字教学的本质因素也是字形。将其对字的形体、结构等方面的解释，运用到实际教学中，既能改善识字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也促进当今识字教学的方式方法的创新。正因如此，《说文解字》在分析字形方面的教学价值也就显而易见了。

其次，《说文解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对于学生来说，汉字是陌生的、复杂的。如果直接进行浅显的识字教学，学生对汉字的构成和意义是无法准确理解认知的。在识字教学的过程中，以《说文解字》作为辅助教学的手段，将其所涉及的汉字的释义方式与文化知识，以直观新颖的方式运用到学生的识字教学中，并在汉字讲授过程中，运用《说文解字》中的相关理论基础，对汉字偏旁部首、演变过程及文化现实意义进行详尽的分析与讲解，加深学生对汉字的理解。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也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了解了丰富的汉字文化。

汉字的结构、形体及其潜在的文化知识，都是当今识字教学中所涉及的教学内容。而《说文解字》蕴含着丰富的汉字文化知识，不仅对识字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更是识字教学的重要参考工具，意义重大。

2 《说文解字》应用于当今识字教学的可行性

《说文解字》所具备的教学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其应用于当今识字教学的可行性也是有力可证的。因为它不仅与学生的识字能力相适应，更与他们的思维发展相契合。

2.1 与学生的识字能力相适应

《义务课程教育语文标准(2022年版)》在小学一、二年级学生识字与写字中提出以下要求："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写字的愿望。认识常用汉字1 600个左右，其中800个左右会写。学习独立识字。能借助汉语拼音认读汉字，学会用音序检字法和部首检字法查字典。"[1]从书写的角度来看，识字写字的要求符合学生的认知和心理特征。但是写字基本量不能少，基本习惯要养成，尤其是要求学生要学会独立识字。其中：部首检字法便是汉字教学中对于字形分析的重要体现，而《说文解字》作为学生学习汉字、拼音和字形的辅助教学工具，对学生学习汉字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从字形上来说，识字就是字形的辨认。由于学生的认知能力较低，缺乏对字形的辨认能力，加之汉字笔画多、字形相近、间架结构复杂，识字学习的过程将难上加难。而识字教学的本质因素就是字形，《说文解字》作为形书、字形派的代表，对于识字教学至关重要。将《说文解字》巧妙地运用于教学之中，学生深入了解了汉字的构字规律，对汉字的构字部件也就了然于胸。以"木"字为例，当学生认识掌握了这个字，就可以自主地认识与"木"有关的汉字，辨析其字形，理解其字义。由此及彼，再遇到晦涩难懂的生字时，也会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剖析。

从字量上来说，识字才能阅读和写作。识字量是反映学生语文能力的重要指标。对于现代汉语来说，掌握一个汉字就相当于掌握一个语素、一个词；当一个字就是一个语素时，学习一个汉字，就能够学习由它构成的很多词组。以"天"字为例，《说文解字》对其形体的解释为："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他前切。"[2]26了解掌握了字的形体结构，理解了字义，再学习由"天"构成的其他词语就显得十分轻松，构句更不在话下。字义是词义理解的基础，我们可以结合汉字本身的规律去了解掌握汉字的字义，并结合对字义的理解来选择字词进行阅读写作。学生自我识字能力还不够成熟，但是，《说文解字》中构形方法是丰富的，将其与识字教学相结合，就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2 与学生的思维发展相契合

思维能力是学习能力的核心。教师在进行识字教学的同时，也应注重学生的思维发展；学生在识字的过程中，会对汉字进行一系列的观察、比较、分析等思维活动。运用《说文解字》中释义与讲解汉字内容的方式进行教学，与学生的思维发展达成契合，以提高识字效率。

首先，在识字教学中可以锻炼学生的概括能力。例如：教学"日""月"两个汉字时，相对基础的方法是进行整体识记，不做字形辨析，仅仅对"日""月"的字形卡片进行反复识记，直到认识为止。另一种方法是对"日""月"两个汉字进行复原，让图像与文字相结合，让学生对字的初始由来产生好奇心，对识字产生浓烈的兴趣。两种方法都能使学生达到对字的识记目的，但是，后一种识字方法运用了"概括"的心理机制，学习者通过对图像和文字进行分析概括，使识字的过程更加有趣。

其次，在识字教学中可以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例如：教学与"水"相关的字——"江"，如何掌握认识，教师可以根据《说文解字》"据形系联"的规

律对其进行教学。“江”左边是“氵”，右边是“工”，本义专指长江。通过分析，认识到所有和“水”有关的字，都可以从“河流”“水域”等相关联的角度来对字的意义进行阐释。由此可见，把分析字形作为探析与其相关词的本义的方式运用到识字教学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分析的能力，也能够激发他们学习汉字的兴趣。

在识字教学中重视学生当前所具备的识字能力与思维的发展水平，充分挖掘汉字“据义构形”的特点，提高其识字能力。由此可见，《说文解字》应用于当今识字教学是可行的。

3　《说文解字》在当今识字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识字是一项相对枯燥的学习内容，运用《说文解字》中的构字释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来说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对教师的教学来说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人的认知发展阶段来看，利用《说文解字》不仅能够从本源上了解汉字，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使其在掌握知识、愉悦身心的同时，对汉字的构字原理有更直观的认知。从教师的教学角度看，可以丰富课堂教学形式、改进教学方法、调动学习积极性，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热情和实际的教学效果，更为有效地完成教学目标。《说文解字》能够做到古为今用，并在识字教学中发挥作用，取决于科学的教学方式和方法。

3.1　运用《说文解字》“六书”原理进行教学

《说文·叙》曰：“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2]556短短的一段六书理论，道尽了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汉字的真谛。《说文解字》的六书理论既是认知字形内部的理论工具，又是把握字形、理解字义、识字教学的通途。识字教学中恰当合理地运用“六书”原理，也将提高教学效率。

在进行象形字的识字教学中，教师可以把事物本体或它的图像替代物带进课堂，让学生去观察、去探索，通过展示实物、欣赏图画、讲述故事等直观的手段，来丰富学生感官认知，形成对汉字的清晰表象，感受汉字的鲜活、灵动。以“山”字为例，《说文解字》：“山，宣也。宣气，生万物。有石而高，象形。凡山之属皆从山。”[2]326教学开始，教师指导学生欣赏山的风景图片，让其在感官上对“山”有初步的认知。接下来，展示出一系列“山”的字体演变，再来观察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变化，同时：思考“山”这个字是怎么构造的。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山”最开始是三座峰峦相接的形状，慢慢地中峰高起、瘦化，发展成了“山”字。因此，也知道了“山”是指地面上由土石构成的隆起的部分。之后，让学生发散思维，寻找生活中带“山”的字，并思考这些字与“山”的关系。通过以上的教学过程，学生对“山”的认识也将更为深刻。

借助实物激起学习兴趣，再以古文字来连接物象、象形字和楷书之间的联系，这种教学方法能够增强学生的识字兴趣，使他们初步感知汉字特点、掌握汉字的音形义。将“六书”原理运用于识字教学之中，将汉字简单化、形象化，降低了识字难度，促进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在学习上也能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3.2　遵循汉字构字规律进行教学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教学实践中，教师要遵循学生的思维发展规律，引导学生去分析概括汉字间的联系，提高学生的文化传承和理解能力。因此，识字教学要遵循汉字构造的两大特点：理据性和系统性。

首先，识字教学要重视汉字构造的理据性。汉字构造的理据性是指利用汉字形义统一的原则，对字理进行讲解，最终使识字教学更加理性化。在识字教学过程中，对字进行理据性的分析，能够减少字的书写错误率。那么，如何增加汉字的理据性，最基础的方法便是进行溯源分析。如：“既”和“即”，小学生常常难以正确区分这两个字。倘若对其进行溯源分析，便会发现两个字都是会意字。将两个字的古字形展示给学生，观察两个字的构造及其所表示字义有何不同。“既”和“即”两个字，左边的古字和现代汉字的写法是相同的，都表示食器。既然如此，辨别两者的重点便落在字的右边。古字“既”的右边像一个人跪坐着，吃完东西，转身准备离开，本义则是“吃完，吃过”；古字“即”的右边像一个人跪坐着，准备开始吃东西，本义则是“走近去吃”。通过对两字的溯源分析，就能够正确理解字义，辨别汉字。所以，在识字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对会意字进行理据性的分析，深入了解汉字构造规律，提高对汉字的分析能力。

其次，识字教学要重视汉字构造的系统性。汉字的字形系统性是指根据某个构字部件种类

形成内部有关联的一系列组织，如：形旁规则，声旁规则等。教学过程中通过对新字进行分类归纳，总结出同一部首字的共同特征，以帮助学生掌握汉字的造字规律。例如：教学“扌”部的字，可以基于汉字构字的系统性，运用类比推理的方法，采取“加一加、换一换”等方式来设计教学，可以提高学生对汉字的有意义识记，学会类推汉字的识字方法。汉字的构形系统呈现有序的状态，教师在识字教学中自觉根据汉字自身的系统性教习汉字，通过类比推理、举一反三的方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汉字认知能力，对提升学生概括归纳的能力也大有裨益。

《说文解字》在当今识字教学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体现在运用古代优秀文化为现代教学服务的同时，也为语文识字教学提供了新的借鉴方法。对于当今语文识字教学而言，运用《说文解字》中的相关知识和理论进行教学，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随着教育教学的不断发展，教师在辅之以《说文解字》进行识字教学的同时，也要进行不断地反思和创新，以提升和改进《说文解字》在今后识字教学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7.
[2] 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2013.
[3] 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 崔增亮.汉字学与小学识字教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5] 王泉根，赵静.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6] 杨晶瑜.汉语言文字的审美特点及其在教学中的作用[J].语文建设，2015(33)：35-36.
[7] 谢立红.《说文解字》对小学语文教学的作用[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7(17)：26.

责任编辑：张　颖

(上接第40页)

成员不再仅仅是高职院校的老师，还需吸纳行业中的专家，企业中的技术骨干、技术能手，形成合力，将行企一线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规范”带入教材中，提高学生职业适应性。这样开发出来的新形态教材既能满足高职院校学生需求，又能适应社会培训需要；不但强化和巩固了产教融合的成果，而且扩大了高职院校的社会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张玉明.智能会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76.
[2]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的通知：教材〔2019〕3号[EB/OL].(2019-12-19)[2023-01-05].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moe_714/202001/t20200107_414578.html.
[3]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号[A/OL].(2019-01-24)[2023-01-05].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904/t20190404_376701.html.
[4] 丁喜纲.职业教育新形态教材的比较与建设探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2)：67-71.
[5] 崔发周.工作手册式教材的基本特征与改革策略[J].教育与职业，2020(18)：97-103.

责任编辑：张彩云

·文学文化·

“揭丑”与“构美”

——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叙述倾向差异之原因

李雯静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系，安徽 宿州　234000）

摘要：现代乡土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不同作者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语体风格、所采取的写作视角与立场等不同，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大体上呈现出两种叙述倾向：以鲁迅为代表的“揭丑”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构美”。究其原因表现为：社会现实与人生关系的不同立场，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下对过于西方化的不同反拨，农耕文化与中国古典哲学影响下的不同艺术呈现。这三个方面的差异形成了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叙述倾向差异之原因。

关键词：鲁迅；沈从文；乡土小说；“揭丑”；“构美”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78-05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作上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叙述倾向：一种是以鲁迅为代表，采取“为人生”的写作立场，通过对乡村苦难生活的真实描绘，对故乡落后、萧条、凝滞、麻木、冷漠的深刻批判，揭露传统乡村社会的封建道德、愚民政策、旧习俗、旧礼仪对于人性的扭曲和戕害，以挖掘出深藏在传统乡村中的“丑”与“病”来，尖刻而冷峭，即：鲁迅所说的“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这种叙述倾向可概括为“揭丑”；一种是以沈从文为代表，采取“为艺术”的写作立场，通过对故乡淳朴温情的传统人性美、人情美的无限追忆，对故乡风情宁静、恬淡、自然的诗意想象，借湘西这个封闭小世界的民俗民风、人际关系、自然景物等的描写来展现出健康的人的自然状态与生命的原初状貌，温情而诗意。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在读到沈从文的作品时曾赞叹说：“他热情地崇拜美。在他艺术的制作里，他表现一段具体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大多数人可以欣赏他的作品，因为它所涵有的理想，是人人可以接受，融化在各自的生命里的。”[2]这种叙述倾向可概括为“构美”。下面分别从三个方面阐述这两种叙述倾向产生的原因。

1　同一社会现实下的不同写作立场

1.1　革命与现代化转变

一个作家，不论写什么，他首先是现实中一个活生生的人。文学创作离不开作家对现实社会的态度。20 世纪初的中国开始进入现代阶段，相较于以前缓慢发展的历史，这一时期最为明显的特点即是各种革命、暴动等不断发生，且涉及面广、速度快、波及人数多，这是以前较少有的。反观那段历史，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即每一次革命无论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甚至抗日战争等都会涉及广大农民的利益和权利。所谓“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这句话十分简明地概括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因此，20 世纪一二十年代，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便敏感地认识到了解决广大下层民众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把唤起民众的觉醒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

另外，古老中国正经历着现代化的转变。在当时的中国，现代化意味着实现社会转型，即由封建社会形态转变为近代社会，这必将伴随着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全方位的变化。鲁迅与沈从文的创作分别从改造“国民性”角度和“人性”角度适应了当时社会这一要求。

1.2　韧性战斗与供奉人性

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接触了西方一些新的思想，经常思考：“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3]，并举起“人的文学”旗帜。在他看来，整个中国积贫积弱不只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更是人的问题。不只是人的生活环境、生

收稿日期：2023-04-19

作者简介：李雯静(1990—)，女，甘肃靖远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活方式，更在于人的思想、行为与灵魂。他出生于一个封建大家庭，深知要改变一些贵族子弟身上的陈旧积习是多么不容易，而扎根在他心里的民本思想又使他将笔触伸向了广大受压迫的人民群众，伸向生活在病态社会里病态的人们，提出了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并以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为旨归。他在深入刻画人的灵魂的同时，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封建社会制度。因此，他的作品又显示出一种反抗、斗争、革命的色彩。面对浑浑噩噩的大众，他以一个战士的姿态进行反抗、揭露，也因此咀嚼了更多的孤独、寂寞，甚至绝望。他颓废过、放弃过，但对生命自由、人人生而平等的追求精神，使他明知不可能，又要与之抗争下去，这是一种“韧性的战斗”精神，但他从不妥协。对于故乡也一样，他敢于撕破假面具、揭开卫道者们虚伪的面纱、戳破表面直达内里，以揭示出压在广大贫苦人民身上的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体现出了真实、深入、细腻、大胆、冷峻的风格。正如现代著名作家毕飞宇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如果我们的手头正好有一本《呐喊》，我们沿着《狂人日记》《孔乙己》《药》《头发的故事》《风波》这个次序往下看，这就到了《故乡》了。读到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什么呢？我们首先会感觉到冷。不是动态的、北风呼啸的那种冷，是寂静的、天寒地冻的那种冷。”[4]

相较而言，沈从文就温和多了。他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但更多是从人性角度将批判矛头指向当时虚伪的文化和文明，目的在于重塑国民精神，他执意寻求的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5]5，且更多地显示出内心自我省视的色彩，呈现出与鲁迅不同的风格。从根本上来说，与鲁迅一样，沈从文所向往的也是五四时期“为人生”文学，并主动承续五四文学传统的写作意向。其小说《萧萧》《丈夫》《月下小景》《边城》《龙朱》等大都贯穿了寻求人性复归的思想主题，显示了五四新文学要求人性解放的人道主义传统，且更多的是从自我、从身边的人、从生命本身扩展到人性，体现出一种内向性和自省性，并尽量简化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隐去人类丑恶的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5]2他的小说名篇《边城》即是他“爱与美”的审美理想的艺术实践，也是他作品中人性之美的体现，作品以诗一样的笔调和散文化的手法，描绘了一幅恬淡温馨、清幽渺远的川湘交界的乡村风俗人情画卷。

总之，二人面对同一社会现实，但与人生关系的立场不同：鲁迅乡土小说叙述倾向主要是改造“国民性”，沈从文乡土小说叙述倾向主要是寻求人性复归。

2　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下对过于西方化倾向的不同反拨

2.1　启蒙思想下的两种“乡土经验”书写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现代文学即是启蒙主义思想下的产物，这主要体现为出现了“现代性视野中的乡土经验”的书写。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文本和理念中，其实是没有“乡土文学”的，只有游仙诗、山水诗、田园诗、闺阁诗。纵观中国的古典小说，可以看到除了世情小说和宋话本小说有时候会写到乡村，神魔小说、历史演义小说几乎与现实相距甚远，虽然也或多或少映射到乡村的生活与风情，但很少专门写到乡村。而以世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或戏剧作品，比如：《金瓶梅》《水浒传》《窦娥冤》《红楼梦》《杜丽娘怒沉百宝箱》等，它们的书写样态其实主要是市民日常生活经验与情感世界，乡村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进入他们的作品，乡村的所谓“破败”“荒芜”或者“落后”等问题也没有得到过真正的书写和思考，只是作为描述对象而存在，且带有作家的主观情感。诗歌也一样，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杨万里等诗人的诗中，村庄、自然风物都是非常诗意的、悠闲的，甚至是田园诗般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学里几乎没有乡土经验。到了20世纪，随着西方先进启蒙思想文化不断传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近代思想知识，获得了一种新的眼光，“城市”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载体，在五四时期大多数乡土作家的作品中，总是以一种他者的身份存在，亦或者是他们借以反观自己所生存的那片土地的一个有力媒介。

由于种种原因，鲁迅与沈从文先后离开家乡到大城市谋生，当他们再次回到故乡重新打量那片土地，就会发现，他们的乡土经验与秩序是有一定问题的，乡村“破败”“荒芜”“落后”“麻木”“冷漠”的一面其实一直存在着。这必然会造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种种来自情感与生活、精神与思想等方面复杂的矛盾与挣扎。一方面，他们不得不认可西方的价值和思想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先天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并无法摆脱这种传统文化观念，且当这种矛盾上升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时，以鲁迅、沈从文为代表的一些敏感的20世纪乡土小说家们，便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开始了对乡村及自身思想困惑与情感矛盾的写作。从

这个意义上，今天从整体上考量乡土文学的创作实绩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乡土小说在文本形态上呈现出向两翼发展的态势，即：在现代乡土小说创作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两种乡土小说的创作范式，体现着两种不同的叙述倾向，一种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重审美乌托邦的抒情性“构美”小说，一种是以鲁迅为代表的重客观叙事的社会批判性“揭丑”小说。

2.2 对过于西方化叙述的艺术反拨

“揭丑”与“构美”这两种不同的叙述倾向也是对“五四”小说过于西方化进行反拨的一种呼应。五四时期小说界革命获得了极大成功，但也存在着许多难以避免的问题。表现之一是虽然提出了尖锐性的问题，但却将问题的第一义放在了内容和题材上，显得不够成熟。表现之二是总体较为单调、轻浅、类型化，说教成分较重，出现了一些口号式的空洞作品，这主要表现在问题小说中，例如：冰心、叶绍钧等人的小说。表现之三是过于欧化，不仅在写作手法上直接借鉴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抒情方式，尤其在对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受卢梭《新爱洛伊丝》及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等影响，过多地将笔墨用于书写主人公穷困潦倒的生活与精神上的萎靡消极，字里行间充满着苦闷压抑。例如：郭沫若、郁达夫、王以仁等创造社作家的小说，它们在叙事上不像小说，语言上欧化痕迹明显，动辄以英文字母入文，并非本土化语言。针对以上不足，一些新文学作家便呼吁文学应“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所以，以鲁迅、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在2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崛起，以一种贴近大地的叙述姿态，反映了五四新文学走近现实生活和下层人民的写作追求，只是由于叙述视角与写作立场的不同而呈现为两种不同的叙述倾向。

3 传统农耕文化和中国古典哲学浸润下的不同文学表现

中国社会自古便是乡土社会，文化呈现出一种乡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集中体现之一便是中国文人作品中所散发出的浓郁的乡土情结。

“情结”是心理学家荣格常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主要是指以本能冲动为核心，并影响人的行为活动和情感变化，一部分或者全部被人的意识和日常理性遮蔽或压抑，而存在于人类脑海里的潜意识。它虽不能被主体清晰地认识到，但却一直存在与本能不同的是它们不完全是与生俱来的，受创伤经验、家庭经历、生活环境、文化传统、教育程度的影响，我们无法摆脱它，并在创作时体现出来。“有许多情结我们就不能抑制；我们不能把一种恶劣的心情变成一种愉快的心情，我们不能命令自己做梦或者不做梦。最理智的人有时也可能陷入某些想法中不能自拔，即便他运用最大的意志力量，也不能把这些想法从自己头脑中赶走。”[6]故乡情结即是其中的一个表现，体现为故乡总成为文人于逆境或不快时自觉不自觉中选择的心灵安居地，或者说这是千百年来存在于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精神归宿和价值依托。同样，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尽管故乡在鲁迅与沈从文笔下呈现出建构与解构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但背后却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在支配着他们写作的整个历程。也就是说，这种写作方式的出现并不只发生在鲁迅和沈从文身上，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很大一部分都散发着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并体现出两种典型的叙述倾向。因此，有必要对作家这种乡土情结写作的生成渊源进行概括与梳理。

3.1 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

古代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土地对先民们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为了求得生存，维持家族的延续，只能依赖土地，这种生产方式虽然效率低下，却极具稳定性。农业生产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农耕文化，拥有一块土地，便意味着一家人有了生存下去的可能，如果不发生战乱或灾难，便能世世代代耕种下去。同时，土地也是一种保障，即：生存权利的保障，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让出去，若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离开，远去他乡，每到一些特殊的节日，就会升起浓浓的乡愁，思念故土和亲人。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风尘仆仆远路回乡，选择叶落归根，回归故土。所有这些反映在中国的乡土小说中，便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强烈的家国意识、民族意识、家族意识；其二是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土地、乡村、田园、家的赞美与喜爱；其三则反映了农耕文化背景下人民的落后、愚昧、守旧，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意识。以沈从文和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以上三个方面，这一点与西方人靠海而生、靠海而存活所形成的海洋文明是截然不同的。

3.2 儒家思想文化的深层浸润

由于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扩大到整个社会，儒家思想的“家本位”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这种以血缘关系为核心，追求和谐稳定、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生活习惯，以及尊老爱幼，“亲亲”“敬长”、父慈子孝、家国情怀等被赋予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作为一种不可违逆的行为规

范维系着中国历代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发展。孔子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认为“孝”是修身的重点所在,《孝经》中也有“爱敬尽于事亲”的说法,所谓“内圣外王”“忠孝两全”便成了人生最高的实现目标。这种种思想伴随着农耕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深入人心。尤其在中国文人的身上极为明显,他们重视家族利益和血缘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较为稳定的亲友关系、夫妻关系、长幼关系、主客关系、邻里关系等,长期下去,这些特征便升华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品质并在创作中反映出来。这在鲁迅的《故乡》《祝福》《弟兄》等和与沈从文的《边城》《长河》《萧萧》等乡土小说系列中都有体现,由于二人的视角不同、风格不同、写作立场不同,读者所获得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不同。

3.3　道家回归哲学与传统还乡思归主题的延伸

道家主张“清净无为”“返璞归真”,“道法自然”即是道家的第一原则,体现出一种和谐的生态伦理精神。顺应自然,要以自然的态度来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对待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现代乡土文学的创作显然体现出一种回归理想,尤其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湘西世界”的建构,以及“神在生命中”的文化体验便是典型实证。

另外,从主题传统来讲,怀乡思归、田园渔樵、感时悯农、悲秋怀春等主题无疑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直接的思想源头。其中:还乡思归主题可以说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母体,由于社会文化背景、语言等的差异,层次与文本体现则千差万别。大体来说,中国的还乡思归主题表达了一种更为切身的生命与生活体验,更情感化、人间化、个人化,这一传统表现在现代乡土小说创作中时即是作家们在表达还乡主题时能更多地走近故乡的自然风物和生活场景,并感同身受于他们的喜怒哀乐。这一点,无论是鲁迅还是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创作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古典文学里的忧患传统和悯农主题也对现代乡土文学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与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相比,传统的士大夫文人则较少将目光移向农民及其生活本身。其原因也许就在于文人所处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面对乡土人生更私人化的考虑。而以鲁迅、沈从文为代表的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作家从这种影响中汲取营养,走进民间,感知民间,融汇于民间,写出了大量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作品。

3.4　民间文化传统的艺术呈现

民间是一个极有意义的文化命题。一些小说里的人物、短谣及短小的故事、谚语、歇后语及当地方言等都受到民间艺术传统的影响。乡土文学的主要特征是地域色彩与风土民情,而民间就是富含这种艺术养料之所在。

鲁迅对鲁镇一些风俗习惯及人情世态的描写,沈从文对湘西各节日的叙述即明显受到民间传统艺术影响。从小生长在绍兴的鲁迅,其乡土系列小说中多处体现了一些极具特色的民间习俗,这在其《故乡》《社戏》《祝福》《离婚》《阿Q正传》等文中均有明显体现。不仅如此,小说还使用了许多当地方言、官员的官话、行业人的行话、贩夫走卒与底层劳动大众的方言俗语等,甚至连同小说人物的用词与语调也恰到好处,符合特定时代特殊人物的身份与处境,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使本地的看客们能够彻底的了解”[7]。

而土生土长的湘西人沈从文,其祖父是汉族人,祖母刘氏是苗族人,母亲则是土家族。复杂的家庭背景,独特的地域风貌,淳朴的乡土民情,温润和宁的个人气质,使他执着地热爱着那片土地。尽管他也曾发誓要离开,但多年的都市生活反而给了他以“乡下人”的视角去回望那片土地,如:《丈夫》《凤子》《边城》《虎雏》《石子船》等许多小说,当然也写到了许多民俗,如:《边城》《媚金·豹子·与那羊》写当地青年男女恋爱时唱山歌表心迹;《神巫之爱》具体刻画了当地人的鬼神迷信风俗;《萧萧》里的女主人公萧萧在生下一个大胖小子后家里人布置了隆重的出生习俗……但沈从文在写人物故事与情节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对当地的环境与人情做抒情的描写,他认为:“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是罪恶,总不能令人愉快。”[8]因此,沈从文的小说总是呈现出一种淡淡的伤感与浪漫。

4　结束语

鲁迅、沈从文二人的乡土小说创作,如果说鲁迅是在揭露,在“揭丑”,于尖锐深刻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沈从文则在回望,在“构美”,于淡淡的伤感与浪漫中企图构筑一个带有原乡神话色彩的“希腊小庙”,他们的乡土叙事分别体现了现代乡土小说创作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倾向,这两种叙述倾向的产生既与作者面对当时社会现实所采取的写作立场有关,也是对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过于西方化倾向的一种艺术反拨,同时也离不开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哲学的深层浸润,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今天的乡土小说写作。

(下转第99页)

论茅盾《当铺前》中的声景

王　梦
（青岛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听觉”敏锐的作家，《子夜》《蚀》等三部曲小说中都有着对声音的关注和描摹。在短篇小说《当铺前》中，汽笛声、哭声、惨呼声、机器运转声等声音共同构成了小说的声景，作者通过声景奠定小说的环境基调，推动故事情节，反映农村的社会现实，声景成为这篇小说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键词：茅盾；《当铺前》；声景
中图分类号：I207.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82-04

声音研究是当下文学研究备受关注的方向之一，声景是声音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指的是声音景观、声音风景或声音背景。“声景”这一概念最早由芬兰地理学家格拉诺提出。20 世纪 60 年代，加拿大作曲家夏弗开声景研究之先河，从声景中划分出主调音、信号音和标志音三个层次。傅修延的论文《论音景》[1]59 结合古今中外具体的文学作品对夏弗的声景概念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声景概念进入文学研究领域是对传统视觉文化空间一次有力的冲击，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张东旭和单月的《大地的声响：当代中国声景观研究状况及其走向》一文梳理了声景概念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该论文指出：“在 2002 年欧盟出台保护城市良好声环境的环境噪声法后，声景学的研究和实践真正引起国内外各界的极大重视，国际上各类声学期刊都开设了声景专题，也形成很多跨领域的研究组织。目前，声景学理论和实践在国外已经初步形成体系。”[2]96 近年来，国内的声景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研究者开始运用声景的概念解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如：路杨的《上海的声景：现代作家的都市听觉实践》[3]、陈茜的《沈从文〈边城〉中的“音景”探析》[4]、张业松的《鲁迅笔下的声景——以〈祝福〉为例》[5]，可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不乏声景的出现。

同张爱玲、沈从文的作品一样，茅盾小说中的声景亦较为典型。有研究者提出相比于听觉，茅盾更感兴趣的是视觉景观，如：王晓珏在《电影、收音机与市声：张爱玲与声音景观》这篇论文中从视觉与听觉的角度切入，分析茅盾《子夜》的第一段，认为“这段文字是跟随叙述者的眼睛的观看，凡视觉传达的景观都是无声的，所以，这段叙述读起来似乎是静音的，如同观看默片电影。城市景观当然不会是无声的，可是声音并没有出来，因为文字描写主要聚焦了视觉感官，其余则近乎无感。茅盾感兴趣的更是上海的视界和视觉环境，而非听觉景观”[6]。《子夜》中的视觉描写的确传达了作者的主观感受，但不应因此而忽略小说中听觉景观的重要意义，如小说中对上海声音景观的描摹：“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地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啵——啵——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都抖了。他觉得他的头颅仿佛是在颈脖子上旋转；他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锥形的，——混杂的一团，在那里跳，在那里转；他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轰！轧，轧，轧！啵，啵，啵！猛烈嘈杂的声浪会叫人心跳出腔子似的。”[7] 大都市带给保守封建的吴老太爷以强烈的震撼和冲击，茅盾通过声音的叙述表现这种强大的冲击力，这是视觉景观的描摹所无法替代的。王敦关注到了茅盾创作中的都市听觉书写，他认为：“不论是在茅盾《子夜》里或新感觉派笔下的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还是当下‘读图时代’的‘广场舞’现象，均充斥着作

收稿日期：2023-04-26
作者简介：王梦（1998—），女，山东青岛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2021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

为现代听觉主体的现代中国人所经历的复杂的现代听觉现象和张力。”[8]《子夜》中的听觉现象并非偶然提及，而是茅盾在写作时的有意书写，在《子夜》的写作提要中，茅盾就对“声音”有所强调：

①色彩与声浪应在此书中占重要位置，且与全书之心理过程相应合。

②在前部分，书中主人公之高扬的心情，用鲜明的色彩，人物衣饰，室中布置，都应如此。房屋为大洋房，高爽雄伟。

③在后半，书中主人公没落心情，用阴暗的色彩。衣饰，室中布置，亦都如此。房屋是幽暗的。

④前半之背景在大都市，热闹的兴奋的。后半是都市之阴暗面或山中避暑别庄。

⑤插入之音乐，也复如此。

⑥最后一章，在亢奋中仍有没落的心情，故资产阶级之两派于握手言和后，终觉心情无聊赖，乃相互交易其情人而纵淫（吴与赵在庐山相会）。[9]

可见，茅盾在创作时就将声音、音乐作为重要的叙事因素，认为听觉与视觉在小说中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他的众多作品都体现了这一创作个性，不仅局限在以都市为背景的小说，农村背景的小说中也有生动的听觉描写，《当铺前》即是其中之一。与鲁迅善于“写人生”不同，茅盾更多的是将笔触对准社会现实。短篇小说《当铺前》最初发表于1933年7月《现代》第三卷第三期，是一篇反映社会底层百姓贫苦生活的作品。小说以嘉杭湖地区为背景，30年代初期日本侵华，嘉杭湖平原遭遇水灾，国民党政府向农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使得当地农民的生活“雪上加霜”，不得不靠典当度日。[10]在这篇小说中茅盾正是通过对不同声音的描摹来营造荒芜，破败的农村环境，展现以王阿大为代表的广大农民悲惨的生活现实，从而展开整个小说的叙述。《当铺前》中的声音是多元的：有小火轮和柴油轮船呜呜的汽笛声，机器碾米厂啵啵啵的叫声，王阿大的哭声、肚子咕咕的叫声，王阿大孩子的哭声，王阿大老婆的催促声，当铺门前的叫嚷声，年轻孕妇的惨呼声等声音。《当铺前》中的声景具有重要的叙事作用，声景在奠定小说的环境基调、推动故事情节、反映农村现实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声景已经由次要位置的叙事陪衬反转为不容忽视的故事角色。”[1]62

1　声景奠定环境基调

根据夏弗的声景理论，汽笛声是这部小说的主调音。作者在开头写到：“东方刚刚发白，那呜呜的小火轮的汽笛声就从村外的小河里送到村里来了。小火轮在这河里行驶总也有五六年了；河道是很狭的，小火轮经过时卷起了两股巨浪，豁剌剌地冲击着那些沿河的‘田横埂’，叫乡下人叫苦。像前年发大水的时候啊，这小火轮恶狠狠地开着快车走过，就像河里起了蛟，轰轰轰地，三五尺高的水头打过那些田横埂，只灌进稻田里去了。”[11]274小火轮的汽笛声长期萦绕在村子里，奠定了小说的音响基调，象征着帝国主义势力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交代了故事发生的现实背景，同时，也打破了乡村的寂静状态。汽笛声从空间上占有了这个村庄，“罗兰·巴特进一步告诉人们，对空间的听觉占有从古到今一直存在，即便是拥有自己独立住宅的现代人，其居住范围内也应回荡着‘熟悉的、被认可的声音’，这样才算实现了‘带声响的’的空间占有。巴特说现代人所处的听觉空间‘大体相当于动物的领地’，与‘动物的领地’相比较，人类的听觉空间其实更容易受到不‘熟悉的’或不‘被认可的声音’的侵扰。”[1]63汽笛声侵扰了村庄，干扰了村民的正常生活。为了消除这种噪声，村里的农民在闹轮船局，到镇上‘区公所’递禀帖都无果的情况下，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反抗，他们向小火轮投石子，结果遭到区公所的镇压。后来，贫困程度的加剧使得农民不得不把报晓鸡也卖掉，可恨的汽笛声在这时竟然代替了报晓鸡，为村民们所接受，汽笛声不仅成为“声音帝国主义”的一种具体呈现，而且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当地村民的生活已经穷困潦倒到几乎无以复加的程度。从奋起反抗到被动接受，汽笛声最终“格格地碾过那些沉睡的人们的灵魂”[11]275。小说通过声景而产生的“声音帝国主义”展现了在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与自然灾害等多重压迫下该地区农民的悲惨生活。作为主调音出现的汽笛声打破了乡村的平静，代表着村民生活在帝国主义统治的阴影之下，他们对汽笛声的反抗实际上是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的一种挣扎，而这种挣扎终究是徒劳的，当汽笛声代替报晓鸡被村民们所接受时，一种“声音帝国主义”已经产生，“汽笛声”深深折磨着村民，而村民却又无力反抗，这成为整部小说的叙事背景，预示了以王阿大一家为代表的广大农民的悲惨命运。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些显示空间转换的标志音。小说叙事依次在村庄、王阿大的家、镇市梢、当铺前展开，在王阿大由乡入城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城镇的标志音。例如：“啵！啵！啵！镇市梢那机器碾米厂的汽管骄傲地叫着。”[11]277机器碾米厂汽管发出的声音是镇市梢的标志音之一，工

业文明首先侵入的是市镇，机器运转的声音也成为市镇有别于乡村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也是现代化的一种趋向。又如：在当铺前，“赶早市的糕团铺伙计顶着热气蓬蓬的蒸笼，接连吆喝着‘糕呀，糕呀！’眨眨眼就跑过了。”[11]277糕团铺伙计的吆喝声代表着镇市梢的烟火气。

2　声景推动故事情节

王阿大孩子的哭声是信号音，孩子是每个家庭的重心和希望，王阿大夫妇不得不为孩子而想办法谋生计，不满半岁的孩子的啼哭声在小说中出现了多次，每次出现都推动了王阿大的行动。第一次出现是王阿大要去当铺当旧衣服之前，一件件旧衣服勾起了王阿大夫妇痛苦的回忆，这些旧衣服在当铺未必能换回一元钱，但对于王阿大来说却是所剩不多的“财产”了，夫妇俩正对着衣服陷入痛苦回忆之时，婴孩微弱的啼哭声打断了他们，让王阿大下定决心尽快出发去当铺。“Hon-ah Hon-ah！婴孩啼了，那声音像是哑嗓子的小猫。”[11]274饥饿的婴孩哭声很微弱，他的哭声触动了王阿大夫妇，将他们从痛苦的回忆中拉回现实，生活还要继续。营养不良的母亲难以使怀中的婴孩吃饱，冷风吹进屋内，“哇的一声，女人怀里的婴孩哭起来了”[11]276，这是小说中第二次出现婴孩的啼哭，进一步催促王阿大，他终于离开家向当铺走去。在路上歇息的王阿大因饥饿肚子咕咕地叫，在叫声中王阿大听到了儿子的哭声，王阿大只好忍住饥饿继续向前奔，儿子的哭声成为王阿大谋求生计的动力，“推动”王阿大奔向当铺。当自己的包袱被朝奉粗暴地拒绝之后，绝望的王阿大耳边又响起了孩子的哭声。小说对婴孩哭声的叙述两次是实写，两次是虚写，但同样对小说情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婴孩哭声的重复构成了王阿大一家悲惨生活的主调；另一方面，它是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身心俱疲的王阿大仍要想办法维持生计的动力。王阿大小儿子的哭声以实写和虚写两种方式出现在王阿大耳边，刺激这个饥肠辘辘的男人急步向前。婴孩发出的哭声，是一种由自身或外界刺激而产生的本能，但在这篇小说中主要是由于艰难的生活条件所致，是一种对苦难自然而然的宣泄。由黑暗的社会环境到嗷嗷待哺的婴孩，从社会到家庭，由外到内，为王阿大带陈旧不堪的衣服去当铺的情节提供了充分的合理性。

当铺前被人群踏倒的年轻孕妇发出的惨呼也是一种信号音，小说叙述了年轻孕妇“声音”的变化，这实际上也显示出其状态的变化。“十多里路吗？可是我呢，我是天还没有发亮的时候就来这里坐着守的！他们几位比我慢几步。我们守了好半天了！又饿又冷！牢门还不开！这忽儿，人又那么多了！”[11]279五个感叹号表达出年轻孕妇的焦灼心情，这时她还能够气呼呼地抱怨。后来，孕妇开始发出“嗳，喔唷，喔唷”[11]279的哼声，但无人察觉，当铺开门的一瞬间，人群蜂拥而至，女人被踏倒发出了刺耳的惨叫，却依旧无人理睬。孕妇本属于社会中需要保护和关怀的群体，但挤在当铺前的人却全然不顾。在极端贫困的生活面前，人性中的温暖也丧失了，只想早一点当出自己的东西解决最基本的吃饭穿衣问题，年轻孕妇的惨呼是身体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直接反应，也是黑暗生活的呐喊，将小说的悲剧性推向了一个高峰。当铺前的年轻孕妇由一开始气呼呼地抱怨到捧着肚子呻吟再到最后刺耳的惨叫声，身在悲剧之中的王阿大又耳闻耳睹了他人的悲剧，听觉上的冲击并不亚于视觉，通过年轻孕妇的声音变化反映的是现实和人性的双重冰冷，声景在这里实现了夏弗所说的从“底”凸显为“图”。

3　声景反映农村现实

《当铺前》中的各种声音构成了小说沉重的声景，与小说悲剧性的主题相契合。声景成为这篇小说内容的一部分，与传统依靠视觉效果表达不同，在某种程度上，环境、情节、小说主题都能通过声景实现，小说围绕着主调音、信号音塑造了以王阿大、年轻孕妇为代表的底层苦难农民的众生相，深刻地反映了帝国主义势力、国民党政府和自然灾害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

声景观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概念，“国际标准化组织给出的声景观的定义是个人或者群体在具体场景中所感知的声环境，这表明声景观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事件来理解的，它通过声音解释人们在特定的时代中与环境作用的方式。”[2]96《当铺前》的声景恰恰是对当时农村、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一种现实性反映。《当铺前》的声音环境是相对嘈杂的，声源也较广，这些声音展现出当时社会的人间百态。嘈杂的声环境之下，小说中的农民实际上处于的是“无声”的状态。汽笛声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噪声”，更是生活的“威胁”，小火轮冲坏了“田横埂”，直接威胁到农民的生产生活，而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农民却只能忍气吞声。

婴孩的哭声是小说的“信号音”，也是王阿大生活的“信号”，是他谋生的全部动力，比起自己，王阿

大更担心自己的家人，贫苦岁月里他只想为家庭换取一点食物却难以做到，他是“阴霾”笼罩下的社会中典型的悲剧性人物。他行动上的犹豫从来不是因为他想要逃避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而是因为他正经受着难以抑制的痛苦和抵抗不住的饥饿的双重折磨。他是当时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下的一个小人物，面对即将典当的“惨痛的生活史”，他深知“男儿有泪不轻弹”，因此，他只是“鼻孔里呼噜了两声，忍住了眼泪”[11]276，但当他“抖着手指，再拿起老婆撩给他的半新的棉袄来。棉袄上还留着老婆身上的热气和那特别的汗臭，王阿大猛觉得心里像刀割似的，抱住了那棉袄，就哭起来了”[11]276。悲惨的现实生活已经让王阿大一家人走投无路了，击溃了王阿大最后的心理防线，这些都为婴孩的哭声成为小说“信号音”作了铺垫。

小说中年轻孕妇的惨呼代表着另一类苦难人的遭遇，是对更为悲惨的社会现实的写照。在等待当铺开门的嘈杂声中，年轻孕妇的声音格外引人注意。作为本该被社会所保护的特殊群体中的一员，她却早早地来到当铺门口等着谋生计，然而，当铺开门的一瞬间伴随着的是她的惨叫。与此同时，人群都挤上前去，没有人关心她。年轻孕妇在小说中未见其人之时已闻其声，从她的语气中可见其勤快、直爽、坚忍的性格，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所发出的呻吟声和惨呼声是震撼人心的，她不仅没有当出自己的东西，甚至遭受了生理上的痛苦，因为，身体原因她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有着比其他人更为艰难的处境。从当铺开门前的熙攘声、开门后的乱嚷声、当铺朝奉的吆喝声中，长期生活在困窘之中的人性格中自私、麻木、市侩、粗暴的一面逐渐显露出来，这在当时的环境中产生了超越其本身的悲剧意义。但值得注意到的是，即使在那样饥寒交迫的情况下，王阿大人性中的善良和悲悯依然没有泯灭，在当铺前老太婆被鱼贩子撞倒时，他喊到：“撞到了老太婆了！大家不要挤啊！”[11]278并帮老太婆挡住了挤来的人群。人群之中唯有他注意到年轻孕妇的惨叫，并由此联想到自己孩子的出生，这在压抑的社会环境之下显得尤为可贵。

4　结束语

正如傅修延教授在《论音景》一文中所说：“声音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景，忽视音景无异于听觉上的自戕。将声学领域的音景概念引入叙事研究，不是要让耳朵压倒眼睛，而是为了纠正因过分突出眼睛而形成的视觉垄断，恢复试听感知的统一与平衡。”[1]60从声学角度研究茅盾的作品能够发掘新的研究空间。《当铺前》是茅盾声景叙事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这篇小说中丰富的、多层次的声景对于小说环境的营造、情节的展开，以及反映农村现实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多重声景共同展现了嘉杭湖农民在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和自然灾害等三重压迫下的贫苦遭遇，小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傅修延.论音景[J].外国文学研究，2015，37(5).

[2] 张东旭，单月.大地的声响：当代中国声景观研究状况及其走向[J].中国图书评论，2020(10)：96-100.

[3] 路杨.上海的声景：现代作家的都市听觉实践[J].文化研究，2018(1)：29-50.

[4] 陈茜.沈从文《边城》中的“音景”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20，40(6)：124-129.

[5] 张业松.鲁迅笔下的声景：以《祝福》为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1)：50-63.

[6] 王晓珏.电影、收音机与市声：张爱玲与声音景观[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6)：79-91.

[7] 茅盾.茅盾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7：7.

[8] 王敦.“声音”和“听觉”孰为重：听觉文化研究的话语建构[J].学术研究，2015(12)：151-158.

[9]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J].新文学史料，1981(4)：1-18.

[10] 锺桂松.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读茅盾《当铺前》[J].嘉兴师专学报，1982(1)：43-44.

[11] 茅盾.茅盾文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张彩云

仪式呈现、空间异化与生命意识的丰盈锐意：《原野》中的原始生命意识呈现

朱慎缜
（湖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笼罩浓厚神秘主义氛围的复仇悲剧《原野》以去城镇特征的乡村原野作为叙事空间，以强烈悲剧意识与原始生命意识贯穿全篇完成戏剧文本建构。《原野》文本以渗透日常生活的仪式与诅咒为表达方式，将异化自然空间与异化生活空间作为主要戏剧空间，在荒诞意识与现实空间中完成原始生命意识呈现。

关键词：曹禺；仪式呈现；原始生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86-04

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中对“人”的处境最为关注的作家之一，曹禺在长期笼罩于文明戏阴影下的戏剧体系下体察当代人生存困境与生存压力，完成带有独特性质的文本话剧书写。其中：《原野》以其独特的呈现方式与现代化戏剧化表达，在创作与二次创作的单向度之外完成戏剧内核新质素的发掘与戏剧空间呈现，历久弥新。

作家曹禺更多地将其创作张力体现于早期作品如《原野》中。原始生命意识指具有意识活动能力的人类对自我生命的存在感知，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人原始生命意义的关切与探寻，具体体现为原始生命体验与原始生命思考。前人对曹禺《原野》中原始精神的表述主要集中在文本价值立场与文本取向，认为原始意识是人类的怀念与困惑，或直接将这种原始精神看作浓重理想主义色彩下的极端个人化表达。而《原野》中的原始生命意识隐藏于剧中人物身体乃至精神、隐秘参与叙事的仪式文本与作为仪式文本载体的异化空间内。作为“粗犷力量与简单生活”[1]的原始生命力始终引导带有原始生命意识的金子与大星离开仪式与异化空间禁锢，在原野中寻找自己的理想国。本文旨在以仪式呈现与异化空间表达为切入点，探讨《原野》戏剧文本中的原始生命意识呈现与具体展现方式。

1　仪式文本呈现

作为叙事成分的仪式以夸耀形式在与戏剧内日常生活的勾连中建构起带有区隔性的风俗事象，而带有仪式意味的叙述则在此基础上完成仪式的象征意味建构，被当作仪式或对作为集体的人类行为的模仿而加以研究。在曹禺看来，封建思想文化与封建道德衍化成为家规族规与“诅咒”，形成其文本中所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而这一文本结构则形象直观地以文本传达方式与表达形式表现于《原野》文本之中。具体而言，渗透在曹禺剧作中的这些“仪式”，并非神秘的宗教仪式，它区别于文化展演仪式，与曹禺对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体现文化规约“仪式”的描写有关，即渗透于日常生活中又无不体现着传统文化规约的种种“礼仪”或是礼仪僭越后所体现的“诅咒”。

1.1　作为仪式的“诅咒”

作为人文现象与艺术手法的“诅咒”以礼仪僭越为主要表达方式，与礼仪仪式相较，“诅咒”仪式遮蔽于神圣性与外显性外壳下，带有强烈的文本吸引性质，并借此强烈的文本意愿框架完成戏剧文本的强烈生命意识呈现。不同于西方文学传统中充分伸张社会正义和审美正义主旨，《原野》戏剧文本中的“诅咒”呈现则更侧重于恶毒与彼此的憎恶呈现，其中：“焦母扎木人”片段这一文本引入的则是作为仪式符号的红色，焦母的“诅咒”与金子的当面揭破均为人性之恶的外在呈现，“诅咒”本身成为恶与人物不可调和矛盾的外显。以此为心理表现空间，将作为仪式的“诅咒”纳入戏剧文本，使作为叙事文学结构框架的仪式结构传递出隐藏于作品中的憎恶与敌对意识，在敌对仪式之外，抗争的原始生命意识油然而生。在还原时间和空间的同时，也

收稿日期：2023-04-20
作者简介：朱慎缜(1999—)，女，江苏徐州人，现当代文学专业 2021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与戏剧。

成为戏剧文本主人公意识回归原始生命状态的契机，“诅咒”仪式在此不再是单纯的艺术表达与猎奇形式，更是作为矛盾主体的戏剧主人公心灵状态的外显投射。

除此之外，作为仪式组成部分的“诅咒”用品是“诅咒”仪式的文本形态，与作为仪式的“诅咒”协同出现。在焦母看来，带有生辰八字的“诅咒”必然会在某种神秘仪式力量的帮助下应验。但事实上，作为仪式的“诅咒”并没有超验的神圣力量，只能在文本发展中获得一定程度的安慰作用，一旦遭遇更强大的生命意识或反抗力量呈现，“诅咒”本身将变为某种破败的荒芜与骗局。作为“诅咒”仪式来源的原野中的庙宇——本该为至纯至善之地的宗教场所同样作为憎恶仪式的一部分成为欺诈犯藏身的窝点，这一带有解构效果的空间揭示使戏剧文本的虚无与空白感复现于文本之中，而作为“诅咒”仪式空间载体的寺庙成为其作品中的又一处带有讽刺意味的“诅咒”仪式载体。

1.2　日常生活化的封建仪式呈现

戏剧文本背景中的民间宗族信仰体系并未完全瓦解崩塌，礼制教化仍旧是维系家庭的重要纽带，作为畸变仪式的“诅咒”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以尊卑礼仪形式呈现的仪式更加不易察觉，揭示数千年封建文化既造成了人格的孱弱又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必不可少的心理构成。就步步紧逼的焦母与金子对话段落而言，这一场景中以往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作为婆婆的焦母的跋扈，但其中对于金子的规训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它体现“中国日常仪式中的行为仪式”[2]，而处在仪式压迫下受凌辱的金子只有忍气吞声，并在向焦母告别后方可离开，这一向长辈告别的文化礼仪呈现完美契合传统文化文化规约，而金子、大星与焦母都生活在文化礼仪规约之下，因此，在这种仪式下生活的人们即使以旺盛生命力试图摆脱规训却仍旧在最后回到规训之中，进一步将戏剧冲突本身推向悲剧深渊。而正因为如此，金子与仇虎的原始生命意识觉醒与在仪式之外的出走才显出人性复归的文本特质，完成戏剧文本的原始生命回归意识呈现。

于曹禺而言，后现代主义荒诞意识中的戏剧文本呈现展现出文本主体对于周围世界主宰能力的严重失控，而失控之下的勉强支撑则依托仪式与仪式僭越后的畸变形式完成“诅咒”。作为叙事文本的情节框架与关键情节基点呈现，仪式结构传递出的则是隐藏于作品中的回归和超越意识的自由。作为个体的人生活在浓重的仪式意味下，在空间中寻求生命扩张与舒展，扩张舒展而不得的情况下则进一步建构起对原始生命意识的渴望与向往，这一表征也使文本中的原始生命意识与反抗意识更为凸显。

2　生存空间异化与原始生命意识

物理空间本身由不可调和的多重矛盾构成，而矛盾已然成为抽象空间异化与转变的重要契机。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并非简单由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构成，而是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建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止容器，而是以动态实践完成空间模式建构。[3]《原野》将戏剧主人公的重要生存空间的焦宅与作为自然空间的原野在社会压迫与空间权力中彻底异化，又在绝望中将原始生命意识寄寓象征文本与外在文本间，人性复归与救赎的呼唤寓然其中。

2.1　异化家宅空间

作为家宅空间呈现的焦宅本身是代表仇虎仇恨根源的屈辱历史与新旧之交社会文化的交错载体，空间内戏剧人物所辖的空间权力与戏剧人物能力相匹配，戏剧人物凭着历史沿革与权力继承或滋生在家宅空间内建构起自身独特的管理者地位或被管理者地位，继而形成一种隐秘的“权力机制”[4]。在《原野》的家宅空间中，这种“权力机制”被外化为在伦理禁锢下的畸形人物关系，成为原始生命力勃发的又一文本。

作为带有异化空间属性家居空间的焦宅并非富于和谐感的文本场所，而是被伦理异化的家宅场域。“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4]，在此基础上，焦宅内部划分出为不同的伦理区位，门房、东西二厢房、客房，宅内叙事主体仅在权力空间内享有活动方式。屋主的焦阎王作为不入场的主角以照片形式悬挂于幕墙之上自始至终俯视一切，本应与焦宅保持一定距离的焦母在文本中完全自由地穿梭于不同的院落内，小黑子作为金子非亲生的孩子始终被放在第一位置的摇篮之中，而外来者焦大星则被安置在厢房里。显然，“权力限制”在焦宅内以空间掌控方式呈现，形成强烈的排他性。这个表面相安无事的家居寓所空间使其中的戏剧角色几乎都感受到压抑与莫可名状的悲哀，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行动动机与行动目的却又无法付诸实践。焦母希望金子永远离开而大星黑子永远在她身旁而不得，大星希望金子热烈的爱而不得，金子渴求自由与富有生机的生活而不得，仇虎渴望向焦父猛烈复仇最终也不得，仇虎渴望圆满复仇而不伤害任何人已然成为泡

影。可以说,作为异化家宅空间的焦宅,自始至终以“吞噬”和“埋没”空间中一切“他者”的诉求与祈愿为存在方式,对于不可能的美好生活向往与祈盼和现实中落差的永恒差距相冲突,反抗因素自此而生。

2.2 被异化的自然空间

作为空间的“原野”是戏剧文本生发的主要地点之一,同样是戏剧文本中人物的心灵归属。曹禺本人对此同样有着清晰的文本认知,在他看来,森林“盘踞生命的恐怖与原始人想象的荒唐”[5]530,象征意味与表现意味的原野积蓄原始生命力于其间,恐惧与神秘的力量皆出于此。《原野》中肃杀阴冷的异化空间呈现出恐怖凄迷的环境意味,如果说幕首带有萧瑟意味的巨树、秋蝉、老屋、灯光的空间呈现带有凄迷肃杀之感,那么,第三幕表现主义式的幻象中所呈现的焦阎王、判官、牛首马面,以及大星所识死者的鬼魂意象与古庙鼓声和叫魂则将带有自然意味的旷野彻底变为异化空间的外显与生命意识的勃发,与幕首“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5]500相对比,《原野》的神秘主义色彩与空间异化意识尽显于此。

《原野》剧作的压抑和闭锁结构之所以发生裂解源于剧中原始型生命意象的存在,反抗因素的滋长,以及寻求“天边外”的理想境界的努力使得戏剧人物开始试图在异化空间内建构被颠倒、被整合、被切割、被异化的异托邦,完成心理表现空间拓展。在异化空间中艰难求生的金子与仇虎并非没有尝试反抗与自洽,但在异化空间的持续压迫与乌托邦的幻灭后仇虎还是走向了消亡与失去,而异化空间在其中“他者”的全部消亡后在环境中则以“原野”的空间呈现,伦理压迫与生命力禁锢在这里退还为背景,使《原野》成为带有寓言意味的隽永文本。

整体而言,曹禺将带有浓重乡村意味的复仇故事杂糅西方后现代主义戏剧表现手法,在潜藏的复仇精神下完成文本家宅空间与权力空间建构,空间内部的被压迫者离去而压迫永恒存在。在异化家宅与自然空间内的人物的原始生命意识无疑成为文本中的生命外显。

3 流寓中的原始生命意识旨归

作为人的恒常性状态的流寓是人类的重要存在方式之一,而这一理念具象化于曹禺作品之中便分为代表流寓中的作品如《原野》,与流寓中短暂停留于精神家园的作品如《北京人》《日出》,而这样的流徙主题则是对时代精神的流徙。处于20世纪初的我国正是处于此种流徙之中,旧事物已然逝去,而新秩序方兴未艾,处在两种社会秩序中的人只能在不断地流徙中寻找出路与方向,一如异化空间中人与流徙的剧中人。在这种意义上,原野已然超出了空间范畴,成为文本意义上主体人物再现的独特场域。

就原始生命意识表达而言,曹禺并非以复归蛮荒虚无为己任,而是将目光投向原始人性之中的蛮荒与富于野性的生命张力,意在张扬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在失去过往的缥缈中寻找自由并以此完成对现代社会的抛弃与对原始的复归,这种生命力与囿于困顿的堕落懦弱不同,出于原始生命再现意识呈现,曹禺对文本的原始风情进行粗犷的诗意化呈现,同时有意对蛮荒中的粗劣进行掩盖,转而将目光投向原始生命意识与文本张力。而这种张力呈现于《原野》中,则是在异化空间与仪式文本之外的原始生命意识呈现。

3.1 流寓中的全新的世界找寻

《原野》中以仪式再现与空间异化进一步的推进戏剧主人公的精神流寓与复归,而这一世界意在引导备受压抑的人们在闭锁世界之外寻求生命意识的复现与重见,从而在出走的流寓中寻找全新世界。“理想国的存在使剧中人发现了闭锁的世界的黑暗,使他们走向理想国来否定闭锁的世界。”[6]在纯粹理性失去的地方人们渴求并祈盼带有光明意味的理想国出现,同样期待旧世界的撕裂者。具有救赎希望与冲破封锁的仇虎即是这样的世界撕裂者与理想国建造者,而这种撕裂与建构同样具象于仇虎与金子的描写文本中,但这种理想国并非真实可感的具体形象,而是以诗意描绘与文本呈现为主的想象呈现与不可及之地的遥远回声。理想国的存在使剧中人发现了闭锁世界的黑暗与压抑,使他们走向理想国来否定闭锁的世界。他们所幻想的金子、铁路另一端的地方正是他们所身处的压抑恐怖世界对立面,这种世界正是《原野》之中的深层结构呈现。作为自然环境的原野不仅仅是人物的活动空间与身体归宿,同时,也是文本人物心理空间再现。在这个空间中,仇虎一面构筑自我情感空间,将虚妄的未来与“金子铺的地”[5]556作为未来的动机,一面又在现实重压下清醒地走向绝望与灭亡。“悲剧恐惧也只是走向激励和鼓舞这类积极情绪的一个步骤。如果它只是一味恐惧,那就会变成恐怖而使我们感到意志消沉。”[7]而对于失去家乡、流寓于精神原野的仇虎而言,死亡是他的精神归宿与身心归途。

由富于生命精神的“原野”意象所衍生出的抗

争与反抗精神决定戏剧文本呈现与行为模式再现。金子与仇虎二人代表原野的一体两面：一方面，作为原野狂暴一面象征的仇虎，与猿人相似的粗犷外形实体与颟顸的身体残疾、墨色衣物完成了阴鸷形象呈现，莫须有之罪与家中不幸所致的苦恨使其只有在无人的旷野才能找到身心归宿，而这种原始野性暴露于原野之中的结局便是不可避免的毁灭与消亡，来表现人在强大的文化规约面前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原野的大地代表性角色金子，一反部分作品中“处境艰难—试图超越—依托男性—失败乃至毁灭”[8]的女性形象，丰腴与自由的充盈之外则是对雷霆之力的地母式包容与文本张力。

3.2　原始生命的消亡与残存希望

原始生命意识本身寄寓于现实社会与人生的深广忧愤，企图以原始生命意识补救文明之中的弊病与人性复归期冀。除此之外，对于原始生命力量的毁灭性力量与其后的灾难性后果同样不容忽视。作为创作前期偏后作品的《原野》是“一个虚构、浪漫的想象”[9]，但这样的浪漫想象中同样不乏狠戾与恣睢色彩。仇虎设计使得焦母锤杀小黑子，又手刃大星夺走金子，复仇完成后的仇虎同样因此陷入恐慌与迷乱之中，原始生命意识使得仇虎拥有反抗的力量与勇气，但远处乌托邦的理想却并未指引其走向救赎之道，而仇虎便在这样的迷茫未来之中走向毁灭与消亡。与金子共奔在幽深的丛林中时，表现主义与抽象主义式的幻象使复仇完成的仇虎怀疑复仇这一动作的原本意义，最终在幻象与带有传统色彩的仪式中完成从怀疑主义到彻底绝望的转变，以自杀结束注定走向悲剧的命运。仇虎以自我了结的方式完成对于原始生命意识的回望与诠释，刻意刻画的原始人式的外貌与彻底走向原始生命力与自我意识尽头的仇虎在矛盾中完成原始生命力主题再现，只留下一点作为希望的金子。

综上所述，在《原野》中，无论是对宗教仪式的运用、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礼仪的还原，还是戏剧空间中的权力空间呈现，都完全服务于作家所致力呈现的主题：现代人无路可走的悲剧命运与最终走向消亡的最终结局。曹禺以自己鲜活的生命感受力体察着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不可言喻的憧憬”安置于戏剧人物之上，而作为空间的原野使故事生发的“始发空间”又变成了剧情的“终点”，无人挣脱这个空间的伦理规约。剧中人都见证过焦阎王的罪恶与悲剧，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试图离开这里，但这个早已异化的空间最终吞噬了所有人的温情与梦想而走向最终的毁灭。曹禺剧作中的这些仪式、权力空间与其中所呈现的原始生命意识在增强曹禺剧作的思想内蕴的同时，又在不动声色中提升了作品的艺术张力，使《原野》在20世纪戏剧史上卓然独步，成为迄今难以逾越的戏剧高峰。

参考文献：

[1] 刘绍铭.小说与戏剧[M].上海：洪范书店，1998：187-188.

[2] 董健.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曹禺的影响[J].戏剧艺术，1991(4)：96-101.

[3] 刘怀玉.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的现代性本质批判[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1)：39-43.

[4] 张厚军.当代社会空间伦理秩序的重建[J].伦理学研究，2018(1)：111-116.

[5] 曹禺.曹禺全集(第一卷)[M].北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

[6] 王晓华.压抑与憧憬：曹禺戏剧的深层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77.

[7]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123.

[8] 何宇宏.女性言说与男性叙述的冲撞：对曹禺剧作的女性主义解读[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89-91.

[9] 王兴平.曹禺研究专集(上)[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299.

责任编辑：张彩云

《狂人日记》两个英译本的比较

许舒婷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鲁迅的《狂人日记》自发表以来多次被译成英文，其英译中林玉霖译文与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译文各有特色，他们因对翻译策略中直译与意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以及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原则的灵活运用而值得比较分析，在《狂人日记》的外译与传播史上也各有其价值。林译作为面向学生的英语学习工具，更侧重实用性；莱尔的译文强调翻译的规范性，更具有文学性。二者的翻译实践共同推动了鲁迅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推动了中华文化更好地通过本土教学与域外传播走向世界。

关键词：《狂人日记》；翻译策略；林玉霖；威廉·莱尔
中图分类号：I2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90-05

鲁迅作品享誉海内外，跟众多译者的外译密不可分。相对来说，其英译文本的影响更大。这些英译文本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对外传播，而且为汉语外译提供了宝贵的翻译策略和实践指导。

《狂人日记》作为鲁迅的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很大，吸引了众多译者将之翻译为多种语言，受到广泛关注并广为播布。选取来自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译文，可以较好地了解鲁迅作品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英译作品的不同风格，对鲁迅作品的英译研究进行更好的综合比照。本文选取 1937 年由林玉霖所译的 *The Diary of A Lunatic*，[1] 与 1990 年出版的由威廉·莱尔所译的 *Diary of a Madman*，[2] 两者的翻译策略不同，各具风格和特点。本文拟从直译与意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以及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三个翻译策略入手，剖析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译过程中的问题与难点。整体来说，林玉霖与威廉·莱尔的译文，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既有相通之处又各有千秋。直译还是意译？更重视语义还是更重视交际？翻译中该作归化还是异化处理？这些对于《狂人日记》的英译来说，都是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1　直译与意译

翻译要能够“信、达、雅”，常常需要直译与意译的有机结合。直译强调既保持原文内容、又保持原文形式；[3]29 意译则相对自由，常常强调保持原文内容，形式上则可以做出灵活调整。[3]30 林玉霖与莱尔的《狂人日记》译文均未拘泥于其一，而是根据表意需要选用直译或意译，较好地传达了原作的思想与韵味。

例 1：狮子式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4]12

林玉霖译：The ferocity of a lion, the cowardliness of a hare, the craftiness of a fox…[1]785

莱尔译：Savage as a lion, timid as a rabbit, crafty as a fox…[2]35

很显然，林玉霖和莱尔都采用了直译。译文分别使用了与原文对应的“的”字式名词短语并列结构和省略式“as…as…”并列结构，通顺达意。值得注意的是，林玉霖将“凶”译作“ferocity”，侧重的是残忍性；而莱尔将“凶”译作“savage”，侧重“野蛮”和“阴谋”，与“文明”对立。由于原作作者批判的是封建礼教，所以，此处译作“ferocity”更加贴切。除此之外，对于“吃人”的翻译，林玉霖大多译作“man-eat”，与“人吃人的社会”[5] 表达相近，偏重口语的表达也与原文的日记体文本相贴合。而莱尔大多译作“cannibal”，即“食人民族”，体现了“野蛮性”，脱离了历史语境，违背了作者意图。由此，译者要了解原作中所反映的社会文化背景并充分考虑词汇的准确性。

例 2：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4]9

林玉霖译：(I see) their array of white teeth (man-eating instruments). [1]718

莱尔译：Their teeth are bared and waiting—

收稿日期：2023-04-26
作者简介：许舒婷(1999—)，女，山东日照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2022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white and razor sharp![2]32

“白厉厉”这样的描绘，似乎将“吃人者”毛骨悚然、整齐排列的白牙齿呈现在读者面前，具有很强的画面感。林玉霖直译为“white”稍显平淡，只是客观描述，缺少了原作中的情感色彩。而莱尔直译为“white and razor sharp”，不仅将“厉”字的“锋利”之意译出，且增译“bared and waiting”，增强了画面感，让读者感到更加直观、恐怖，因此，其文学性更强。除此之外，同样作为吴方言中的词汇，后文中出现的“滑溜溜”，[4]10林玉霖译为“slimy and slippery”[1]720，莱尔译为“smooth and slippery”[2]33。林玉霖和莱尔二人都采用了词义相近的两个词。一方面，起到强调作用；另一方面，押头韵包含了语言的音乐美和整齐美，具有强烈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例3：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4]15

林玉霖译：Last year when a criminal was executed in the city, there was still a tuberculous patient who licked the beheaded man's blood from steamed dumpling dipped into it.[1]112

莱尔译：And just last year when they executed a criminal in town, there was even someone with T. B. who dunked a steamed bread roll in his blood and then licked it off.[2]38

“痨病”是一个中医名词，是在中国古代就已经认识到的疾病，西医称为“肺结核”，即“tuberculosis”，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称谓。林玉霖此处使用的形容词“tuberculous”和莱尔的“T. B.”即“tuberculosis”属于意译，扫除了读者的阅读障碍。此外，馒头被译为“steamed dumpling”或“steamed bread”，由于西方人没有吃馒头的习惯，所以，翻译时尽量采用文化上交叉的词汇加以解释。

例4：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4]12

林玉霖译：Hence they have conspired against me on all sides with a view to forcing me into suicide.[1]810

莱尔译：And so, they've gotten everyone into cahoots with them and have set traps all over the place so that I'll do myself in.[2]35

林译中“conspire”有“密谋”之意，莱尔译“cahoots”有“共谋”之意。林玉霖和莱尔结合语境将“联系”译为“密谋、共谋”切合原作，有助于读者理解原文。“罗网”在原文中指的是“大哥”一伙人的阴谋。在我国有“天罗地网”之说，比喻严密的包围圈。林玉霖将“罗网”意译为“all sides with a view”，相对于直译来说更有助于读者直观地体会“狂人”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状态。莱尔意译为“set traps”，与“cahoots”相呼应，传神达意。

2 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

从翻译效果或者翻译目的来看，翻译策略还有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之别。侧重语义的译文比较客观，直接翻译原文的意思，屈从于源语文化，处理方式带有直译的特点；交际翻译则具有主观性，它要求源语屈从于译语文化，注重译文读者的反应，以避免给读者带来困惑，处理方法带有意译的性质。

例5：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4]9

林玉霖译：I still remember how, in teaching me essay writing, my brother would mark my writing with circles of appreciation if I criticize a good man a bit, no matter how good he actually was.[1]719

莱尔译：I can still remember how it was when Elder Brother was teaching me composition. No matter how good a man was, if I could find a few things wrong with him he would approvingly underline my words.[2]32

“打上几个圈”来源于成语“可圈可点”，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笔记方法。“可圈可点”指文章精彩，值得加以圈点，也引申为事物值得称赞。林玉霖译作“circles”，保留了源语文化，属于语义翻译；且增译“appreciation”弥补了读者文化缺失的空白，从而缓解阅读的生硬感。而莱尔译作“approvingly underline my words”，用副词“approvingly”来表达“赞同”之意，通俗易懂，便于读者理解，增强了翻译的可接受性，属于交际翻译。

例6：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4]10

林玉霖译：In fact I know that old fox is only an executioner in disguise![1]751

莱尔译：But don't think for one moment that I didn't know the old geezer was an executioner in disguise![2]33

此处，林玉霖和莱尔在翻译时都对原文进行了修改和润色。在原文中，作者使用了“岂不……”的文言固定句式，采用双重否定结构表示肯定。林玉霖站在读者角度考虑，改变句式结构，直接译作肯

定句，使原文更加简洁易懂。在对于“老头子”的翻译中，林玉霖译作“old fox”，更加侧重于口语表达，有“老奸巨猾”之意，译出了“老头子”的隐含之意，属于交际翻译。莱尔在翻译时保留了较多译语文化的规范翻译，采用与原文相同的双重否定结构来加强句子语气，属于语义翻译。将“老头子”译作“old geezer”，即“老家伙、怪老头”，是一种非正式表达，偏重口语，相对于直接翻译原文语义，读者能切实感受到作者对“老头子”的贬低之意，理解更加深刻，属于交际翻译。

例7：陈老五也气愤愤的直走进来。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对这伙人说……[4]16

林玉霖译：Chen Lao-wu rushed in with an indignant face, and wanted to cover up my mouth. But I was bent on giving them a piece of my mind:[1]140

莱尔译：Old Fifth Chen came in and made straight for me, looking mad as could be. But he wasn't going to shut me up! I was going to tell that bunch of cannibals off, and no two ways about it![2]40

不同于原句，林玉霖和莱尔在句子最后都补充了狂人想要对以大哥为代表的“吃人”的一伙人说的话。林玉霖增译了 “a piece of my mind”即“狂人”的想法，为美式口语，通俗易懂，符合句法规则。莱尔译作“bunch of cannibals off, and no two ways about it!”将话语对象译出，且增译“no two ways about it!”即“别无他法”，并使用连接词“and”，从而既传达出强烈的情感色彩，又使译作连贯流畅。二人此处的增译法属于交际策略的运用，将具有鲁迅风格特色的语言转化为符合译入语习惯的语言，为读者扫清阅读障碍。

3 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

在翻译中，语言的异化处理能使译文打破目的语的束缚，并保留原文语言中的异国情调；归化翻译则力求避免译文中异国情调的出现，保证译文的自然流畅，尽量减少给读者留下晦涩难懂之处。

例8：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4[8]

林玉霖译：He looked as if he feared me; as if he were designing my destruction. Seven or eight other fellows were whispering together stealthily about me.[1]624

莱尔译：Seemed as though he was afraid of me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looked as though he had it in for me. There were seven or eight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ir heads together whispering about me.[2]30

对于此处的“想害我”，林玉霖译作“design my destruction”，属于归化翻译。因为中文中的“害”的意思并非对应的就是“design my destruction”，林译向读者靠拢，虽然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但此处的翻译较为生硬，丢失了些许流畅与生动。莱尔采用归化翻译，译作“had it in for me”，保留了“对某人不利，想害某人”的意思，既保持了译语与源语在不同语境中的一致性，也兼顾了行文的流畅；对于“交头接耳的议论我”的处理，二人也是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林玉霖选择归化翻译，译作“whispering together stealthily about me”，取其内涵来翻译，达到意会言传的效果，从而减少了读者在语义理解上的障碍。莱尔采用了异化翻译，译作“had their heads together whispering about me”，保留了独特的文化特征，有助于读者对中国文化负载词的了解，增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例9：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4]9

林玉霖译：They——some of them had been sentenced to cangue by the magistrate, some of them had been slapped on the face by the gentry, some had been robbed of their wives by official underlings and attendants, some had their parents persecuted to death by the creditors.[1]655

莱尔译：Take all those people——some have worn the cangue on the district magistrate's order, some have had their faces slapped by the gentry, some have had their wives ravished by yamen clerks, some have had their dads and moms dunned to death by creditors.[2]31

此处，林玉霖和莱尔在句式结构及对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官职名的翻译方面都比较客观直接。在句式结构方面，林玉霖采用四个被动语态的并列句，使用过去完成时。莱尔也采用了四个并列结构，使用现在完成时，被动体现在定语“slapped”“ravished”和“dunned”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专有名词——官职名的翻译都带有直译的性质。对于“衙役”的处理，林玉霖采用归化翻译，译作“official underlings and attendants”。而莱尔则直接译为“yamen clerks”，还对“打枷”和“衙役”进行注释，关照外国读者对中国古代法制文化的认识，

这使原作中含有民族文化色彩的概念得以保留，从而彰显出原作的语言特色和表达方式，体现了翻译的规范性。总体来说，在选词上，莱尔的异化程度更高。

例10：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4]10

林玉霖译：To feel my pulse is just a pretence to know how fat I am,——and for this work, he might also have a slice of my flesh.[1]751

莱尔译：Taking my pulse was nothing but a ruse; he wanted to feel my flesh and decide if I was fat enough to butcher yet. He'd probably even get a share of the meat for his troubles.[2]33

对于“看脉”这个中医术语，无论是林译“to feel my pulse”，还是莱尔译“taking my pulse”，都保留了民族文化特色，有利于西方读者对中医的了解，属于异化翻译。另外，莱尔将“无非”译作“nothing but”，具有源语文化特色，属于异化翻译，相较于林译“just”这样的归化处理，具有更好的表达效果。且莱尔将文化负载词“功劳”译为“troubles”，相比林玉霖采用归化翻译，译作“work”这样的中性词，更能传达出原文的语言风格及情感特色。总体来说，莱尔译文中的异化程度更高。

4　翻译策略选择的读者原则

事实上，选择何种翻译方式或者翻译策略，与译者对理想读者的设定有关，而理想读者的设定又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从林玉霖与莱尔的翻译实践来看，他们都有着明确的翻译策略选择的读者原则。也就是说，在选择何种翻译策略以传达原作内容与形式时，“信、达、雅”的偏重某种程度上要由翻译给哪些读者阅读、要在读者那里达成怎样的阅读效果来确定。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翻译史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思想文化大繁荣的时代。其间，新旧观念相互碰撞，主张与世界接轨。中国开始拓展与世界的交流，开发了多种对外翻译，而且出现了诸多翻译机构、翻译协会。作为在民国激流中奋进的大师，鲁迅先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翻译等多个领域作出重大贡献，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其作品也被众多翻译家所译介。林玉霖英译《狂人日记》(*The Diary of A Lunatic*)，是从1937年5月15日至7月31日，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高级中华英文周报》(*Chung Hwa English Weekly*)第31－32卷第792期至803期的“小说英译”栏，以汉英对照方式，分10期连载的。《高级中华英文周报》前身为1919年4月5日创刊于上海的《中华英文周报》。《中华英文周报》为周刊，由中华英文周报社编辑，中华书局发行。该报主要面向普通读者，内容丰富，兼具信息性、趣味性与知识性。1922年和1928年政府相继颁布“壬戌学制”[6]148和“戊辰学制”[6]162，强调了高中和初中外国语教学。作为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中华英文周报》也作出了相应调整，1929年之后分为《初级中华英文周报》与《高级中华英文周报》，将对象读者转移到在校学习英语的学生群体。其中：高中英语部分主要由《高级中华英文周报》承担。《高级中华英文周报》紧扣学制中规定的高中英语课教育目标，开始关注英语语言能力培养。为此还设置了实用中美对话栏目，包括汉英翻译技巧的讲解等内容。文章阅读方面则多刊载经典文学作品，足资为中高级英文水平的读者提供良好示范。林玉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归国后曾在圣约翰大学、厦门大学、光华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任英文教授。翻译《狂人日记》给高中学生阅读，自然要兼顾充分尊重原作、示范英文翻译两个方面。林译《狂人日记》在《高级中华英文周报》上不间断连载了两个半月，足见其译文拥有稳定的读者群体、能够为刊载平台提供良好的售卖效果。

威廉·莱尔对鲁迅作品的译介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访华，中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彻底改变了两国之间的关系，为两国长期友好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加上改革开放的热潮，“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中国能够更好地与世界交流，从而丰富了我们的本土文化，因此这一阶段的翻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成就和繁荣。莱尔是美国的鲁迅研究专家，他翻译的小说集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鲁迅的〈狂人日记〉及其他小说》)于1990年出版。选择“《狂人日记》”直接呈现在该翻译小说集书名中，显示出莱尔对该篇作品的重视，同时，也彰显了莱尔对 *Diary of a Madman* 的翻译自信。众所周知，鲁迅文笔辛辣，意蕴丰富厚重，通常晦涩难懂。对于不了解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的西方读者来说，必须要有对中国文化、社会与历史背景的了解，否则很难从文本中解读作者的真实意图。莱尔在翻译鲁迅作品时在努力保留原作形式、充分彰显源语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大量注释，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在直译的基础上综合采用多种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读者和自己对于原文的理解相一致。美语版的翻译让

人读起来朗朗上口，莱尔用现代口语翻译鲁迅小说，语言通俗易懂，别有一番风味，获得了广泛的受众。这既体现了翻译的进步，又给其他作品的英译实践以启示。莱尔的翻译实践显然扩大了鲁迅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向世界的传播。

5 《狂人日记》的英译启示

通过对比林玉霖与莱尔翻译策略的运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人在选择翻译策略时均未拘于一格，但相对于林玉霖的译文，莱尔的译作在整体上文学性更强，异化程度更高，因此，更符合翻译规范。这也从侧面体现了翻译的进步及中国文学影响力的增强。就直译和意译来说，二人都能够灵活处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林玉霖在直译时难逃刻板之嫌，而莱尔在个别词语的选择上存在用词不当的现象；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中，二者的翻译都较为成功，口语化的处理不仅拉近了原文与读者的距离，而且增强了读者的可接受性。在句式结构的处理中，林玉霖采用交际翻译，改变句式，而莱尔采用了语义翻译，没有做很大的调整，尊重原作，这里莱尔的处理兼顾了读者与源语文化两方面；在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中，林玉霖侧重于归化翻译，强调译文的流畅性和读者的理解。而莱尔侧重于异化翻译，并结合以加注释的方式，既保留了文化特色，又促进了读者对原作的理解，是一种较好的处理方式。通过了解两篇译文中翻译策略选择的读者原则，我们可以认识到，翻译目的、译者身份、历史文化背景等都会影响到作品的翻译。林玉霖的翻译作为一种英语学习工具，面向学生外语学习，更具有实用性；莱尔主要面向外国读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更加符合翻译规范，侧重于文学性。总体来说，二者各有所长，也都非常成功，他们打破了翻译策略中直译与意译、归化和异化、语义和交际的二元对立。林玉霖译文的连续刊载，莱尔翻译的广受好评，都呈现出重视读者接受、灵活选择翻译策略的翻译智慧。

在近现代中国，学者们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不可避免地将批评转向国民性和封建文化。后来的读者或者译者，由于语境缺失以及语言或者文化上的差异，常常在读解这一时期的启蒙文学作品时遇到困难。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此类作品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原作的社会文化背景，灵活运用多种翻译策略，辅之以多种翻译方法，以达到翻译的最好效果。作为中国本土译者，林玉霖虽出生、成长在原作诞生的社会语境中，但他的学习经历使西方文化成为林玉霖的主要文化视域，其翻译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就愈发要求译者要有较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灵活选择翻译策略能够使读者接受具有异国情调的中国文学作品，从而使优秀作品进入异域翻译领域。二人的翻译实践启发我们，翻译倚重译者的文化功力，同时，也被受众和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影响。本土教学及域外传播作为文化交流重要场域，呼唤大批优秀译者的进入。新时代，我们有必要从译者与读者两方面，培育文化交流土壤，并以此作为发展文化软实力的着力点。

参考文献：

[1] 鲁迅，林玉霖. 狂人日记(*The Diary of A Lunatic*)[J]. 高级中华英文周报，1937.

[2] Lu Xun.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Trans. By William A Lyell)[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

[3] 陈达. 英汉互译理论与实践[M]. 成都：巴蜀书社，2003.

[4] 鲁迅. 呐喊[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

[5] 米亚宁. 误读理论视角下《狂人日记》六个英译版本翻译评析[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29(1)：99-103.

[6]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 中国英语教学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刘雪琪

论文学审美意识的三种形态

赵学存
（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61）

摘要：文学审美意识是主张文学审美特性的观念，它既包含以“审美”建构文学定义的“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也包含以“审美”的某些要素来强调文学性质的观点学说。新时期以来，文学审美意识以三种形态存在，即人学形态、语言形式形态、“审美”形态。三种形态各具内涵，各应具体问题，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研究文学审美意识对促进新时代文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文学审美意识；人学形态；语言形式形态；“审美”形态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095-05

肯定文学的审美属性的相关论述、观点很多，若将它们都归为“文学审美论”，会导致这一理论概念的内涵宽泛模糊。因为“文学审美论”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其内涵不仅包括主张文学的性质、功能、价值是审美，而且还应包括用“审美”去建构或解释“文学”的基本内涵。不过，我们可以用“文学审美意识”一词来涵盖它们。

1　人学形态

文学审美意识的人学形态是指那些认为人是文学的中心、主体或本体，强调文学的情感、体验、自由、超越等特性的文学审美意识的类型。新时期以来，文学审美意识的人学形态集中体现在“文学是人学”研究、文学主体论、文艺审美超越论、人类本体论文艺学、文艺心理学中。这些研究不再沿用工具论的方法，而是运用人学的方法来探讨文学，这导致文学性质观念的变化：由主张工具性变为主张审美性。这一变化表现为人学形态的审美意识的涌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审美创造意识

文学审美意识认为文学创作是人的一种审美创造活动。人是文学的中心、主体、本体，文学之人是审美的人，不同于从事生产劳动、科学研究或其他精神实践的人，他是感性和理性、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有血有肉的整体，其整个像海洋一样丰富的精神世界瞬息万变。这里的人首先是指文学的创作者，其“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1]。

创作者按自己的意志、能力创造支配着外界，按自己的方式去作用对象客体，去思考，去认识。世界是因人的活动才产生、存在的，人要以产生或创造世界的方式而生存，世界与人生存同一。艺术活动就是人生存中的一种创造，一种生存方式，它是人创造的新世界，是生命的神秘性的象征。艺术的语言、文本都只是文学艺术活动的物态化、符号化，艺术作品只是艺术存在的中介，艺术存在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奇迹般的创造，艺术家“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创造作品。人正是在这种创造中才实现自己的本质，“我们相信人类有一种永恒的纳音西斯（水仙花）的自恋情节。他在不断创造自己的美时，不断欣赏自己的美。艺术便是水仙花。”[2]

1.2　情感体验意识

这种文学审美意识认为文学艺术活动是一种情感体验活动，艺术家通过艺术沉思，将癫狂体验升华为艺术审美情感，再用符号将这种情感体验表现出来，就形成文艺作品。

包括艺术活动在内的审美活动，是一种以情感为核心的生命体验活动。它是对经验带有感情色彩的回味、反刍，常让人达到心醉神迷、物我两忘的境界。“艺术的世界就是人类情感的世界、体验的世界，艺术作品是‘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苏珊·朗格语）。”[3]情感体验的符号表现即为艺术品，作品写某物“是借某物来表现人自身，表现人的价值，表现人的情感，表现人的生命体验”[4]。

艺术家的情感体验有两种典型形态，即癫狂与

收稿日期：2023-05-15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 2018 年规划项目“文学审美意识的三种形态（1977－2017）”（编号：AHSKY2018D11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赵学存（1977—），男，安徽六安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学基本理论。

沉思。艺术癫狂是作家、艺术家情感达到一种极致状态的奇异的创作现象，它近乎柏拉图所说的诗人的迷狂；艺术沉思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在未进入艺术表现之前，将日常生活情感升华为艺术审美情感。包含艺术体验在内的审美体验由过去历次经验的层次、现在临景感受的层次、预构未来感受的层次有机统一而形成。[5]

1.3 审美超越意识

这种文学审美意识认为文艺活动具有审美超越性，能将人引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杨春时指出审美超越意识及艺术超越性的基本内涵，他依据马克思区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和“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的观点，认为审美与一般的理论认识或普通的情感相比，“更全面、更自由、更高级”[6]，是人类自我创造的一种社会心理，让人超越现实获得精神的解放与自由；超越性是文艺的本质、内部规律。

王元骧提出文艺具有将人的精神引向升华的超越性，他针对传统认识论文艺观的片面性和日趋“物化”的现实生活，认为与一般动物不同，人的生活既有经验的世界、物质的世界，又有更高的超验的世界、意义的世界。追求更高意义的伟大作品饱含着作者自觉的、丰富的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我们决不小看它对人的精神所产生的感召的力量。”[7]

新时期初，政治上实行拨乱反正，文艺上恢复探讨人性、人道主义、异化等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为“文学是人学”、文艺心理学、文学主体论、人类本体论文艺学等论争和理论建构，这些理论集中体现出文学的审美意识，它们针对文学工具论对文学主体性的压抑，强调文学的审美创造性、情感体验性、审美超越性，这对新时期文学的繁荣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 语言形式形态

文学审美意识的语言形式形态是指那些从艺术形式、语言、文本、结构、符号的角度，强调文学的审美本性的文学审美意识的类型。新时期以来，文学审美意识的语言形式形态集中体现在文学形式本体论、语言学文论、符号学文论的研究与传播中。文学审美意识的语言形式形态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审美意识。

2.1 形式本体意识

形式本体意识认为艺术即形式，形式即审美，也就是说艺术以形式为本体，具有审美特性。何新反对作品的内容压倒形式，主张应该颠倒二者关系，达到“形式高于内容”，并认为艺术“必须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愉快感受，即具有审美价值”[8]。这审美价值显然是由形式即艺术家对于美的表现能力和技巧实现的。

虞频频、林兴宅、李泽厚、李劼等学者舍弃传统的将“内容与形式”二分的横向思维模式，采用“由形式到意味”的纵向分层思维模式进行阐释，从而将内容化入形式，主张形式即内容。虞频频主张：“通过人的审美欣赏，能引起人一系列的心理活动……直到表情达意的深层，从而使人获得美感。”[9]林兴宅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包含由浅入深的审美层次。[10]李泽厚从审美经验角度将艺术品划分成为感知层、观念情欲层、意味层三个纵深层次。[11]李劼主张语言形式本身就意味着内容，文学审美也就是对语言形式的审美感受。[12]赵宪章等人认为形式是美和艺术总体观念的基本概念，[13]并把对形式概念的美学阐释作为形式美学的研究对象，将形式美学的方法践行于文学形式研究，其基本原则就是通过形式阐发意义。[14]

2.2 文学性意识

在研究、传播俄国形式主义中，人们承认其“文学性”主张所追求的文学独立、自律、自主的精神的合理性。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观念被认为是具体化了的“文学性”的内涵，它不仅说明了一部文学作品的特点，而且也反映了文学历史演变的特点。当然，对俄国形式主义以文学性封闭文学，将文学与现实生活、主体相割裂的做法应进行批判。这一传播过程体现了研究者们的文学审美意识。

在研究、传播英美新批评中，研究者重视文本语义的形成方式，如：张力、反讽等，从而体现其文学性意识。研究者认为退特提出张力理论具有特殊意义，即主张诗歌是感性、理性方面所有意义的统一体。张力能区别文学与科学性文体。科学语言需要且只需要外延，并不需要感性与理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张力也就成为文学区别于科学文体的特异性。赵毅衡认为新批评的反讽论首先是语言技巧研究，然后，又将反讽内涵发展到宏观的作品全局上，反讽的最基本形态是所言非所指，其中包括几个亚形态：克制陈述，用较轻松的语言暗示严重的实情；夸大陈述，用假情假意的夸张，暗指相反性质；正话反说。[15]可见，反讽研究从语义学的角度体现出文学语言的文学性。

结构主义研究者认为西方结构主义都强调对一个系统内部诸因素之间关系及规定这种关系的规律的研究，它们重视作品的系统性和规律性，也

重视事物被人类心智所赋予的意义。研究者肯定西方结构主义对文学作品结构规律的揭示，批评它常对作品本身的思想和艺术的忽视，体现了研究者的文学性意识。

2.3　“情感—形式”意识

有研究者借苏珊·朗格的艺术定义，认为艺术的“情感—形式”不可分离：“第一，强调艺术需要形式，但绝不是脱离情感的形式；第二，也强调艺术需要情感，但不是那种不符合形式规律的情感自我宣泄。”[16]有研究者细究文学符号传达情调的具体方式：直接呈现、同构革新、组接句式、意指错位。[17]也有研究者以文学语言符号的非特指性主张文学审美本性，认为“文学性艺术性的符号是非特指的、虚幻性的、自律的、形式化的；非文学性非艺术性的符号是特指的、实在性的、他律的、非形式化的”[18]。

这就是说，文学审美性的实现依赖文学符号的非特指性，即它不像工具性语言那样，一个符号对应现实中特定的一个事物或意义，而是意会地、含蓄地、多义地、形象地显现虚无缥缈、闪烁不定的情感世界。通过语言符号的非特指化、形式化，即把虚构、想象、距离化等纳入符号形式化的具体手段，通过这些手段，情感、社会、历史等因素的现实性变化成审美性了。经过非特指化的语言符号系统摆脱了实用工具性，因而具有了独立性和自律性，成了具有审美本性的文学作品。

可见，研究者围绕苏珊·朗格的“情感的语言符号形式”这个艺术定义，强调艺术“情感－形式”的对立统一关系、实现手段和非特指审美化，从而达到对文学的文学性的把握。

由于受到“政治标准第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论界，一旦有人研究文学形式，就被视为形式主义而受到打击，文学形式研究成为禁区之一。于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关于文学形式的观念：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表现内容服务。而文学的内容一般被理解为现实生活、政治或斗争，文学形式成为更好地反映这些内容的手段。这样的文学形式观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

这种观念显然是与文学工具论、认识论相一致的，它容易导致创作的概念化、图解化后果。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西方文论的译介，人们从文学的语言形式角度，开始了新的探索，形成形式本体论、语言学文论、符号学文论。这些研究一方面深化了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反拨了文学工具论。

3　“审美”形态

文学审美意识的“审美”形态是指以“审美”这一概念来解释文学本质特征，并进一步以“审美”概念来建构文学定义的文学审美意识的类型。新时期以来，文学审美意识的“审美”形态集中体现在“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研究、论争中，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以审美为文学的本质特征

其一，文学与科学不仅在形式上不同，在内容上也有区别，文学在内容上也是审美的。“文学的具体的对象、内容跟其他科学的具体的对象、内容有很大不同，文学所反映的生活是整体的、美的、个性化的生活。这就是文学的内容的基本特征。抓住了文学的内容的基本特征就抓住了文学的基本特征这一问题的关键。”[19]其二，确定审美是文学的本质属性，是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包括了巨大的认识因素，但构成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则不是认识而是审美。”[20]其三，以审美为文学下定义，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21]。其四，解释文学审美的复杂结构，童庆炳认为它是“格式塔质”，是“审美场”，它包含主体心理层、客体物质层、生活时空层、历史文化层。

3.2　以情感为文学审美的基础

其一，情感是文学审美的根本特征。研究者通过考察中西文论史对情感的论述，在肯定情感以认识为基础，以及理性对情感的积极作用的前提下，主张文学的情感特性，“文学艺术的特性当然也是多层次的，那么，它独具的最鲜明的特性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情感。”[22]其二，文学以审美情感反映现实生活。认为“文学艺术对现实的反映不是以认识的形式，而是以情感的形式，即通过作家、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感知和审美体验而作出的”[23]。因此，作为审美反映的文学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是智力的又是直觉的，是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其三，文学的审美体验以情感为中心。钱中文指出，审美体验中的人以情感为中心，其一切心理机制都被全面、充分地调动起来，达到高度的和谐。

3.3　审美反映具有主体性、表现性

钱中文从文学审美的心理现实角度，指出审美反映与表现是统一的，它具有具体性和主观性。其一，从审美主体来看，“他的潜在的动力，隐伏意识的种种形态，能动的主体在这里复杂多样，这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精灵。”[24]10其二，就审美创作来看，“审美反映是一种灌满生气，千殊万类的生命体的

艺术反映，它具有实在的容量，巨大的自由，它不仅曲折多变，而且可以使脱离现实的幻想反映，具有多样的具象形态。”[24]10 其三，就创作个性来看，审美反映是“创作主体所拥有的审美趣味、个人气质、观察才能、创作经验、艺术修养以及广泛的文化素养的混合物”[24]19。

3.4 以“审美”构建“审美意识形态”论

童庆炳、王元骧、钱中文于20世纪80年代构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与之前文学的意识形态观念有很大不同，特别强调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审美的特殊性。例如：钱中文认为文学以情感为中心，又是情感和思想认识的结合；是一种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真实性；有目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有阶级性，但又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全人类性；是“审美意识的形态”[25]。钱中文又以“审美意识”为逻辑起点来解释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的形成过程。[26]

“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针对之前的“形象反映”论、“社会意识形态”论，扭转了那种简单的、机械的、哲学式的反映论、认识论，以实践论为基础，在对主客体丰富、复杂的关系，以及文学丰富复杂的构成的探索中，赋予文学审美特性。“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以‘审美’为轴心构建了一套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审美话语体系，‘审美’已然取代了‘形象’，成了仅次于‘反映’与‘意识形态’的至关重要的关键词。”[27]

文学审美意识的“审美”形态一方面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强化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审美意识趋向；但同时它又担心完全走向审美论会削弱文学的社会功能，所以，又主张文学仍然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即审美的意识形态。这是在确定文学的审美本质以后，试图在审美与意识形态即社会功能之间进行平衡，以求更加合理地解释文学的审美性。

4 结束语

文学审美意识的人学形态、语言形式形态、“审美”形态，三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我们知道“审美”最基本的两个要素是主体的感性经验和客体的感性形式，文学审美意识的人学形态、语言形式形态的研究者分别从文学的主体角度和文学语言形式的角度主张文学性质，其中：有的研究者为文学下定义，但这些主张或定义缺乏系统性，而文学审美意识的“审美”形态，即“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则综合前两者要素，主张文学的“审美”性质，并从多角度、多层次建构文学的定义。前两种形态为“审美”形态的建构准备了条件，“审美”形态则统筹前两种形态的各种审美意识建构了“审美意识形态”论。

新时期以来，文学审美意识的建构反拨了机械僵化的文学观念，为文学创作和批评争取了自主性，为文学的审美独立性进行了辩护。自20世纪90年代始，也有学者提出文学审美意识存在一些问题，如：本质主义、唯美主义、封闭主义等。因此，文学审美意识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1] 夏伟.钱谷融：学术情怀[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87-88.

[2] 彭富春.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C]//陈飞，徐国利，刘晖，等.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5卷下).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694.

[3] 童庆炳.现代心理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73.

[4] 杜书瀛.论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J].文艺理论研究，1989(3)：14-24.

[5] 王一川.审美体验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85.

[6] 杨春时.论审美意识[J].求是学刊，1982(3)：59-63.

[7] 王元骧.论美与人的生存[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287.

[8] 何新.试论审美的艺术观：兼论艺术的人道主义及其他[J].学习与探索，1980(6)：99-107.

[9] 虞频频.论艺术形式美的价值[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5)：81-87.

[10] 林兴宅.文学作品的审美层次与文学欣赏的心理过程[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5(1)：28-32.

[11] 李泽厚.艺术杂谈[J].文艺理论研究，1986(3)：2-17.

[12] 李劼.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文学语言学初探[C]//新人文论丛书 个性·自我·创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350-370.

[13] 赵宪章，张辉，王雄.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3.

[14] 赵宪章.形式美学与文学形式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62-168.

[15] 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94.

[16] 陈超南.苏珊·朗格论艺术的本质[J].学术月刊，1983(6)：77-80.

[17] 夏中义.传达美学：情调与符号[J].名作欣赏，1987(2)：9-10.

[18] 赵宪章.符号的转换：新时期文学本体观描述[J].学术月刊，1992(1)：10-18.

[19] 童庆炳.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6):25-34.
[20] 童庆炳.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童庆炳文学专题论集[C].赵勇,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2.
[21] 童庆炳.文学概论(上)[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4:46.
[22] 王元骧.情感:文学艺术的基本特性[J].文学评论,1983(5):91-102+26.
[23] 王元骧.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J].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4):78-88+37.
[24] 钱中文.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J].文艺理论研究,1986(4).
[25] 钱中文.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J].文艺研究,1987(6):13-30.
[26] 钱中文.论文学形式的发生[J].文艺研究,1988(4):122-135.
[27] 张永清.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发展与深化[J].文学评论,2022(3):34-43.

责任编辑:王凌晨

(上接第81页)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
[2] 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52.
[3]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
[4] 毕飞宇.小说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124.
[5]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 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基本假设[M].冯川,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7:39.
[7]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0.
[8]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07.

责任编辑:张彩云

"Revealing Ugliness" and "Constructing Beauty"

——The Generation of Two Narrative Tendencies of Local Novels of Lu Xun and Shen Congwen

LI Wenjing

Abstract:Chinese modern local novel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Due to the author's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language style, writing perspective and standpoint, the modern Chinese local novels generally show two different narrative tendencies: "revealing ugliness" represented by Lu Xun and "constructing beauty" represented by Shen Congwen.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reality and life, the different reversal of excessive westerniz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nlightenment thought, and the different artistic present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arming culture and Chinese classical philosophy. The differences in these three aspects for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arrative tendency of Lu Xun and Shen Congwen's local novels follow.

Key words:Lu Xun; Shen Congwen; local novel; "revealing ugliness"; "constructing the beauty"

清代宫廷舞蹈的美学形态源起及特征

赵梓宁
（沈阳音乐学院 舞蹈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8）

摘要：清代宫廷舞蹈的美学形态既延续了历代宫廷礼乐制度的文化精神，又吸纳了满族民间舞蹈的文化精髓，形成了独具美学价值的宫廷舞蹈形态。这种舞蹈样式既包含着满族先民生存的渔猎农耕形态，又表现了庄重的战斗庆祝传统，赋予了清代宫廷舞蹈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写意美感。研究清代宫廷舞蹈的美学形态，旨在新时代的思想潮流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内涵进行深入挖掘，追溯其审美源头，梳理其稚拙朴质特征、虚实相生的艺术神韵、包容相济的“和”之美态特征，使其能够适应当代文化发展节奏，实现这一舞蹈形式在新时代的价值重生与美学嬗变。

关键词：清代；满族；宫廷舞蹈；美学嬗变
中图分类号：J7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100-04

清代宫廷舞蹈是中华传统礼乐制度与朴质民族文化完美结合的结果，其舞蹈形态既粗犷豪放、雄浑有力，又不失妩媚、端庄与优雅，展现了满族纯朴善良、热情奔放和勇敢豪爽的民族性格，体现了宫廷文化高雅庄重、含蓄内敛的文化特征，是我国少数民族代表性的宫廷舞蹈形态，具有重要的艺术研究价值。

1　清代宫廷舞蹈的美学形态源起

随着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我国封建宫廷礼乐制度得到了不断完善，并在历史朝代更迭中不断汲取“民间”舞蹈形态为“宫廷”所用，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意境美”与民间舞蹈中的“稚拙美”结合在一起，反映着“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不同社会形态的历史状貌及发展轨迹所映照的古代各种思想意识”[1]2。

1.1　清代宫廷舞蹈中“宫廷性”的美学形态源起

清代宫廷舞蹈的宫廷性继承了近至元、明两代，远至汉代、唐代、宋代的古代礼乐文化精神，同时，融合了多个少数民族的舞蹈文化，形成了包容、典雅又富有民族情怀的清代宫廷舞蹈形态。

中国宫廷舞蹈最大的美学形态特征便是“技巧性”和“人文性”的融合，其中：“技巧性”的臻熟早于“人文性”。宫廷舞蹈的雏形最早可追溯至夏朝，其舞蹈形态将“宴飨之乐”的娱乐形态融入宫廷舞蹈之中。至西周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相对标准化的礼乐措施，标志着中国宫廷舞蹈形态的确立。后来，再经汉代宫廷的“乐府机构设立”，魏晋南北朝的“西域乐舞舶引”，中国宫廷舞蹈完成了自身技巧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宫廷舞蹈基本的舞蹈文化形态。到了唐朝，“文以载道”的美学思想，不仅赋予了唐代宫廷舞蹈“神韵”“意境”“含蓄”“奔放”的形态特征，而且又增添了“觉醒”“智慧”“禅思”等哲学价值，将中国宫廷舞蹈推向历史至高点。宋代文人对传统文化“守民族”“深思考”“精表达”“美意境”的高度认知，促成了宋代宫廷舞蹈情节性、程式性及“诗舞乐一体”的文化形态，将中国宫廷舞蹈的意境美和诗意美推至新的高峰。随后而来的元代则是部分继承了宋代宫廷的舞蹈特征，并且加入了富有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乐舞形态。明朝则奉周以来“雅乐舞”等“庄重”“严肃”“雅致”“规范”的舞蹈为正统乐舞，主动剔除了传统宫廷舞蹈的娱乐性和欣赏性，使其成为更加“严正”“刻板”“庄肃”的宫廷舞蹈形态。

1.2　清代宫廷舞蹈中“民族性”的美学形态源起

清代宫廷舞蹈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古代满族先民在氏族时期的生活过程，对祭祀仪式、狩猎劳作形态、踏锤娱乐等活动的舞蹈形态进行了吸纳和整理，再经艺术化的提炼与加工，形成了农耕狩猎的

收稿日期：2023-05-06
基金项目：东北亚音乐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2022 年度科研项目“民族学视角下西辽河流域舞蹈文化研究”（编号：XT202201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赵梓宁（1991—），男，满族，辽宁沈阳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舞表演、中国古典舞身韵教学。

舞蹈形态，有着典型的“民族性”特征，呈现出清代宫廷舞蹈“稚拙朴质”的艺术特征。

满族自古以来崇尚自然，是清代宫廷舞蹈“民族性”的源头。满族先民长期活动在我国北方区域，从事捕鱼、狩猎、农耕等生存劳作。他们通过对劳动过程的提炼，以舞蹈的形态传承了渔猎农耕的生存技能，形成了兼顾朴质与野性风格的舞蹈形态。这种形态延续至清朝宫廷便发展成为表现骑射狩猎生活的庆隆舞。

关于清代宫廷舞蹈，最早的记录可见于《后汉书·东夷列传》中，其曾描述“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2]的歌舞场景。肃慎时期的舞蹈美学形态与满族先民的乐舞活动，以及祭祀、狩猎、生产、生活紧密关联，借由庆功、生辰、祭祖、狩猎、生产等活动进行精神表达，完成了舞姿来源从生产“劳作技能”向生活的“娱乐宣泄”的美学形态转变。靺鞨时期建立的渤海国，其渤海乐舞在满族先民传统舞蹈的基础上融合了唐代乐舞的风格，将“战斗围猎”“排兵布阵”等表现民族骁勇善战的战斗场景融入宫廷舞蹈之中，形成了“朴质刚猛”的美学特征，是后期“莽式”“扬烈舞”等舞蹈类型的源头。女真族建立金国政权后，其宫廷乐舞一方面承袭了称为“本国旧音”的女真传统歌舞，另一方面，承袭唐、宋两朝礼乐制度下“恢弘典雅”的乐舞特征，形成了“雅俗相融”的美学特征。

2　清代宫廷舞蹈的美学形态特征

清代宫廷舞蹈的美学形态特征来源于“民族”和“历史”两个因素。一方面，清代宫廷舞蹈的文化形态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古代满族先民在氏族时期的生活形态，对狩猎劳作形态、战斗对抗过程、踏锤娱乐等活动进行艺术化的提炼与加工，形成了稚拙朴质的舞蹈形态；另一方面，清代宫廷舞蹈继承了近至元、明两代，远至汉代、唐代、宋代的古代礼乐文化精神，同时，融合了满族、蒙族、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舞蹈文化，形成了包容、典雅的清代宫廷舞蹈形态。

2.1　原始农耕的稚拙朴质

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爱德华·伯内特·泰勒认为“征战生活蒙昧人和野蛮人用舞蹈作为自己愉快和悲伤、热爱和暴怒的表现”[3]。他将人们对原始农耕的舞蹈艺术的热爱，以“直接”“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满族先民在“原始部落”时代，十分崇尚自然和武功，并将这种精神赋于舞蹈形态之中。他们以“狩猎之舞”“农耕之舞”来表现捕熊、猎鹰、采参、打渔等农耕、狩猎等生产生活；以“征战之舞”来反映自身“处山险，又善射”“卒不能服，威武不屈”等维护家园、保护族群的武战能力、作战方式和坚强意志。随着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农耕”“狩猎”两种生活印记以舞蹈的形式被保存下来，成为满族原始舞蹈的重要舞姿来源，更是成为清代宫廷舞蹈美学形态的源头。

首先，从“农耕之舞”“狩猎之舞”的农耕狩猎生产生活上来谈。满族先民的农耕狩猎舞蹈主要来源于原始农耕狩猎生产活动之中的劳动过程，其动作刚劲有力，舞姿粗犷豪放，节奏大起大落，表达内容丰富多彩。主要步法有进、退、转、移、跳、跨等。摹拟的对象有狼、蟒、虎、豹、猪、熊、鹰、雕等。[4]狩猎舞既有对于自然中动物习性的肢体模仿，又有捕捉动物过程中集体搏斗场面的再现，这些不仅反映了原始社会初级阶段满族先民对于生产活动的朴素认知，而且形成了满族民间舞蹈稚拙朴质的美学形态特征。此外，清代宫廷舞蹈中的“莽式”，即：“玛克辛”的音译，是一种农耕生产生活类型的满族传统舞蹈形式，有着“九折十八式”的舞姿形态，其源自于满族先民捕鱼、狩猎、织网、采贝等原始生产活动。其中：“九折”，即“起式”“拍水”“穿针”“吉祥步”“单奔马”“双奔马”“怪蟒出洞”“大小盘龙”（带吸水）、“大圆场”；所谓“十八势（十八式）”，包括：“手势”“脚势”“腰势”各3个，“肩势”“转势”“走势”各2个，“鼓势”3个。其中：“拍水”“穿针”等生活拟态的动作，是对于满族先民捕鱼织网等渔猎活动的记录；“怪蟒出洞”形态特点是来自大自然界中“蟒”的生活习性的观察，表演者双手相继握拳，分别以前额为起始向身下环绕。舞者的双脚以“正步”姿态踏步，腰臀轻微摆扭，呈现蜿蜒流畅的整体形态，这是对蟒出洞穴蜿蜒之势的生活临摹。

其次，从“征战之舞”的守护家园生活上来谈。满族先民热爱生活，热爱家庭，他们长期尚武以守护家园。庆隆舞是清代宫廷舞蹈的主要类型之一，其舞蹈形态多为群众欢娱的场面。舞者以刚性的造型力量展现狩猎、战斗的真实场景，他们通过单人侦察、双人谋局、多人狩猎来形成多类型的舞蹈形态，以展现其果断勇敢、坚韧不拔与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这是清朝统治者对满族民间舞蹈的崇敬，以及对自身民族文化高度认同的结果，是牢记“满族马上得天下”这一生产劳动本性的印记，更是一种对民族存在根源的寻觅和固守。庆隆舞源于满族民间舞蹈——莽式。清代吴振臣在《宁古塔纪略》中写道：“满洲人家歌舞，名曰‘莽式’，有男莽式，女莽式，两人相对而舞，旁人拍手而歌。每行于

新岁或喜庆之时。上于太庙中，用男莽式礼。”[5]其中：庆隆舞中的扬烈舞部分充分展现了满族先民“尚武”的核心精神。舞蹈将舞者以2人或9人为一组，或以1人或8人为一组，将其装扮成军士模样，并以木头或竹子制作成禺马，且头戴马护（面具），进行队列舞蹈，用来表现军士骑马持弓、射杀怪兽的情节。这种舞蹈情节复现了满族先民“骑马驭甲胄”“引弓驰逐兽”的生活场景。舞蹈最后“群兽慑服”的场景不仅表达了收获的喜悦，而且彰显了骁勇卓绝的战功。

这些具有朴质力量的清代宫廷舞蹈既是满族先民朴质美学精神的粗犷表达，又是清代宫廷“武舞”的代表。它既有艺术形态带来的含蓄和内敛，又有娱乐形态带来的热情和亲切，其以最直观的肢体表达传递质朴的情感内容。庆隆舞并不追求舞蹈动作上复杂的技巧特征，而是以单调的肢体动作配以跑动和跳跃来形成具有吸引力的群态造型形式，用以展现狩猎、战斗等真实场面，表现满族先民群聚生活的时代环境，是对当时生活最自然的表达，具有稚拙朴质的美学形态特征。

2.2 虚实相生的艺术神韵

进入清朝以来，作为满族舞蹈的清代宫廷舞蹈的前身，已经从作为“记录”和“生活”形态的“狩猎之舞”“农耕之舞”“征战之舞”束缚中解脱出来。其沿袭千年的满族旧俗舞蹈，又延续了宋元以来宫廷舞蹈形态的传统，因而包孕了千百年来坚守不变的艺术精神内涵，从而为清代宫廷舞蹈保留至今提供了必要条件。它既留有满族先民民族性的“旧俗舞蹈”，又吸纳中国古代“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美学形态特征。袁禾表示：“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是中国舞蹈的审美追求之一，也是舞蹈创作在意象营造过程中的一个具体原则，还是舞蹈鉴赏中的一个审美标准。”[6]283这种“虚”“实”关系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对范畴，也是中国舞蹈美学研究的一对范畴，涉及清代宫廷舞蹈从表演到欣赏的美学原则。

“虚实相生”是清代宫廷舞蹈在吸纳满族先民舞蹈文化基础上，融合了唐代乐舞“文以载道”的美学思想而逐渐形成的富有“神韵”“意境”“含蓄”“奔放”的舞姿形态特征。其鲜明地反映了“觉醒”“智慧”“禅思”等重要的哲学价值。元代张昱曾作诗：“女贞女子舞尽觞，团衫鞶带分两傍，玉纤罗袖柘枝体，要与雀声相颉颃，朝弹暮弹《白翎雀》，贵人听之以为乐。”[7]这里深刻地描写了女真时期宫廷舞蹈的“团衫鞶带”“玉纤罗袖”虚实相生的美感，富有着浓郁的写意韵味。之后，清代宫廷舞蹈继承了周代以来的“文舞”形态，延续了女真时期宫廷舞蹈的写意风味，充分吸纳了中国古代舞蹈美学中“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特征，展现出了高贵典雅的气质和皇族威仪的神韵。以清代宫廷的《文德之舞》为例：舞者“右手执羽扇”“左手执籥”，将对祖先、自然神的崇敬，对帝王和皇权的崇尚，以情与景的交融为手段，创造了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情感意象，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虚实相生、情景相融”的中国舞蹈的美学追求。

清朝及其先民统治者继承了历代礼乐文化的传统美学价值，并不断吸纳汉族以及其他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态，形成“外朝鸣响黄钟大吕，威冠群臣”的姿态，这便是宫廷舞蹈重要的美学形态特征。其美学价值在于“不断地将民间舞蹈乃至全社会的舞蹈精华‘为我所用’，接受着各族各地各国进献的高质量的乐舞，加上经过严格选拔的宫廷专职乐舞人员的智慧和创造而使宫廷舞蹈形成了一种荟萃精华的性质”[1]37。这就使清代宫廷舞蹈美学形态特征“集萃”了先代宫廷舞蹈内敛、含蓄、寄寓等哲学思想，使其乐舞的风格形态饱含着传统礼乐文化的“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美感。清代宫廷舞蹈中的满族传统民族文化保留了原始“渔猎农耕”的“母题性动作”，且接受了宋元以来宫廷礼乐制度的范式，将传统戏曲中“欲扬先抑”“欲静先动”的美学特征，以及“刚柔并济”“强弱互补”的动作特征显著地应用到宫廷舞蹈的创作中。同时，其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观”融合到宫廷舞蹈的风格样式之中，以凝练的动作形态作为精神实质进行表现，使舞蹈既有人文价值的蕴涵和寄寓，又具有朴实生动的浓郁写意美感。它将“大巧若拙”的姿态以程式的方式集中体现在清代宫廷舞蹈的形态中，并呈现出“笔简而意繁”的深邃意味，从而形成了清代宫廷舞蹈“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审美形态特色。

2.3 包容相济的“和”之美态

清代宫廷舞蹈作为清代宫廷重要的礼乐形态，既保留着满族先民的舞蹈形态，又吸取了先朝优秀汉民族礼乐文化，同时，不断吸纳蒙古族、朝鲜族等其他民族舞蹈的精华，从而造就了满族舞蹈文化历史上的“大繁荣”时代，并将满族舞蹈文化推向了历史高潮，具有重要“和”的人文价值。它继承了中国千载“礼乐制度”的文化精神，融合了满族先民的文化精髓，传递着儒家“雅乐”理想中“仁义礼智”的思想内核，将宫廷中传承千年的“中正和平”的古代文化乐舞风格展现出来，[8]鲜明地展现了中国舞蹈之包容相济“和”之美态。这种“美”是中国舞蹈之

“美”，其追寻着庄子的“大美”之意。[9]这里的“美”既有“狩猎之舞”“征战之舞”“农耕之舞”形态中体现的天地自然的规律之美，一切的真理之美；亦有“宴飨之舞”“旧俗之舞”中展现出来的中国古代舞蹈美学的精神之美，“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美学之美。清朝将汉族礼乐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以礼为治国之道，以礼来教化民众，以礼示天下之统一，展现了其文化上“大同”思想，进而推动了包容相济的“和”的美学特征的形成。史料记载：清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其母后孝惠章皇后七十大寿。康熙谕礼部：“玛克式舞，乃满洲筵宴大礼，典至隆重，故事皆王大臣行。今岁皇太后七旬大庆，朕亦五十有七，欲亲舞称觞。”[10]273“是日皇太后宫进宴奏乐，上千舞蹈奉爵，极欢乃罢。”[10]273在这次舞蹈记录中人们不难发现，康熙皇帝始终坚守满族古老民间舞蹈传统的意义，在于“坚守满族文化”“共享大同世界”的思想，将满族文化与世人共享。这是清代宫廷舞蹈中“和”思想的价值表达的重要方面。

舞蹈作为清朝“满汉融合，文御天下”的重要政治手段，被统治者从宫廷推广至民间，因而形成了以“和”为思想核心的文化包容形态，推动着清代宫廷舞蹈审美价值的不断发展。清代宫廷舞蹈除沿袭前朝舞蹈特征之外，还融入了满族自身的民族舞蹈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特色，形成了具有独特审美特征的清代宫廷舞蹈样式，使清代宫廷舞蹈在审美上兼顾古朴之美与气韵之美，呈现出粗雅相济、简约而不简单的审美特征。“和”的思想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清朝宫廷舞蹈在美学领域的特征之一。随着“满汉融合”思想在清代统治阶级的生根，前朝优秀的礼乐文化与满族旧俗的舞蹈形态进行了“和”化，发展出了独具清代宫廷舞蹈审美形态的舞姿特征。这里的“和”既是两者美学上的一种重构，又是两者内在和谐的结果，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美学形态。在“和”思想的影响下，清代宫廷舞蹈被赋予了特有的气质和风韵，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的审美品格与精神寓意。

3　结束语

清代宫廷舞蹈是满族民间舞蹈和中华舞蹈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在美学价值、文化价值还是人文价值上都达到了古典舞蹈艺术的较高水平。进入当代以来，清代宫廷舞蹈也随着舞蹈文化的复兴而再度兴起，也使清代宫廷舞蹈发展和建设成为当代重要课题。总之，清代宫廷舞蹈在包容其他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形态的同时，推动着清朝经济、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作为清代宫廷的一种艺术形态，清代宫廷舞蹈不仅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而且对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新时代的文化思想发展潮流中，我们要把握文化传承的脉搏，系统地完成对于清代宫廷舞蹈的发掘与保护。

参考文献：

[1] 袁禾.论中国宫廷舞蹈[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0.
[2] 范晔.后汉书(第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4：224.
[3] 爱德华·B.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M].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75.
[4] 金宝忱.东北少数民族狩猎舞[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2)：101-104.
[5] 方登峄，方式济，方观承，等.述本堂诗集·宁古塔纪略[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570.
[6] 袁禾.中国舞蹈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 严楚乔.张昱在京交游简论[J].青年文学家，2020(9)：80-81.
[8] 项阳.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1)：5-8.
[9] 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8.
[10] 赵尔巽.清史稿·乐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石柏胜

·经济管理·

互联网金融影响下传统金融业态的重构

——以阿里巴巴集团为例

鲍　勇，赵　红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经贸旅游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2）

摘要：阿里巴巴是互联网金融应用中的典型代表，巨量近乎零成本的数据和信息优势支撑是阿里巴巴商业模式可持续的基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倒逼传统金融业态重构，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的业务融合正在形成数字化金融。金融资本阶段，资本过剩、债务过度货币化、金融监管缺位、不平等问题突出等因素加剧经济周期波动和风险的积累，互联网金融垄断与无序扩张等问题对传统金融行业带来了不利影响。构建基于大数据基础之上的金融监管与国家金融信用体系乃是当务之急，传统金融需要借助互联网金融具有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精准识别用户，为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传统金融；金融供给侧改革；金融生态重构；阿里巴巴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104-05

1　传统金融业态重构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金融科技的应用与发展，推动了支付结算、资金借贷、投资理财等传统金融业态的数字化转型。阿里巴巴是互联网金融应用中的典型代表，它的出现推动了成千上万小微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产生并实现在网上经营，阿里巴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然而，蚂蚁集团利用各大国有银行提供的大量资金用于其贷款业务并获取巨额利润的行为，本质上是传统国有金融业为私人企业打工，阿里巴巴的前三大股东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外金融资本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大影响。在政府倡导的“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战略转型背景下，金融供给侧改革正在有序推进，“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注重公平、兼顾效率”“反垄断、反对资本的无序扩张”，“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走以“共同富裕”为核心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金融生态文明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构建数字化新型金融业态来应对互联网金融异象，探讨互联网金融影响下传统金融业态重构的必要性与路径，显然是一个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理论探讨。

2　互联网金融及其与传统金融的关系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最根本职能就是把钱从存款人向外借人手里转移。”[1]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融资方式即“互联网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是依赖网络信息技术、移动通讯技术以及大数据云计算，实现融资、支付、中介等多种功能的一种新型的金融服务。”[2]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关系紧密，传统金融是互联网金融的基础，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的补充。互联网金融产品和传统金融产品包括支付与货币、股票与债券，信托与保险等没有本质区别，互联网金融交易始终离不开传统银行账户，互联网金融利用金融科技催生的金融市场的新金融手段，实现现代金融功能的跨越式转变，而传统金融服务不能产生新的金融功能。

3　互联网金融影响下传统金融业态重构的必要性

3.1　互联网金融发展概况——以阿里巴巴集团为例

“1995 年 10 月，世界上第一家没有分支机构的单一网上银行即安全第一网络银行（SFNB）成立了，这家美国最大的银行被认为是互联网金融的原型。”[3] 美国嘉信金融公司开始在网上进行证券

收稿日期：2023-05-13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 2020 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互联网＋货币’金融模式的构建研究”（编号：SK2020A0744）、安徽省教育厅 2021 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区域间公共教育支出及结构的经济效应问题研究”（编号：SK2021A0963）和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基于不同阶段资本市场治理机制下的股票投资研究”（编号：2021KYQDR01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鲍勇（1969—），男，安徽安庆人，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与金融；赵红（1971—），女，安徽庐江人，教授，研究方向为财务与审计。

交易，而 Scottrade.com 的推出也是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开始。“1999 年，马云创建阿里巴巴集团，其经营领域已经从网络支付、电子商务、网上交易等领域逐步扩展。”[4] 目前，阿里巴巴三大互联网金融模式是支付宝、阿里小贷和余额宝。支付宝成立于 2004 年，是淘宝的第三方担保交易平台，支付宝凭借其便捷、低成本的移动支付手段，已经占据了人们日常生活支出的最大份额，传统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机构之间的关系也从最初的合作逐渐转变为竞争和协作共存的局面。

由图 1 可见，在 2019 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市场份额中支付宝和财付通分别以 54.4%和 39.4%的占比遥遥领先，因此，许多传统金融机构纷纷与第三方支付合作。与此同时，融资平台和融资渠道逐渐脱离实体给传统金融带来了不利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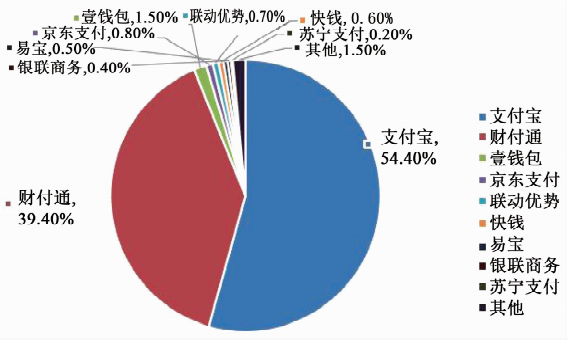


图 1　2019 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市场份额占比

数据来源：https://m.toutiao.com/article/6829247940905665036/

阿里小贷成立于 2010 年，是一种面向小型企业和个体创业者的商业借贷模式。阿里小额信贷借助阿里巴巴的网络技术优势，利用三方认证，保证了用户的真实，不需抵押、担保，只要求用户资信状况，利用天猫、淘宝、聚划算等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贷款服务，更多的是面向长尾用户和弱势群体，这是其他国有银行等传统金融业做不到的事情。“余额宝是一款由蚂蚁金服发行的金融理财产品”[5]，于 2013 年 6 月正式上线。天弘货币型开放式基金是余额宝的管理者，余额宝主用户可直接用于购买、转账、支付、还款、理财等，把存款放在余额宝的风险较小，转账费用较低，使用方便。

3.2　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3.2.1　数据管理问题

截至 2021 年 12 底，阿里巴巴在世界范围内的活跃用户每年达到了 12.8 亿，其中国内市场 9.79 亿人，海外 3.1 亿人。支付宝和余额宝共同支撑起阿里的金融消费数据，通过云计算对大数据的挖掘，可以建立起消费者的个人档案，包括信用程度、性格禀赋、社会关系、兴趣爱好等，甚至可以建立起国内战略资源的流转及节点图。有了这样一份档案，个人行为偏好及弱点乃至国家战略资源的薄弱环节都可能暴露无遗，个人或国家就可能会被潜在的对手或敌人威胁利诱甚至攻击。阿里巴巴的企业国籍注册于英属开曼群岛，日资软银、美资雅虎在其股权结构中占比超过 50%，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是否真正属于中国企业值得深思。大数据不仅是阿里的生命线，更是国家安全的生命线。

3.2.2　阿里巴巴的垄断与资本的无限扩张问题

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等知名的中国企业，是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平台产业。2020 年秋，蚂蚁集团拟以发行价 68.80 元到科创板上市，估值高达 2.1 万亿元，蚂蚁集团众高管及公司持股员工均将从其上市中受益。11 月 5 日上市前夜，蚂蚁集团 IPO 被证监会紧急叫停。事实上，蚂蚁集团年盈利超 20 亿美元，并不缺钱，选择上市融资的背后是受到投资股东的推动，有些股东是放杠杆进去的，不上市无法变现，还要还利息。2021 年 4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经过调查发现，2015 年以来阿里巴巴集团凭借掌控大量数据和市场份额，对商家实施“二选一”要求，形成垄断抑制公平竞争。之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予以行政处罚，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予以罚款人民币 182.28 亿元。

3.2.3　产品过度宣传问题

随着互联网金融产业的竞争日益激烈，金融业中的产品也呈现出了“过度美化”的现象。为了与同行们竞争，大多数商家都是奉承而不是贬低，这样做会让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和性能产生怀疑，从而造成消费者对商品质量的不满。阿里巴巴通过一则广告“一家三口的日子，再精打细算，女儿的生日也要过得像模像样”，宣传并鼓励人们使用借呗、花呗。借呗、花呗实则是高利贷平台，该平台不谈利率与风险，却专门给消费者讲情怀、讲体面，这本身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来道德绑架普通人，在 P2P、水滴筹、京东、拼多多等互联网金融的广告中或多或少都有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说事情的。

3.2.4　业务风险较大问题

中国咨询式股权投融资专家藏其超认为，利率是一切资产定价的锚，全球低利率下市场估值本身

就高，按照金融公司定位，蚂蚁集团IPO定价不会太高，蚂蚁金服以支付、借贷为主要金融业务，但走的是科技上市路线，蚂蚁集团的市场估值就会更高，股市不是资本家的提款机，这是欺骗政府。蚂蚁集团本来应该在中国人民银行至少交200亿的存款准备金，但蚂蚁借呗、花呗平台上能够贷出去的钱，几乎全部来自于银行。借呗、花呗从国有银行借来的资金利息约在5%左右，贷款给用户的年化利率约15%，自己等于“空手套白狼”从中套取了10%的差价，国有银行都在为蚂蚁集团打工。蚂蚁集团利用自有的38亿元资金形成了40轮的资产证券化，放贷额度接近4 000亿元，撬动了最高近100倍的资金杠杆，放贷给消费者最高超过了2.15万亿元资金。[6]蚂蚁集团用户中很多都是没有稳定收入的，可能是社会最底层的一些人，蚂蚁集团除了号称拥有虚拟的征信记录外，没有掌握借款者的任何抵押资产，蚂蚁集团做的信贷是居民加杠杆过程中的信用下沉的最后一段。信贷是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推动力，近十年来的中国居民杠杆率已经从20%提升到60%，从一个极端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信贷不一定是坏事，只是会误导周期性变化。如果居民的杠杆周期逆转，整个行业的资产质量开始恶化的时候，就会发现蚂蚁集团的这些用户，可能它的资产质量相对来说是更加不可控的。蚂蚁集团把自己所有的责任和税收全避完了，这还没上市就达到2万亿，若上市则可以达到5万亿。如果蚂蚁集团有一天真崩盘了，其只承担30亿元人民币的责任，马云仅仅需要承担的是350万人民币的责任，放任蚂蚁集团在银行体系外野蛮生长、无限膨胀，对传统金融主要是银行资金带来较大风险，将穷人、年轻人、中小型企业和创业者，拖入隐形的次级贷款金融危机的黑洞之中。

3.3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模式优势互补的必要性

在线金融是一种较传统金融更具创新性的商业方式，互联网金融的用户群都是年轻人，他们更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对网络也比较了解。传统金融的管理模式主要是把有创意、有想法的人放到一个标准化的金融体系里，传统金融的安全程度要高于互联网金融。传统的银行以批发银行为主，面向大客户，而“余额宝”、阿里小贷等互联网金融则是面向中小客户和个体消费者的。互联网的公平、开发理念、大众理财需求的多元化与复杂，都促使传统银行组织发生了变化，各家银行都在利用互联网提高经营效率、拓展新的业务领域，“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领域，开设信贷相关业务的标准非常严格，必须遵循相关流程。”[7]在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模式相互融合、优势互补的推动下，国内金融业务的推广速度大大加快了，到2020年，国内基本的金融覆盖率达到99%，农村覆盖率达到96.6%。随着科技、资讯技术的进步，网上理财越来越精准，国内金融业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复杂，多个平台并存，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为了更好地提升客户体验，金融公司内部业务整合是通过提升产品创意来提升客户体验的关键。”[8]

4　互联网金融影响下传统金融业态重构的路径

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改变了传统的金融交易的方式，“现实的财务处理速度无法与互联网金融相比，所以，银行的金融机构在不断地被消弱。”[9]“传统银行由于存款利率低再加手续繁杂等特征，使得人们更多选择将闲散资金放入到互联网金融平台中，传统银行的存款资金流失很严重。”[10]传统金融业可以凭借其深厚的金融背景和金融根基的优势，引进和扩充以云服务、大数据为基础的网络技术，以提升现有的基础业务，并扩大以网络为基础的金融形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传统金融业态转型与重构的路径：

4.1　国家金融信用体系的构建与阿里巴巴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

大部分P2P公司通过建一个网站把借贷双方拉到一起进行交易，由于没有足够的信息评估信用等级来降低坏账风险，所以，这种没有价值创造的金融生意是做不久的。金融创造价值的根本在于获取信息，根据企业的行为特征，“可以定义公司的潜在债务风险，并据此来确定其合理的信贷限额。”[11]利用这些交易信息，阿里巴巴可以估计贷款申请人的财务状况和违约风险，根据风险等级决定是否发放贷款及贷多少。传统机构天天在做信用评级，但阿里巴巴信用评级的成本更低，因为他们用的是现成的、几乎是零成本的数据。基于信息之上的信用是金融创造价值的源泉，阿里巴巴创造了价值，它的商业模式因此是可持续的。在金融世界与人类世界的现实里，金融与人生追求的意义都不是现实理性的，而是为了改善未来。金融企业只有坚守道德高尚和诚信的精神基础，才有酝酿长期的企业生态环境，而基于金融信用体系基础上的法律支持是金融伦理基础的有力保障，构建基于大数据基础之上的国家金融信用体系乃是当务之急。

4.2　互联网金融影响下金融监管的紧迫性与对策

有人问阿里巴巴如何处理和政府的关系，阿里

圈里的朋友们如是回答：阿里是巨兽一般的存在，政府从来没有面对过影响力这么大的企业。随着阿里的大数据安全性、违法集资嫌疑、高杠杆借贷，以及垄断与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的出现，较高的系统性风险对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带来了严重冲击，对阿里巴巴的金融监管迫在眉睫。于是，蚂蚁集团上市IPO计划被国家市场证监会紧急叫停，打着文艺和消费主义旗号的借呗、花呗的广告，被连夜从地铁站、公交站、机场、LED广告牌上集体一夜消失。从顶层规划来看，国家先后出台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互联网带来的渠道革命使金融交易的受众范围太大，参与交易的人数太多之后，金融市场里的“不确定性”与“羊群效应”概率就会大增，市场风险剧增。据悉，国有资本已经注入蚂蚁集团，马云不再独立掌控蚂蚁集团。“要想把网络技术与互联网金融结合起来，通过网络实现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12]金融科技创新的态度转变符合人们对新兴事物的一般性认知过程，即鼓励支持到深刻反思，再到规范发展的过程。金融科技的监管必须有顶层设计，真正做好“金融为民、科技向善”这个课题。

4.3　金融资本时代传统金融业态的重构

传统金融业务在与互联网金融的融合创新中，首先要做的就是推动数字化经济的变革，降低服务门槛，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金融交易效率。互联网金融催生下传统金融业态的形式升级和变革，首先，是支付形式升级和变革。当前，我国各商业银行均已建成网上银行，“它可以让人们随时随地处理各种不同的金融服务，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银行的服务领域。”[13]其次，是网络贷款与信用消费网络借贷具有“短、急、小”的特征，往往集中在被银行忽略的地方，但这种小额贷款方式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广泛参与。传统金融机构可以借机通过各种类型的小额贷款产品来规范网贷市场，同时，拓宽机构理财产品的范围。另外，传统金融行业可以开发网销保险、证券、基金等在线金融产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最大拓宽金融交易的渠道。

金融资本阶段的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过高的债务融资、杠杆、金融监管缺位等因素加剧经济周期波动和风险的积累，共同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催化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永钦教授提出：“重构金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14]与债务不同，股票等股权合约天然具有保险的特征，以此类股权工具平抑经济波动，发展新型的股权类工具是有益的，包括发展健全股市，对企业融资和个人分享经济红利都是有益的；可以用普惠金融改进传统债务融资模式，重构中国现有以土地和房地产作抵押、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金融体系，试用基于抵押的创新型货币政策，促进实现共享式的发展。因此，中国的法治改革就显得尤其重要，法治环境的改善可以创造更多的抵押品，改善中国的金融结构，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方文明起源于海洋文明，早期的海洋文明大都是劫掠文明，西方因为生产过剩、转嫁国内矛盾，最后转型为二次世界大战。现在，中国已经处于资本相对过剩阶段了，主要矛盾是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等三大资本都过剩。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不能也不会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因为生产过剩转嫁国内矛盾而进入侵略战争。中国解决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办法是换道超车，从工业文明转型为生态文明，从产业资本阶段、金融资本阶段过渡到生态文明阶段。生态文明阶段就要有一套全新的符合生态文明的运作制度，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通过加强对技术先进、新常态和新动能行业的信贷支持，以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发展。乡村振兴是当前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中国从工业文明转型为生态文明的基础，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城市是资本池，乡村是劳动力资源池，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是城市，而乡村几乎没危险，“小乱避城，大乱避乡”。传统金融服务应更多向乡村振兴倾斜，向一产业(生态农业)、二产业(低端产业链、加工贸易型工业)倾斜，传统金融要借助互联网金融具有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精准识别用户，为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及城乡融合。

5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看传统金融业态重构的发展趋势

人类在经历了语言、文字、印刷术、无线电、电视、互联网等信息革命后，面临着第七次信息革命——人工智能。互联网、人工智能与金融深度融合有助于缓解我国在发展普惠金融上面临的一些难题，并有很强的社会功能，是人际交流沟通与资源配置的需要，是知识经济与金融科技的发展需要。蚂蚁集团IPO快速被否的背后代表了互联网金融高增长、野蛮生长时代的结束，也表明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融资需求存在短板。2023年2月17日，中国宣布全面实行IPO注册制，实行注册制可以促进国内直接融资的发展，补足融资需求的短

板，是中国资本市场化走向成熟的标志。互联网金融的产生与发展可以看成是所谓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中国特色“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互联网金融的野蛮生长是制度成本。互联网金融影响下传统金融业态重构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计划的“顶层设计”。当前，中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顶层设计”或最终目标是强化金融生态建设，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推动传统金融企业管理观念的变革和创新，以数据驱动、技术驱动和技术规范为目标，从而达到创新和安全、效率和稳定的动态均衡。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金融可以是融资工具，可以是一种思维方式，也可以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框架，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业务融合可以给人类提供一种对社会和历史的全新视角。现在世界各国所谓的市场经济，实质是混合经济，每个国家根据本国的不同经济结构或阶段所采取的经济管理手段无非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问题。中国金融发展的一轨是计划，一轨是市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行渐进式双轨制金融改革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伟大实践和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徐力. 普惠金融赋能社会治理[J]. 中国金融，2021(5)：53-55.

[2] 谢平，邹传伟，刘海二. 互联网金融手册[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7.

[3] Ouida Taaffe. The Development and Future of Financial Services[J]. Banking on Change，2019(1)：11.

[4] 孙菁. 互联网企业的平台商业模式研究：以阿里巴巴为例[J]. 现代营销(下旬刊)，2020(7)：96-97.

[5] 李航. 互联网金融产品风险管理问题分析：以余额宝为例[J]. 现代营销(下旬刊)，2020(4)：36-37.

[6] 张淇. 花呗利息和借呗哪个高？这些方面做对比[EB/OL]. [2022-06-23]. https://www.csai.cn/loan/1353755.html.

[7] 林为民. 互联网金融经济对传统金融经济行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 现代商业，2021(8)：64-66.

[8] 贾焱. 互联网金融[M].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196.

[9] 万昕. 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挑战[J]. 商业文化，2021(21)：86-87.

[10] 杨子君. 浅谈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业发展的影响[J]. 投资与创业，2021(12)：29-31.

[11] 李明选. 互联网金融产业及其对传统金融冲击影响的研究[D].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5：134.

[12] 傅澳华，刘清. 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业的影响及对策[J]. 新西部，2020(14)：64-65.

[13] 李晓东. 互联网金融发展及其对传统金融模式的影响探讨[J]. 现代营销(下旬刊)，2021(4)：184-185.

[14] 王永钦. 视点|王永钦：重构金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EB/OL]. [2022-12-04]. https://econ.fudan.edu.cn/info/1025/20747.htm.

责任编辑：张彩云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Forma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Finance

——Taking Alibaba Group as an example

BAO Yong，ZHAO Hong

Abstract：Alibaba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Internet finance applications，and its massive and nearly zero cost data and information superiority support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Alibaba's business model. The emergence of internet finance has forced the restructuring 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formats，and the business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finance and internet finance is forming digital finance. In the financial capital stage，factors such as excess capital，excessive debt monetization，lack of financial regulation，and prominent inequality exacerbate economic cycle fluctuation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risks. Issues such as Internet financial monopoly and disorderly expansion have brought adverse effects on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dustry. Building a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national financial credit system based on big data is a top priority. Traditional finance needs to accurately identify users with the help of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provided by Internet finance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servic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Internet finance；traditional finance；financial supply-side reform；re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ecology；Alibaba

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

——以亳州市白酒和中医药产业为例

蒋　栋，许正松

（亳州学院 经济与管理系，安徽 亳州　236800）

摘要：当前，亳州市白酒产业面临着过于依靠古井贡酒的龙头作用、中小型白酒企业产值和利润普遍较低等问题，而中医药产业则面临着中药材原料的道地性不足、研发投入少、品牌建设缓慢等问题。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强化政府引导，推动白酒和中医药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力促进中医药、白酒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亳州市实体经济发展呈现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可以为促进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丰富而深刻的借鉴。

关键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白酒产业；中医药产业；产业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109-04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能脱实向虚。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全面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我国服务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从 1990 年的 17.3%一路上升到 2021 年的 53.3%，即一半以上的增加值来自第三产业。2021 年，第三产业中 GDP 占比排在前 3 位的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1]虽然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行业的地位日益重要，但经济发展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逻辑没有变，实体经济在解决紧急突发的重大事件和推动经济稳定发展过程中起着根本性支撑作用，强调必须要重视发展实体经济，要以实体作为经济增长为着力点。[2]而实体是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基本内涵也没有变。[3]亳州市具有人口基数大、实体经济占比高、外出务工人员多、人口外流严重等特点，在我国的地级市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此，以亳州市为对象，分析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及提出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对于促进我国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普遍意义。

1　亳州市中医药产业和白酒产业发展历程和现状

《亳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亳州市经济社会发展要聚焦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并在第六篇单独提出“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4]中医药产业和白酒产业是亳州市两大主导产业，在亳州市实体经济发展中起着引领和龙头带动作用。

1.1　亳州市中医药产业发展历程与现状

上千年中药种植、培养、贩卖的历史，使亳州享有“世界中医药之都”的美誉。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已经发展为全球最大的中药材集散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每年 400 多亿元的交易额占到中国同类市场交易总额的 45%。截至 2022 年底，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日上市药材品种达 2 800 多种，年交易额逾 400 亿元，整个亳州市种植面积在 5 万亩以上的乡镇有 6 个，种植面积 1 万亩以上的乡镇有 27 个，全市有 800 多个中药材种植专业村（庄）。[5] 2021 年，亳州市中药产业总产值达到 1 545.8亿元，其中：出口 1.7 万吨（价值 6.1 亿元），亳州全市中药种植面积为 5.85 万公顷，现代中药产业固定投资额 100.2 亿元，中药生产企业

收稿日期：2023-04-29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产业转移、环境规制与产业生态化发展——以安徽省为例”（编号：SK2020A0572）和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亳州市发展实体经济的定位与路径研究”（编号：A202211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蒋栋（1997—），男，安徽亳州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环境经济；许正松（1972—），男，安徽寿县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产业发展。

206家，中药商贸流通业交易额1 091亿元。[6]2022年，亳州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约124万亩，实现中医药产业规模约1 800亿元，其中：贸易总额约1 350亿元，中医药制造业产值增长10%以上。[7]亳州市每年举办的中医药博览会是我国最悠久的中医药展会，2022年举办的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是第38届全国中药材交易会的盛会。近年来，亳州市加大中药科研投入并实现重大突破。2014年，济人药业生产的疏风解毒胶囊专利荣获第十六届国家专利金奖，也是全国中药固体制剂专利首次获此殊荣。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后，亳州中药企业生产的中药配方被10多个国家选作抗疫药物，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更好促进亳州中医药产业发展，安徽省和亳州市政府不断完善中药产业发展政策，2020年1月13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世界中医药之都（安徽亳州）建设发展规划（2020—2030年）》，明确产业发展对策与支撑服务体系，建设中药材扶贫基地，策划重点工程与支撑项目。[8]亳州市政府还设立了多支中药产业投资基金，为亳州市中药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1.2　亳州市白酒产业发展历程与现状

亳州市有着悠久的酿酒历史，是中国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1989年，在距今有5 000年的尉迟寺遗址出土了与酿酒有关的陶器，古井集团至今仍在使用的《九酝酒法》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蒸馏酒酿造方法。近年来，亳州市白酒产业发展势头较好，白酒生产企业从2017年的37家增加到2022年的250余家，成为亳州市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与白酒企业数量同步增加的是白酒生产规模的扩张和销售额的增加。2022年，亳州市白酒产量和总销售额双双实现了增长。初步估计，2023年，亳州市白酒产量和总销售额将分别超过16万千升和150亿元。2022年，亳州市白酒产量占整个安徽省白酒产量比重高达35%，对亳州市白酒产量贡献最大的三家企业分别为古井贡酒、亳州市金不换白酒、徽酒集团。古井贡酒名列中国白酒品牌价值第四、安徽白酒第一，位于中国白酒第一方阵，是无可争议的安徽省头部酒企。亳州市白酒生产行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5个，形成了以古井镇和高炉镇为中心的白酒产业集群，集群区域内白酒生产配置设施齐全，酒类研发、生产、包装、物流等产业链条运转高效。为进一步推动白酒产业集群化、高质量发展，亳州市出台了《亳州市促进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建设“华夏酒城”，构建“一核两区，一圈多点”的整体发展格局，打造“品牌强、品质优、品种多、集群化、集约化”的亳州白酒产业发展体系，进一步巩固提升亳州白酒全省龙头、全国第一方阵的地位。

2　亳州市白酒和中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2.1　亳州市白酒产业面临的问题

2.1.1　资源条件与发展格局相矛盾，导致两个白酒产业集中区差距较大

亳州市正在实施的“华夏酒城”战略提出构建“一核两区”的发展格局，即以古井集团为核心引领，以古井特色小镇和高炉白酒产业集中区为两区。目前，古井贡酒的龙头作用日益增强，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发展状态，核心地位日益稳固，而高炉白酒产业集中区的发展却乏善可陈，其龙头企业徽酒集团资源匮乏，地理位置受限，近些年低迷的状态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该公司位置偏僻，人口较古井镇偏少，人员配备不齐，很大程度上安于现状。“华夏酒城”两翼展开的局面短期内难以形成，“护城河”作用不明显。

2.1.2　资金实力和宣传费用相矛盾，导致中小型白酒企业发展受限

2022年，亳州市白酒生产企业中产值超亿元的企业有古井集团、井中集团、徽酒集团、金不换集团等6家企业，其中：古井集团一家企业的产值就占了亳州市白酒产业总产值的90%左右，剩下两百多家白酒生产企业的产值之和仅为15亿元左右，也说明白酒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的白酒营销模式日渐成熟和没落，需要创新营销模式。[9]众多中小型白酒生产企业利润也较少，仅处于维持生存的状况。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白酒的销售中至关重要，大型酒企有雄厚的资金用于品牌宣传和推广，使众多消费者所熟知；而众多的中小酒企由于资金实力弱，难让自己的品牌为社会知晓和接受，只能走低端路线，进入附加值较低的低端市场，或者为大型酒企提供原料或半成品，选择加入大中型酒企的产业链。中小型酒企的低利润率使得“多点”建设目标难以实现。

2.1.3　企业发展与人员需求相矛盾，导致管理和创新水平难以提高

亳州市大多数白酒生产企业都是由家庭作坊发展而来，企业创始人和高层管理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缺少系统的白酒营销专业知识和现代化企业管理知识。因交通便利程度较差，不具备良好的区位优势，身处亳州的企业难吸引优秀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进入，加之酒企生产基地都位于郊区或乡镇，除了能给出较高薪酬的大型酒企在人才

招聘时相对比较容易外，绝大多数中小型白酒生产企业都很难招到专业对口的大学毕业生，导致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一直上不去。另外，亳州市的白酒企业至今没有形成抱团取暖的局面，依然各自为战，相互间的合作较少，“华夏酒城”提出的融合发展局面远没有形成。

2.2　亳州市中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2.2.1　种植方式不当，导致道地性不足

困扰亳州市中医药产业良性发展的最根本性问题是种植方式导致中药材的道地性不足。虽然亳州中药材种植面积大，种植种类多，但超过90%的中药种植户都是小农散户，普遍缺乏专业种植技术，少数规模化种植户追求高产量和低成本，这两种种植方式导致了中药材道地性较差。使用缺乏道地性的中药材生产出来的中药或中药制品自然很难具备良好的品质和疗效，中药产品的质量难以保证。由于道地性较差，药企和经销商在收购中药材时就不会给出较高的收购价格，种植户就难以获得较好的收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种植中药材的积极性。

2.2.2　研发投入不足，导致以初产品为主

亳州市中药材协会提供的数据表明，亳州市中药生产企业的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多数中药生产企业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不足1%，少数大型中药生产企业，如：北京同仁堂制药亳州有限公司、安徽华佗国药厂、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其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例也不足5%。众多中药生产企业的产品以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中药切片、中药饮片、花茶等为主，而药食同源产品、中成药、中药提取、中药颗粒等产品相对较少，甚至一部分中药生产企业还在寻求古法制药。科研人才的缺乏和研发投入力度不足的叠加，使亳州市中药生产企业的产品以中低端制成品为主，虽然中药制品产量不低，但很难占领高端市场，利润率较低。

2.2.3　品牌建设滞后，导致自有品牌缺乏

被称为“世界中医药之都”的亳州，在中药制成品的品牌建设方面却显得非常尴尬，缺乏知名度高、被市场认可的品牌，影响亳州中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亳州市的160余家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均已注册了商标，但数十年来品牌建设成果乏善可陈。很多亳州本地中药生产企业在为同仁堂等知名品牌贴牌生产，赚取利润相对较少的加工费，由于缺乏知名的自有品牌，难以获得品牌溢价的好处。事实上，亳州市政府在2018年提出了亳州中药产业品牌建设方案，但由于品牌建设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中小型企业及利润率较低的企业缺乏足够的资金和动力，品牌建设效果一直不尽人意。

3　亳州市白酒和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白酒和中医药产业是亳州市最主要的两个支柱性产业，亳州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白酒和中医药两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矛盾、资源环境瓶颈、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等背景下，更高质量、更具效率、更加稳定、更为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10]质量发展的核心意义是以高标准、高要求来衡量事物发展的优劣程度。[11]周涵婷等人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领域的全面发展，其发展重点在于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12]基于以上学者论述，针对亳州市白酒和中医药产业发展历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本文认为亳州市白酒和中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至少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3.1　出台激励措施，培育产业链竞争力

亳州市白酒生产企业和中医药企业众多，但多数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不仅制造企业之间的合作少，而且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很少，整个产业呈现出一盘散沙的局面，产业链的竞争力不强。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制造企业之间和上下游企业之间能自发合作起来，地方政府需要发挥宏观调控和引导作用，出台激励措施，促进和加强中药种植户与中医药生产企业之间、家庭白酒作坊及小型白酒生产企业和龙头白酒企业之间的合作，让中药材种植户、家庭白酒作坊、小型白酒生产企业都能成为白酒产业链和中医药产业链中的一环，相互之间形成合作大于竞争的共生共赢关系；同时，鼓励和引导白酒生产企业和中医药制造企业在地理空间上进一步集聚，营造可以产生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的环境及条件，进一步增强两个产业的全产业链竞争力，进一步解决生产集中区差距较大和发展受限等问题。

3.2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厘清亳州市白酒和中医药产业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从供给方面找出产业发展路径。虽然国内白酒消费量逐年增长，但国产白酒的海外市场占有情况不容乐观，哪怕是高端白酒也未能在海外市场打开销路，需要改进生产工艺。[13]如何改进生产工艺，对于国产白酒和中药的产业转型至关重要。要以树品牌、提品质、优品种为主线，加快推进亳州市白酒和中医药企业的信息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改

造，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大力实施产品品牌化和基地品牌化的创品牌专项行动，加强品牌梯度培育，打造一批白酒和中医药知名品牌，构建“品牌强大、品质优良、品种优化、集群发展”的产业发展体系。按照“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要求，推动白酒和中医药产业的生态化和绿色化发展，尤其是通过发展生态种植，整合种植资源，优化种植结构，建立专业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优质原材料生产基地，有效解决中药材道地性不足的问题，为产品的深加工把好原料关的同时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

3.3　挖掘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优化产业融合发展

相对于机械制造等产业，中医药和白酒产业的发展更加强调历史文化底蕴，文化因素对这两个产业的影响更明显。于刃刚提出产业融合是不同产业之间的传统边界趋于模糊甚至消失的现象。[11]首先，加大亳酒和中医药文化保护力度，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亳州市白酒企业和中医药生产厂家深挖文化资源，打造白酒和中医药历史文化胜地，大力开发白酒、中药旅游商品，打造一批“白酒＋生态旅游、中药＋生态旅游、乡村特色旅游”精品路线，通过发展工业旅游，促进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在全市范围内遴选一批有条件的白酒酿造企业和中医药加工企业作为旅游宣传点，规划建设一批集餐饮、住宿、娱乐、休闲、素质拓展等为一体的特色庄园或博物园。其次，强化中医药产业和白酒产业的融合发展，这两个产业本身就有很大的交叉点和合作空间，引导白酒生产企业开发生产保健酒、养生酒、高端功能酒，相互借助对方的比较优势，增加亳州白酒产品的多样性，宣扬传统中医药文化，打造高端品牌。

3.4　健全用人留人育人机制，加强高端人才引进

缺乏高层次和创新型人才已经严重影响了亳州市白酒和中药产业的发展，针对上述企业发展与人员需求相矛盾的情况，其实是如何创新用人机制，积极引进高端人才的问题。对于亳州白酒和中医药产业的提档升级至关重要。亳州需要持续改革创新机制体制，重视待遇留人、事业留人、综合服务留人、社会名誉留人等措施的有机融合，完善专业人才工作体制，充分保障专业人才引得来、留得住。逐渐增大专业人才关注度，在《中共亳州市委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的基础上，以丰富待遇吸引专业人才、留下专业人才，充分保障人尽其才。主动推进亳州市产业改革创新队伍与皖北实体经济创新队伍的投资建设项目工程、“首席专家工作室”投资建设项目工程，实行改革创新创业领军专业人才行动等。积极优化完善专业人才发展进步软环境，持续完善专业人才综合服务充分保障体制，及时、全面、深入地了解和掌握专业人才日常工作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与意见，主动协调处理和解决，为亳州市白酒和中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保障。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近十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达到55.6%[EB/OL].[2022-09-29].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5266994664900195&wfr=spider&for=pc&searchword=.

[2] 徐坤，王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工业化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4)：94-96.

[3] 黄群慧.论新时期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17(9)：5-24.

[4] 划重点！亳州“十四五”规划纲要发布！[EB/OL].[2021-05-21].https://www.sohu.com/a/468843872_121106991.

[5] 亳州：千年传承 千亿药都.[EB/OL].[2022-09-09].https://ah.news.cn/2022-09/09/c_1128988932.htm.

[6] 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亳州：“世界中医药之都”正加速走来[EB/OL].[2022-11-10].http://tradeinservices.mofcom.gov.cn/article/lingyu/zhongyy/202211/141804.html.

[7] 潇湘晨报.擦亮“金字招牌”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EB/OL].[2023-02-0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7225013417103288.

[8] 安徽亳州：“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路线图出炉[EB/OL].[2020-03-20].https://difang.gmw.cn/ah/2020-03/20/content_33668980.htm.

[9] 陈雪，余莉，王振涛.贵州省白酒行业市场营销人才现状分析[J].中国市场，2018(25)：122＋127.

[10] 马茹，罗晖，王宏伟，等.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9(7)：60-67.

[11] 陈川，许伟.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J].宏观经济管理，2020(3)：15-20.

[12] 周涵婷，宋明顺，程龙生，等.我国质量提升率测算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21，29(12)：203-214.

[13] 熊柳.泸州白酒企业进军新加坡市场营销策略研究[J].酿酒，2021，48(2)：29-34.

[14] 于刃刚，李玉红，麻卫华，等.产业融合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张彩云

数字乡村战略下淮北农产品电商 PEST 分析及发展策略

周莉婷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系，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淮北市一二三产业失衡，农业发展成为短板，农产品电商发展滞后，严重制约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以 PEST 分析为基础，淮北农产品电商存在农村电商横向对比滞后、农产品结构较单一、城乡收支水平差异较大等问题，依托数字乡村战略背景，结合淮北农产品资源禀赋，提出发展农产品电商集聚产业区、“田园乡村”经济、培育本地农产品品牌等策略。

关键词：数字乡村；PEST 分析；农产品电商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23)04-0113-04

2019 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两部门发布《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将数字乡村发展放在重要位置，提出数字乡村建设分 2020 年、2025 年、2035 年、2050 年四步走的发展目标，[1]指出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和数字中国建设重要内容，加快了数字农产品电商时代到来。

1　问题提出

2020 年淮北市经济统计报告显示：全市全年 GDP 为 1 119.1 亿，三次产业结构 7.2∶41.7∶51.1[2]，比较 2019 年三次产业结构 6.8∶42.7∶50.5，[3]一三产小幅提升、二产有所降低，但一产短板明显，二产仍是支柱，三产经济贡献逐步提高。202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60.8 亿元，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99.7 亿元，占比 22%；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实现网上零售额 4.9 亿元，下降 31.2%，占比 1.06%。农业、电商整体发展滞后，严重制约了淮北市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了淮北经济转型发展速度，而乡村消费占比过低，不利于刺激消费拉动经济，更加不利于消除城乡贫富差异实现共同富裕。

2021 年的前 5 个月，淮北市农村电商交易额 12.88 亿元，同比增长 16%，其中：上行农产品网销额 2.85 亿元，同比增长 14%。2020 年，全市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约 45 亿元，其中：农村电子商务交易额 34.568 亿元，同比增长 23.64%。全市新增农村电商经营主体 198 家。5 家企业产品被评为 2020 年安徽好网货品牌。[4]208-211 2019 年全市实现农村电子商务交易额 27.96 亿元，同比增长 93%；上行农产品交易额 8.22 亿元，同比增长 123%；全市新增农村电商经营主体 243 家。[3]不难发现，近年来，淮北农村电商交易不断攀升，农产品上行也成为主要发展趋势。

近年来，随着电商经济渗透率越来越高，电商市场开始向三线以下城市下沉，农产品电商发展迅速，河南、安徽、山东等地农产品电商对于解决当地贫困地区脱贫、促进当地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显著作用。[3]电子商务显著提高农产品的销量和农民收入水平，推动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2019 年《纲要》提出“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深化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培育农村电商产品品牌、推动互联网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等系列发展农村数字经济举措。[1]

基于此，依托数字乡村战略背景，尝试用 PEST 分析法，对淮北农产品电商发展宏观环境进行分析，并剖析成因，提出可行建议，积极为淮北实现乡村振兴、数字经济寻求有效解决办法。

2　淮北农产品电商 PEST 分析[4]

PEST 分析是一种宏观环境分析方法，从 P（Politics）政治、E（Economy）经济、S（Society）社

收稿日期：2023-04-09
基金项目：安徽省 2019 年高校质量工程项目“电子商务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编号：2019cxtd036）、安徽省 2020 年高校质量工程项目“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电子商务与物流》”（编号：2020szsfkc0792）、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数字乡村战略下淮北农产品电商问题研究”（编号：2020-B-6）和安徽省 2021 年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职教园区服务能力提升工程项目“濉溪县淮海村特色村镇建设研究”（编号：WB-ZJYQ-03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周莉婷（1978—），女，安徽淮北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职业教育。

会、T(Technology)技术四个维度对社会宏观环境进行分析。

2.1 政策环境

2.1.1 国家政策支持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发展农业、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等经济政策,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关于做好2020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随着农村电商政策不断完善,电商助农成效逐步显现。

2.1.2 地方扶持政策

依据中央精神,安徽省及淮北市先后出台助力电子商务产业相关政策,如:《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实施意见》《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农村电商优化升级工作方案的通知》《淮北市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淮北市农村电商提质增效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淮北市各区县及乡镇纷纷出台配套政策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助推数字乡村、乡村振兴战略实现。

2.2 经济环境

2020年,淮北市生产总值(GDP)为1 119.1亿元,同比增长3.3%,批发和零售业97.9亿元,上升3.6%,占比8.7%,网上商店从无到有,2020年共有限额以上零售网店12家。[5]

2020年,淮北市农业实现总产值133.8亿元:粮食面积412.8万亩,粮食总产量达到149.4万吨,增长0.14%,其中:小麦99.9万吨,玉米41.2万吨,大豆8.1万吨,油料产量0.5万吨,增长12.5%;水果产量33.9万吨,增长2.3%;蔬菜及食用菌产量40.7万吨,增长4.8%。[2]

2.3 社会环境

2.3.1 淮北城乡人口及消费规模

2020年,淮北市户籍人口218.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22.6万人,乡村人口96.3万人,城镇化率56%。[2]2021年,城镇化率达64.16%,位于皖北第1、全省第5。[5]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60.8亿元,比上年增长1.3%,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61.1亿元,增长0.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99.7亿元,增长3.2%。[6]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城镇消费总量远大于乡村消费,但乡村消费增长幅度远大于城镇。

2.3.2 淮北城乡收支差异

2020年,淮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 127元,比上年增加1 551元,增长5.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 428元,比上年增加1 701元,增长4.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 218元,比上年增加1 166元,增长8.3%。[2]淮北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明显,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较大,但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远高于城镇,也说明国家各项三农政策起到积极作用,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升。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 283元,增长4.0%,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 611元,增长4.7%。[2]可见,总量上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1.83倍,城乡消费支出差距较大,但农村人均消费支付增长率略快。尽管农村消费潜力巨大,农村收入提升,但受限于可支配收入总量所限,制约了农村消费支出的总量。

2.4 技术环境

2.4.1 我国网民规模及网络普及情况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比上年末增长3 549万。其中: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3.08亿,较2021年12月增长2 371万,占网民整体的28.9%。互联网普及率达75.6%,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1.9%。[7]

2.4.2 我国通信网络基础设施

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移动电话基站总数达1 083万个,互联网宽带接入数达10.71亿个,光缆线路总长度达5 958万千米,移动电话基站总数达1 083万个,5G基站总数达231.2万个。全国农村宽带用户总数达1.76亿户,全年净增1 862万户,比上年增长11.8%。[7]

3 存在问题

依据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通过对淮北农产品电商进行PEST分析,我们发现淮北农产品电商存在以下问题。

3.1 政策引领,农村电商发展成效明显,横向对比水平仍滞后

安徽省商务厅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淮北市共有省级农村电商示范县1个(濉溪县),省级农村电商示范镇10个,省级农村电商示范村30个。淮北农村电商发展成效显著,但省内其他地区横向对比发展仍然滞后。究其原因,通过2019—2021年淮北农村电商省级示范建设成果,对比2017年,只申报通过一个农村电商濉溪镇,示范镇

农村电商示范县、示范村数量均为0。

3.2　经济总量逆势上扬，省内排名仍靠后，农产品结构较单一

2020年，受疫情影响，淮北经济总量逆势上扬，同比增长3.3%，但全省排名13仍靠后。[2]2021年，淮北粮食播种面积413.01万亩，总产量151万吨，实现“十八连丰”，面积和总产双增长；小麦单产496.6公斤，连续三年全省第一；小麦良种繁育面积5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2.5万亩、建设高标准农田示范区1万亩。[4]208-211由2020淮北主要农产品结构图发现，淮北主要农产品中粮食占比62%，小麦占比却达67%。[2]淮北实现粮食总产量“十八连升”，受益于依托资源优势，积极开展小麦良种繁育建设、标准农田建设、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的打造等粮食基地建设，取得良好成效。但从产品结构看，淮北农产品存在类型高度趋同，品种结构单一，农作物多元性不够，经济作物占比太低等问。

3.3　收支水平上升，但城乡收支差异较大，人均GDP迈入中高收入国家水平

2021年淮北城镇人均消费品零售额29 454元，乡村人均消费品零售额10 353元，城乡相差2.8倍，乡村消费品消费水平偏低。[4]但是，乡村人均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是城镇的4倍，说明各方努力下，农业农村经济逐步改善，乡村潜力很大。城乡收支规模，城乡人均收支差异较大，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的2.39倍，城镇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的1.83倍，城乡收支差异较大，拉低了社会整体消费规模，不利于消费拉动生产经济政策实施，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从增长速度来看，人均收支农村均高于城镇，说明农民消费潜力远高于城镇。

2020年淮北人均GDP为51 147.17元，按人民币年均汇率折算，达7 415.427美元，按世界银行2015年标准，淮北人均GDP水平已经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这说明淮北经济在阵痛中转型取得一定成绩，尤其在疫情期保持经济加速增长更加不易，但也应该看到，对比全国人均GDP1.2万美元远未达全国平均水平。

3.4　网购习惯养成但有新变化，通信网络趋成熟，但农产品数据化度低

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21年消费对经济贡献率为65.4%。[8]2022年底，我国农村网民达3.08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61.9%，网民网购习惯逐步养成，随着农村网民数量和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高，为农产品电商提供数字经济基础。[4]208-211

我国5G网络全球领先，我国行政村甚至贫困村基本实现通信网络全覆盖，较为成熟的通信网络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数字乡村发展提供网络技术保障。但我国农产品数据化管理程度较低，缺乏农业基础数据，如：农产品市场信息、农产品质量追溯、农药使用数据等。

4　淮北农产品电商发展策略

4.1　巩固农村电商省级示范成果，发展农产品电商集聚产业区

近年来，淮北农村电商发展成效显著，依托省级示范建设成果，如：临涣村、临涣镇被列入省级农业电商示范镇、示范村，结合临涣特色农产品临涣马蹄烧饼、临涣酱菜、临涣棒棒茶等发展农产品电商集聚区。[9]由于农产品电商规模一般较小，产业集聚区的知识、技能、经验等外溢及产业关联效应，可以带动物流、农产品采购、加工等关联产业发展，从而实现集聚区产业协同、共享、开发、绿色、联动，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同时，临涣镇还是省级旅游特色名镇，可以借用省级旅游名片引流外地游客发展线下农特产品体验消费，再由线下消费引流线上消费。农产品电商示范镇＋旅游特色名镇，二者合力，共同推动临涣本地经济发展，打造淮北经济新名片。

4.2　打造“最美田园”名片，发展“田园乡村”经济

淮北农产品结构单一，主要农产品粮食占比62%，粮食中小麦占比67%，可见，小麦是淮北农产品的支柱。[2]依托小麦良种繁育建设，打造小麦良种品牌，提升小麦种植的高附加值。同时，依据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选取种植连片，道路沟渠完整，周边交通便利，衔接周边美丽乡村、特色旅游景点、美食特色、农家乐等旅游资源，通过乡村环境整治、田园清洁化、景观化、生态化，建设小麦良种繁育基地、小麦高标准农田示范园等，融入当地风俗文化、农耕文明、五谷科普、农产品品牌等元素，打造“最美田园”名片，发展“田园乡村”经济。

4.3　培育本地农产品品牌，构建农产品标准化体系[10]

2020年淮北新培育27个以上“三品一标”农产品，如：芦笋茶、隋唐飘飘香油、皖雪小麦胚芽等网销产品。成功品牌效应可以带动其他农产品品牌化建设，借鉴成功品牌经验，融入本地特色农产品独特属性、人文地理元素等，挖掘种养方式、品种改良等差异，提炼产品和品牌差异化价值，打造专

属独特产品品牌，政策引导通过线上线下产销会推广本地产品品牌。

农产品标准体系建设则需要政府规范农产品检测标准、严格市场监督，构建农产品分类分级管理体系、物流配色标准规范体系、产品质量溯源标准体系等，规范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办法。[11]

4.4 政策引路农产品数字化建设，助推农村电商深入发展

2019 年《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和 2021 年《"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均对农产品数字化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农产品数字化，包括：全要素数字化、生产过程数字化、农产品数字化、交易的数字化、物流配送数字化、支付结算数字化、质量监测数字化，等等。农产品生产过程数据化，可以利用物联网、遥感技术、卫星技术等检测农情，种植类型、面积、土壤墒情、病虫害灾害、作物长势等数字化动态监测，实时预警。[12]

5 结束语

淮北市近年国民经济发展稳步提升，但一二三产发展不平衡，农业发展缓慢、农产品电商发展滞后，农业短板突出，限制了淮北经济转型和发展速度。为寻求有效解决办法，利用 PEST 宏观分析方法，分析淮北农产品发展现状，发现存在农产品结构较单一、收支水平城乡收支差异较大等突出问题。依托乡村振兴、数字乡村战略背景，我们提出发展农产品电商集聚产业区、"田园乡村"经济等建议，以期为淮北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有效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EB/OL]. (2019-05-16)[2022-01-10].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5/16/content_5392269.htm.

[2] 淮北市统计局. 淮北市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1-05-07)[2022-01-10]. https://tj.huaibei.gov.cn/xwzx/tjgb/56600101.html.

[3] 淮北市统计局. 淮北市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0-05-25)[2022-01-10]. https://tj.huaibei.gov.cn/xwzx/tjgb/56150231.html.

[4] 任志军. 小农户直播电商的 PEST 与 SWOT 分析[J]. 安徽农业科学，2021(14).

[5] 覃卫国. 政府工作报告[EB/OL]. (2022-01-13)[2022-01-14]. https://www.huaibei.gov.cn/xwzx/zwyw/61196341.html.

[6] 淮北市统计局. 淮北市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1-05-07)[2022-01-14]. https://tj.huaibei.gov.cn/xwzx/tjgb/57082671.html.

[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1-09-15)[2022-01-14]. 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109/t20210915_71543.htm.

[8] 国家统计局. 2021 年四季度和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算结果[EB/OL]. (2023-03-02)[2022-03-05]. https://www.cnnic.cn/n4/2023/0302/c199-10755.html.

[9] 汪娟. 数字乡村视角下"新零售"农村电商模式研究[J]. 武汉商学院学报，2019(4)：31-34.

[10] 梁甜甜. "互联网＋"背景下安徽省农产品电商发展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13)：153-155.

[11] 金恩焘. 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D]. 南昌：南昌大学，2020：165-166.

[12] 赵练达. 中国数字乡村建设问题研究[D].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20：47-48.

责任编辑：杜红艳

PEST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Huaibei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under the Digital Rural Strategy

ZHOU Liting

Abstract: The imbalance of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Huaibei has led to a shortag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mmerce lags behind, seriously constrain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PEST analysis, Huaibei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has problems such as lagging horizontal comparison of rural e-commerce, single agricultural product structure,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urban-rur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levels. Relying on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rural strategy and combined with the resource endowment of Huaibei agricultural products, strategic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develop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aggregation industrial zones, "pastoral rural" economy, and cultivate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s.

Key words: digital countryside; PEST analysis;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